

〔日〕近藤邦康 著

革命者  
与  
建设者

河東

在战后的日本，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作为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领袖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学界以《毛泽东选集》为基本资料对其思想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先行研究，我特别重视毛泽东死后  
的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以及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以及  
野村浩一、李泽厚、斯图尔特·R·施拉姆的研究。

关于研究方法，我立志描绘出日本人眼中的  
毛泽东，为此设定了以下三个视角：

- 第一，近代中国与毛泽东的视角
- 第二，中国思想史与毛泽东的视角
- 第三，中国社会主义与毛泽东的视角

本书力求把毛泽东通过革命的实践和建设的实践产生出来的思想，作为生活在一个时代的个人的思想，当作一种思想加以理解。

ISBN 7-5006-5772-2



9 787500 657729 >

ISBN 7-5006-5772-2/A·25

定价：29.80元

# 革命者与建设者 与 河东

〔日〕近藤邦康 著

宋志勇 孙雪梅

桑凤平 孙继强

万鲁建 周志国

石秀梅 张利军

田庆立 刘志强

曹修平 邵建彤 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CHINA YOUTH PRESS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毛泽东 革命者与建设者 / [日] 近藤邦康著; 宋志勇等译.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4

ISBN 7-5006-5772-2

I. 毛... II. ①近... ②宋... III. 毛泽东 (1893~1976) - 生平事迹 IV. A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0111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3-8477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http://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64033813 邮购部电话: (010) 64049424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1000×700 1/16 25.5 印张 2 插页 380 千字

2004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定价: 29.80 元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64033570

雄狮书店: (010)84039659

## 中文版序言

金冲及

毛泽东,似乎已成为永远也谈不完的话题。尽管他逝世已近三十年,尽管中国和世界都已发生巨大变化,人们依然时常热烈地谈论他,饶有兴味地阅读各种同他有关的书籍。这种现象并不奇怪。不管赞颂他还是反对他的人,都无法否认一个事实: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实在太太大,这种影响在三十年后的今天仍处处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可以说:如果不了解毛泽东,对今天中国社会生活中许多问题都很难有真切的了解。

在研究毛泽东的著作中,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受到众多读者的关注,因为它是以中国人以外的另一种眼睛来观察这段历史的。他们常常从不同的视角,或者采用不同的方法,提出一些中国读者以前没有想过的问题。即使你不赞成这些著作中的某些论断,它仍可以启发你作进一步的思考,深化你对问题的认识。

日本学者近藤邦康教授对毛泽东的研究,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他是一位严肃的富有学术素养的学者。我同他认识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大概在他开始来中国进行学术访问后不久,那时他是东京大学的

教授。我们是同辈人。当他来中国或我去日本时，常有机会深入交谈，最初是谈章太炎(炳麟)，以后谈孙中山，后来就着重谈毛泽东。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近代思想发展有相当深入的了解。更可贵的是，在他表面上很平静、甚至有些拘谨的学者风度背后，可以感觉到他怀着一颗执着地探寻真理的热烈的内心。他总是在思考，总是在追根究底地寻求找出问题的答案。这种思索和寻求，都是十分认真的。

最近，他的大作《毛泽东——革命者与建设者》中译本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这是他多年研究成果的结晶。近藤邦康教授从日本打来电话，嘱咐我为本书的中译本写篇序言。因为出版的时间不能耽误，我只来得及将清样匆匆地读了一遍。总的说来，我感到这确实有如作者所说，称得起“有日本特色的毛泽东研究”。由于作者本身具有的条件，这本书有着两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书中用力最多的，是对毛泽东思想观点体系的剖析，并且把它放在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复杂背景下，放在对毛泽东产生过影响的那些先行者的细心比较中，又密切联系他的实践活动来研究。书中利用已经公布的档案、文稿和回忆资料，通过细腻的叙述，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巨大贡献和成就，注意到他“坚持以平等取代不平等的强烈的平等思想”，突出他在“救亡”(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之中)、“民主”(把人民从君主统治的客体转变为革命主体)的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直陈他有过的严重失误，提出了不少很有见地的看法。

第二，作者把毛泽东的一生划分为青年时期、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历史的跨度很长，几个时期之间的差别不小，驾驭这样一个研究课题，自然十分不易。作者说道：“从一个日本人、一个知识分子的眼睛看，我首先被毛泽东个人吸引住，因此想抓住生活在一个时代的毛泽东个人的思想。”他努力寻找毛泽东一生中“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又仔细研究各个时期所具有的不同特点和相互关系，认真地考察毛泽东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哪些是一贯的，哪些发生了变化。书中详细地论述了这个发展过程，写道：“在革命时期，他把‘人民’理想主义和‘实际’现实主义坚韧地结合起来。在建设时期，他虽然努力结合这两个方面，但有时出现了背离，陷入了困境，倾注力量于再结合。这是

变化的。”这个论断是客观的。

这些都会给中国读者以有益的启发。当然，书中的论述并不是没有什么可以商榷之处，有些地方还明显受到中国不少档案尚未公布的限制。但作者在中译本后记中所说，希望中国读者能以“‘他山之后，可以攻玉’之精神看本书”。这种作用，我想一定是可以达到的。

2004年6月

（金冲及先生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研究员，  
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 目 录

金冲及序

前言 课题与视点 .....	1
凡例 .....	15
绪论 中国的近代——“救亡”与“民主” .....	17

## 第一部 革命者毛泽东

### 第一章 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的五四

运动(1893—1921) .....

第一节 “精神之个人主义” .....

第二节 “民众的大联合”与“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 .....

### 第二章 农民的革命——国民革命和苏维埃

革命(1921—1937) .....

第一节 湖南农民运动 .....

第二节 “农村包围城市” .....

### 第三章 民族的抵抗——抗日战争(1937—1945) .....

第一节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第二节 《实践论》与《矛盾统一法则》 .....

第三节 《论持久战》与《论新阶段》 .....

第四节 新民主主义、整风运动、联合政府 .....



第四章 人民的解放——人民解放	
战争(1945—1949) .....	157
第一节 从“和平、民主的新阶段”到自卫战争 .....	158
第二节 战略进攻与土地改革 .....	175
第三节 和平谈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	186

## 第二部 建设者毛泽东

第一章 朝鲜战争与社会主义改造(1949—1956) .....	203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与朝鲜战争 .....	203
第二节 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	214
第二章 中苏论战与社会主义建设(1956—1966) .....	230
第一节 《论十大关系》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的问题》 .....	230
第二节 反右派斗争与大跃进 .....	247
第三节 调整与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理论 .....	265
第四节 中苏论战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	276
第三章 越南战争与文化大革命(1966—1976) .....	297
第一节 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 .....	298
第二节 开门整党与红卫兵运动 .....	314
第三节 中美和解与文革体制的矛盾 .....	336
结论 毛泽东 实践和思想 .....	353
主要文献目录 .....	364
后记 .....	389
中译者后记 .....	392
中译本著者后记 .....	393

## 前言 课题与视点

### 我与毛泽东

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的中国近代史中,中日战争是中国对最大的侵略进行的最大的抵抗。对此,毛泽东 1938 年 5 月至 6 月在延安做了《论持久战》的演讲,预见“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毛集》第六册第 143 页),并亲自进行了模范的持久战。1945 年 8 月日本的战败,证实了这一预见是正确的。四年以后,毛泽东又取得了国共内战的胜利,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毛选》第五卷第 5 页),并于 1949 年 10 月 1 日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东西方冷战期间,中日战争状态延续了 23 年。1972 年 9 月经过田中角荣和毛泽东、周恩来的交涉,中日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中日共同声明明确写进了“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在这一政治基础上,日中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交流和文化交流,直至今日。

在战后的日本,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作为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领袖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学界以《毛泽东选集》为基本资料对其思想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1976 年 9 月 9 日毛泽东去世,两年后进入了邓小平时代,中国转变为改革开放政策,并做出了毛泽东功绩第一、错误第二,文化大革命完全错误的结论。在这一框架内,相关的资料和研究成果不断公开、出版。这一时期,日本主要关注中国的改革

开放,对毛泽东的关心度下降,研究减少。但是,在中国,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个时代是连续的,如何继承和批评毛泽东,仍是今天非常重要的问题。要了解邓小平时代及其以后的中国,就有必要研究毛泽东的思想。

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在战后日本研究中国的气氛中,我读了《毛泽东选集》,为其魄力所吸引。一方面感叹《论持久战》中对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非常正确的预见;另一方面,也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讲话》)要求知识分子作为人民的一员,为工、农、兵人民群众服务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感动。同时也留下了疑问,感到自我改造好像有压制作作为个人的知识分子自立的一面。我自己考虑,比起看革命的结果,更应先了解新中国是怎样从旧中国建立起来的这一革命的过程。为此,我便以毛泽东的先行者谭嗣同、章炳麟、李大钊为中心致力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并在1981年出版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从毛去世后的1977年开始撰写关于毛泽东的研究论文。

本书力求把毛泽东通过革命的实践和建设的实践产生出来的思想,当作生活在一个时代的个人的思想,当作一种思想加以理解。毛泽东对外抵抗侵略,对内突破束缚(“冲决网罗”),发挥人民自己的力量,把国家独立和革命结合起来。他的这一根本思想是一贯的,其核心是“人民、矛盾、大同(共产主义)”,是从外部对帝国主义的“绝对批判”(人们在历史当中,在彻底地批判他的“同时代”时所依据的立足点,即极端地批判现实的论据、绝对假设。梅本认为,基督教教义里的“原罪”、马丁·路德主张的“自由”、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哲学”和“无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共产党宣言》等,在历史上起过“绝对批判”的作用。——梅本《现代思想入门》<sup>①</sup>,第56页)。而且,在革命时期,他把“人民”理想主义和“实际”现

---

<sup>①</sup> 梅本在该书中还这样说道:“基督教提出的原罪,也是历史上出现的这种绝对批判之一(第56页)。民众根据“上帝的面前人人平等”的教义,“以上帝的名义”“提出自己的愿望”,“向统治者提出强烈的抗议”(第51—52页)。而马克思则把“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作为“人类的原罪”,即“一切矛盾的根源”(第194页)。对于由私有财产产生的近代国家和市民社会,他主张工人阶级(近代产业的雇佣工人阶级)应以哲学为武器,通过实践加以绝对批判,并使之解体,“通过完全恢复人性”,“恢复自己”。“大长征”是对“当代帝国主义”

实主义紧密结合起来，在建设时期，他的根本态度没有改变，在军事、外交领域相当成功地把两者结合起来，但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却出现了背离，陷入了困境，便倾注力量于再结合。本书把这种一贯性和变化作为线索，以阐明其思想发展的主要脉络。

## 研究的视点

关于研究方法，我立志描绘出日本人眼中的毛泽东，为此设定了以下三个视角：

### 第一，近代中国与毛泽东的视角。

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一百多年的近代中国，被卷入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濒临灭亡的危机。中国人为抵抗外来侵略和国内专制奋争苦战，终于打破危局，起死回生。从这一过程阐明在“救亡(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中)——民主(把人民从君主统治的客体转变为革命的主体)”的历史中毛泽东的地位和作用。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是建立在竹内好(1910—1977)毛泽东研究基础之上的。

竹内好把毛泽东思想的核心看做是“抵抗”的思想，对近代中国从对西方扩张、侵略的抵抗上加以把握，把鲁迅的文学和毛泽东的根据地视为代表。他认定根据地“自力更生”、“不依存于其他力量”，是不受支配夺取不了的独立存在。认为根据地的“最小单位是个人”，“就像革命需要根据地一样，个人也必须有根据地”，并将其归结为“人格的独立”。此外，他还认为“如果根据地变得最大，敌人的战斗力就变得最小，武装斗争也就会因此而消失”。为此，“毛泽东明显接近了和平革命”。这是尝试要在中国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和日本战后民主主义(人格独立、和平革命)之间架设思想上的桥梁(《毛泽东》，1951年；《全集》第四卷、五卷)。

### 第二，中国思想史与毛泽东的视角。

---

的“绝对批判”(第239页)。在其延长线上(第252页)，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积极从事“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宏大事业”(第239页)，但“那仅仅是在与历史的发展规律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够成功”(第240页)，“有必要找出其绝对批判的表现形式和实践形式”(第242页)。

与具有四千年东亚文明中心地位的旧中国的思想、体制进行搏斗,实现价值转换,并创造新中国的思想、体制,这是毛泽东不管是革命还是建设时期都坚持不变的事业。对该课题的考察是继承了西顺藏(1914—1984)的毛泽东研究。

西顺藏把毛泽东思想的核心看做是“人民”和“实践”,把中国近代的历史,看做是一方面抵抗近代西方的侵略,一方面在最低层的农村进行自我变革,将自己的被动性转变为能动性,打破了近代西方的侵略和中国旧体制的过程。他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旧中国的总体的“人伦”原理和“行”的立场,抵抗了近代西方个人的“人格”原理和“知”的立场,并自我颠倒,产生了毛泽东哲学,即总体的“人民”的原理和“实践”的立场。毛泽东哲学是领导人民,教育人民,使他们在总体抵抗运动中成为个人的主体,“成为能动的人格集团”,《关于中国的〈实践论〉〈矛盾论〉》,1953年;《著作集》第一至三卷)。西顺藏着眼于中国革命的“思想的实践性质”,意欲将其活用于日本知识分子的自我批评中。

第三,中国社会主义与毛泽东的视角。

这里想研究毛泽东从苏联的社会主义中吸收了什么?怎样运用苏联的模式创造出了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本书虽不将邓小平时代及其以后作为研究对象,但留意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评价。在关注邓小平时代及其以后的成就和困难的同时,思考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跟我合作主编《苏联的改革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合作写作其第一章和第六章的和田春树(1938—),提出了“应付世界战争的新总力战体制”的“国家社会主义”(《苏联的改革与中国的改革开放》,1993年;《作为历史现象的社会主义》,1992年)概念,本书将其应用于分析毛泽东的思想和行动。

和田春树的见解,可以归纳为以下内容:

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认为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为了分割世界而发动了世界战争。要从世界战争中拯救人类,就必须通过社会主义世界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创立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他认为,“革命政权如果学习德国,实现战时统制经济,俄国也会向社会主义发展”。他在俄国革命中,将工人、士兵运动及农民运动相结合,创立了共产党一党独裁的新总力战国家和“战时共产

主义”，构筑起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基础。经历了强化政治一元化，经济、社会多元化的新经济政策后，在 1927 年以后战争威胁增长的情况下，斯大林推行了由“农业的全盘集体化、强制工业化，作为阶级斗争的文化革命”构成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实现了“计划经济与经济一元化”、“党、国家、社会团体的一元化”（第一级结构），完成了“国家社会主义”。1936—1938 年期间，增加了由大清洗、斯大林个人独裁，家庭成为公的统制末端组织构成的“第二级结构”，对德国、日本夹击苏联的恐惧心理把这个体系的各个因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斯大林的死去和对斯大林的批判，“第二级结构”被清除，“国家社会主义”成熟起来。

### 关于先行研究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先行研究，我特别重视毛泽东死后的中国共产党（以下有时简称“中共”）对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以及野村浩一、李泽厚、斯图尔特 R. 施拉姆的研究。叶剑英代表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大革命做了如下评价：反对“对内压迫人民，对外追求霸权”的苏联修正主义，防止中国的修正主义（“反修防修”）这一出发点，与对形势做出的违反实际的估计及错误的斗争方针发生了矛盾（《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79 年 9 月 29 日）。邓小平则指出，文化大革命源于毛泽东“避免资本主义复辟”这一主观愿望，与他对“实际情况”的“错误判断”之间的矛盾（1980 年 8 月 21 日，《邓选（1975—1982 年）》，第 305 页）。

但是，邓小平主导下 1981 年 6 月 27 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以下简称为“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历史决议”没有谈及邓指出的矛盾，对文化大革命予以全面的否定。即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区别开来，将其作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思想给予全面的肯定，而对毛泽东个人的评价是功绩第一位，错误第二位。对新民主主义革命（1927—1949 年）、社会主义改造

(1949—1956年)的胜利给予了全面的肯定,对社会主义建设(1956—1966年)的成果和错误进行分析,基本予以肯定。而对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则批判它是脱离了毛泽东思想,“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是“左倾”错误。并定性为:“是由领导者(毛泽东)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该决议还从党内如何做出决定的程序上批评说,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党内的不同意见被视为路线斗争,“党内关系日趋紧张”。由于毛泽东的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但“历史决议”也承认,“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做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毛泽东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的错误”,“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25年前的1956年,毛泽东反对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给斯大林做出了“成绩多于缺点”(三七开)的评价。“历史决议”借用了毛泽东的故智,对毛泽东做出了相应的评价,没有重复赫鲁晓夫的失败,这是贤明之举。但是,对文化大革命仅仅全面否定,对其矛盾不加分析,就不能对其有全面深刻的认识。

在日本的毛泽东研究中,野村浩一(1930—)在毛泽东时代撰写了《中国革命的思想》(1971年)一书。他在书中一方面思考眼前开展的文化大革命“解放群众”的思想和“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的动因,一方面考察革命史中的“群众路线”,将其视为从过去到现在贯穿于中国革命的“类型”。以“‘被压迫的人民大众’——反抗压迫站立起来的‘人民’的逻辑”(第144页)为基轴,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论断与“以先进的革命理论武装起来的先锋党”俄国不同,中国毛泽东的党,是“反抗压迫”、“领导人民事业的核心力量”的“核心党”(第324页)。他主张,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拒绝西方从外部“强制的‘历史(规律)’”的同时,中国革命也拒绝了“以先进国家苏维埃——为顶点的新的世界史中得到应有地位”。在此意义上,“它是从拒绝‘世界史’,拒绝‘世界史的理论’上出发的(第320页)”。他认为,从卢梭到黑格尔、马克思,这一“欧洲思想史的主要潮流”,与近代市民社

会内在的“公—私”矛盾斗争中，造就了“公”的观念。这个潮流与打破前近代性的宗族主义、地方主义及派阀主义的“私”=集团性的利己主义，建立反抗帝国主义、军阀压迫的人民的“公”，实现社会统一的毛泽东的“破私立公”，具有“内在的联系”（第201页）。而且，发现了“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理念”与“提倡扬弃自我异化、恢复人的本质的马克思”之间“基本上的一致点”〔（第215页）、（近藤，1971年）〕。野村还在《毛泽东》（1978年）一书中，从“解放的思想”、“实践的思想”、“教育的思想”三个侧面来把握毛泽东的思想，“追求改变了历史的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关于文化大革命，认为毛泽东是为了实现人民在群众运动中改造意识、精神的“文化革命”而发动的，是旨在打倒阻碍这一运动的党内实权派=修正主义分子的“政治革命”。

进入邓小平时代后，野村在《近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新青年〉的群像》（1990年）一书中，正视文化大革命显露出的陈旧的体制、特别是政治权力及民众的暴力等“行使权力的实际状况”，考察了1915年创刊的《新青年》杂志及其运动。他认为，以陈独秀为中心的知识分子，为了瓦解辛亥革命及中华民国建国后出现的军阀“旧的专制权力”，依据新的文明（民主与科学），对构成权力基础的“旧文明世界”（儒教——家族制度与道教——迷信）进行了批判。但经过“五四运动”，他们立志依据“新的权力”（无产阶级专政）来创造“新的文明世界”，完成了结构性的转变。关于他们提出的启蒙、解放、权力，他认为毛泽东的革命运动带来了：（1）权力与“民众世界被压制的力量”相联系（第367页），与解放相结合；（2）但“文明的变革”=启蒙的课题并未解决，它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新的权力被旧的文明所浸透（近藤，1991年）。

《中国革命的思想》中，将反抗压迫的人民作为毛泽东思想核心的观点，现在看也是合理的。但是，毛泽东在以“敌人侵略我反抗”这一矛盾论为基点的同时，在如何与“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再到社会主义”这一发展阶段论（世界史的基本法则）相结合上却是煞费苦心（《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拒绝‘世界史的理论’”这一表现或者构思，看来似乎是割舍毛的这一面的。《近代中国的思



想世界》中的(1)和(2)两个论点,分别开来都可以理解,但怎样看待其相互关系呢?我以为,在毛泽东思想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启蒙在革命时期的农民解放中具体化了;革命时期着力于根据地的农民解放、战争和大后方知识分子的启蒙、民主互相支持;建设时期则将知识分子的启蒙埋没于农民解放之中。有必要进行上述时期上的划分,具体阐明启蒙和解放的相关关系。

在中国的毛泽东研究中,李泽厚(1930—,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思想史、哲学、美学学者,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化界的精英)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1987年)等著作中,在大致赞同“历史决议”的同时,在时代思想史上也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他高度评价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与农民革命战争的实际以及兵家(孙子、吴子等先秦兵法家学派)辩证法的传统相结合并使之中国化,建立了主观能动性、实践与客观实际、认识相平衡的“斗争哲学”,成功地领导了军事斗争、统一战线、思想改造,夺取了政权。但他也认为,建国后,毛泽东根据宇宙通过矛盾、斗争而发展这一辩证法的唯物论,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种“两军对战”的图式强加于政治、经济、思想上。毛没有进行以历史唯物论为基础的科学研究,也不向工业大生产的方向发展,而是以思想、政治统帅经济、技术,发动群众运动批判右倾,改变了生产关系,这是1957年以后中国陷入苦难的原因。

李泽厚主张,在“五四”以后的革命战争中,“救亡”(政治。反帝国主义、集团主义)压倒了“启蒙”(文化。反封建主义、个人主义),封建主义的集体主义渗入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中,带来了文化大革命=“封建传统的全面复活”。而以农业小生产为基础的斗争哲学、道德主义、民粹主义为“体”(根本原则),以马克思主义为“用”(辅助作用)的“中体西用”,创造性地转换为“西体(现代化。引进现代大工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思想体系中用(民族化。适用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实践活动)”。但他也指出,文化大革命有人民群众特别是学生,对共产党的“封建性的官僚主义”及等级主义、服从主义“不快、不满和愤怒”爆发的因素。毛泽东则是憎恶和希望打碎官僚机器,“追求新

人和新世界的理想主义的一面”，与“重新分配权力的政治斗争的一面”混在一起的(第192—193页)。李泽厚以解放的一代知识分子丧失自我的悔恨与恢复自我的期望为立足点，把毛泽东的巨大形象对象化、相对化，从闭塞中提示了出路。他的这些分析和建议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也存有疑问，这就是李泽厚仅仅提“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再到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而不提“帝国主义与民族解放运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并舍去了致力于将社会主义建设的斯大林模式中国化，把封建小农生产转变为现代工业大生产这一毛泽东的思想和行动(近藤，1988年、1992年)。

在英国，斯图尔特 R. 施拉姆(Stuart R. Schram, 1924—, 1967—1990年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政治学教授)在其主要著作《毛泽东的思想》(The Thought of Mao Tse-tung, 1989年)中，照应毛泽东制造舆论(文化革命)、夺取政权(社会革命与民族革命相伴的政治革命)、建立新的生产关系(经济革命)、发展生产力(技术革命)这种革命与建设的图式，将无产阶级政党与农民的基础，决定论(determinism)与唯意志论(voluntarism)、独裁与大众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传统等诸矛盾的斗争为重点，对毛泽东的思想进行了考察。他概括为，毛泽东通过农村游击战争打倒了国民党，给农民分配了土地，恢复了中国的独立和主权，在革命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在建设方面，有正确的领导也有错误的领导，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在设想上就有缺陷，招致了悲惨的结果。他的这一主张接受了“历史决议”的基本观点。对于文化大革命，他分析了目的与方法的矛盾：“强调同官僚主义的斗争、鼓动群众参加、强调中国的自立等毛泽东的目的，一般说来应该是称赞的。但他追求这些目的的方法，虽大胆并富有想像力，却完全是自我拆台的”(第195页)。

施拉姆认为，在毛泽东内心，与保持创造性的紧张关系共存的一些对立面(矛盾的两个方面，两个侧面)在其晚年发生了分裂，使他的思想和行动走向了破坏性的道路。施拉姆指出，群众对于党的等级制的“造反”权，只有毛泽东(=秦始皇)才能予以保证；真理与权威不是存在于党之中，而是存在于毛主席之内；党的领导与群众能动性的结

合被扭曲受损害；以往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的“民主”与“集中”，被“造反”和“忠”（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无限、永远的忠诚）所取代。他还认定，毛泽东思想“是起源于西方的革命思想，是西方化的媒介物”（第192页）。西方化与人“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这种强调“政治中人的、道德的侧面”的中国传统思想的想法，以及由民族屈辱感与斗争胜利的信心组成的中国中心主义（sinocentrism）从并立走向分解，中国和传统的影响由此增大。

关于毛泽东和邓小平，施拉姆认为，在“为了找到既能保存自己，又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要向西方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习这一目标”上，和“为了领导中国革命而‘运用’马克思主义，同时又将其‘适应’于中国人民的情况和文化”的方法上，两者是相同的。他以现代化（西方化）和民族化（中国化）为支柱强调了两者的连续面。

施拉姆视野广阔、分析深刻。他把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在“强大国家”的框架内推进大众参加的民主主义，并一贯积极致力于现代化和工业化，视为西方化加以了肯定。但是，对毛的反西方化或非西方化的要素，塞入了由民族的屈辱感、自信、对抗意识等构成的“中国中心主义”的框架内，而对“救亡”=反帝国主义民族解放运动这一毛的思想中重要的侧面，几乎未加分析。我对该方面以及仅仅强调毛和邓的连续面而不谈其断绝面，持有疑义。<sup>①</sup>

## 关于资料、版本

进行本课题研究的时候，我除注意后来对毛泽东思想的整理、理论化及解释外，更注重在可能的范围内，直接接触毛泽东当时的文

<sup>①</sup> 除本文举出的三人之外，我还注意到了下面六人的先行研究。

在日本，中岛岭雄（1936-）在《现代中国论》（1964年）中，虽然高度评价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基本上不承认领导这一革命上的毛泽东的思想的积极意义，强调“接受马克思主义上的片面性、有限性”、“特殊的中国式的思考与行动方式”。在建设方面，中岛认为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对苏联共产党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过而不入”，回避了与斯大林主义的交锋。他还批评中共在中苏论战及中意论战中的主张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与宗派式的教条”。在《北京烈烈》（1981年）中，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岛认为与苏联支持“批判斯大林”的阶层一样，中国的“知识分子、城市市民、科技专家官僚、城市官僚”等，也支持“反毛泽东派”对毛泽东个人崇拜和毛泽东思想绝对化的抵抗。他认为“大跃进”的挫折，显

章、发言、行动及事实，有意识地接近毛的实像。关于革命时期的著述，毛自己主持编撰了《毛泽东选集》全四卷，我很重视这一表现 20 世纪 50 年代前毛泽东思想的资料。但是，这套著作，适应从“拥蒋（拥护蒋介石）抗日”到“反蒋抗美”课题的变化，以及从统一战线中居第二位的党到国家的第一大党执政党主体地位的变化，将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为集结点的民族革命思想，重组为以共产党的领导为中心点的国家统治思想，并为此对一些文章进行了不少的修订，因而与革命当时的原文有重要的出入。

《毛泽东选集》被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单纯化了。而以前革命时代的毛泽东的思想，在复杂的情况下表现曲折，充满了丰富的创造

---

露出毛泽东模式与现实的背离，为了利用自己的绝对权威克服由此产生并增长的政治的、社会的紧张关系，毛泽东断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林彪主流派与刘少奇、邓小平当权派之间，有对内是进行“大跃进”式的建设还是实行调整、对外是“反美反苏”还是与苏联“共同行动”等“政策对立”。民主主义的机能流于形式，党内的政策和理论的对立、论争瞬间转为权力斗争。中岛诊断说“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体质”是最大的病根。

加加美光行(1944—)在《历史上的文化大革命》(2001 年)中主张，文化大革命不是单纯的权力斗争，而是“来自于在社会主义体制下，中国是选择走‘现代’化道路(刘、邓)，还是走‘批判现代’的道路(毛、林)，这一‘围绕对中国社会主义理念的解釋的对立’”。他强调指出，与 20 世纪 60 年代到 70 年代初日本及欧美的“反现代”、“批判现代”的运动一样，中国的“文革”也因红卫兵的暴力而自我瓦解；但从“主体性论”(在中国，“主观能动性”论)和“公社主义”的角度看，不应连其批判当代世界的视点也予否定。他评价说，“现代化革命路线”与“公社革命路线”之间的对立虽然画上了句号，但作为“‘民众向国家提出不同意见’的革命”仍继续存在，“‘文革’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化来说，决不是徒劳无益的”。

我以为加加美的“反现代”观点，与下面讲到的汪晖、德里克有共同点，是很重要的。

在中国，廖盖隆(1918—2001，共产党理论家，1980 年激进的“庚申改革方案”的提出者)依据《历史决议》写了《毛泽东思想史》(1993 年)。他在书中把毛泽东纠正了王明“左”倾路线的 1935 年遵义会议，和邓小平 1978 年把全党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并称为“伟大转折”。他把毛的毛泽东思想的创立和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并列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两“历史性飞跃”。他把 1989 年东欧剧变与 1991 年苏联解体，理解为“把权力高度集中于领导者个人和少数人”，实行“对人民专制主义”，“僵化的政治体制”，和具有“战时统制型行政命令性”的“僵化的经济体制”所构成的、“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人类解放(即人民能够过幸福、自由、文明的生活，人民当家作主人)的基本原理”(第 473—474 页)。由斯大林创造出的社会主义旧模式在同现代资本主义的竞赛中失败了。他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的政治体制、市场经济、精神文明中寻求中国的出路，由此回顾，对毛泽东作了如下三点评价：(一)批判了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二)批判了苏联对外的大国主义、对内的大民族主义和“对人民的专制主义”；(三)批判了斯大林严重破坏法制的错误。他把邓小平对权力过度集中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定位为是对毛泽东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想的发展。另外，他还考察 1986 年的学潮和 1989 年的政治风波的原因，从而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愿望是要消除中共和国家有机体的阴

性思考。为了了解该时代毛泽东的思想,日本以竹内实为首,收集了毛泽东发表过的原文以及接近原文的资料,编辑了《毛泽东集》全十卷和《毛泽东集补卷》全九卷、别卷。我对此最为重视,充分利用它。此外,还利用了90年代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一—第五卷,以及《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第五卷和按专题区分的文集。这些文集即使有省略的地方,但好像没有动笔修改过。《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引用的政治局会议等的记录概要也非常有用。

建设时期,我首先重视毛泽东去世后中共中央编辑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文化大革命期间流传到国外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等红

---

暗面,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贪污腐败、反对干部的蜕化变质、“和平演变”,进而将其评价为“不能说是不好的”(第18页)。看来,似乎是廖盖隆从《历史决议》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框框中迈出了一步。

汪晖(1959—),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近代文学、思想研究者,新左派领袖)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和现代性(modernity)问题》(1997年。砂山幸雄译,《世界》1998年10月号、11月号、12月号)中,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定位为“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康有为、章太炎、孙中山等力图避免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种种弊端的中国现代化(modernization)运动的延续。他认为毛泽东一边力图用革命的或大跃进的方式促成中国社会向现代化的目标迈进,实行社会主义所有制,以“消灭工农、城乡、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三大差别这一平等目标为主要目的”,同时又力图“建立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通过对农村的生产和消费的剥削为城市工业化积累资源”。他并且主张当前面临的课题是依靠“制度创新”(在新左派中也有人认为可以在“文革”中挖掘出“制度创新”)来抑制在生产和贸易的全球化过程中,国际资本和中国内部的资本控制者(政治权力的控制者)相互渗透又相互冲突而导致的体制性的腐败和社会不公。

据说后述的德里克对汪晖的主张有很大影响。另外,汪晖的主张与竹内好观点也有共通性。竹内好把对西方近代的扩张、侵入的抵抗理解为东方的近代。

在美国,本杰明·I·史华兹(Benjamin I. Schwartz,1916—1999。1950—1987年哈佛大学政治系、历史系教授)在《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1951年)一书中,把中国共产党看做既不是“无产阶级(产业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不是“农民党”,而是“将农民的不满这一原动力作为自己的基础,并以此获取了权力的职业革命家的精华”。他重视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的思想的独创性,提出了“毛泽东主义”(Maoism)的概念,并将其视作“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异端”。他还洞察到:马克思主义正在“解体”。对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史华兹依据卢梭《社会契约论》的学说进行了解释。他认为,《红旗》杂志社论中“党的合法性的来源于毛泽东”的主张,也就是立法者创造制度(共和国)。史华兹把毛泽东追求的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朴素、目标专一、坚决憎恨恶势力等道德的“一般意志的社会承担者”(1968B),与卢梭所讲的“人民”——即“统治权力的源泉”、“为了公共利益牺牲自己的利益(或自己本身)”的“公民道德”的源泉、“道德统一”相提并论。他认为黑格尔的“近代国家”、马克思的“工业无产阶级”、列宁的“党”和“领袖”、斯大林的“领袖”和“党”都是在其延长线上。他对于毛泽东的社会、经济战略“摆脱苏联模式的固定观念”和探索中国独自的现代化道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关于人的情况的、毛的可怕的单纯和狭窄的观念将要被证明;与其他国家一样,在中国也不能适用于人的现实”(1968A,第227页),并预言抵制毛的乌托邦思想的势力会最后取胜。史华兹认

卫兵资料,然后阅读了90年代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六—第八卷、《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和80年代至90年代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十三卷等资料。但我也注意到,上述资料因“历史决议”框框的约束,没有将毛泽东的资料全面地收录到里面去。

在中国,毛泽东自己写的或说的原始资料的公开极不充分,外国人不能直接阅览。因此,一部分只能依靠中国学者的学术著作、论文中引用的未公开资料和对资料的解释。如“后记”所写的那样,1978年以后到中国访问和与中国学者的交流,对于充实我靠读资料制作的毛泽东像,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如上所述,与毛泽东时代比较,现在毛泽东著作的出版进了一大步,但还很不够,很不全面。研究上也不得不要受这种情况的制约。将来,随着著作的出版、资料的公开等进一步改进,再对本书进行补充修改。

---

为,毛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的)行政的和政治的权力,真的与根据私有财产的权力一样,成为剥削、压迫、腐败的根源吗?”(《1977》,第34页)这一很难应付的问题会缠绕毛以后的新的领导班子。史华兹的观点遭到了各派的批评,保守派的代表人物魏特夫主张毛泽东没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做出创造性的贡献(1960年),激进派的佩弗·沃尔特·塞尔登主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和革命的经验,既可适用于第三世界,也可适用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1976—1977年)。史华兹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坚持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自主性,对于上述批评进行了反驳(《1966》、《1976》)。

我赞成史华兹的强调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自主性、独创性的倾向,但我不是沿着“摆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向上思考,而是沿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方向上思考”。

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 1940—,杜克大学教授,专门研究中国现代史)在《毛泽东的思想中现代主义(modernism)和反现代主义(anti-modernism)》(1993年)一文中,把现代看做是“科学与科学思考的巨大创造力”与“破坏人类生存的诸条件”的“破坏力”之间的矛盾,并与“一边倒地参与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经济以及社会过程”的“现代化主义”(modernizationism)相区别,把现代主义规定为“和现代化孕育的矛盾相伴而生存”、“现代主义虽然认识到在现代化过程中主体不可避免地历史性地被客体化,但仍造成出主体的地位”。他把“反现代主义”理解为“并不是拒绝现代性本身,而是为了克服现代性带来的压抑和异化的尝试”、“是代表了对另一类现代性的追求”(第226—228页)。他把毛泽东思想视为“第三世界现代性的一种的中国的性的现代产物”,充满着“深刻的反现代主义”。他把文化大革命定位为“将社会从资本主义中摆脱出来,追求另一类现代性的最后的历史性的痛苦挣扎”。他同时承认大跃进和“文革”带来的破坏是损伤太大,以学会把现代生活的“破坏性作为生存的一个条件,而与之共存”作为自己的立足点。

我认为:德里克把激进派曾经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主张的代表第三世界的声音的毛泽东思想这一论点,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权威下降的情况下,用现代化论的语言表达。



## 凡 例

- 1 引文中的〔〕表示原作者所注，本文和引文中的（）表示作者所注。
- 2 本文和引文中的（）内的小字表示出典的简称、《毛泽东年谱》中的日期、简称的提示等。出典及其简称标在卷末的主要文献目录中。
- 3 〔为人民服务（〔服务〕）〕这样的句子，对于日语的译文，在（）内有时用〔〕来表示汉语的原文。
- 4 对于在毛泽东的《矛盾统一法则》（《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中使用的诸概念，通常把汉语原文的“敌我矛盾”、“次要方面”、“对抗”翻译为日语的“敵味方の矛盾”、“副次的を側面”、“敵対”。但在本书中将“敌我矛盾”、“次要方面”、“对抗”原样不动地作为日语使用。但是，有时也加上“次要（第二に重要を）方面”这样的说明。
- 5 汉语原文有日语译文的，作者将其作为参考重新翻译引用。英语原文有日语译文的将主要使用该译文，有时作者对原文会有部分改动。没有日语译文的汉语原文和英语原文，引用作者翻译的。





## 绪论 中国的近代——“救亡”与“民主”

应以“救亡”与“民主”为主轴来把握毛泽东登上的舞台——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华帝国是与印度、西亚、西洋并列的拥有古老文明的东亚帝国，它是由农业经济、家族制度、专制王朝、传统思想（正统——儒教，异端——老庄、佛教）四结构所构成的。

公元前16世纪商（殷）王朝建立后实行神权政治，公元前11世纪周王朝灭掉殷王朝实行由“王——诸侯——卿、大夫、士”的世袭领主支配土地与人民的封建制，由规定宗族（祭祀共同的祖先的父系同族集团）内部上下秩序的宗法来支撑它。由于非华族的异族入侵，周室衰落。经过诸侯争霸、百家争鸣、实力万能的春秋战国时代，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而实行了郡县制，公元前136年汉武帝把儒教（用“仁”的道德意识来承担“礼”的上下秩序的学说）奉为国教。在此后的大约两千年里，一直持续着“一君万民”（“君——臣——民”）的天下王朝体制，君主一人通过推荐或考试从学习儒家经典的读书人即士（士大夫）中选拔官吏，用官吏来直接统治万民。士在古代为豪族，后为地主，这一阶层统治着村落并成为王朝体制的基础。

这一体制一方面所谓君主一人自由而万民皆是其奴隶的专制主义的权力关系，并以父系家长制的上下尊卑秩序（君——臣、父——子、夫——妇的“三纲”）为核心。然而，另一方面君主作为受命于万物的父母之天的天子，负有管理、保全天下万民全体生命的责任，即把底层无数的村落共同体统一为整体——天下，维持自然秩序

和社会秩序以保障农业社会的再生产。如果一人一姓的君主不能担负起保全人民生存的责任,就会丧失天命,而由另一人一姓革君主之命,夺取皇位(易姓革命)。事实上,由于王朝的腐败和地主、豪族的土地兼并,使剥削变得过重,民众生活出现困顿,于是就发生了为求得生存与平等的农民起义。豪族地主的一员或农民起义的首领抑或少数民族通过武力夺取皇位而实现了王朝的更替。在这里既存在着“天下之天下”而非“一人之天下”的共同体关系的一面,又有“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 大略篇》)的民本主义的一面。

这一保全民生和上下秩序的两个方面在《礼记 礼运篇》(大约公元前2世纪)中被作为“大同”和“小康”的二重结构而谈及。古代是以“公”为原理的“大同”之世,天下是公有的,君主、诸侯的地位作为公共之物而不世袭,孝顺他人的双亲,疼爱他人的孩子,以保障万民的生活,财产共有,为公共而劳动。因为没有国、家、身的“私”——利己主义,便不会发生阴谋、盗窃、战乱,也没有强制的秩序,天下亲如一家。然而,现在是以“私”为原理的“小康”之世,天下变为一家所私有,君主、诸侯的地位被世袭,只孝顺自己的父母、疼爱自己的孩子,财产私有、为自己而劳动。由于产生了国、家、身的“私”,发生了阴谋、战乱,开明的君主便想通过建立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的“礼义”这种上下秩序,来抑制争战,进行统治。

“大同”是假托古代的理想国。《礼记·礼运篇》认为:“大同”虽是最高理想,但因不能立即实现,就只好先实现“小康”。但是,农民起义高举“大同”或“太平”的平等理想,盼望一举消灭现实的贵贱、贫富的差异。异端读书人也憧憬“大同”的平等社会,表现出了对现实专制王朝的不满(近藤,1985)。

关于对外关系,汉族(华族)以自处世界中心、文化优越的中华而自负,产生了视其他的民族为周边未开化的野蛮的夷狄而加以蔑视的华夷思想。他们在春秋时代由于以人种和“礼”为根本的文化共通性而团结起来,排斥或同化侵入内地的异族,形成了统一的秦汉帝国来对抗北方匈奴。他们构思了作为天子的中国皇帝如果实行王道,天下夷狄便会来朝归服的“中华——夷狄”上下秩序观。

汉、唐、元、明、清是世界性的大帝国。清王朝 17 世纪占领全中国，征服了蒙古、回部(新疆)、青海、西藏而设立了藩部，并与东进的俄罗斯进行战争，确定了以外兴安岭为国境。清朝在保持自己民族的特殊性的同时，吸收利用中华即王朝、儒教的普遍性来统治汉民族，力图实现王道政治。它对于读书人，进行大编纂事业来吸收他们的精力，同时，抹杀批评夷狄的文字以统制思想，大兴文字狱，以挫伤其反抗心。在内部，君主建立通过科举从地主阶层选拔官吏的中央与地方(省、道、府、州、县)的金字塔状机构以统治万民，乡绅(定居在乡里的有科举功名者或退職官吏)形成了特权阶层，统治村落参与地方的行政。在外部，清朝形成了以自己为宗主国，以朝鲜、琉球、越南、缅甸、暹罗(泰国)、老挝、苏鲁、尼泊尔、浩罕、哈萨克、阿富汗等国家为朝贡国的不平等的国际秩序。西洋诸国也被作为朝贡国对待。18 世纪中叶，贸易被限制在广州一港口，并由特许商人(“公行”)所垄断。

1840 年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被英国所打败，通过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及其附约与协定，清政府承认了割让香港；开放广州、上海等五处为通商港口；废除垄断贸易；支付赔款；协定关税(5%。丧失了关税自主权)；领事裁判权。中国被迫卷入了西方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沦为半殖民地。外国商品的流入，使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中国人开始了抵抗外来侵略和改革内部专制的艰苦奋斗。林则徐通过研究西洋事物，购入洋式大炮、组织群众来抵抗外来侵略；魏源则介绍世界形势，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把握住了中国的近代的课题。

农民出身科举失意的读书人洪秀全把外来的基督教与本土的大同思想相结合，创立了拜上帝会，呼吁实现人人作为上帝(神)之子，相互扶助的大同世界，消灭背叛上帝的妖魔(恶魔)。1851 年至 1864 年在华南、华中爆发了以农民、手工业者、矿工、交通运输工人、游民等为主力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制定了严格的军事纪律，实行物资共有、按人供给的军事共产主义，以平分土地保障人人温饱的《天朝田亩制度》为目标，同清朝和地主及外国干涉军队进行了作战，动摇了其体制基础，达到了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

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也称“亚罗号”战争)中被英法所打败,订立《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又承认了外国公使可驻北京;开放天津、南京等 11 个港口;基督教有传教权;外国人有到内地游历的权利;只抽 2.5% 的洋货运入内地的子口税;支付赔款等条款。从 19 世纪 60 年代起,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而兴起的曾国藩、李鸿章等汉族大官僚,推行了在以中国的思想(儒教)和制度(王朝)为“体”(根本原则)维持秩序的同时,把西方技术作为“用”(辅助作用)而吸收起来的“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他们在适应不平等条约体制的同时,为使周边的朝贡国免遭列强的侵略,镇压国内的民众叛乱,力图再次强化动摇的“中华夷狄——一君万民”的天下王朝体制。但是,中法战争的失败使其丧失了越南,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其丧失了朝鲜,洋务运动因此而破产。在这一运动中,出现了学习西方知识的新知识分子。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就主张开设“议院”和振兴“商务”(资本主义工商业)等制度改革。

1895 年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被迫承认了朝鲜独立自主;割让台湾;赔偿日本军费;允许日本人在通商口岸从事工艺制造;开放重庆等四个港口。由于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列强展开了输出资本和争夺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的竞争,使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机。为了挽救这一危机,康有为等读书人和官僚推动变法运动。一方面,向光绪皇帝请求,以俄国的“彼得变政”和日本的“明治维新”为榜样,用君权从上采用西方的制度(国民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另一方面,自下结成学会,创设学堂,发行报刊杂志,掀起了变法的舆论。

严复把握住了问题的焦点,指出国际政治是被弱肉强食的进化论法则所支配,中国如不能建立近代国民国家成为强者,就会灭亡。他向皇帝请求应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西方为样本,以民作为“天下之真主”,培养其力、智、德,提高其自治能力,把奴隶转化为国民,使国家团结起来。他把自古以来的“中华夷狄——一君万民”的认识框架转变为近代的“救亡——民主”的认识框架。康有为也请求皇帝应适应从“一统闭关之世”到“列强并争之世”的变化,变上下隔绝、

分裂的专制政体为君民一体、团结的立宪政体。他为了给变法以理论基础，力图对儒教进行宗教改革以创设孔教；突出主体——圣人孔子，关怀客体——人民的生存的“仁”为目的，把“礼”的上下秩序作为手段而相对化了。他主张从用“礼”来抑止因国、家、身之“私”而产生的争乱的“小康”之世过渡到人人“公”，自由平等没有争乱，无须“礼”只有“仁”的“大同”之世。康有为想要依靠圣人的绝对权威与皇帝的绝对权力来实现变法。

湖南出生的谭嗣同致力于湖南自立，以地方自治、产业振兴为目标，主张我与宇宙全体生命的“以太”、“仁”合为一体，来突破（“冲决”）君权、伦常（上下秩序）的束缚（“网罗”），牺牲自我，拯救众生，来实现“大同”。他劝告中国的士人学习实现“明治维新”的日本武士的道德风气以成为仁侠。

1898年光绪帝虽然断然实行了戊戌变法，但却被西太后等守旧派所扼杀。为反抗列强的入侵，华北民众（农民、手工业者、交通运输工人、小商贩、士兵、游民等）掀起了义和团排外运动，1900年与八国联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清政府也借此向列强宣战，但却失败了。列强认识到了中国人民的巨大反抗力量，变瓜分中国的政策为利用走狗清政府来统治中国的保全政策。清政府在翌年与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答应了付出巨额的赔款；拆除北京至大沽的炮台；北京使馆区及北京至山海关间的12处，外国军队有驻军权；取缔排外运动等条款。另一方面，清政府为苟延残喘，开始推行“新政”，即振兴实业；改革教育，废除科举，开设学堂，派遣留学生；创设新军。但是，对清政府表示失望而把希望寄托在革命上的知识分子增加，以及反抗因新政而造成的增税及饥饿等的群众暴动频繁发生，削弱了体制的统治力。

章太炎（炳麟）从满人和汉人应该一致反抗白人压迫的排外主张，发展到除非首先推翻清政府建立汉民族主义，否则汉民族将成为满人和欧美双重奴隶的排满思想。他投身于革命，并在民族革命的范围里肯定了农民暴动。他认为反抗异族统治的汉民族的每个人都要有革命之道德（各个人决心战死，继承仁侠的道德风气）；还认为“知

识愈进，权位愈申，则愈远”于道德，并认为“农人于道德为最高”。他把下层（农民、手工业者、小贩、小商人、下层知识分子等平民）看成是革命党的成员；认为中层（知识分子）应自觉地担当起培养道德、提倡革命的责任；而排除上层（军人、大官僚、大商人、翻译等）在革命党之外。他以宣扬自心的独立（“独”）和牺牲自己来普救众生的菩萨行为（“群”）的佛教为其基础。他认为应继承拒绝王朝体制的隐士逸民，与参与王朝统治人民追求富贵利禄的儒教士大夫的传统相决裂。他主张依据《庄子·齐物论》各个体对于他人的压迫进行抵抗、自立而并存，提倡反对帝国主义的亚洲各民族的解放运动应相互扶助；反对代议制，主张总统制；反对资本主义，主张社会主义。他依据东方的佛教和庄子的全体后退原理，来抵抗西方的基督教与进化论的个人前进原理。

出生湖南的黄兴等建立的华兴会继承了谭嗣同的湖南自立路线，构思了一省自立、各省群起响应、使中国独立的革命。

孙中山（文）的目标，与其说是要阻止列强分割中国，无宁说是要使中国追赶列强而并驾齐驱。他想要实行三民主义，即用武力打倒压制、分裂汉民族使中国走向衰落的异族专制的清王朝，夺回主权的民族主义；扩大宗族和部落的自治与团结，创立中华民国，使国民平等地参与政治的民权主义；借助外国的资本和人才进行工业化以图富强，并且用“平均地权”（让土地所有者因工业化而导致地价上升的部分纳入国库）来防止贫富不平等的弊端的民生主义。他提倡以中层——新知识分子自觉团结起来结成革命党、革命军成为中枢；使下层——人民潜在的力量现实化，成为拥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的革命主体的“国民革命”；宣传革命军政府教育，训练无知、分裂的人民，使其成长为自觉、团结之国民的军法之治（军政）、约法之治（训政）、宪法之治（宪政）的“三序”之说。他主张要打倒天下王朝体制之纵的秩序（异族统治、专制王朝），扩大下面之横的团结（汉民族主义、宗族、村落），以建立新的国家。孙中山 1894 年在夏威夷建立了兴中会，1905 年在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结合华侨的资金、学生等新知识分子的知识、和会党（秘密结社）及新军的力量，编成革命军，在西

南边境数次发动起义，期待着民众的呼应。

1911年，清政府为从外国得到借款，强行推行铁路国有化政策，遭到了四川保路运动的反对。以此为导火线，在武昌新军内部的革命派发动起义建立了军政府，各省相继独立，辛亥革命取得了成功。翌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诞生，宣布实行人民主权和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清朝皇帝宣布退位。这样就给持续了两千年的天下王朝体制打上了句号。但是，由于革命派力量薄弱，得到列强支持的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篡夺了政权，镇压了二次革命，实行专制统治，使民国徒具形式。

孙中山在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中倡导“知难行易”（行之非艰，知之惟艰）学说，强调将“先知先觉”（孙中山）发明的主义、宪法、方略，由“后知后觉”（革命党人）宣传，让“不知不觉”（民众）来实行这一自上而下的单方向的领导，想要以此来克服知与行的脱节。他看到五四运动后，痛感应该与多数民众相结合，并开始抨击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还认识到了苏联是援助中国革命的惟一国家。孙中山看到了共产主义同大同思想及三民主义有共同点，便采取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下定决心实现国共合作。1924年，他举起了新三民主义即反对帝国主义，从“中国独立”走向“济弱扶贫”（救援弱小民族），更走向“世界大同”的民族主义；四万万人民做皇帝，管理政治的民权主义；“平均地权”（把土地分给农民）和“节制资本”（交通、矿产、工业的国营化）的民生主义。他将首先创立民国，接受列强的援助，完成经济建设，才能追赶列强这一思考方法反过来，主张如果不能首先排除帝国主义的压迫，废除不平等条约，恢复关税自主权，就无法保护中国的工业并使其发展。

孙中山说法国革命是“为个人争自由”，而中国革命是“为国家争自由”。他反对卢梭的天赋人权说，认为民族全体中存在着知与无知的不平等，主张推翻有“聪明才力”的人贪图利己、夺取人家的利益、生出政治上的不平等的专制；实现有“聪明才力”的人重于利他、奉侍“服务”他人、谋他人的幸福的民权。

辛亥革命以后，期待革命、民国有着“光明”的知识分子悲愤于



“黑暗”的现实，开始探索打破现状的道路。他们发起了反对图谋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和独占中国的日本《二十一条》要求的运动，以及反对企图废除共和制、想当皇帝的袁世凯的运动。这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相合流，发展成为了五四运动。

陈独秀在1915年创办了《青年杂志》(翌年改为《新青年》)，为打破专制政治充实共和政治，发起新文化运动，主张废除儒家的“三纲”阶级制度，采用西方的“自由、平等、独立”的思想，提倡了“民主与科学”。1919年5月4日，为了抗议中国代表提出的归还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取消以二十一条为基础的协约要求在巴黎和平会议上没有得到承认的事，学生发起了五四运动，举行了集会、游行、罢课，并且把它扩大为商人的罢市、工人的罢工。陈独秀参加了这一运动，放弃了对欧美列强的幻想，对俄国革命表示了同感，主张进行民众运动和社会改造。不久，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提倡“劳动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的工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将“学习西方”深化到思想的层次，到达了否定专制王朝之基础的家族制度和儒教这一极点，从对英美的幻想转变到“走俄国人的路”(毛泽东)上来。

李大钊以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为思想活动的出发点，呼吁人们应通过“悔改”(去旧恶从新善的心的变化)来抵挡和顶回社会“黑暗”使人们绝望而自取灭亡的趋势，以实现“光明”。他参加了反对《二十一条》的斗争和反袁斗争，以唤起国民的自由、自觉而把民意反映给政治，来恢复国民全体的大生命为目标，主张实行充实民国的民主主义——代议政治。他构建了青年和“青春”(宇宙全体生命)合为一体，而得到无限的气力，“以冲决”使宇宙衰弱的“网罗”(过去历史的积尘同对黄金和权势的执着)，来恢复“青春”(“宇宙即我，我即宇宙”)这一宇宙论，以为政治论之基础。李大钊从俄国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中得出三大结论：

1. 关于课题，得出了“大……主义”(“大日耳曼主义”等帝国主义和“大北方主义”等军阀的把自己的势力扩张到固有的范围之外侵犯他人的自由。“一力之独行”)之失败和民主主义(对于帝国主义和军

阔，多数弱者联合起来反抗，恢复各自本来的自由。“各个之并立”之胜利；资本主义之失败和劳工主义之胜利的结论。

2. 关于主体，学习劳工会（苏维埃），设想“小组织大联合”的直接民主主义的组织形态，呼吁知识青年学习“到民间去”的精神，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使他们自觉并组织起来。

3. 关于方法，主张学习马克思主义，把人道主义（互助、博爱）的精神改造和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经济组织的改造）的物质改造相结合的、“物心两面之改造、灵肉一致之改造”。

李大钊阐释了“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及“精神解放”，呼吁受着束缚、隔绝而深感痛苦的人人，自己来打破贯穿于国家、社会、家族束缚个性、隔绝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儒教上下秩序，以实现“个性自由、共性互助”的“大同”世界。他努力于使民族、人民、阶级的集团解放运动与各个人的自由、互助之要求不断结合起来。

胡适主张应由少数学者一个一个地研究问题写出处方，来一点一滴地改良社会，而反对（马克思）主义之宣传。针对胡适的意见，李大钊反驳说：“社会上多数人”是认识社会问题并通过共同的运动来解决问题之主体；知识分子应当起宣传理想的主义的作用，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等主义就是帮助他们认识社会问题的工具（“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他也突破了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之自上而下的单方向领导的圈子。可以说李大钊开辟了一条道路——将知识分子的认识和实践转化为人民改造世界运动的一部分的道路。

李大钊也是共产党创立者之一，他揭示出了由民众运动来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建立“平民之专政”；创建社会主义经济，以抵抗世界资本主义的革命与社会主义的前途。从俄国革命中吸收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民众运动论，给“救亡——民主”的认识框架注入了理论脉络。

主体——知识分子、民众摸索解决“救亡”之课题的方法，经历了从“彼得变政、明治维新”（戊戌变法）过渡到“美国独立、法国革命”（辛亥革命）、再变化到“走俄国人的路”（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展开；从自古以来的“天”、民本主义转变到近代的“人民”、民主主

义的思想变动；从参与王朝统治人民的士大夫，到唤起民众的新知识分子这种人的存在方式的自我变革，我想在上述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摆正毛泽东的位置，并以此把握其思想。可以看出，毛泽东的革命乃是继承孙中山的政治革命和李大钊的文化革命、社会革命，并与谭嗣同、李大钊的“冲决网罗”的宇宙论系列相联系，且与章太炎的反对帝国主义、革命道德、“独”与“群”的结合、肯定农民暴动的抵抗思想一脉相承。他的创造则是代替康有所期待的皇帝的绝对权力和圣人的绝对权威，集政治领袖与思想导师为一身来领导人民。

湖南第一师范的恩师杨昌济(1872—1920)，是给予青年时期毛泽东以最大影响的重要人物。

毛泽东在1936年10月对埃德加·斯诺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归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我在他的影响下，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伦理学原理》，我受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一百分(《1937》，第143页)。”

杨昌济是把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政治运动深化到内心的层次，构思自己的哲学、伦理学，并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人物。杨昌济的哲学虽然是由于早先受到母亲家即向家的学风和曾国藩的影响，而深刻学习了程、朱理学的“存天理，去人欲”的学说，并且在道德修养上，也深受主张宇宙与吾心为一体的陆王心学的影响，但不久，却倾倒在继承张载(横渠)之气学的湖南人王夫之(船山)、谭嗣同的“天理即在于人欲之中”的学说，并批判了宋儒的禁欲主义。

杨昌济出生在湖南长沙郊外不丰裕的读书人家中。他一边教私塾一边参加科举考试。由于生长在家族、朋友等走向崩溃的旧的人际关系中，他一方面拒绝“随俗苟且”而要求内心的自立，另一方面又因置身于世俗，而力图以自己的“诚”来感化他人转移其风气。后来在他

进入长沙岳麓书院读书的同时，参加了湖南变法运动，由于在南学会就“民主”问题向谭嗣同提出了疑问而受到谭的极力称赞；并接受了谭所回答的主旨——“以民为主”。为了完成南学会所布置的课题，他提交了一篇论文《论湖南遵旨设立商务局宜先振兴农工之学》，其主旨为中国应该振兴商学、商务以对抗西人，“自立于强大之间”，为此读书人应当创设学会联络“农工之人”，并须教育他们。此论文被评为第三名。

戊戌政变后，杨昌济绝意仕进，开始摸索作为孤独的个人而自立、改良中国的道路。1903年他留学日本，进入弘文学院学习，虽然与湖南革命派的中坚人物杨毓麟、陈天华、黄兴等关系密切，但由于志在学问，并没有参加革命运动。同年杨昌济在留学生杂志《游学译编》上发表了《达化斋日记》，在《日记》中讲：保万民之生为目的，君权、教旨为手段，而不可以手段绝对化来妨碍变法的目的。这里他对戊戌变法之精神再次进行了确认。而且他从政变中得出了教训，认为不能依赖“变之自上”，即不能依靠权力者的“政”——制度的改革，只能开辟“变之自下”的、依靠知识分子的“教”——变革学问的道路。他一方面宣扬“以吾为主”，使担任改革的知识分子的自我绝对化；另一方面提倡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无我”之宇宙观，与杀身亡家以使天下万世生存的道德。他根据“以民为主”的思想，主张由知识分子来教化民众、开启民智以强中国。杨昌济绝意政治尽力于教育，力图把以圣人、君主为顶点自上而下所构成的旧中国，导入以“吾”与“民”为原点的自下而上的改建。

杨昌济1907（1906？）年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教育学；1909年留学英国的滬北淀大学<sup>①</sup>学习道德哲学、伦理学及教育学；

---

①：1988年夏，佐佐木武访问了滬北淀大学（通译爱伯丁大学 University of Aberdeen），抄写在该大学的 Student Register（学生记录簿）中记载着的杨昌济、章士钊、杨曾浩的成绩等，并复印了1909—10年度、1910—11年度、1911—12年度的大学要览的有关部分。在此深表感谢。我在杨昌济成绩后面，加上了该任课老师的姓名，做成了如下之表。

1909 1910

英语：■ 135

教授 威廉·雷斯里·戴维森 (Davidson)

1912年考察了德国的教育制度。他1913年回国,担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员,教授修身和教育学,把救国之志寄托在了教育青年的一途上。

杨昌济认为国际政治是优胜劣败的生存竞争,因而主张国家的团结、独立。他虽然对作为首先由少数志士大声疾呼、变国体从专制为共和的大变革的辛亥革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看到由于只是改变了政治法律之外形而并未改变民族之精神;数千年的专制政治、科举官僚制的余弊喷涌而出,使人人都热衷于政治之一途而争夺权力,道德腐败呈一落千丈之势。因此他说“无善良之教育,则不能有善良之政治”。他鉴于在实行民政之希腊、罗马,均以市民为国家之中坚,强调在专制既久共和初创之中国,尤不可不以全力倾注于培养接受普通之教育,其家计足以独立,全国舆论之所自出之“市民”——“健全之中等社会(中产阶级)”(《教育与政治》,1913年10月)。杨昌济忧虑地呼吁,“有健全之中等社会,则上可以监督上流社会”,“下可以指导下流社会”(《杨集》,第40页),通过振兴教育与实业,提高国民的道德力和生产力,来挽救国家的危急存亡。他指出了从人格独立到中等社会(市民)的形成以至于国家独立的自下而上的变革道路。而且,他对于家族主义,虽然评价其对维系人心、团结国民有重要作用,但仍对其压制女子等的家族主义之弊提出了批判,主张将其除弊害保留优点转化为人道主义,以确立人人之独立的精神。

---

逻辑学: ■ —— 58 1910	教授 威廉·雷斯里·戴维森
逻辑学: ■ —— 58 1910—1911	教授 詹姆斯·布莱克·贝利(Baillic)
道德哲学:S	教授 詹姆斯·布莱克·贝利(Baillic)
教育学: ■ —— 13 1911	讲师 约翰·克拉克(Clarke)
国际公法:S 1911—1912	讲师 乔治·邓肯(Dwncan)
宪法和历史:S	讲师 罗伯特·莫伊拉·威廉逊(Williamson)
政治经济学: ■	讲师 斯坦利·H.特纳(Turner)
法学:S	讲师 J. M. 欧文(Irvine)
说明	
考试,罗马数字表示学生对照所授奖的名次进行安排而形成的等级:	

作为培养人才改造风俗民心的力量，“社会进化的原动力”，杨昌济最为重视哲学，力图吸收西方哲学，继承儒家思想以及融合两者。

对于西方哲学，他倾心于排斥自然主义(唯物论)和绝对主义(绝对唯心化)的人本主义(人格唯心论)——新理想主义的哲学。他主张一方面为了抵抗列强的压迫，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是必要的；但另一方面，由于只有独立之人格，国家才可成为独立之国家，因而应养成“有公共心之个人主义之人”(为社会牺牲自己之利益，然不牺牲其所确信之主义的人)。杨昌济主张有中国风格的“自我实现说”，他说：“所谓自我者，大我也，以宇宙为一体之大我也。谋世界之公益，即所以实现自我也(同上，第49页)”。他非常重视格林(Green)的自我实现主义。为寻求自我实现与社会进步的结合，他介绍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论和康德的意志自律、人格尊严学说的要点，吸收了西方近代思想的精髓。

关于儒家思想，他将其看成了人本主义(人格唯心论)，特别是领会了宋、明理学与康德的意志自律学说是相通的，为形成“救亡”的主体发挥其思想能量。关于政教合一的儒家，他想要与支撑专制王朝的体制教学这一“政”的一面相分开，而活用由教育确立道德以拯救民众的“教”的一面。

杨昌济自己编写了《论语类钞》，看到了儒家的“立志”中包含着“意志之强者，对于己身，则能抑制情欲之横恣；对于社会，则能抵抗

---

I = 最优级    II = 次优级    III = 相当好地通过了    IV = 刚刚通过的

S = 满意    NS = 不满意    R = 未通过的    A = 弃考的或未收到答卷的

杨昌济的成绩，II为“等外奖或者次优级”，III为“相当好地通过了”。S为“满意”，但S同III写在同一行，因此我推测为：S没有进入合格等级，而是表示的III可以视为合格的成绩。英文学研究者推测为：S处于III和IV之间而接近III，大概是因外国留学生存在着语言能力方面的不利条件，因而视为合格这一意思吧。这一推测得到了英国人的确认。符号后面的番号表示在全部考生中的名次。

另外，记录簿中有“MA 1912”，杨昌济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

另外，佐佐木武交给我关于杨昌济，爱伯丁大学1994年出版的刊物上有所记载，如下：

杨昌济(MA 1912)回到中国，在长沙师范学校教授伦理学，后来又到北京大学任教。他从詹姆斯·贝利教授那里学到了一些黑格尔主义的唯心论，似乎暂时地影响了杨昌济最优秀的学生毛泽东，毛泽东最终成为他的女婿。[约翰·D. 哈格里夫斯(Hangreaves)《大学与帝国》(Academe and Empire)，爱伯丁大学出版社，1994，第38页]

权势之压迫”(同上,第69页)的意志自律思想。另外,关于重视在“三纲”上下秩序中卑贱者之臣、子、妇自觉地服从尊贵者之君、父、夫的王船山,杨昌济认为他重视个人之独立,给予了高度评价;但同时又灵活地接受了谭嗣同对“三纲”严责卑幼而薄责尊长,实酿暴虐残忍之风的激烈批判。看来他力图将纵的“三纲”秩序转化为横的国民道德。甚至他决心以政治上不得志退而以培养人才来拯救乱世的大教育家孔子为榜样,以自己的道德就必能感化他人、转移世风这一教导为主轴,自己担当起教育救国的重任。

杨昌济由于既吸收西方哲学又继承儒家思想,从而使“以吾为主”和“以民为主”相结合这一戊戌变法以来的思想课题更加深化,力图通过教育来推进“变之自下”。1918年,他任北京大学教授,后投身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感到自己的理想有实现的可能,便积极呼吁学生自己自觉,唤起国家之自觉;通过确立独立的人格来实现独立之国家。

杨昌济的“诚”之哲学是力求把自己与世间的外部矛盾引入自己的内心以作为内部矛盾来调和,并通过从内到外感化人们来调和外部矛盾。一旦外部矛盾激化扩大,杨便在内心将其保持,来进一步磨炼自己的意志。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以至五四运动,这种政治变动,实际上是与杨的学问、教育的发展平行推进,并向着同一方向开展。

杨昌济尽管提出了在中国近代史上应该引起关注的独特问题,但并未对其充分展开,其“生平之志百未建一”,就这样于1920年1月17日逝世了。我以为杨昌济哲学的基本部分被毛泽东的实践与思想继承下来了。

# 第一部 革命者毛泽东





# 第一章 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的 五四运动(1893—1921)

## 第一节 “精神之个人主义”

“我过去读过孔夫子，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后来进资产阶级学校七年。七六三年。尽学资产阶级那一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还讲了教育学。五年师范，两年中学，上图书馆也算在内。那时就是相信康德的二元论，特别是唯心论。我原来是个封建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社会推动我转入革命”。

(1964年8月18日,《万岁》丁本第549页)

我想就上述所说的从“封建主义者”、“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连续和飞跃进行考察。

毛泽东于1893年12月26日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的一户农家,是父亲毛贻昌(顺生)和母亲文七妹的第三个孩子。因为头两胎婴儿都夭折,所以受到特别的照顾。毛氏的始祖、江西农民毛太华在元末参加了朱元璋的军队,远征云南并娶了少数民族女子为妻。毛泽东这一辈是韶山冲毛氏家族的第20代,第20代“泽”字辈的大约

有 800 人，是一个大族<sup>①</sup>。

毛泽东于 1936 年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描述了自己的幼年时代。毛泽东的父亲精明刚强，当兵、做小买卖积下资金买回了土地，成为耕种着 15 亩（约 1 公顷）田地的富农，并兼做贩运大米和猪牛的生意。他强制毛泽东从事农活，让他在私塾读书，并记账，要求他能继承家业。然而毛泽东却对此进行了反抗。另外他还谈到，他的母亲笃信神佛，并经常向穷人施舍。毛泽东深受母亲的影响，和母亲、弟弟及长工结成“统一战线”，反抗父亲的命令。当时发生了长沙饥民暴动和韶山哥老会会员反抗地主、政府等社会事件，他对穷人和造反者十分同情，这也可以看做是来自母亲的影响的延伸。对父亲和统治阶级的反抗和对母亲和人民群众的同情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这其中，通过求学，他渐渐地脱离了父亲为他设定的道路。

毛泽东不喜欢私塾念的经书，但是对《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小说，特别是造反的故事爱看。读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之后，他想继续上学，同父亲吵了一架后，便离家出走去求学。在读了关于列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之后，他知道了中国面临灭亡的危机，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经世济俗意识的支配下，为“新学”（西方近代学问）所吸引，于是便到了母亲的娘家湘乡县，考入东山高等小学堂。

这个回忆直到现在也是最重要的资料。但是，不免有根据经历了苏维埃革命和大长征后的 1936 年当时的意识而过于修饰的嫌疑。

根据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汪澍白等中国学者的研究，我们可以得知以下当时的事实：毛泽东受母亲文七妹的娘家的影响非常大，父亲家和母亲家都有知识分子，他幼年时生活在知识氛围之中。

文家在与韶山一山之隔的湘乡县四都唐家托，耕种着 50 亩田外，出租 50 亩，并饲养着十几头耕牛，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富农大家庭。毛泽东从 2 岁到 8 岁一直都在这里度过，他和表兄弟们一起帮助

---

<sup>①</sup> 根据《中湘韶山毛氏四修族谱》（民国辛巳[1941年]四修 西河堂家藏）记载，毛泽东属于震房竹溪客脚派，他被评价为“閩中肆外、国而忘家”（文章内容充实，表现奔放，行动一心为国而忘记自己的家）。“泽”辈分中，震房十二派共 391 人，再加上閩房、监房、深房和石驮房等十一派，合计 800 人左右。

干农活，不愿意回韶山。母亲的哥哥文玉钦（一作文玉清）在家开馆授徒，毛泽东经常在那里旁听。

毛泽东于1902年回到韶山，在其后总共6年里，他在韶山的6家私塾，其中包括同族毛宇居的私塾和毛麓钟的私塾，学习《三字经》和四书五经等“旧学”（中国传统学术）的基础，尊孔孟，读《春秋左氏传》、《史记》、《纲鉴类纂》、《日知录》，对历史抱有浓厚的兴趣，这对他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文玉钦的儿子文昌昌借给毛泽东《盛世危言》及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使他了解了洋务运动，并劝说他进入自己正在就读的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入学后，又借给他《新民丛报》，使他了解变法运动。文玉钦、毛麓钟、王季范（母亲姐姐的儿子，湖南第一师范教员）等人对毛泽东的父亲说，接受新式教育将来能够赚钱，极力劝说父亲同意毛泽东上小学堂。母亲家和父亲家都有一些有知识的人看到了毛泽东的才能，帮助他的成长，并开启了他进学之路。

毛泽东于1910年秋天离开韶山冲游学之际，将西乡隆盛的汉诗“男儿立志出乡关，学若无成死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无处不青山”<sup>①</sup>稍作改动，誊写下来赠与父亲。考入东山高等小学堂后学习“新学”，他读了《新民丛报》后非常崇拜康有为、梁启超，赞成君主立宪制的主张，并喜欢听留着假辫子、曾经留学日本的体育老师讲日本的事情。毛泽东从学友萧子暲（萧三）处借了《世界英雄豪杰传》来读，对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的传记特别感兴趣，并在重点之处作了圈点。1911年春天，毛泽东第一次来到长沙，进入湘乡驻省中学。在这里，他读到了革命派的报纸《民立报》，知道了排满革命运动，并张贴了一张大字报，要求孙中山担任总统，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四川保路运动发生后，毛泽东和一个朋友剪掉了辫子，

---

<sup>①</sup> 这首汉诗，在日本一般认为是释月性（清狂）或村松文三所作（简野道明3—4页），但在中国则传为西乡隆盛所作，这可能是因为当时湖南革命派以萨摩藩为目标，首领黄兴非常尊敬西乡隆盛，也可能是因为毛泽东也有同样的心情。在中国这首汉诗被改为“男儿立志出乡关，学若无成死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无处不青山”（《新青年》第一卷第391页也有刊登），毛泽东又将“男儿”改为“孩儿”，“死不还”改为“誓不还”。

表示了排满的决心，并强行剪去了不遵守剪发诺言的十余人的辫子。武昌起义、辛亥革命开始后，毛泽东参加了湖南革命军，成了一名战士，半年后，孙中山和袁世凯缔结了和议，他认为革命已经结束，便离开了军队。

毛泽东通过非凡的辨别方向的能力和读书力、行动力，将洋务→变法→革命约 50 年的中国近代思想史压缩成 5 年，在自身得到再现，从而站到了时代的最前端。

1912 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半年后退学，每天泡在省立图书馆。在半年之内，博览了严复翻译的西方名著，其中有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J. S. 穆勒的《名学》、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以及孟德斯鸠的《法意》，另外看了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

1913 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第二年合并到第一师范），到 1918 年 6 月毕业，毛泽东一直在这里学习。在这期间，“政治思想开始形成”，“取得最早的社会经验”。后来，毛泽东曾说“第一师范是一所好学校”，但是当时他反对学校的以繁琐的规则束缚学生、并强制学习很多课程的做法，甚至多次萌生退学的想法。他还对同乡师兄兼老师黎锦熙诉说了对学校、社会的强烈不满和深深的孤独感。

在诸多课程中，毛泽东喜欢国文、地理和历史，最后受杨昌济的影响，对哲学产生兴趣，特别喜欢研读谭嗣同的《仁学》和康德哲学，摸索通过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来变换全国思想和政治的道路。1914 年冬到 1915 年 9 月，每周六或周日，毛泽东和蔡和森、萧子升（瑜）等人一起，参加杨昌济主持的哲学研究小组，研讨西方哲学、伦理学以及宋元明哲学。杨昌济以“资质俊秀”来评价激励他。他首先表示了对国家的关心（政治革命），一旦将此收敛在自我的内心世界（文化革命），最终便将此扩大为社会改造（社会革命）。毛泽东还到同年创立的船山学社听讲。经杨昌济介绍，他成为同年创刊的《新青年》的热心读者，崇拜陈独秀、胡适，并在杨昌济的推荐下，在第三卷第 2 号（1917 年 4 月）以二十八画生（“毛澤東”的笔画共计二十八

笔)为笔名,发表了《体育之研究》的文章。而实际生活中毛泽东通过冷水浴、日光浴、游泳、爬山、野游和露宿、远足等来锻炼身体。

毛泽东于1915年夏天在长沙各学校张贴了征友启事,得到了三个人的答复。1917年冬天,他和十余名朋友讨论“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并得出了“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的结论。1918年4月17日创立了新民学会,会员几乎都是杨昌济的学生。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形成了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由邹彝鼎、毛泽东起草的《会章》规定:“第二条,本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第四条,本会会员须守左之各规律: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

杨昌济自身拒绝社会的腐败和污浊,将社会改良的希望寄托在未受腐败污染的青年身上。因此,那些立志继承此意志,将自己从社会恶习中彻底解脱出来,并试图通过改造自己的身心来改良人心风俗的青年们结成了集团,出现在社会上。此后,新民学会成为湖南的理论研究和社会运动的核心。

另一方面,毛泽东对时事问题也很关心,他每天都读报纸,被称作“时事通”。他也非常活跃,1915年反对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在第一师范学生编印有关中日交涉、日本吞并朝鲜及侵略中国的历史和朝鲜、越南的亡国惨状的刊物《明耻论》的封面上,他写下了“(日本发出最后通牒的)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的誓言。1916年7月25日在致萧子升信中,他写道:“日人诚我国之劲敌!”“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早稿》,第51页)。那时,由于校长张干向省议会提议征收学生十元杂费,毛泽东改写并散发了反对张干的运动传单。张干要开除毛泽东等17名学生,但是经杨昌济等教员劝说作罢,张干7月被迫辞职。12月毛泽东印刷并散发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文集《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

1917年夏天毛泽东和萧子升历时一个月,走访了湖南的五个县的农村,是年冬天他又一个人走访了农村。他在学生投票的“人物互选”中位列第一,当选为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长,并创办了由学友会主办的工人夜学。同年11月他指挥学生志愿军保卫学校,协助

警察缴北洋军队的枪，并将他们赶出了长沙。他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接近工人、农民的政治方向开始鲜明起来。

这个时期，毛泽东将活动的重点放在自己的身心锻炼，特别是哲学研究上。1917年9月22日，他向张昆弟和蔡和森慨叹国民的奴隶性和思想狭隘，说：“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张昆弟认为：“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均为此类人物）。另外，他还主张进行家族革命和师生（教师和学生）革命，说“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早稿》，第639页）。看来他在幼年时期进行家族革命，而在湖南第一师范时期又进行师生革命。毛泽东对学校的不满非常强烈，说：“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后述）。”看来这种家族革命和师生革命不是单纯地否定“旧”，而是在反抗“旧”、确立自我的同时，将“旧”的最好的东西移植到自己开拓的“新”的基础之上。

毛泽东在长沙时代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思想。

他在向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提交的文章《商鞅徙木立信论》<sup>①</sup>（1912年6月，《早稿》）中赞成法家的中央集权、富国强兵、统一中国的政策，并慨叹了国民的无知和愚昧。

记载1913年10月到12月的修身和国文课堂记录《讲堂录》里，毛泽东写下了杨昌济的话，这些话可以认为是毛泽东哲学的出发点。

“有独立心，是谓豪杰”（《早稿》，第581页）。

“理想者，事实之母也”（同上，第589页）。

“一个之我，小我也；宇宙之我，大我也。一个之我，肉体之我也；宇宙之我，精神之我也”（同上，第590页）。

“志不在温饱，对立志而言，若言作用，则王道之极亦只衣帛食粟不饥不寒而已，安见温饱之不可以谋也”（同上，第597页）。

---

<sup>①</sup> 公元前4世纪，秦朝政治家商鞅在发布新法时，担心得不到百姓的拥护，于是他在都城南门立了一块木桩，并贴出告示说，将木桩移到北门者奖励10金，但是没有一个人去搬木桩。于是他又贴出告示，将奖金提高到50金。这时有一个人将木桩移到了北门，他依照诺言给了那人50金，表明自己没有说谎。因此，发布新法时，百姓都能自觉遵守。

这些话在宇宙和我合为一体的宇宙观、人观中，强调了自我的立志和对民生的责任。

《体育之研究》(1917年4月)是从对全体即“国力”、“民族之体质”等的衰弱的忧虑出发，但是它并不主张体育救国论——作为强化全体的手段，锻炼作为部分的个体的体力这样的观点。相反，他认为，个体自觉、锻炼身体、强壮起来、“弱可转强”是人的生命的充实，这样的行动本身就是目的，个体强壮起来，其结果全体就会自然而然地强壮起来。

《体育之研究》有两条主轴。

第一，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毛泽东主张：心即主观、自觉、意志，是决定性的，是人开始活动、变革事物的原动力；“欲图体育之有效，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于体育之自觉不可”(同上，第65页)；“夫内断于心，百体从令。……故讲体育必自自动始”(同上，第69页)；“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同上，第72页)。

第二，人是身体的存在，是天地之一物这一宇宙观、人观。

毛泽东认为，人首先是身体，是生、动，“人者，动物也”，其次，是拥有赋予生以节度、赋予动以规则次序、使生和动更加充实这种意识性，具有不同于动物的特长说：“人者，有理性的动物也，则动必有道。”另外，他在“动也者，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这种人观的基础上，加上了“天地盖为有动而已”的宇宙观，将朱熹的“敬”、陆象山的“静”、老子的“无动”、佛教的“寂静”以及近代人们崇高的静坐法都否定了。

他说：体育可以“强筋骨”，体质可变，弱可转强，强调这种锻炼身体的方面。同时，他又根据“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这一身体的人观，说体育还有“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等锻炼心的方面。他并主张：“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心的锻炼和体的锻炼的结合成为以后毛泽东哲学的基调。

看来似乎是，“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中，毛泽东叙述了他已经丢失的论文《心之力》的主旨。



毛泽东认为：天下混乱的原因，是政治领导人无见识、无根底，不论袁世凯和孙文，连康有为也不清楚本源。他独佩服曾国藩。他和杨昌济一样，认为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等政治变革，一切皆枝节，而应以学术变革为基础。他说：“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当今之世，宜有大器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毛泽东说：“大本大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知之谓也”（《早稿》，第85—86页）。这句话的意思是，宇宙中有本体，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成为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它形式上受到朱熹的“一本万殊”和杨昌济的“大本大源”（贯通宇宙全体的大原则）的影响，而内容上接近于作为自然界的立法者和道德界的立法者。

毛泽东说：人人皆为强有力者所利用，“全失其主观性灵”，颠倒之，拨弄之，如商货，如土木；他们不顾道理，不能自主只是被驱于社会制裁之下，则相率为善不为恶，德行无非“盲目的动作”；因此，“欲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张以行，不盲从他人是非，非普及哲学不可”。他是想将人们的意志他律转换为意志自律。而且，他还说：具有高尚之智德的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吾同胞、吾宇宙之一体的小人，普及哲学，开其智而蓄其德，使“天下尽为圣贤”，从而实现“大同”。可以认为，他想要利用儒教的君子和小人在知识、道德上的不平等来普及哲学，从而达到最终消灭不平等实现平等的目的。

可是，对于他自己，毛泽东说：“未尝立志”，对宇宙、人生、国家、教育的主张“茫乎未定”。他制定了将来的计划：毕业后组织私塾，略通国学大要，然后出洋求学，乃求西学大要，回国后返于私塾生活。

杨昌济以德国的泡尔生（今译鲍尔生，1846—1908）著，日本蟹江义丸译，后蔡元培又参考原本进行重译的《伦理学原理》（以下简称《原理》）为教材讲课，毛泽东听了他的课。1917—1918年，他精心研

读此书，并在空白处写下了一万二千余字的“批注”。建国后，他曾说过，这本书“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但我们“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得到了新的启发和帮助”。在我看来，从鲍尔生的伦理学中，他得到了如下的启发和帮助：将此前追求的康德的意志自律说和谭嗣同的宇宙与我合为一体的宇宙观、人观结合起来的道理。

“批注”是记录青年毛泽东为了达到“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的目的而力图吸取与中国文明不同的、形成一个体系的西方哲学来力战奋斗的珍贵文件。毛泽东赞成《原理》的基调，理解其核心并进行了展开，但有些地方也提出了疑问或反对意见，并提出了自己的与之相反的观点。

作为“广义的康德派”、“新人文主义者”的鲍尔生在哲学上反对严格的基督教正统派（非合理的超自然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唯物论（机械自然主义），站在“唯心的泛神论”、“实在的唯理论”的立场上。他在伦理学上，则试图调和动机论和功利论，站在“目的论的势力论”的立场上。他一方面反对快乐论，抱有理想主义，认为“个人及全社会的人生的客观形成”是至善的，同康德的立场相同。另一方面他反对康德的严格主义，即反对认为人类的价值在于驱除自然冲动、性癖，仅以义务感情来决定意志这一主义，而是站在以“生活之保存和发展”为目的的效果论上，主张由理性来约束冲动和欲望。他的这种调和心和物、动机和效果、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个人和种族等矛盾的学说在当时的日本被介绍为公平、温和的学说。

杨昌济认为近世伦理学有自然主义（唯物论）、绝对主义（绝对唯心论）和人本主义（人格唯心论）三种，他把孔子、孟子、陆象山、王阳明的思想看做是人格唯心论，认为“人生之行为有目的，其目的乃己身自由意志之所决定”，他本人也持相同的观点。这和鲍尔生的立场相近，所以大概毛泽东对《原理》比较容易理解。

“批注”的思想可以整理为两个中心主题：“精神的个人主义”和“精神不灭，物质不灭”。

### 1. “精神之个人主义”

第一，鲍尔生认为，人生的目的即至善，即具足之生活，是“人类

之体魄及精神，其势力皆发展至高而无所歉然之谓也”（《原理》，第 424 页）。毛泽东对此非常赞成，并且他比鲍尔生更彻底地坚持这个原则。

在善论这一点上，《原理》反对两个极端，即霍布斯的“利己主义”或“一人之功利主义”以及叔本华所主张的“必以他人之利害为其行动之动机者”才是有“道德之价值”的利他主义。它主张“人之意志以小己及他人之安宁为鹄”，“其自存之冲动，固已与保存种族之冲动并存矣”，“小己之利害与社会之利害互相错综”（同上，第 447—448 页）。

“批注”吸收了《原理》主张的利己利他相结合的学说，但是对其结合方法表示了不满，认为“我固万事万念之中心也”，“人恒以利我为主”，“利他由我而起点也”。他把人类、生物、宇宙为一大我，认为“精神之利己”中包含着利他，从而更加强了利己（《早稿》，第 141 页）。

在迦太基被俘的罗马人列格路回到故乡，反对和议，使罗马人背盟宣战之后，列格路重赴迦太基从容就死，对于这种献身行为，《原理》解释为：“一切正当的献身行为”（蔡元培翻译为“杀身成仁”，这是出自《论语 卫灵公篇》的典故）亦皆含有保存小己之义，即所以保存其观念中之小己者也。彼列格路何尝不以生活为鹄，惟其所鹄者，非形质界之生活而精神界之生活耳”（《原理》，第 449—450 页）。对此，“批注”大加赞赏，谓之为“精神之个人主义”（《早稿》，第 151 页）。另外，他将这种“个人主义”详细说明：“一切之生活动作所以成全个人，一切之道德所以成全个人，表同情于他人，为他人谋幸福，非以为人，乃以为己”（同上，第 203 页）。毛泽东将“自我实现”——“人类之体魄及精神，其势力皆发展至高”作为“人类之目的”，认为“杀身成仁”（儒教）、“舍身救人”（佛教）等圣贤豪杰的利他道德也是利己的一个手段，包含于其中，并称之为“精神之个人主义”。

《原理》从近代西方的原子个人主义的利己主义出发导向利他主义，以图调和两者。“批注”相反，它从中国传统共同体伦理的利他主义出发导向利己主义，试图将利他包含于利己之中。这是一个以宇宙和自我合为一体的精神之我。可以说，毛泽东将杨昌济的“以民为主”的思想包含于他的“以吾为主”之中，并继承了“有公共心之个人

主义”，把它改进为更加彻底的个人主义。《原理》讲：“且如经济社会，以契约若买卖为基本。利己主义之原理，间有因之而实现者”；“盖经济社会中人，各以己之利害为鹄的，集同此鹄之人，而后乃有此社会也”（《原理》，第 526 页）。对于这个“经济社会”的个人观，毛泽东几乎完全没有吸收。

毛泽东根据“精神之个人主义”，试图突破那些妨碍个人发展的来自他人的压抑和束缚。他说：“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早稿》，第 151—152 页）。他继承了谭嗣同的突出了“仁”、否定“三纲”的思想，走向更加彻底的个人主义的方向，力求将“三纲”所压抑的客体的个人转化为自己突破压抑的主体。这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个性解放”的精神。个人应该内心抱有利他道德，一方面，打破国、家全体生命体现者的君、父的纵向压抑，将旧社会解体为个人；另一方面，个人向横向扩展，舍己救人，回复全体生命——提倡家庭革命和师生革命，并进一步摸索社会革命的毛泽东，其思想的核心即在于此吧！

看来，毛泽东的“精神之个人主义”受到康德的影响。“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同上，第 148 页）。大概来源于“现象界即吾人认为宇宙的东西均为主观所产”（吉田静致，第 526 页）。“吾人惟有对这一于自己之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早稿》，第 235 页），是仅仅取了“对于自己之义务在于保全自我、发展自我；对于他人之义务者，可将其分为尊敬和爱”（吉田静致，第 546 页）。

在毛泽东所坚持的彻底的个人主义中，有一部分超出了主张试图调和个人与团体（社会、种族、国民军）矛盾的鲍尔生思想的范畴。对于《原理》将个人比作四肢、将国民比作躯体，讲：“各个由国民而发生，其有生命、有动作也，亦由于国民之有生命也”，“批注”给予批判，说“先有各人而后有国民”，“国民之生命，即各人之总生命，乃合各（人）之生命而成”（《早稿》，第 243 页）。

“批注”主张“现实主义”，认为：只对于自己经历的主观客观现实者负责，与除此之外的过去和未来不负责；“吾惟发展吾之一身，使吾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同上，第 203-206 页）。他强调由于个人在空间上自立于团体和宇宙的“个人主义”，和个人在时间上自立于历史的“现实主义”，便会得到真正的自由和自我完善。

第二，《原理》在说明要达到个人及种族的保存和发展这一人生目的应如何行动的义务论部分，反对康德的严格主义，即“人类之者，必于其意志中悉屏性癖冲动之属，而粹然余义务之感情，乃始可以评定其价值”，主张“义务者冲动之制限也”，并追求自然冲动与义务感情的一致。它认为追求人生目的的意志有三个阶段：无意识之冲动、感觉之欲望和理性之意志，意志之对于冲动、欲望的批判、选择谓之良心，“理性意志之能力，所以训练下级意志而培养之者，谓之意志之自由”（《原理》，第 432 页）。

对于康德的学说——“从容中道者之意志，逊于克私从理者之价值”，“批注”批判为“吾国宋儒之说与康德同”（《早稿》，第 215 页），从而偏袒鲍尔生，甚至比鲍尔生更加肯定自然冲动。

《原理》认为，与自然冲动相矛盾的义务感情的起源，在于本于教育习惯之决意和风俗习惯。对此，“批注”提出了异议，认为“自然冲动未必非真，义务感情，未必非伪”（《早稿》，第 208 页），冲动（食欲、性欲）是先天的，真的，自然的，实在的，促进了生存发达，但若过度则会危及生存发达，此时良心加以节制，完成冲动。它主张要防止后天的人为的训练习惯过度，反对自然冲动，致使良心变为伪的、人为的、非实在的。

“批注”非常赞成《原理》所讲的“大人君子，决非能以义务感情实现之者，大抵由活泼之地感情之冲动而陶铸之焉”。

它说，豪杰之士“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之力”，成全人格；此动力即自然之冲动、性癖，将来自外部的制裁束缚全部排除。豪杰“自计”此动力之发出之适宜与否，得当与否，保持之或变更之，绝非服从外来之道德律及义务感情。

《原理》将义务规定为“凡与风俗习惯及道德律一致之生活及行

为”，说“履危蹈险，舍身以拯人，则在义务以上……圣贤豪杰之所为也”。

对此，“批注”唱了反调，说：吾人无对于他人之义务，惟有对于自己之义务，即“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救人危难之事即为此；圣贤豪杰“乃其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同上，第235-237页）者，普通人当然也应以为期向。

依我看，“批注”过于肯定“自然之冲动”，对节制、统驭它的“理性之意志”的省察却不够充分。

## 2. “精神不灭，物质不灭”

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将意志之自由、灵魂不灭和神的存在三理念作为实践理性的要求加以提出。鲍尔生试图将康德主张的合理科学——伦理学作为经验科学加以重建，强烈地意识到这三理念，并阐述了自己的见解。毛泽东力求理解并接受鲍尔生的论点，一方面，在作为其论据的西方哲学思想上进行力战苦斗；另一方面，费尽心思从谭嗣同等中国思想中吸取材料、构筑“土哲学”，给予“精神之个人主义”以理论基础。

第一，关于灵魂不灭，《原理》说：灵魂不灭的信仰是以“此世之生活即本体悠久生活现象之形式这一思想”，“特借感官以表彰之耳”；“斯世之时间意识”为“永存意识之一部分”；“一切记忆”为“神之绝对意识之一部分”。

“批注”将以精神超越自然为原理的西方哲学的灵魂不灭说，移植到以自然内部的“全体一个体”为原理的中国思想的基础之上。

它说：“人类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则之支配，有生必有死，即自然物有成必有毁之法则”（同上，第194页）；所谓生即由精神与物质之团聚而为人，所谓死即解散之，归于自然物；因为作为全体的自然物不灭；所以作为其一部分的个体的人也是不灭的；“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世上各种现象只有变化并无生灭成毁也”。

这种主张大概受到谭嗣同《仁学》中“有无者，聚散也，非生灭也”这一思想的直接影响。其渊源可以追溯至张载甚至庄子的生死观。

“精神不灭，物质不灭”哲学通过个体、我与全体、自然合为一体的自觉意识，给予“舍身救人”、“杀身成仁”的圣贤豪杰的利他行动以理论基础。另外，它从成毁、变化的观点把握国家、民族，积极肯定像德国那样的“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同上，第201页）的“大革命”、“大变化”。

第二，关于神的存在，《原理》主张，良心之起源于风俗习惯之意识，父母、师保、社会、法束，最终神的权威作为高等意志之意识抑止各人不合道德之意志。

“批注”说：“合无量数发显而为一大本体，由一大本体分为无量数发显”，“人类者与本体有直接关系，而为其一部分”，“本体或名之曰神”。但是，它将《原理》强调的“以道德律为出于神之命令而后能实行”批判为“奴隶之心理”，主张“服从神何不服从己，己即神也”。另外它还说：“吾从前固主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今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各除去我，即无宇宙”，“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同上，第229—231页）。

无我论过渡到唯我论，是在以宇宙和我合为一体的宇宙观内部，把重心从使我消融于宇宙的存在论转移到以宇宙为我所产的认识论。

第三，关于意志之自由，《原理》探求了自然律的支配与意志之自由之间的关系，认为随着自己身体的发育，就会从大受物质之影响的阶段发展为渐能抵抗物质之势力，遂能由其意志而变更外界密切关系之事状，且能间接自变其形体的阶段。

“批注”首先提出疑问：人虽精神发展之后，亦曷尝不为自然界所规定耶？然后说：“吾人虽为自然所规定，而亦即为自然之一部分。故自然有规定吾人之力，吾人亦有规定自然之力”（同上，第272页）。作为自然的一部分规定于自然人的被动性，和由自由意志变革自然人的能动性之间的关系这一哲学根本问题在此有所触及，这与他后来的主观能动性思想有关系，这一点值得我们注意。

另外，毛泽东接受了鲍尔生主张的“盖历史生活之形式，不外乎善恶相竞之力，与时扩充而已”的思想，认为：“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

而成者也”(同上,第183页),“不平等、不自由、大战争亦当与天地终古,永不能绝”(同上,第184页),“吾尝梦想人智平等、人类皆为圣人,则一切法治均可弃去,今亦知其决无此境(“大同”)矣”(同上,第186—187页)。看来在此基础上,后来毛泽东接受了“矛盾统一法则”中永远的矛盾和永远的斗争哲学思想。

如上所述,毛泽东在“批注”中,思想上对鲍尔生进行又吸收又批判的力战奋斗中,构筑了自己的哲学——宇宙观、人观。以此为中心的毛泽东早期思想有下述三个问题点。

第一,毛泽东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位置。

可以看出:毛泽东继承了谭嗣同的思想,即宇宙全体生命要突破上下秩序的束缚,士要与宇宙合为一体,牺牲自己拯救众生的思想。他又经由杨昌济和鲍尔生的思想,走向更加彻底的个人主义方向,并更加明确了作为突破束缚拯救他人之主体的个人。

第二,毛泽东接受西方哲学的意义<sup>①</sup>。

毛泽东将鲍尔生的以自己的“体魄及精神,其势力皆发展至高”作为人生的目的的人观称之为“精神之个人主义”并加以接受。他还做了如下的工作:将它从精神超越自然为原理的西方哲学的土壤移植到以精神投入自然合为一体为原理的中国思想的土壤上,并给它以“精神不灭,物质不灭”这一理论基础。可以认为,据此,在自然优越于精神、全体优越于个体的中国思想内部,他建筑了最大限度发达精神和个体的宇宙观、人观。

第三,毛泽东与儒教思想的关系。

儒教认为:圣人即自觉的主体,确立上下秩序,关怀、保全自然的客体即人民的生命。在我看来,毛泽东力图将此颠倒过来,从作为知

---

<sup>①</sup> 岩间一雄认为,杨昌济提倡的东西文明“融合”,实际上是“有公共心之个人主义之人”,因此,儒教道德“只能与西洋近代的个人主义冲突(《东西文明的“融合”和冲突——最后的变法派杨昌济》)。毛泽东对鲍尔生的《伦理学原理》的“批注”“是基于旧儒家的、特别是明学的思考”,最终“和西方哲学在思想上错过了”。但是通过与一种唯物论与辩证法的“异文化接触”,在毛泽东思想深处萌发了“用历史观念把握现实的原理”(《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注绪论》)。他是试图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与我本人相同的问题,并开拓不同的方向。



识分子自我开始，最终使人民各个人自己打破上下秩序的压抑，将“杀身成仁”的圣贤道德作为手段，使自我身体及精神发展至高，自我节制并充足自然冲动和欲望，并使自我从客体向主体，从意志他律向意志自律转化。作为实现上述目的的契机，他吸收了主张个人的无限发展和意志之自由的西方哲学。

另外，从“批注”中我们还能感觉到毛泽东的个性——即通过坚韧的自我来保持那些存在于自我内部的、所谓利他与利己、无我与自我、慈悲与离群索居（离开同伴而孤独生活）等社会连带和个人独立的两极之间的激烈的矛盾、对抗这一个性。这是左右摇摆并大幅前进的毛泽东的力量的源泉。

毛泽东一方面，在这种宇宙观、人观的基础上，后来接受了列宁哲学，构筑了自己的辩证唯物论哲学——“实践论”和“矛盾统一法则”。另一方面，在青年时期形成的宇宙观、人观在其思想深处保存一生。

## 第二节 “民众的大联合”与“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

毛泽东1918年6月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为了主持新民学会会员的留法勤工俭学准备工作，8月去了北京。他通过杨昌济的介绍，从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那里得到了一份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并加入了北京大学的新闻学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感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策源地的气氛。在天安门他亲耳听了李大钊盛赞俄国十月革命的演说《庶民的胜利》，通过邀请蔡元培、胡适举行新民学会会员座谈会等等，与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接触，在这期间他认识了陈独秀，他结识了王光祈、张国焘等青年，并阅读新刊物，扩大了视野。他日益关心政治，思想变得激进，在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下同朱谦之展开了讨论。1919年3月他离开北京，在上海欢送前往法国的留学生后，4月回到长沙做了修业小学的教员。

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学生发起了“五四”运动。5月下旬，在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遣的邓中夏的联络下，毛泽东等改组了湖南学生

联合会,6月3日举行了罢课,7月9日成立了湖南各界联合会,在其下组织了救国十人团。他们创办了湖南学联的机关杂志《湘江评论》,毛泽东担任主编,他亲自撰写了以《湘江评论创刊宣言》(1919年7月14日)、《民众的大联合》(1919年7月21日、7月28日、8月4日)为代表的大量文章,引导并指示运动方向。他认为:文艺复兴由“一些学者倡之,大多民众和之”而取得成功,此后欧洲进行了宗教、文学、政治、社会、教育、经济、思想、国际等各方面的打倒强权得自由的平民主义(民主主义)改革。其后出现了民众的大联合战胜王党的大联合的法国革命以来的政治改革,以及战胜贵族的大联合资本家的大联合的俄国革命以来的社会改革,他将中国的五四运动,定位在冲破一切障碍前进的“世界革命”、“人类解放”的这种潮流中。

五四运动以自己的学生联合会为先导,商人和工人继起响应,组织各界联合会,迫使北京政府于6月10日罢免了亲日派三官僚,并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从五四运动的胜利经验中,毛泽东产生了只有我们才能拯救天下、国家、社会的极大自信,形成了确信多数的民众的大联合的力量最强,一定能战胜少数的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大联合的“人民”理想主义。他鲜明地道破了“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早稿》,第292页),天、鬼、死人、官僚、军阀、资本家都不要怕,要拯救达到极点的国家的恶化、人类的痛苦、社会的黑暗,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他一生都信守着多数民众一定能战胜少数强权者的单纯信条。

毛泽东提倡民众摆脱文化、经济、政治的三重压迫而取得解放。他以为:少数的贵族、资本家、强权者,以知识、金钱和武力为手段来压迫民众,所以如果多数的民众把它们夺回来,扭转智与愚、富与贫、强与弱的差距,就一定能够胜利。在俄国革命中,原把枪口指向平民的皇帝的军队,响应平民的号召站到平民一方而变成抵抗贵族和资本家的健将。这一事实成为了毛泽东的重要论据。因此,作为民众的大联合打倒强权者的大联合的方法,与马克思的“用强权打倒强权”的“激烈的方法”相比,他更赞同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温和的方法”,即平民自觉团结起来,不断对强权者进行“忠告运动”、“呼

声革命”，使他们“回心向善”的。这种“温和的方法”，大概是受到了杨昌济以自己的“诚”感化他人的思想的影响和在北京接触到的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可以认为，即使在1920年他接受了列宁主义的暴力革命的方式之后，这种影响仍然存续于毛泽东的思想之中，让敌人回归人民队伍的和平改造思想就是其具体表现。

其次，关于形成民众的大联合的办法，毛泽东号召先呼吁组织农民、工人、学生、女子、小学教师、警察、车夫的各种小联合，以此作为大联合的基础。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皇帝，1916年打倒了洪宪皇帝（袁世凯），以及以俄国革命为起点的匈牙利、德国、奥地利、捷克进行的社会改革，英、法、意、美举行的大罢工，印度、朝鲜的大革命之后，又爆发了五四运动。毛泽东根据这些论据，认为中国有民众的大联合的觉悟。而且根据清末民国初年从咨议局到进步党、从同盟会到国民党这些政党的结成，国会以及各省丛生着的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农会、学生团体等各种职业团体、各界联合会，他认为中国存在民众大联合的动机。但是，考虑到湖南人和中华民族只图私利、目光短浅、不考虑共同生活和长期展望的弱点，他对中国人有没有民众的大联合的能力提出了疑问。而这正是《新青年》提出的“改革国民性”的问题。

毛泽东认为产生这些弱点的原因，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被迫作皇帝的奴隶，不允许我们有思想，有组织，有练习。然而，根据“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的倒转的逻辑，他期待着中华民族将来能发挥这种潜在能力，比任何民族都更早地实现大联合。人要反抗压迫（1939年以“造反有理”的形式被公式化）这一单纯的信条，毛泽东也信守了一生。民众能够凭借内在“自然力”的爆发来突破外在的“人为”的束缚，克服自身的弱点，这一民众观在以后的革命运动中进一步具体化。

从以“人类之体魄及精神，其势力皆发展至高力”为“人生之正鹄”突破他人的压迫和束缚的“精神之个人主义”的文化革命，发展到“由少数阶级专制的黑暗社会变为全体人民自由发展的光明社会”的民众的大联合的社会革命，主体从“个人、我”扩大为“民众、我们”。依

我看,应该实现的新社会,就是全体人民人人都实现“精神之个人主义”的场所。这和李大钊主张的“个性自由、共性互助”的“大同”具有共同的结构。毛泽东通过“一些学者倡之,大多民众和之”取得改革成功的观点,继承了杨昌济的“以吾为主”、“以民为主”的思想,但在看到了学者号召民众响应而站起来的巨大的形象上,毛比杨迈出了一大步。此前在宇宙论中摸索出的“天地之动”和“宇宙日新”等根源性力量,以“民众的大联合”的形态在社会上出现了。在李大钊思想展开过程中,“青春”的宇宙论在“世界新潮流”和“全体人民”这一社会存在中具体化了。在这一点上,毛泽东紧紧追随于李大钊的步伐之后(近藤,第209-210页)。

毛泽东首先针对敌人即强权者树立起民众这一主体,并怀有了民众的大联合一定能战胜强权者的大联合而实现光明社会的坚定信念。此后,关于主体即民众打倒敌人的方法,他走过了一个从“温和”到“激烈”的大跨度的摸索过程。

《湘江评论》在湖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文章被北京、上海、成都的报刊杂志转载,相当于五四运动的中央机关报。在北京的《每周评论》第36期上,胡适对其加以介绍,说:《民众的大联合》“眼光远大,议论也痛快,确是今日的重要文章”。但是,8月中旬北方的皖系军阀、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解散湖南学联,查封了《湘江评论》。

从7月至8月,《每周评论》报纸上展开了胡适与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毛泽东9月1日印刷并分发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列举了教育、女子、国语、孔子、劳动、民族自决、社会主义、民族的联合、俄国、印度、日本、朝鲜、山东、湖南、地方自治、中央地方的集权分权、普通选举、实业、交通、财政、经济、领事裁判权取消、联邦制等71个大项目及其中的81个小项目,作为应该研究的问题。并且指出“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早稿》,第401页),并列出了10个领域的主义。10月该章程经邓中夏介绍刊登在《北京大学日刊》上。毛泽东听过胡适关于实验主义的讲演,把实验主义列入近代思想改革的代表,并受到了它的影响。当时他大概对胡与李的论争还没有进行深入的思考。

11月，毛泽东成了长沙《大公报》的“馆外撰述人”。11月14日长沙的女学生赵五贞为反抗父母强制她嫁给有钱的老头作续弦，在婚礼的花轿中自杀了。针对这一事件，毛泽东在《大公报》上连续撰写了九篇文章，呼吁改革婚姻制度。一方面他从个人的人格角度分析问题，认为赵五贞21年来人格和自由意志一直不被父母承认，因而抱着“不自由，无宁死”的想法自杀，这是人格的表现，而表示同情。但是，站在鲍尔生把人生目的放在“人类之体魄及精神，其势力皆发展到(至)高地位”这一伦理学说的立场上，他否定自杀，主张“与其自杀而死，宁奋斗被杀而亡”。另一方面，他注意到社会的黑暗面，基于夫妇关系要以恋爱为中心的婚姻观，号召人们打破压制这一观点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及结婚对象是由命运已经前定的“婚姻命定说”等迷信的束缚，这样就能兴起“家庭革命军”，婚姻自由、恋爱自由的大潮便将泛滥于中国大陆。他还是期待着突破“人为”束缚的“自然”的力量，并解释这要从教育普及着手。他继承杨昌济的“尊重本人之志愿”的家族制度改革方案。

毛泽东1918年6月从第一师范毕业后，曾设计在岳麓山与朋友共同生活，建立“半耕半读”的村庄计划。1919年12月，他写了《学生之工作》一文，参考俄国的民粹主义、日本的“新村”、美国和菲律宾的“工读(边劳动边学习)主义”，提出了在岳麓山建设“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的新村设想。在那里，学生一天的时间分为睡眠、游息、自习、教授、工作几部分，一边进行农业劳动一边学习。这里面包含对不从事农业劳动而要到城市中做商人或官僚的新旧知识分子的批判。在新村中，新学校的学生创造新家庭，新家庭聚集而创造新社会，并要建设公共的育儿院、蒙养院、学校、图书馆、银行、农场、工作厂、消费社、剧院、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这大概就是促使他后来办人民公社的公社(Commune)之梦吧。

但是，在公社梦想付诸实施之前，12月2日，由重建的湖南学联号召发起，长沙的学生、教员、店员、工人参加的焚烧日货示威大会遭到张敬尧镇压，毛泽东与新民学会会员及学联干部协商后，投身于驱张(敬尧)运动，使反日民族运动发展成为反军阀民主运动。他率驱张

代表团赴北京，创建平民通信社并任社长，将揭露张的罪恶的文章送往各地的报纸以唤起社会舆论的支持，并向政府请愿要求罢免并处罚张。期间他去医院探望重病的杨昌济，杨给在上海的同乡朋友章士钊写信，作为“海内人才”而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后杨于1920年1月逝世，毛尽心办理了葬礼及后事。

毛泽东在驱张运动过程中，仍在思考改造湖南及中国的方案。他1920年1月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2月参观了女子工读互助团，访问了介绍“新村”的周作人，会见了李大钊并与他商量留俄勤工俭学，3月与陈独秀等发起了《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与《新青年》的领导人商谈、接触新的运动。他与上海的湖南改造促进会关系密切，参加了《发起宣言》的起草，并将之印刷分发出去。他热心地寻求马克思主义文献，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等。4月他离开北京，经天津、济南、泰山、曲阜、南京赴上海，送走了去法国实验工读互助生活的新民学会会员后。他向报纸投稿主张湖南人民自决，以湖南改造促成会的名义给湘籍老同盟会员曾毅复信，申明自决自治的主张。他会见陈独秀，就湖南改造促成会及马克思主义书籍进行了讨论。

6月，张敬尧败走，谭延闿、赵恒惕的湘军收复了湖南。7月初毛泽东回到长沙，参与创立湘潭教育促进会，创设文化书社以图吸收新文化，还组织俄罗斯研究会等，致力于文化活动。此时他得到了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主事（校长）的职务。

7月22日督军兼省长谭延闿为回避南北各势力入侵湖南而宣布湖南自治，毛泽东从9月初至10月上旬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了10篇文章，积极推进自治运动。看来这延续了自谭嗣同以来的湖南一省自立路线。

毛泽东提倡“湖南共和国”，赞成“湖南门罗主义”，主张在世界民族自决的风潮中实现被征服被蹂躏的湖南人民的自决自治，与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携手。他认为全国的总建设在短期内完全无望，主张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在10年乃至20年之后，再发起“彻底的总革命”。

毛泽东撰写了题为《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

从湖南做起》(1920年9月5日)的文章,认为四千年的中国没有基础,“外强中干,上实下虚”,批判民国成立以来的宪法、国会、总统制、内阁制的尝试,都是建层楼于沙渚,并归于失败。相反,基于“政治组织是以社会组织做基础”、“大国家是以小地方做基础”、“国民全体是以国民个人做基础”的观点,他主张自下部变革旧中国的结构。他认为要想“以政治组织改良社会组织,以国家促进地方,以团体力量改造个人”,是需要相当的环境和条件的。对于俄国革命,毛认为“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立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是大批党员站出来,占人口八九成的劳农阶级响应斯而成功的。他说:“中国如有彻底的总革命,我也赞成,但是不行”,所以他要从杨昌济的教导中找出一条与列宁自上而下的革命道路所不同的,自下而上的变革道路。“中国的事不能由总处下手,只能由分处下手。我的先生杨怀中说:‘不谋之总谋之散,不谋之上谋之下,不谋之己谋之人’”(《达化斋日记》,1903年。《杨集》,第23页)”(《早稿》,第507—508页)。

杨昌济要把由圣人、皇帝为顶点,自上而下地构成的旧中国,进行以“吾”和“民”为原点,自下而上地改建。杨的这种思想,在毛泽东的湖南自治运动中的“分处”思想中得到了继承。此外,毛吸收列宁主义,开始武力革命后,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根据地思想。可以认为,其中以个人的独立、发展和人与人的团结为起点,自下重新组成旧中国的结构的共通逻辑也发挥了作用。

在湖南省内部,相对于最少数的无职政客,毛泽东站在“最大多数的人民”(农人、工人、商人、学生、老人及孩子)的立场上。他批判谭延闿的“湘人治湘”的口号,是“把少数特殊人做治者,把一般人做被治者,把治者做主人,把被治者做奴隶”的“官治”(官僚政治),主张由平民自己选出同辈中靠得住的人作为乡长、县长、省长,去执行公役,从而实现完全的乡自治、县自治、省自治的“民治”(民主政治)的“湘人自治”(《“湘人自治”与“湘人治湘”》,1920年9月30日,《早稿》,第523—524页)。他呼吁长沙30万市民承担起对3000万湖南人托付的责任,参加到自治运动中来。他力图在湖南的政治舞台上实现“民众的大联

合”的理想主义。

10月5日—6日,由龙兼公(《大公报》主笔)、毛泽东、彭璜(原湖南学联会长)提出《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刊载在《大公报》上,377人(几天后增至436人)在建议上签名。《建议》主张“革命政府”谭延闿政权作为湖南自治根本法即湖南宪法的起草者,应接受长沙居民和各团体的意见,通过“直接的、平等的、普通的选举”,“每五万人选出代表一人”,召集人民宪法会议,制定(起草、决议、公布)湖南宪法,根据宪法创立正式的省议会省政府、县议会县政府、市镇乡自治机关,建设新湖南。他力图贯彻通过群众参政来建设新湖南的原则。

10月7日湖南学联召集了长沙各团体各报馆代表联席会议,8日各界建议人400余人举行大会,10日双十节举行万人请愿游行,一时间运动高涨。其中毛泽东担任起草请愿书、组织大会等重要工作。但由于遭到了省议会的强烈反对,建议没有被接受,推动运动的“长沙公团势力”(塚本元,第100页,第116—117页)也拒绝在妥协案上签字。毛泽东对针对他个人的攻击予以反驳。运动高涨、逆风亦强的时期,毛泽东把此前所致力的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决不是定位为我们的‘根本主张’”,而是“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他再次强调要置身于腐败政界之外,从旁“促进”改革,整顿阵容,把活动的重点转移到确立新民学会的主义上。

给予毛泽东对主义进行思考的机会和材料的是伯兰特·罗素的长沙演讲。

湖南省教育会在1920年10月26日至11月2日召开了邀请有杜威、罗素、章太炎、张继、蔡元培、吴稚晖、张东荪、李石曾、杨端六等中外名人出席的演讲会,相关报道登载在《大公报》上。罗素根据同年5月至6月中旬五周时间对苏联进行的视察并与列宁进行的多次面谈,做了“布尔什维克主义与世界政治”和“俄国访问见闻”两个演讲,前者和“对俄国记者的谈话”登在《大公报》上。罗素认为资本主义总会失败、灭绝,并为此寻求取而代之的新主义,他虽肯定共产主义为“好学说”、“文化的进步”,但主张用“渐进的方法”、“教育的方法”。罗



素同情布尔什维克和列宁,但又忧虑其“强迫手段”、“平民专制”的方法会压迫人民而使自由很难恢复,并发生国内外战争。他批判英美用经济封锁来扼杀俄国的方法太不好,另外又劝告布尔什维克停止在外国煽动革命,要与外国媾和以解除经济封锁,从而得到援助来发展工业,并使工业制品和粮食等价交换,尤其期待工业发达、粮食能自给的美国变为共产主义。

毛泽东记录了担任罗素翻译的杨端六的演讲“与罗素先生的谈话”,谈话的要点为“罗素之所以反对布尔什维克,就是因为他不自由。布党的目的是共产主义,是罗素所赞成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而要以专制为手段,一往难收,将使自由丧尽,是罗素所不赞成的。罗素认为人类的理想社会,是自由的充分发展个性”(11月1日)。毛泽东丝毫没有提及这种学说和自己的“精神之个人主义”和“民众的大联合”是有共通性的。而他将罗素的主张把握为“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他在与彭璜、易礼容详细辩论后,得出“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给蔡和森萧子升及在法诸会友”的信,1920年12月1日,《书信》,第5页)的论断。毛泽东通过罗素的演讲知道苏联的实际情况,更加确信中国不能走罗素的教育之路,而只能走列宁的革命和专政之路。

在此之前,萧子升8月份“给毛泽东的信”中对在法新民学会会员的蒙达尼会议(7月6日—10日)作了以下介绍:将会务进行的方针定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关于改造的方法,蔡和森的俄国革命、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和萧子升的以教育为工具的、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温和的革命”,以工会、合作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的、“无政府——无强权——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道路相对立(《社团》(一),第41页)。蔡和森8月13日的“给毛泽东的信”中提议:将先要组织共产党、进行“阶级战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改建社会经济制度的“俄式革命”,做成一个系统的行动计划(《蔡集》,第49—54页)。

毛泽东在“给蔡和森萧子升及法诸会友”的信(1920年12月1日)中,就学会方针、方法、态度、求学、会务进行、联络六项问题阐述

了自己的见解。他从世界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立场出发,赞成他们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作为学会的方针、目的,主张改造中国的同时,应帮助苏联完成社会革命,帮助朝鲜、南洋独立,帮助蒙古、新疆、西藏、青海自治自决。关于方法,认为萧子升的教育的方法与罗素在长沙演说的主张相同,“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因此不同意。他列举了三点原因:事实上教育因经费、人、机关(学校、报馆)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都宣传资本主义;从心理及历史上看,资本家不可能相信共产主义,以些小教育之力不能推翻资本主义;用和平方法去达“共产”目的,要何日才能成功也不得而知,其间无产阶级苦于“无产”而要求“共产”。他还提出了另一个疑问,即若实现了无政府主义,则会出现出生增加、死亡减少、人口过剩的问题。为此,他赞同蔡和森提出的俄国革命方式,讲到“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书信》,第6页)。这表明,他认清仅靠自己一直致力于教育的方法通过群众运动来改造中国是不可能的,通过消灭法,下定决心走作为剩下的惟一可能性的革命、专政的道路。当时在朋友中有“和森是理论家,润之是实际家”的评论(李维汉,《社团》,第(一)第633页)。的确,蔡和森通过努力学习而掌握了系统化的理论,毛泽东通过实践的直觉掌握了。

罗素以其世界性的眼光,抓住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平等自由的目的和剥夺自由的独裁方法之间的矛盾,指出所谓专政——战争、煽动革命——经济封锁——工业停滞、粮食危机的困难现状,并提示了自由化、民主化——和平共处——经济交流——工业化、经济发展的另外的选择余地。从长远看,罗素在此暗示了苏联型国家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虽然与自己迄今为止摸索的理论有共通点,但在理论层面上,毛泽东从不接受这种提法。在思想层面上他并没有完全清除掉自己的“精神之个人主义”和“民众的大联合”的教育的方法,用他以后的矛盾论的概念来讲,可以认为,新接受的暴力革命的思想 and 革命、专政的方法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其优势之下,以前的和平革命的思想和教育的方法成为次要方面,在自身内部保持矛盾,并于二者间

摇摆前进。

1921年1月1日、2日、3日，在大雪满城的长沙，新民学会会员十几个人聚集在一起，毛泽东报告了巴黎会友讨论的结果，全体会员进行彻底的讨论。最后，学会决定以“改造中国及世界”为新民学会共同目的（多数赞成），以“布尔什维克主义”为达到目的方法（多数赞成），以研究、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宣传、联络、基金、基本事业为着手方法（全体赞成）。在此，青年们将自身的人生“修学”、“立身”（维持生计）与改造中国及世界联系在一起，认真思考，热情讨论，洋溢着青春的朝气。

毛泽东自己列举了解决社会问题的五种方法：社会政策、社会民主主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主义）、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主义）、无政府主义。在论证了其他四种方法不可能实现之后，他说：“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毛文》1卷第2页）。这表明他还是用消灭法选择了列宁主义。对于自己的人生，他说：在长沙两年，“从译本及报志了解世界学术思想的大概”，以后去苏俄，希望做教书和新闻记者的工作，“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另外还要学会如打袜子和制面包等体力工作，这样对世界任何地方跑，均可得食（《社团》（一），第600页、第606页）。作为普通的知识青年毛泽东依然考虑着继续学习和维持生计。

新民学会在创立后的三年之间，从当初的学术团体过渡为政治团体，性质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全体会员七十四人中三十一人加入了共产党，其他有三十多人从事教育、科学事业并且同情革命。后者中周世钊成为湖南第一师范校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际，向毛泽东发了贺电、贺信。毛泽东在10月15日的回信中写道，“兄过去虽未参加革命斗争，教书就是有益人民的”（《书信》，第345页）。为了恢复经济、完成土地改革、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水平，请求文教工作的协助。他确认以前革命的方法和教育方法各走不同的路，但实际上相互支持，并热切希望在以后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

1920年底，毛泽东从临时回国的萧子升处，收到了蔡和森在9

月16日写的信。蔡讲述了柏拉图以来的“有产阶级”的唯理观和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的唯物史观的对立，提出了“俄国社会革命的出发点=唯物史观。方法=阶级战争+阶级专政。目的=创造共产主义社会；无阶级、无反动社会组织完成、世界组织完成……消灭国家”（《蔡集》，第64页）的“公式”。他并指出民众运动尚处于幼稚阶段的中国，“我以为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同上，第69页），“第二次资本家大战的战场必在中国，我们还不准备么”（同上，第72页）。毛泽东在1921年1月21日的回信中写道：“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你的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并告之“党一层，陈仲甫（独秀）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书信》，第15页）。那时已经进入了中国共产党创建准备阶段。

在这之后毛泽东依然进行湖南自治运动。1921年4月25日、26日，他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了《省宪法草案最大的缺点》一文，要求关于人民的权利，如女子有承受遗产之权，有婚姻之自由权、有求得正当职业的自由权要加入省宪法；并要求关于被选举权，无当选议员之资格之军人、官吏、学生三项人之外，加一项（无正当职业之人）。另外省宪法制定运动本身也在继续，谭延闿政权倒台后成立的赵恒惕政权，于1922年1月1日正式公布施行了湖南省宪法。湖南的民主运动和宪法制定，为毛泽东领导的工人运动的推进提供了有利条件，起到了掩护作用。

总而言之，可以认为，毛泽东早期继承杨昌济的“以吾为主”形成的“精神之个人主义”，发展为主观能动性（1937年）；继承杨的“以民为主”形成的“民众的大联合”，发展为群众路线（1929年）；杨的“变之自下”与“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主义）的结合，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1938年）。我以为，毛泽东的五四新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在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并不是消失了，而是作为一种潜流，持续不断地为革命主体的形成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 第二章 农民的革命——国民革命和苏维埃革命(1921—1937)

### 第一节 湖南农民运动

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和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作为共产党员参加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民族解放运动。首先从事工人运动,参与国共合作,在城市运动中继续积累经验,他随后着手农民运动,逐渐认识到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接受1920年8月在上海创立共产党发起组的陈独秀的委托,毛泽东于同年11月创建了由六名成员组成的长沙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1月他又成立了由十六名成员组成的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任书记。同年,他与何叔衡一起作为长沙代表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7月23日至8月初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日本的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十二人以及陈独秀的代理一人、共产国际代表二人出席大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是作为“共产国际中国支部”而建立的,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援助。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1920年7月—8月)上,列宁起草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初稿》中讲到“绝对要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但同时又强调“共产国际应当同(受帝国主义列强压迫的)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列宁全集》第31卷,第127页。·俄文原著的页数,下同)。然而共产国际

的民族运动专家印度人 M. N. 罗易起草的《补充提纲》中讲,“殖民地革命的第一步应当是推翻外国资本主义”,但主张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将革命的领导权放在资产阶级民主派手中,“应当加紧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并在最初的可能之下创立工农苏维埃(在革命中掌握权力的代表会议)”,并领导工农走向“创立苏维埃共和国”(《共产国际》第 31—32 页)。在中国,1924—1927 年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在前者的民族解放运动(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的路线上,1927 年—1937 年国共内战在后者的苏维埃革命的路线上。我以为毛泽东殚精竭虑将两条路线结合在一起,制定出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不仅自己走上了革命家的道路,还感化家人也走上这条道路。初次去北京时他遇见继而爱上了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在 1920 年冬结婚。杨开慧第二年成为共产党员,协助丈夫活动。1921 年 2 月毛泽东在韶山的家中劝弟弟们“舍家为国,舍己为民”,并让守家的弟弟泽民去长沙学习。妻子、两个弟弟及妹妹(父亲的养女)都参加革命,又都在后来或被处死或战死。在毛泽东的家中,由反抗父亲压制的家庭革命演进为一家人参加社会革命的全家革命。

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后任湖南第一师范国文教员,8 月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并任指导主任。自修大学取古代书院的形式和现代学校的内容二者之长,设文科和法科,鼓励自己研究和共同研究。它注重修学和向上,继承新民学会的精神,着眼于“培养健全的人格,湔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而准备”(《创立宣言》)。并且它高举“使文化普及于平民”的平民主义旗帜,附设了工人夜学等进行各种平民教育。它还“图脑力和体力之平均发展,并求知识与劳力两阶级之接近”(《组织大纲》)而让学生进行劳动,颇具五四新思想和马克思主义色彩。到 1923 年 11 月它被赵恒惕封闭,共有二百余名学生在该校已经接受教育。

1921 年 10 月 10 日,毛泽东建立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并任支部书记,一家住在支部,在学生和工人中发展党员。他按照共产党的方针,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工人运动上,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并任主任。他说服湖南劳工会领袖、无政府主义者黄爱、庞人

铨，支持改组劳工会，并使黄、庞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在第二年黄、庞被赵恒惕杀害后，他为其组织召开了追悼大会，并发起抗议运动。他还让共产党员组织工人俱乐部、工会，被选为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干事局总干事。

关于湖南工人运动，毛泽东写了《省宪下的湖南》（《前锋》第1期。1923年7月1日。《毛补》2卷）一文，评价为“工人的活动，大引起社会之注目”，并把其统计做成图表简要地进行说明。新式组织的工团（工会、工人俱乐部等）有23个、3万人，旧式组织的工团5个，查封以前为两三千人。罢工从1922年8月起至12月（实际上是1923年2月）在安源煤矿等地进行了十次（胜利及半胜利九次，失败一次），参加的工人有22250人，目的大部分是增加工资，小部分（两次）是为获得集会、结社自由。湖南工人运动取得如此成功的原因，是在于建立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可靠的领导班子，制定正确的战略，党员接近工人，又趁平民教育风潮开设工人补习学校进行教育，提出“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安源煤矿罢工中毛提出）这样要求恢复工人的斗争口号，触动了工人的心灵。由“哀兵必胜”（《老子》）的战术获取舆论的同情，对省当局亦是讲道理进行说服（李锐《一九五七》，第184页至185页）。

在获取舆论的同情方面，针对《大公报》记者“盾”对举行罢工的印刷工人缺欠常识、不守秩序、不知卫生真谛，并忠告工人们应去做点学问的指责，毛泽东以印刷工会的名义在《大公报》上进行了反驳：劝他去读一下托尔斯泰的《忏悔》第二章，很愿教训工人的先生真个脱去长衣，帮助我们干劳动运动，至少也应当做一个真实的劳工教育者；我们非自己团结起来，减少工作时间，自己创办补习学校，不能取得读书的场所（《毛补》2卷）。他要求知识分子和工人相结合，改造自己。

为了说服省当局，1922年12月11日—13日，毛泽东等23人作为以全省工团联合会的十一个工会的代表，会见赵恒惕省长、政务厅长、警察厅长、长沙县知事，就结社等十个问题进行交涉。迫使赵恒惕等宣称，政府对工人采取保护主义，并无压迫之意，还承认宪法规定的人民集会、结社的自由，完全有效。毛泽东等表明：工人所希望的是

社会主义,但目前政治以民治主义为原则,并不信仰无政府主义;工人是为了解决自身痛苦而发起运动,其要求均不出增加工钱、减少时间和改善待遇等范围。最后,工人与政府面谈、设立劳资裁判所以及各工会的要求,几乎都被省政府方面接受了。交涉的详细记录登载在《大公报》上(《毛补》9卷)。

毛泽东将以中层即学生、新知识分子组成的新民学会为核心,发动下层即民众的运动,推动上层即政府、统治阶层,尽可能争取更多人支持五四运动、驱张运动、湖南自治运动的办法,活用到下发动工人,中争取舆论支持,上与省政府交涉的中共湖南支部的工人运动的战术中。1922年1月公布施行的湖南省宪法,对工人运动起到了掩护的作用。

毛泽东在《省宪下的湖南》一文中,除了劳动以外,概观政治、经济、一般文化及教育,写道:省宪法只不过是“弱小军阀(赵恒惕)用来保险的工具”,避免遭受外省武力蹂躏而已。但它也有作为“束缚军阀的绳索”的一面,所以寿命决无久理;湖南的一般文化,“小农思想略无变动”,他们政治的要求,但求有清官有好皇帝,他认为民众并不想革命。他对联省自治运动评价很低,这大概是从国民革命的角度来批判地回顾的缘故吧。

1923年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下有时简称“中共中央”或“党中央”)决定派李维汉接替毛泽东做湘区委员会书记,调毛泽东担任中央工作。毛向李移交工作时强调:利用省宪法中的民主条文进行斗争,用接近群众的方法,如在工人中办夜校、读书班,在学生中办刊物或组织社团,从中发现积极分子,并逐步扩大成为建立工会、学生会的核心,并且推动上层人物的方法还要继续。4月毛泽东离开长沙去上海。这时,赵恒惕已发出了悬赏缉拿“过激派”毛泽东的布告。

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下有时简称“二大”),主张进行“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呼吁工人、贫农、小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毛泽东没有出席大会,但他依照二大路线分析全国政治,写了《外力、军阀与革命》(《新时代》第一卷,第1号,1923年4月10



日。《毛文》第1卷)一文,说:革命的民主派的国民党和共产派,若与非革命的民主派的研究系、知识阶级派、商人派合作,结局是战胜直、奉、皖等反动的军阀派;但反动军阀的统治对协调着步骤来侵略中国的国际帝国主义最为有利,并适合落后分散等混乱的中国社会经济,因此目前及最近之将来,中国必然是反动军阀支配的天下;“但政治愈反动愈混乱的结果,是必然要激起全国国民的革命观念,国民的组织能力也会要一天进步一天”,“结果民主派战胜军阀派,中国的民主独立政治在这个时期才算完成”(《毛文》第一卷,第12页)。

确信我方胜利的理想主义和正视敌人强大的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思想在此可见一斑。但对革命的主体即“全国国民”的认识和为获取胜利的战略战术还不大清楚。

毛泽东于1923年6月上旬,由上海赴广州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陈独秀、毛泽东等认为中国离资本主义甚远,除非发展一段资本主义,否则不仅无产阶级太少,就是资产阶级的力量也远不足以进行一场民主革命”(杨奎松《1997》,第143页)。这与张国焘、蔡和森的相信无产阶级的力量已经到了可以夺权的程度的观点不同。大会依照马林传达的共产国际的方针,决定通过共产党员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仍旧保存共产党组织的形式进行国共合作。它并宣布国民党为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居领导地位,工人、农民、工商业家等各阶级都急需一个国民革命,共产党的中心是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会上陈、毛的意见占了上风,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委员,做为中央局秘书协助陈独秀委员长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毛泽东写了《北京政变与商人》(《向导》31、32期合刊,1923年7月11日。《毛集》第1卷)一文,向全国国民中商人、工人、农人、学生、教职员和受压迫的国民号召商人之迫切要求的“裁厘”(废除国内通行税)和“加税”(提高进口关税),可以打击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利益,并号召商人只有建立严密的联合战线,实现国民革命,才能挽救自己和国家。

1924年1月,毛泽东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他2月回到上海,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

组织部秘书，5月兼任共产党组织部长。在与陈独秀委员长联名签署的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五号（7月21日。《中央文件》第一册）中，主张：在图革命势力联合的同时，要纠正与帝国主义、军阀妥协，纠正执行反苏、反共、压迫农工政策的国民党右派的错误；要获得或维持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各团体的实权，巩固我们在国民党左翼之力量。他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内部排斥共产党员的右派做斗争，坚持国共合作。由于积劳成疾，12月毛泽东回湖南养病，未出席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会上张国焘的意见占据了优势，毛没有继续当选中央执行委员。

毛泽东在韶山休养期间，组织农民运动和进行阶级分析（后述）。在3月12日孙中山逝世、5月反对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高涨、7月广东成立国民政府、8月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廖仲恺被暗杀等一系列大事件之后，他于1925年9月中旬到达广州。10月由国民政府主席兼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汪精卫推荐，他就任代理宣传部长。12月以宣传部的名义创刊《政治周报》，他写了十几篇文章，对旨在推翻帝国主义、军阀的民众运动分析形势，提出宣传要点和口号，强调对民众进行文字、图画、口头的宣传，批评主张反苏、反共的西山会议派等国民党右派。如是有了独特的中国社会阶级分析，在11月21日回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时，他进一步明确了其要点。

“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有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毛文》第1卷，第18-19页）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革命》第4期，1925年12月1日。《中国农民》第1卷第2期，1926年2月1日。《毛集》第1卷）中，分析：中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中国资本的银行家、工商业者、小地主、高等知识分子）虽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但由于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而需

要革命,但又害怕无产阶级参加革命而怀疑革命,在革命的第三国际和反革命的国际联盟的两大势力的最后斗争中,中产阶级右翼会向反革命、左翼会向革命的方向分化;右翼当然危险,然而左翼由于极易妥协,不能持久,也是危险的。毛在其他的论文和演讲中,也认为中间派不能独立存在,它必将分裂为革命和反革命,因此全国的革命派将形成一个更大的团结。

1926年1月,毛泽东在出席国民党二大时主张反击右派,但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为了维持国共合作而向戴季陶等新右派做出让步。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sup>①</sup>,以海军企图叛乱为借口,宣布广州戒严。尽管毛泽东主张反击,苏联军事顾问团代理团长却没有同意。5月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以下简称“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活动的“整理党务案”,中共中央和苏联顾问接受了此提案,但毛泽东却不服,辞去了代理宣传部长,转而全力投身农民运动。

毛泽东在1923年4月派水口山的两名工人,在其故乡衡山岳北组织农工会。6月在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与谭平山共同起草《农民问题决议案》。1925年1月2日回到韶山后,他正式投身农民运动,创办农民夜校,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共产党支部和国民党支部,五卅运动时期成立雪耻会。7月韶山大旱,8月地主囤积居奇,高抬谷价,还准备把谷子运往湘潭等地高价出售。毛泽东发动农民阻止谷米起运,迫使地主开仓平粜。后得知由于地主告密,赵恒惕发出了逮捕令,情急之下毛泽东只得经长沙奔广州。

毛泽东基于半年的湖南农民运动经验,写了《中国农民中的各阶级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sup>②</sup>(《中国农民》第1卷第1期,1926年1月。《毛

<sup>①</sup> 蒋介石命令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共产党员)将中山舰驶回黄埔,在中山舰到达后,又说共产党企图暴动而宣布戒严。

<sup>②</sup> 《青年毛泽东》中写道,《中国农民中各阶级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实质上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革命》4期,1925年12月。《中国农民》第2期,1926年2月1日。《中国青年》第116、117期合刊,1926年3月13日)部分内容的再版”,并且“对农村各阶级的分析”及“对大地主、小地主的来源及剥削农民的形式作了补充”(第221页)。实际的写作顺序可能是这样。然而我以为,关于毛泽东思考过程,他首先把握住农村阶级关系的全貌,并以此为核心,再附上城市的阶级分析,从而勾勒出了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的全貌。

集》第1卷),将3.2亿农村人口划分为八个阶级,并阐释了经济地位和生活状况的差异对其心理,即对待革命观念上差异的影响,说:

拥有500亩以上土地的大地主有32万人,他们大部分是前清官僚后裔或现在的军阀官僚,小部分是城市富商;他们严酷剥削农民的方法分为五种:(1)重租(50%—80%),(2)高利贷(月息3%—7%,年息36%—84%),(3)为维持地主武装团防局(民团)而征收的重捐,(4)对雇农(农业的无产阶级)的剥削(较少),(5)与贪官污吏合谋在本年包缴预征田赋,来年索取重息,因此他们是“中国农民的死敌”、“帝国主义军阀的真实基础”、“一切反革命势力发生的最后原因”。小地主有200万人,其来源大部分为自耕农上来者。还有一部分是城市商人、官僚后裔之衰败者即现在之小官僚,其剥削方法为重租,高利贷和剥削剩余劳动,他们虽反抗军阀及大地主的压迫,但又怕“共产”,对革命取矛盾的态度。

在劳动农民中,小资产阶级的自耕农有1.2亿人,其中又分为劳动所得能自给并有余钱剩米者1200万人,能自给者6000万人,不能自给要亏本者4800万人三种,他们对革命的态度虽有怀疑、中立、欢迎的差异,但在革命高潮到来时,又都附和或参加;半无产阶级有1.7亿人,其中,半自耕农(自耕农,但兼租别人田地或做工或营小商)5000万人,佃农(佃农,但拥有农具和流动资本)6000万人,贫农(佃农,没有充足的农具和流动资本)6000万人,生活愈苦的阶级革命性也愈强;没有土地、农具、流动资本的雇农2000万人是农业的无产阶级,他们劳动时间长、工资少、待遇薄、职业不安定,甚感痛苦,因此在农民运动中应特别注意,手工业工人与雇农相差不远;游民无产阶级有2000万人,失去土地、工作,分为兵、匪、盗、丐、娼妓,为了互助而组织秘密结社,“很能勇敢奋斗,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综上所述,毛泽东提出农民运动的战略战术:组织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贫农、雇农及手工业工人加入农民协会,对于地主阶级用斗争的方法,迫使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让步,打倒最反动、最凶恶的土豪劣绅,劝游民无产阶级站到农民协会一边,解决其失业问题,切

不可逼其跑入敌人那一边，做了反革命派的力量。

毛泽东断定遭受反革命的大地主和半反革命的小地主的压榨而贫困、失业、甚感痛苦、“吃不上饭”的农民，必然为了生存、为了从生活的苦难中摆脱出来而进行革命。他把农民定位为革命主体，并将农村各阶级由于经济地位和生活状况的差异，而采取对革命不同态度的情况描绘成一幅草图，从而为形成农民运动战略战术提供了基础资料。这便是文章的意义所在。

《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以上述农村的阶级分析为核心，加上城市民众运动、工人运动和国共合作中取得的经验：重视那些因集中和经济地位低下而会更加奋勇斗争的 200 万产业工人（工业无产阶级），并把他们当做“民族革命运动的主力”。由此将阶级分析扩大到整个中国社会，并提出了国民革命的新战略。

毛泽东站在我们即革命党的立场讲：我们在革命中运动，引导群众走向胜利，就必须弄清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分析中国社会阶级的经济地位、阶级性、人数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将中国社会划分为五个等级，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附庸。买办与外资有密切关系的银行家和商业家工业家、大地主、官僚、军阀、反动派知识阶级）100 万人，中产阶级（华资银行工商阶级、小地主、高等知识分子）400 万人，小资产阶级（自耕农、小商人、手工业主、小知识分子）1.5 亿人，半无产阶级（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2 亿人，无产阶级（工业无产阶级、都市苦力、农业无产阶级、游民无产阶级）4500 万人（不是指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所占的地位，而主要是以资产的大、中、小、半无、无，即能不能吃饭的标准来划分）；并主要以农村为材料，说明这五个等级大致对应反革命、半反革命、中立（在“战时”附和参加）、参加革命、革命的主力军的五种态度。

综上所述，他呼吁：作为革命党真正的朋友的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有 3.95 亿人，真正的敌人的大资产阶级有 100 万人，且即便让可友可敌的 400 万中产阶级全部算成敌人，500 万人也抵不住 3.95 亿人。3.95 亿团结起来！

多数的民众的大联合势必战胜少数的强权者的大联合这一“人民”理想主义，在中国社会的阶级分析及革命战略中更加具体化了。

毛泽东在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会议上修改《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写明了“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为农民革命”。2月他被任命为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3月就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负责培养农民运动人才，他指出：“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

7月9日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向湖南、湖北发动进攻，得到工人、农民的援助，10月攻占武汉。毛泽东在为9月1日发刊的《农民问题丛刊》第一辑写的序言《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毛文》第1卷）中提到：“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由于帝国主义、军阀的统治基础是地主阶级，因此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猛击买办阶级，并对付帝国主义，然若无农民在农村打倒地主的特权，帝国主义与军阀就不会根本倒塌，因此我们应该引导农民和城市民众建立统一战线。11月上旬毛泽东从广州到上海，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起草《目前农运计划》，提出将农民运动扩大到各省。毛泽东视察了长江沿线一带，后经南昌于12月初到达武汉，中旬出席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在会上赞同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注意掌握武力的问题的主张。但是陈独秀主张督促国民党实行“武力（国民党）和民众（共产党）结合”的口号，他认为要促使国民党左派（汪精卫）取得领导地位，并促使军事势力（蒋介石）左倾，主张抑制共产党领导下的过激的群众运动。这个提案被会议采纳。

毛泽东去长沙出席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联合举行的欢迎大会。为把握在驱逐赵恒惕的国民革命的军事力量背景下而迅速高涨起来的湖南农民运动，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以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并将结果整理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4月全文以单行本《湖南农民革命（一）》刊发。以下简称《考察报告》）。毛泽东惊异地看到，国民革命的中心是农民革命，贫困农民必将反抗地主阶级的压榨而进行革命这一作为农民运动的领导者的、

自己从来的主张，通过湖南农民运动已在远远超出预测的强度、深度、广度上不断地被实现。《考察报告》并不是客观地记录现实，而是基于解放农民的个人理想，重新构成地主农民的阶级矛盾的整体结构，指出农民运动解决矛盾奋勇前进的方向。他鼓动人人去实践，并促使转换国民革命的路线和革命党的作用。

《考察报告》，第一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原点，就是将“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吃人的仇敌”土豪劣绅，即那些不法地主阶级的权力，被受他们压迫、剥削的“奴隶”——农民推翻，而且建立了自己的权力，颠倒了上下，并将1926年10月以前和以后分为“两个世界”的“空前的农村大革命”，它把农民的激烈变革的能量作为打破相对人为秩序的绝对自然力来赞美。

“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最后葬入坟墓”（《毛集》第1卷，第208页）。

毛泽东给多数群众的大联合势必战胜少数的强权者的大联合这一五四新思想，镶嵌了阶级斗争理论的铁筋，道破多数的贫困农民势必推翻少数地主的权力，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必将胜利，由此将“人民”理想主义更加具体化了。

毛泽东对农民进行阶级分析，认为10%的富农（有钱余，有谷剩的）对革命取消极态度；20%的中农（自给自足的）保存游移的态度；70%的贫农，即20%的“赤贫”（游民无产阶级。全然无业，即既无土地又无资本，完全失去生活根据，不得不出外当兵、做工、当乞丐、做盗贼的）和50%的“次贫”（贫农、雇农；半无业；略有土地或资本，在劳碌、愁苦中过活的），由于不怕失掉什么而成为“革命先锋”勇敢奋斗，可见生活越苦越积极革命。他说：土豪劣绅压迫最重的地方农民反抗也最强烈，被地主置于最下层不被当人看的贫农，站到最上层，与地主彻底地进行斗争，“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人要反抗压迫这一信条更坚定了。

另外，毛泽东把农民的行动分类起来，说：农民在农民协会指挥之下做了十四件大事。这就是将农民组织在农会（农民协会）之下；政治上打击地主（清算，罚款，捐款，小质问，大示威，戴高帽子游乡，关进县监狱，驱逐，枪毙等），彻底地撕毁他们的面子，让他们威风扫地；经济上打击地主（不准谷米出境，不准抬高物价，不准加租加押，不准退佃，减息等）；推翻土豪劣绅（占领基层的都团即区、乡政机关，拥有武装、财政征税权、司法权，管辖一万至五六万人之多的地主）的封建统治，农民协会掌握政权；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改革县的政治；推翻其政权，同时动摇与此相联系的族权（族长的支配）、神权（鬼神的支配）、夫权（夫对妻的支配）。（这四种权是儒教、道教、佛教的现实基础），开始从封建的宗法思想和制度的束缚中把自己解放出来；普及政治宣传；严禁牌、赌、鸦片等恶习；清匪；废苛捐；文化运动；合作社运动；修道路、修塘坝。他说：“论功行赏，如果把完成民主革命的功绩作十分，则市民及军事的功绩占三分，农民在乡村革命中功绩占七分”（同上，第211页—212页）。他高度评价了农民的作用。

也就是说，他把农村革命的情况掌握为：农民尤其是贫农，每个人都参加农民协会，发起运动，推翻地主政权，把自己从身体和精神两面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同时创立自己的政权和武装，订立自己的纪律，推进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可以认为，毛本人的“民众的大联合”、李大钊的“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精神解放”等表现出来的“个性自由、共性互助”的五四运动中城市知识分子的文化革命、社会革命的思想，进入了农村，并在农民的社会革命、文化革命的运动中具体化。但这是在农民推翻地主权力、建立农民权力、“独裁一切”、压制地主剥夺其发言权的苛烈的阶级斗争的形态中进行的。

毛泽东继承孙中山汉族推翻国家——满清异族专制王朝，创立扩大社会——村落自治团结的中华民国的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并将其发展为农民推翻作为帝国主义、军阀统治基础的村落的土豪劣绅专制统治的社会革命。

《考察报告》，第二是迫使革命党表明态度，是站到地主一方还是站到农民一方。他说：对于农民运动，有“糟得很”和“好得很”、“痞子



运动”和“贫农运动的先锋”等完全相反的看法，这就是选择，站在地主反革命立场呢？还是站在农民革命立场呢？针对中间派议论农民“过分”不好，毛泽东批评说：革命是暴动，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若不采用“过分”的举动，决不能推翻数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政权。

“一切革命的党，革命的同志，都将在农民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取舍，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同上，第208页）。

在此，他把人民同敌人的斗争放在首位，并以此为标准，提出革命党若脱离人民就会被人民抛弃，要求革命党不断地改造自己，并站在人民的前头领导他们。这是对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陈独秀路线的批评，而人民优先于党的革命观，贯彻了毛泽东的一生。

《考察报告》中“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源自俄国革命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由此可见，毛泽东从民族解放运动路线，向苏维埃革命路线大大倾斜了。

另外，毛泽东在《考察湖南农运给中央的报告》（1927年2月6日。《毛补》第2卷）中，简要叙述了上述《考察报告》的要点，并为领导农民群众革命的战略和党组织的强化做出如下提议：

农村应免去孤立的危险，从革命时期的无政府状态向实现民主的乡村自治制度和建设农村联合战线转变；农村间的各种冲突必须抬出国民党的招牌去解决，而万不可马上抬出共产党的招牌去解决，农民中必须普遍地发展国民党；许多县农民已经完成了民主革命，但他们要进到另一个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这时共产党却落在后边；因此共产党要迅速发展，在六个月内要把湖南6000名党员发展到2万名。

毛泽东回到武昌，3月至4月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中，作为农民运动的领导人全力解决土地问题（一、政治没收，二、经济没收），但他们的提案最后没有被采纳。4月至5月在武昌召开的代表5.8万名党员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上，提出给农民重新分配土地的农民运动决议案，虽然大会没有采纳，甚至未予讨论，但在会上毛当选为

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这期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武装政变,在各地逮捕和杀害共产党员和群众。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出罢免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开除党籍和拿办的决定。但蒋在18日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共产党采取与武汉国民政府合作、推进革命的方针。5月21日,长沙许克祥部队袭击革命团体,逮捕和杀害革命家。6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组织新的湖南省党委员会,任命毛泽东为书记。毛去湖南恢复组织,指示集中武装。毛7月初回到武汉,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主张保存农民武装,说:“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毛谱》上卷,第205页)。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开始防备武汉国民政府发动武装政变,7月12日成立由张国焘等五人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将一直维护国共合作的陈独秀停职。7月13日中共中央公开谴责武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7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分共”,并用军事力量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之后宁汉合流。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遭到了挫折。

## 第二节 “农村包围城市”

在以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为目标的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被国民党的军事力量所镇压,受到极大的打击,中共党员人数从6万人锐减到1万人。但中共通过创建自己的军事力量进行战斗,推进苏维埃革命。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在湖南、江西、福建、广东的国民革命的基础上,创造了中国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形成了以农民为主力军的革命主体,并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摸索出一套独特的以主体即弱小的我们抵抗强大的敌人而获得胜利的方法即战略战术,经过许多曲折,使得中共领导承认这一作战方法,毛由此掌握了全党的军事领导权。

1927年8月7日,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的“八七会议”。会议批评陈独秀等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妥协退

让”的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毛泽东提出了根本问题，说我提交的农民要革命的报告，对中央则毫无影响，上级机关只有倾听下级的报告与意见，才能从不革命转变为革命，以往共产党仅开展民众运动，以后要非常重视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文》第1卷，第47页）。8月1日，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12月11日，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的广州起义等，中共在各地相继举行武装起义。

毛泽东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常委瞿秋白向毛泽东征求意见，要他到上海党中央工作，但毛泽东说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不愿去大城市。在政治局会议上，他反对湖南省委组织一个师的武装去广东的意见，主张先占据五六个县，形成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即使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毛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去长沙，在中共湖南省委的会议上，极力主张没收所有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靠军事力量发动暴动夺取政权。湖南省委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上报发动全省农民暴动，夺取长沙的计划。毛泽东8月20日以湖南省委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信讲，苏联驻长沙领事、共产国际代表马也尔传达的共产国际的新训令，主张“中国应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闻之雀跃；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阶段），只要在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必且迅速地取得全国之胜利”，主张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红旗。这在当时是最激进的主张。关于土地问题他提出如下设想：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农在内，归之公有，由农协按照“工作能力”与“消费量”两个标准公平分配于愿得地之一切乡村人民。土地分配以区（县与乡之间的行政区划单位）为单位，不以乡为单位，土地没收之后对于地主家属之安置必须有一办法，方能安定人心（《中央文件》第3册，第354—355页）。这成为毛泽东土地革命政策的出发点。8月23日中共中央回信，反对湖南省委的主要论点，指示应该把“没收大地主土地”、小地主“减租”作为口号。8月30日，湖南省委组成“前敌委员会”（受中共中央委托，领导前线对敌斗争的党的机关。以下简称“前委”），以毛泽东为书记。他未得到中央批准

就将起义计划付诸实施。

毛泽东将国民革命军武昌警卫团、农民、安源煤矿工人组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放弃了国民党的旗帜而举起共产党的旗帜。9月9日，发动起义占领各县，但因敌人的军事力量占优势且内部出现叛变，造成很大损失。他判断攻占长沙的计划不能实现，向省委建议停止这一计划。9月15日，省委决定停止，毛转兵向南进入江西省，向山区进军。9月29日，他在三湾将1000人的兵力改编为团，党支部建立在连队，实行民主制度，连、营、团三级建立士兵委员会，宣布三项行军纪律。

10月毛泽东到达湖南、江西交界的井冈山，吸收当地的旧式农民军的领导人袁文才、王佐参加工农革命军，利用险峻的地形建立革命根据地。11月，他重建周边三个县的共产党组织，巩固和发展农民自卫军，成立了县工农兵政府（第二年改称工农兵苏维埃政府）。12月他规定和宣传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1928年1月他提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取胜的游击战（游击队、民兵与群众相结合，随机应变地奇袭敌人的正规军、开展扰乱与消耗的战争）的作战原则，宣布军队纪律，2月打退了国民党赣军的“进剿”。

毛泽东认清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将攻打城市的方针转变为到山区建立根据地的方针，使革命军生存下来，这是非常准确的形势判断。毛从那时开始摸索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取胜的作战方法。

另一方面，受斯大林方针的影响，9月11日以瞿秋白（第一次“左”倾路线；1927年11月—1928年4月）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起草的决议，指示放弃国民党旗帜，出现革命高潮的广州、长沙等大城市应成立苏维埃，禁止在县城和农村组织苏维埃。11月看到革命形势不断高涨，中央又确立了实行以城市暴动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的方针<sup>①</sup>，并斥责湖南省委将农民暴动

---

<sup>①</sup> 瞿秋白在12月的广州（苏维埃）暴动失败后，曾考虑“夺取一省数省政权”、“一县数县首先胜利”，但其后于1928年6月在苏联作为“农民割据”观念、“旧式农民革命形式”而被批判（杨奎松，第181页）。

变成了单纯的军事投机，对毛泽东则解除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1928年3月湘南特委代表周鲁到井冈山传达中央上述决定，撤消毛泽东的党内职务，毛泽东只担任第一师师长。

但是，毛泽东继续扎实地进行着战争与建设。4月上旬，他把以往建立的军事纪律归纳为三大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三、打土豪要归公”，和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后改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使工农革命军的官兵具备为人民服务道德。4月下旬，毛将参加过南昌起义的朱德部队迎上了井冈山，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不久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兼军委（军事委员会）书记，打退了赣军的第二次“进剿”。5月下旬，毛泽东被选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特别委员会）书记，统一领导军委和地方党组织。他通过边界、各县和各区的地方政府，开始土地革命，没收一切土地，按人口平均分给农民。农民得到土地由衷支持红军和革命根据地。5月他把游击战的作战原则重新修订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

另一方面，1928年2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所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认为革命的高潮已经过去，批评中国共产党的盲动主义。4月中共中央采纳这一决议。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通过如下决议：确定革命的性质为反对帝国主义、豪绅地主与加入反革命阵营的民族资产阶级（蒋介石）、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汪精卫）、无产阶级、农民、城市贫民的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革命；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及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因为革命的第一个高潮已经过去，新的高潮尚未到来，党的总路线就是争取群众，准备武装暴动，主要危险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向忠发担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兼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常委会”）主席，实际上是由常委会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周恩来承担实际负责人。毛泽东被大会选为中央委员。他同年冬天收到大会文件，对六大所采取的新方针是“完全同意的”。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以下简称“红四军”）打退了赣军的第三次

和第四次“进剿”。6月下旬，井冈山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7月红四军打退了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的“会剿”，但中共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不顾毛泽东等的异议，把红军开赴到湘南导致失败，边界的县城及平原地区被国民党军占领（八月失败）。9月以后红军主力又收复革命根据地。

10月5日，湘赣边界各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决议案》。其中在《一、政治问题与边界党的任务》（《毛集》第2卷；《毛选》第1卷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列举了像井冈山这样的“工农武装割据”即苏维埃政权长期存在与发展的原因和条件：一、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白色政权间的不断的分裂与战争；二、国民革命中工农兵群众广泛发动起来过的地方；三、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四、红军的存在；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与正确的政策。它将在白色政权稳定的时候和其军队的进剿下，井冈山能得以维持的原因，概括为边界党的正确的政策：坚决地和敌斗争，创造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土地革命；军队党地方党及地方武装；集中红军应付敌人，反对分兵；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它批评杜修经的八月失败，说其原因在于白色政权稳定时期采取冒进的政策。可以说，与共产国际和党中央从全局即世界与中国的方面，给局部的根据地自上而下地发指令的观点相反，中国革命的主体先在局部即根据地自立，自下而上地认识全局即中国与世界并对其进行改造——毛泽东建立这一观点。但是，毛并未拒绝来自上面的指令，而是热心地予以吸收，并且力图把自下的认识和实践反映给上面，由此制定出正确的路线和政策。

6月4日党中央给朱德、毛泽东的信，11月2日才送到井冈山，信中提出如下战略：先由几个重要的中心区域的割据，而向全省的中心区域作包围的发展，以取得全省总暴动的胜利。中央在肯定“处（湘鄂赣）三省暴动布置的中心地位”的井冈山根据地重要性的基础上，又指出其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即“在你们军队的本身上说，现在还是一种国民党时代的雇佣式的军队，未加以组织上政治上的改造”（《井

冈山》上册,第116页),并指示取消党代表(毛泽东),设政治部。

11月6日边界特委扩大会议,除了要求游击区过宽与取消党代表制度等事项外,决定依照中央来信的指示执行。会上成立红四军前委,毛泽东任书记;在前委下设置军委,朱德任书记。

毛泽东于11月25日写的《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毛集》第2卷;《毛选》第1卷的《井冈山的斗争》),就军事、土地革命、政权、党的建设、革命性质和根据地等问题做报告。关于军事问题,回答军队的政治上的改造问题,他列举军队的困难:红军的基干部队伤亡了三分之二,国民党军的俘虏占多数,工人、农民占少数,游民无产者死伤很多,不能补充。在要求派遣工人、农民的同时,他讲:在现实情形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以改变大部分来自雇佣军的士兵的质量一法;连、营、团的士兵委员会在党代表的督促下,监督官长,代表士兵利益,参加军队管理,做政治训练和民众运动;“士兵大概都有阶级觉悟,分配土地、建立苏维埃武装工农等政治常识大概都有了”,已知道“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同上,第38页),就能够忍耐艰苦的生活和激烈的斗争。毛泽东在信中提出:实行彻底的民权主义是红军战斗力的源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穿吃一样,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言论的自由,废除繁缛礼节,经济公开,由士兵代表审查决算,士兵管理伙食费、零花钱的支出等。他又说:“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得前日的营垒中与今日的营垒中完全是两个世界。他们虽感到红军的物质生活比较不如白军(国民党军)的好,但精神得到解放,所以尚能相安”(同上,第41页)。

这就是让士兵拥有这样一种解放感,是与打倒地主、获得解放、感到以前和现在是“两个世界”的湖南农民运动中的农民具有相同的性质。从白军中“不是人能忍受的”封建的雇佣军队中的士兵生活,转变为红军中的民权主义的自由、平等的生活。毛泽东在此基础上实施政治训练,让士兵具有自己也是工农阶级中的一员的阶级觉悟,把他们培养成了革命主体。

另外,关于土地问题,毛泽东认为对于60%以上的土地在地主手里,40%以下在农民手里的现状,“没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的政策

是能得到大多数人拥护的。另一方面，他又认识到因为由于这一政策，豪绅阶级（大、中地主）及中间阶级（小地主、自耕农即富农和中农）同被打击，中间阶级会利用其社会地位和家族主义恐吓贫农，阻碍政策的执行；白色恐怖一来，马上反水。当全国革命低潮时，中间阶级就附属于豪绅阶级，贫农成了孤军。因此他考虑到为让自耕农帮助贫农打击豪绅，要将土地分配，从按人口平均分配改为按劳动力分配，在扩大根据地之初不没收土地的做法，就是考虑到土地政策等的变更。对在城市打击小资产阶级过度，从而致使商业和手工业萧条的问题，他进行反省。从最大限度地扩大我们和朋友，最小限度地缩小敌人的“实际”现实主义出发，他摸索改变苏维埃革命路线及政策。

关于苏维埃政权，毛泽东批评了由群众选举的执行委员会掌握实权，最便于知识分子或投机分子的操纵，以及在此基础上群众和党员具有的“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指出民主集中主义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只有使群众了解到这一点，才能将工农兵代表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建立起来。

关于边界地方党，毛泽东说：许多是一姓的党员成立一个支部，在“支部会议简直就是家族会议”的情形下，进行党的建设是很困难的，在抵抗白军两省会剿的“非地方主义的压迫”的斗争中，农民有了共同的利害，才把这种仅考虑自己的乡、区、县的根深蒂固的“地方主义”逐渐抛弃。分散落后的农民通过抵抗敌军，意识到自己是被压迫阶级的一员，在扩大跨越省界县界的横向团结中，他找到了一条生路。他主张以此为基础，让工人、贫农、士兵多量地参加几乎都由农民组成的地方党，以无产阶级意识领导农民，逐渐肃清其小资产阶级意识。

毛泽东指出：“我们一年转战各地的经验，深感全国革命潮流之日益低落”，“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終了”（同上，第59页），表现了根据地的孤立感。关于革命性质，他摸索以小资产阶级改变为朋友的政策，热切期望包括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治的经济的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革命的高涨。

但是，12月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



埃政府所有”，分配土地主要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有特殊情形的地方，得“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者比不能劳动者多分土地一倍”。以人口为标准的主要理由是，“在养老育婴的设备未完备以前，老幼如分田过少，必至不能维持生活”，“以人口为标准计算分田，比较简单方便”，“老少虽无耕种能力，但在分得田地后，政府亦得分配以相当之公众勤务，如任交通等”（《毛文》第1卷，第49—50页）。他以大多数贫农每个人生活下去的问题，即“吃饭”问题优先于劳动力问题。毛泽东此后继续探索使农民各阶层更加团结在一起的分配土地的方法。

12月，彭德怀率红五军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1929年1月，因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队3万人开始了第三次“会剿”，彭德怀部队和袁文才、王佐部队留守井冈山，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人出击赣南。红军谋求突破经济封锁，并依靠攻打赣州、吉安使敌人返回的“围魏救赵”（战国时期魏军包攻赵国都城邯郸，齐军攻打魏国都城大梁，使魏军撤回，从而解除赵国之围）的战法，即毛泽东提出的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策略，解除井冈山之围。

1929年1月，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率领的红四军主力采取“打圈子”游击战术，同跟踪尾追的国民党军队苦战恶斗，转战于赣南。1月底，井冈山被国民党军队攻陷，彭德怀突破重围到赣南寻找主力红四军。袁文才、王佐部队仍固守在山里。2月10日，红四军在瑞金的大柏地首次打胜仗，整顿队势，中旬在东固游击区与李文林指挥的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会合，从他们那学习公开的武装斗争与秘密的割据方式相结合的方法，毛泽东提出：“强敌来了就用盘旋式的打圈子的政策对付他”（《毛传》，第195页）。3月上旬它进入闽西，中旬占据长汀，4月初进入赣南，在瑞金与彭德怀红五军主力会合（5月初红五军夺回井冈山）。

2月7日中共中央给毛泽东和朱德并转湘赣特委的信（周恩来起草），4月3日到达瑞金，信中如下指示：

中国资产阶级与蒋系军阀依赖美国，需要和平、统一、恢复经济，以改良主义的口号压制工人阶级的斗争，而共产党的领导力量薄弱，

还不能促进这一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农民斗争在南方得不到城市领导,导致许多苏维埃区域都相继失败。“故目前党的主要工作,在建立和发展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主要的是产业工人党支部),与领导工农群众日常生活的斗争和组织群众”。与此相适应,应“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朱、毛两同志有离开部队来中央的需要”(《中央文件》第5册,第34—37页)。

4月5日,毛泽东在红四军前委会议讨论的基础上写复信,指出:“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必须反对盲动主义,但也必须防止与其相对立的取消主义。在基于现场实践的基础上,他批判党中央的消极态度。他极力强调农村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说:“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苏维埃之建立,红军之创造与扩大,亦是帮助城市斗争、促成革命潮流高涨的条件”(《毛文》第1卷,第55页),系统地说明“十六字诀”,波浪式的推进政策、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等红军战术,主张“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他说:若有需要改换朱、毛工作,望即派遣刘伯承、恽代英。他进而提出在一年内与蒋桂两派争取江西的大胆计划。同上年11月井冈山书信相比,他明显持乐观情绪,增强了胜利的信心。

从5月到10月,红四军乘军阀混战之际,歼灭闽西地方军阀的部队,自赣南至闽西依次建立县苏维埃政权。

但是,在5月底的前委会议上,围绕着是个人领导还是党的领导,是否对前委和军委进行分权等问题产生了争论。毛泽东在6月14日给红四军第一纵队纵队长林彪的信中(《毛文》第1卷),将争论的问题归纳整理为十四点: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小团体主义与反小团体主义;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政权;地方武装;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对时局的估量;1928年湘南的“八月失败”;科学化、规律化;军事技术;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其他腐败思想。同时又规定争论的性质为:从旧式军队带来的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的拥护者和一些反对这种思想的人作斗争,游民、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与无产阶级

思想之间的斗争。而且在信中他又谈到：自己两年以来已经既竭力于思想斗争，现在又把问题的内容提出以后，使多数同志奋斗；现在想离开红四军前委，经过党中央送到莫斯科留学休息，在未得到党中央批准之前，想到地方去工作。这次争论体现了主张由军委领导军队的朱德与坚持党的前委领导军队的毛泽东之间的对立。

6月22日，由陈毅主持，中共红四军七大召开，他亲自做了发言，代表们进行争论。毛泽东主张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建设的流寇思想，必须坚持党的集中制领导，但未被采纳。大会决议指出：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的斗争并非事实，集权制的领导原则具有形成“家长制”的倾向。由中共中央指定的毛泽东没有当选而由陈毅选为前委书记。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休养并领导地方工作。

8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强调：七大的争论方法不正确，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红军内党“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事事要拿到党支部中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指示信基本上支持了毛泽东的主张（《毛传》，第206页）。

中共中央听取陈毅关于红四军的汇报，9月28日由陈毅起草经周恩来审定给红四军前委发去了指示信（《中央文件》第5册）。“九月来信”提出，以工农兵暴动的力量消灭以帝国主义的冲突为动因的军阀战争，把红军作为动力之一来促成全国革命高潮到来这种战略观点。它基于这个战略基础，认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主张“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信中虽然基本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但不同意游击战战略战术的一部分，指示：“党代表名称应立即废除，改为政治委员”，“对于党的军队的指挥，尽可能实现党团路线，不要直接指挥军队，经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经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其中包含着对毛的批评。另外，它批评朱、毛两位同志对立争论，离开政治立场相互猜疑猜测，在工作方法上存在主观的或不公开的缺点，指出经过前委会议二人诚恳接受了中央指示后，毛同志应仍为前委

书记。

10月中旬,红四军利用两广军阀混战,进攻粤东的东江,因内部政治领导的弱化,月底遭受巨大损失而失败。应陈毅和朱德的请求,11月下旬,毛泽东复任前委书记。

12月下旬,在闽西古田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毛泽东作政治报告,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其中“一、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毛集》第2卷;《毛选》第1卷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最重要的,对于农民阶级与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客观存在而产生的非无产阶级意识,要通过党领导机关进行思想斗争与教育的主观思想的改造加以纠正。列举的非无产阶级意识包括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意识、绝对平均主义、唯心观点、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这些大概是他所挑选出、在六月份给林彪的信中所列举的错误政治观点的思想根源。其中从革命集团即阶级、党的一员中脱离出来追求个人利益的“个人主义”,通过教育和正确的措施加以克服;对于主观地判断敌我力量对比而陷入“右倾”机会主义或“左”倾盲动主义的“唯心观念”(在《毛选》中修改为“主观主义”),通过调查研究等思想与生活的政治化、科学化加以克服,就是“群众”观点和“实际”观点是最重要的。它从削弱并毁灭党的战斗力的角度来批判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强调“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从妨碍斗争的角度来批判物质上的绝对平均主义,强调“按照个人及各工作的需要”分配。但这没有同红军破坏白军的封建专制主义,实行自由、平等是战斗原动力这个民主的方面有机地结合,而是偏向于集中。总之,在这里毛泽东主张的实行工农革命的、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建军思想,被党中央所支持,并为红四军党组织正式认可。

林彪给毛泽东寄贺年信,提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用流动游击方式扩大政治影响,在全国各地争取群众后,来一个全国暴动,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进行全国形势的大革命,即“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毛泽东在1930年1月5日给林彪的信中(《毛集》第2卷;《毛选》第1卷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批评林彪的

悲观思想,指出:“我觉得是于中国革命不适合的。”他提出应该集中红军兵力打破敌人,占领城镇,才能发动群众,建立湘赣边界政权与闽西政权那样几个县联在一块的政权,这样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促进革命高潮到来,即主张“由这种红色政权的深入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同上,第128页)这一战略。他把1929年4月5日给党中央回信的论点又发展了一步,开辟了以农民战争为主要动力的、与俄国由城市波及农村的革命道路相反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独特的道路。多年以后,他使中国的共产党的任务公式化:“不是(俄国革命那样)先占城市后取农村,而是走相反的路。”(《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6日;《毛选》第2卷,第542页)。

1930年6月,将赣南、闽西的三个军整编为红军第一路军(一万多人不久改称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前委书记,准备从游击战转变为运动战(正规兵团在大的战区上面,用优势兵力从事进攻战或防御战的作战形式)。

关于土地革命,1929年4月下旬,毛泽东制定(兴国县)土地法,把(井冈山)土地法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将攻击目标集中在地主身上(纠正了第一个错误)。7月他在赣西,确定只没收富农多余的土地、不过分打击富农的方针,实行“抽多补少”的分配原则,对在乡地主家属分与田地,给以生活出路。1930年6月,他又增加了“抽肥补瘦”的分配原则,1931年2月,写信承认农民的土地私有(纠正了土地所有权属政府的第二个错误),承认土地买卖(纠正了禁止土地买卖的第三个错误)(《农村》第37页)。1933年,针对党中央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极左政策,他领导查田运动,主张“土地斗争的阶级路线是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削弱富农,消灭地主”,反对侵犯中农(主要是富裕中农)及消灭富农,而且反对与地主富农图谋妥协(《毛集》第4卷,第250页,1934年1月24—25日),捍卫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

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在1929年10月26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指出: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日益生长的革命高潮”,要开展“阶级斗争的革命方式”,共产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

义。接到这一指示后,1930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第七十号通告,批评朱毛红军的“躲避和分散的观念”,要求红军“向着交通要道中心城市发展”,号令“首先争到一省或几省的胜利”。其结果,李立三(第二次“左”倾路线,1930年6月—9月)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定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李批评“‘想以乡村包围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中央文件》第6册,第123页),而且认为中国革命的总爆发必将引起世界革命的总爆发。他要求中国暴动一起,蒙古应出兵华北,苏联应在满洲同日本作战。党中央命令红一军团进攻南昌、九江,但7月朱德、毛泽东分析形势后中止攻占南昌。8月,红一军团与暂时占领长沙、随后撤出的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合编为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共3万余人(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治委员、前委书记。同时设立统一指挥红军与地方政权的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毛任主席),9月接中央的指示攻打长沙,但没能突破敌阵,被迫撤围。

共产国际为抑制李立三路线,1930年7月23日发表决议案,并让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和瞿秋白回国。9月下旬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批评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但是共产国际在10月给中共中央的来信中,将李立三批判为“反国际的方针”、“右倾机会主义”。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干预下,批判了三中全会对李立三的“调和主义”,把右倾机会主义作为党内的主要危险,并做出“引进反立三主义的斗争之中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到中央委员会里来,并且重新审定政治局的成分”的决议。留学苏俄的王明(陈绍禹;第三次“左”倾路线,1931年1月—1935年1月)被提拔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在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1930年10月,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展开的中原大战结束后,开始调集10万兵力对赣南的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毛泽东主张:正视全国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红军主力应先向根据地内退却,依靠根据地群众的支援和有利地形等条件,发现和造成敌军的弱点,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变化,然后集中兵力

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敌军，粉碎“围剿”（10月25日。《毛谱》上卷第321页），即主张“积极防御”。这种“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被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所认可。对于分为八个纵队向根据地进攻的国民党军队，红军集中4万人在12月底到1月初的五天时间里，先设伏兵全歼了一个师敌军，又乘胜追击歼灭半个师敌军，打破了“围剿”。

另外，在国民党军队进攻之前的12月上旬，毛泽东认为省行动委员会和红二十军的干部有“AB（反布尔什维克）团”的嫌疑，派部下到富田，将他们逮捕。红二十军依靠实力释放被逮捕的干部，并提出反毛泽东的口号，被毛作为叛乱予以镇压处刑（富田事件；戴向青）。毛泽东本人说：“我们虽杀了4500人，但我们保存了4万红军”（高华，第498页），从而承认死者达到红军总数的10%。

1931年4月，蒋介石调集20万兵力，开始第二次“围剿”，兵分四路发动进攻。共产党内部出现了“分兵退敌”的意见和退出中央苏区的意见，但毛泽东仍然坚持“诱敌深入”战略，采取集中红军3万主力打击弱敌的战法，自5月中旬在15天时间内由西向东进击350公里，五战五胜，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

同年6月，蒋介石亲自担任总司令，率30万兵力开始第三次“围剿”，向革命根据地“长驱直入”。毛泽东决定“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命闽西闽北的红军行军500公里，集中到赣南，8月上旬三战三胜，摆脱国民党军的包围，隐蔽休整半个月，9月上旬对因疲惫而退却的国民党军进行追击，两战两胜。由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蒋介石停止了“围剿”。依靠这一胜利，使赣南和闽西两个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中央苏区迎来了全盛时期。

另一方面，推行王明路线的中共中央的方针逐渐波及到苏区，同在当地执行的毛泽东的方针产生了矛盾冲突。1931年1月，毛泽东被任命为由党中央组织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周恩来任书记）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副主席，但自己负责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与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被撤消了。8月底党中央批评红军的“游击主义”。9月王明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成立了由留苏学生出身的博古（秦邦宪）负总责的临时中央政治局。9月20日，王明起

草的中央决议要求苏区的党和红军占领中心城市,认为目前主要危险还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11月上旬在中央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上,把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批判为“狭隘的经验论”,把土地政策批判为“富农路线”,呼吁同“右倾机会主义”做斗争。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1932年3月,毛泽东反对攻打赣州,4月攻克了闽南漳州。10月在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宁都会议),欲贯彻党中央的进攻策略,将毛泽东批判为“纯粹防御路线”、“右倾”,让毛泽东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由周恩来代理。1933年1月,博古领导下的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进行直接领导,为消除毛泽东的影响,开展反对“罗明路线”、“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1932年底,蒋介石以50万兵力开始第四次“围剿”。1933年1月,兵分三路进攻中央苏区。朱德、周恩来按照党中央的指令,强攻敌军驻守的南丰,但看到形势不利,便将红军集中在根据地内,采取大兵团伏击歼灭战法,2月底和3月下旬,两战两胜。日本军攻陷热河,并试图攻入长城,国民党被迫分兵,停止了“围剿”。

1933年9月底,蒋介石调集100万大军,以其中的50万兵力向中央苏区进攻(第五次“围剿”)。蒋倡导“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活动保甲制(通过户籍编制来使人民相互监视的邻保组织,10户为1甲设甲长,100户为1保设保长),设立地方保安队管制农民,进行经济封锁,采取构筑无数碉堡、步步推进的“堡垒主义”的持久战战术。由共产国际派来、被中共中央委以军事指挥大权的德国人李德(奥托·布劳恩)放弃“积极防御”战略,在根据地外防御敌军,首先攻打国民党军队的坚固阵地,导致失败(冒险主义)。接着对侵入根据地的敌军主力和堡垒战,他采取“消极防御”的方针,进行阵地战,分兵防御,短促出击,陷入被动地位(保守主义),最终丢弃根据地逃跑转移(逃跑主义)。中共中央站在“中间势力主要打击论”的立场上,1933年11月至1934年1月,没有同打着“抗日反蒋”旗号的福建人民政府联合斗争,错失了红军粉碎“围剿”的很有利的机会。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机关与86000名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开始“西征”(“长征”)。红军在同国民党“追剿”军战斗,突破四道封锁线,付出巨大牺牲,特别是在广西的湘江战役中锐减到3万人。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及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等20多个人参加,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与长征的军事指挥问题。博古作总结报告,将第五次“围剿”不能粉碎的原因,归结为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这个客观原因。周恩来作副报告,指出反“围剿”失利的原因是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又批评博古和李德。毛泽东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上与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批评博古、李德没有采取此前红军取得胜利的决战防御、运动战的战略战术,而是相反地采取上单纯防御、阵地战、堡垒战、短促突击,这是败于敌军的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原因。毛泽东的发言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会议主要根据毛的发言委托张闻天起草政治局决议,取消了博古、李德、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三人团,由朱德、周恩来担任军事指挥,周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以后的行军中,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政治局总的责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设置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中央决定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军事指挥三人小组。王明路线的统治被画上了句号,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权。

红军西进后北上,穿越大河、爬高山、过草原,通过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避免与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发生冲突。1935年10月,5000人到达陕甘苏维埃地区,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在谈到长征时自豪地说,“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上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选》第1卷,第150页)。长征成

为支撑毛泽东、共产党和人民克服一切困难、不断前进的精神支柱。

毛泽东在同国民党军的“围剿”进行战斗和倾注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集》第5卷），对10年苏维埃革命战争中的经验进行理论上的总结与概括。

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他列举了四点：一、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地大物博的国家”（由于帝国主义的不统一和国内统治集团的不统一），而又经历了1925年与1927年的革命；二、敌人的强大；三、红军的弱小；四、共产党领导与土地革命。他说：从第一点和第四点的顺利条件，给了红军以发展与战胜敌人的可能性，从第二点和第三点的困难条件，给了红军以不能很快战胜其敌人的可能性，给了战略持久战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一方面红军因实行土地革命得到农民的援助（军民一致），大多数士兵是农民出身，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战斗，而且指挥员与战斗员之间在政治上是一致的（官兵一致），而与之相对的国民党军队反对土地革命，没有农民的援助，士兵和下级干部不能拼命作战，官兵之间在政治上是不平等的，因此红军一定能够胜利，即强调“人民”理想主义。他将其表现为战略上“以一当十”（抱着从整体的立场、长期观点来看我方必胜这一历史观，大胆作战），反对为敌人所吓倒的倾向。“暴风骤雨”式的农民革命力量一定能把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葬入坟墓这个湖南农民运动理想主义的继续与发展。另一方面，要正确认识到，敌人是全国性政权，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把持着政治、经济、文化的中枢这一“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主张在敌人力量难以波及的边境地区建立根据地，针对敌人的“围剿”进行反“围剿”，针对敌人的战略性进攻进行战略性防御这一持久战方针。具体遵循以下过程：

进行反“围剿”的准备。我方实行战略退却，“诱敌深入”至根据地，使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①积极援助红军的人，②有利作战的阵地，③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④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⑤使敌人疲劳沮丧，⑥使敌人发生过失。具备其中两个以上的条件，敌人

的战斗力量减弱，我军的战斗力增强，得出敌我力量均衡，或者敌军的绝对优势改变到相对优势，我军的绝对劣势改变到相对劣势，形成敌劣于我，我优于敌等情形后，再转入战略反攻。通过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打破“围剿”。

毛提倡这种“实际”现实主义，将此表现为战术上“以十当一”（在个别的局部的战争中，为能人工地造成我多于敌，我优于敌的形势而取胜，慎重地计划、实施），反对轻视敌人的倾向。他将这一战略的形成过程概括为：从1928年5月在井冈山产生出“十六字诀”的军事原则；1930年10月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时，提出“诱敌深入”的原则，而且应用成功了；在1931年9月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

在阶级矛盾剧烈，仅仅是统治阶级获得战争利益的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如德、日的一些军事学者，鼓吹战略进攻的利益，反对动摇人心的战略防御。与此相反，毛泽东认为在中国的苏维埃革命战争和民族革命战争中，战略防御是有利的，主张“正义战争的防御战”。他说：因为我们是被压迫者和被侵略者，在保卫苏区和保卫中国的口号下，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民，万众一心地作战；战略的防御战，不但有麻痹政治上异己分子的作用，而且可以动员落后的人民群众加入到战争中来。可以认为，通过抵抗敌人的进攻，我方多数人民会自我觉悟，将自身的被动性转化为能动性——其思想核心就有人反抗压迫的信条。他想要将敌人引入局部即根据地，通过抵抗敌人的进攻，使我方的潜在力量现实化，把全局即全国的“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发生转变为“敌劣我优”的形势，从而取得胜利。就是说，他力图持有“多数人民一定能战胜少数压迫者”的战略上的信条，通过正确认识敌我矛盾，并加以正确的实践解决它，从而取得战术上的胜利。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发现了中国革命的主体——农民，将“人民”理想主义进一步具体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把握了主体即工农红军士兵与农民认识课题即敌我矛盾，战胜敌人的方法，把“人民”理想主义与“实际”现实主义结合在一起。他确立了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积累局部的胜利，一步步使全局

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取得最后胜利这一根据地、持久战的人民战争战略。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作战方法的错误——毛泽东的这一看法,是很有说服力的。但在当时国民党军队与红军的军事力量具有压倒性差距的情况下,若采取毛所主张的作战方法,也就是说,在开战两个月后红军主力进攻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或者一年后进攻湖南,实施“围魏救赵”的谋略,突入到大城市集中、交通发达、富裕的国民党统治中心地区,大概也会有全部被歼灭的危险性。失败后到达偏僻而又贫困的陕北苏区,最后幸存下来,反而同“农村包围城市”的根据地理论更为一致。可以认为,结果由此成功地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再次将国民党及资产阶级拉入到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中来,发动全民族,从而挽救了中国,也挽救了中国共产党。

### 第三章 民族的抵抗——抗日 战争(1937—1945)

“大革命的失败，显然在于共产党人没有掌握政权和武装，苏维埃革命的失败，多半是因为共产党人不能有效地影响和争取民众。而新形势下的国共合作，则不仅使共产党人得以保存了自己的政权和武装，而且使他们获得了大力进行宣传鼓动和群众工作的广阔天地。”(杨奎松，第301页)

这一说法是有相当说服力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参加了近代中国最大的“救亡”运动——抗日战争，把革命的主体从农民扩大到民族，并在继续保持自己政权和军队的同时，同蒋介石和国民党展开谁能更好地与日本进行斗争的竞争，从而获得民众的支持并扩大党势。我以为，在全民族的抗战中，毛泽东通过自下而上的人民民主<sup>①</sup>，

---

<sup>①</sup> 50年代初，丸山真男提出了如下观点。“与早就放弃国民的解放的课题，把国民主义升华为国家主义把国家主义再升华为超国家主义”的日本民族主义相反，“中国则由于统治阶层从内部改组旧体制、推进近代化的尝试失败，因此受到包括日本在内帝国主义列强长期的、深刻的渗透。然而，这反而不得不赋予反对帝国主义统治的民族主义运动，以彻底改造旧社会即政治体制的任务。……因为一方面有旧统治结构和帝国主义相勾结，所以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唤起民族主义和社会革命相结合”(《在日本的民族主义》，1951年1月。《丸山真男集》第五卷，第64—65页)。竹内好说，“作为中国和日本近代化类型的比较”，丸山和我本人的想法是大体一致的，并认为“在中国发现了只有全体的联合中，才能确立个人的自由”(“国民文学论的深化”，1953年11月。《国民文学论》第164页)。我以为丸山的观点和竹内的观点作为“总体的观察”，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更加详细地观察中国，就必须重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为了进行抗日战争，停止对国民政府的武装斗争和对地主的土地革命即社会革命，而进行要求国民政府实行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和让地主实行“减租减息”的社会改革等。毛和中共由于经过“抗日——民主”这一阶段，得到舆论的支持，才取得了战后社会革命和武装斗争的胜利。

既顶回又支撑蒋介石自上而下的国家统一，并使合作得以维持到最后而未能分裂，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而且，可以说，由此共产党奠定了战后在国共内战中胜利，并使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成功的基础。

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的思想在“中国共产党于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毛集》第七卷，第74页）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各方面得到了深化和发展。

## 第一节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共产国际早在第四次“围剿”进行最激烈的1933年1月17日，就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在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的三个条件下，愿“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的宣言。

在中国工农红军进行长征的途中，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召开中的1935年8月1日，驻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员王明、康生等人，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宣言认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和南京卖国政府投降，国家、民族已处在“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的生死关头，为此向全国同胞呼吁，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队停止内战、共同救国和组织国防政府及抗日联军，并声明“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作成立国防政府的发起人”（“抗日反蒋”）。第二天，季米特洛夫在大会的主题报告中，高度评价中国的“广泛的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所显示的主动权”，并表示支持“八一宣言”。在这背后有着这样的背景：由于1931年日本侵略满洲和1933年德国建立了希特勒政权，在苏联有“对日德夹击的恐怖现实化”，为此“在1935年共产国际七次大会上，苏联力图在西欧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在亚洲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此自己成为反法西斯的堡垒”（和田春树，《中苏》，第20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先由莫斯科共产国际和中共

代表团提出方针，而后由国内的中共中央接受并具体化的。

1935年10月红军第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11月中旬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派遣林育英传达共产国际七次大会的精神和“八一宣言”。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23日通过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毛文》第一卷，第376—382页），其中包含有“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方针和“战略的持久战、战役的速决战”的作战原则；25日通过张闻天起草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瓦窑堡决议》）。

《瓦窑堡决议》把握目前中国的课题，说：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东北后，又并吞华北，而且正准备并吞全中国，以“把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中华民族为了挽救“亡国灭种”的危机，只有发动民族战争。《决议》认为抗日的主体是中国人民，立足于其中坚力量的苏维埃和红军，进行阶级分析，指出：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革命的知识分子为其基本力量，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和军阀也有可能同情、中立、参加抗日，地主买办阶级能够利用他们中间的矛盾与冲突，使某些反革命力量处于不反对反日战线的地位。《决议》一方面呼吁只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目蒋介石，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都应该联合起来参加民族革命战争，以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又力图取得共产党的领导权，说党只有同内部的投降和外部的攻击作斗争，以获得群众的支持来掌握领导权，才能得到反日运动的胜利。关于方法，它主张要组织统一战线的最高的形式——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为此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sup>①</sup>。要通过克服“左”的“关门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来扩大和加强共产党。可以说，《瓦窑堡决议》是以苏维埃和红军为立足点，以敌即日本帝国主义与

---

<sup>①</sup> 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表明自己不但是代表工人和农民的，而且是代表中华民族的。它宣告：给予一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保护城乡小资本工商业；废除苛捐杂税，征收统一累进税；优待知识分子和给予他们以工作、以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不没收富农的财产，和封建剥削部分以外的土地；保护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和华侨的事业与财产等。就是说，他宣布改变苏维埃革命中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敌视政策。

我即中国人民构成敌我矛盾，并把“八一宣言”中提到的一般的统一战线战术作为我同敌斗争以解决矛盾的方法而具体化了。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解题说：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瓦窑堡决议》的精神进行了详细的说明。被收录在建国后的《毛选》的这一报告，压缩《决议》的内容，更加明确地阐述。特别是由于帝国主义力量的强大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中国的革命战争必然是持久战——在这种武装斗争论的基础上，毛开展抛弃关门主义防止冒险主义的统一战线论，这里显现出毛的独特性。但是，这一报告对“八一宣言”的要点即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则丝毫没有提及，且一次也没有公开发表。可能是在收录于《毛选》时进行大幅度的修订。

当时仅有一万红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毛泽东）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的指挥下。他们谋求一边同国民党的“围剿”作斗争；一边扩大陕北苏区以同苏联及外蒙古打成一片，以及同“围剿”主力军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结成抗日反蒋西北大联合，以发动全国抗日战争。1936年2月，红军主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渡过黄河东征山西，力图粉碎对陕北苏区的“围剿”，促进全国的抗日运动和扩大红军与根据地。

另一方面，蒋介石从1934年至1935年把红军主力赶出南方，看到“安内”（先消灭共产党以使国内安定）、“统一”已告一段落，便开始致力于“攘外”（后驱逐外敌即日本）、“御侮”（抵抗外国的侵略）。为了抵抗日本的侵略而得到苏联的支援，南京政府从1934年秋天开始加快对苏交涉，而在这期间，企图通过“政治解决”来使中国共产党服从中央政府。自1936年开始，蒋开辟了几条渠道，同共产党进行秘密接触。1936年2月底上海牧师、中共秘密党员的董健吾等到达瓦窑堡，传达南京政府希望同共产党谈判的意向。

3月2日，周恩来致电山西前线的张闻天、毛泽东说，“对蒋（介石）及南京方面，应答应派正式代表去”，“利用蒋现时之弱点，抓住他找我之一环，向全国各方活动，并得与全国群众见面。这千载一时



之机，万万不可放松”（杨奎松《1992》第9页）。3月4日，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等致电董说，“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提出了五项条件，即（1）停止内战、一致抗日；（2）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3）容许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寇迈进；（4）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5）内政与经济改革。以后双方继续接触。

对于在军事上占有压倒优势的蒋介石和国民党企图在政治上逼迫中共服从，并加以吸收合并，在军事上处于劣势的毛泽东和共产党虽然被迫接受谈判，但在政治上，反过来要求国民党停止讨伐共产党、向抗日、民主的路线转变，力图使共产党和中国能起死回生。

进入山西的抗日先锋军，在受到蒋介石嫡系中央军的阻挡而撤回陕西时，5月5日，毛泽东在向南京政府、全国的军队及各党派各团体、各报社、同胞所发的“通电”中，声称是“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而撤退的，并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从这以后，中共开始放弃“反蒋”口号。

5月中旬，以巩固西北抗日根据地，扩大红军，更加接近外蒙和苏联，使抗日力量为团聚目标，红军西征宁夏。对于广东派、广西派将领要求南京政府对日开战和让抗日救国军北上的两广事件，6月8日毛泽东发表了支持这一抗日反蒋军事行动的谈话。

7月13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作了《御侮之限度》的演说。他虽然仍坚持前一年11月第五次大会报告的“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蒋集》第一册，第921页）的调子，但其抗日的态度则进一步明确了，表示：所谓“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同上，第952页）。但是，蒋仍坚持“御侮之先决条件，乃在集中一切救国力量于中央指挥之下”，“军政军令之统一，尤为近代国家组织之最低限度”（《二中全会宣言》。《国民党》下册，第409页）这一原来的“安内攘外”路线。

如果追溯历史，蒋介石在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指挥北伐战争，乘着民族运动的大浪，打败北洋军阀。但1927年，他却发动了四

一二武装政变，镇压共产党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并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大体上统一中国。蒋开展与列强进行改订不平等条约的谈判，以收复关税自主权；还得到江浙财阀和地主阶层的支持及英美的援助，进行经济建设。对于成为统一和建设障碍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中国共产党的苏维埃革命，蒋介石采取“安内攘外”的路线。

在思想上，蒋介石虽然以孙中山的后继者、三民主义的信徒的面目出现，并掌握了政权，但实际上放弃孙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而实行反苏、反共、镇压农工的政策。然而，他依然没有放下“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国民革命的旗帜。他的逻辑就是：由于北伐的成功，打倒军阀的任务已经完成；目前革命的惟一目的是打倒帝国主义，其方法是国家拥有统一和实力，通过外交谈判，废除不平等条约；全国应一致拥护国民政府，反对革命的国民政府的人就是反革命。他根据这种逻辑，取缔群众运动。在这儿有他把方法即国家统一优先于目的即反对帝国主义，将其作为判定是否革命的标准而绝对化的颠倒。

在蒋的国家统一思想里包含有三个要素：第一，部下要牺牲个人自由，绝对服从“大公无私”的总司令的命令这种国民革命军的统一、集中；第二，“后知后觉”的军人、干部，实行“先知先觉”的孙中山的教导来感化“不知不觉”的国民这种对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的解释；第三，要求每个人心中，把作为个人的自我主张和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与作为阶级的自我主张和自私自利的共产主义看成“私”而否定，回归到国家的“公”这一对阳明学“致良知”、“知行合一”的解释。

蒋介石欲通过使国民绝对服从于三民主义和“最高统帅”即蒋，把不统一的“一盘散沙”的无组织的非现代国家的中国，改造成为统一的有组织的现代国家。他力图在规定“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与“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的华盛顿会议九国公约的国际秩序中，完成国家的独立。蒋介石的“大公无私”（“公”指国家）、调和论、“知行合一”哲学，与毛泽东的“大公无私”（“公”指人民）、矛盾论、“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实践论）的哲学，在结构上有共通性，但其运行方向却是相背的。

1936年7月13日,全国各界救国会的代表向国民党二中全会请愿,要求“立即对日抗战、停止内战”。7月15日,沈钧儒(法律家)、章乃器(原银行家)、陶行知(教育家)、邹韬奋(新闻记者、出版家)等救国会四领袖,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彻底地批判蒋介石的“安内攘外”路线,并要求其转变。四领袖站在“抗日救国是关系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决不是任何党派、任何个人所能包办的”(《救国会》第118页)观点上,呼吁结成联合战线;并向蒋介石、西南当局、宋哲元和华北其他将领、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红军、一般大众,提出了希望。他们认为抵抗日本的主体不是国家而是民族,以政府与民众、中央与地方、各党各派各个人都作为全民族的一部分而相对化,要求各团体各个人承担起作为抗日主体的责任。其中,有两点引人注目。

第一,联合战线的原则。

四领袖提倡各党各派“在抗日救国的一点上,求得共同一致”、而在其他的点上,“尽可以有不同的主张或意见的组织原则。他们期待各党派一边“互相容许自由发表意见、自由结合团体”(同上,第119页),一边通过共同奋斗得到了共同的胜利,“中国才真正能够统一起来”。

对于蒋的先使一盘散沙的国民绝对服从“最高统帅”来统一国家,而后抵抗日本的侵略的道路,四领袖以先使全民族的各团体各个人,作为抵抗侵略的主体而自立,一边实现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一边共同奋斗,从这个过程中与统一国家的道路相对抗。在这里存在着从上与从下、一与多的哲学的对立。

第二,对蒋介石的态度。

四领袖一方面引用蒋介石的话“埋头苦干,忍辱负重,准备抗日”来肯定他的抗日的目的;另一方面又断定其“先安内,后攘外”方法的失败,并且要求采取“联合各党各派,开放民众运动,以共纾国难”(同上,第121页)这种“真正地准备”的办法。他们通过突出抗日的目的把方法相对化,使国家统一的方法优先于反对帝国主义的目的而绝对化的蒋的本末倒置,再颠倒过来。四领袖赞许蒋的二中全会报告的对

于“和平绝望”与“牺牲最后关头”的解释是“比较的具体了”，希望蒋得到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

8月25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毛文》第一卷，第424—434页），要求停止内战、结成统一战线、发动抗战，并呼吁再现1925至1927年的国共合作。书信一边认为蒋介石的报告对于“和平的绝望时期”和“牺牲的最后关头”的“最低限度”的解释，“较之过去是有了若干进步”，并表示“欢迎”；一边又批评他继续退让政策，要求将其转到抗战。而且，书信认为中国的内战和不统一的原因在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并批判《二中全会宣言》的“集中统一”的主张，是“本末倒置”、“缘木求鱼”。它也力图通过突出本来的目的强调全国人民所要的是“抗日救民”的集中统一，而不是“媚外残民”的集中统一，来把使集中统一的方法优先于御侮的目的而绝对化的、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本末倒置再颠倒。关于方法，《致国民党书》批判国民党政府“一党专政”的咨询机关，以及只不过是装饰品的国防会议和国民大会，建议建立民主共和国，召集国会和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组建国防政府；并要求产生吸收“各党各派各界各武装队伍”的代表，作为权力机关的国防政府。

中共中央由于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9月1日发出指示：蒋介石军队有参加抗日的可能，因此应从抗日反蒋向“逼蒋抗日”的方针转变；而且，我们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并应成为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以便争取广大人民的同情与拥护（《中央文件》第11册，第89—91页）。

9月17日，中共中央做出，在全国建立民主共和国，而苏维埃区域成为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决议。

毛泽东在10月起草《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其中包含有如下许多内容即：努力实现武装抗战、联合战线和民主共和国；双方停止军事敌对行为；承认“在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之条件下，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实行统一的指挥与统一的编制”；建立全国军事委员会与总司令部，承认国民党在此机关占主要领导地位；设置两党混合委员会，但同时双方均保持其政治上与组织

上之独立性”（《毛文》第一卷，第446—448页）。共产党代表持此草案面对国共会谈。但是，由于红军打算通过占领宁夏，打通通往苏联的道路，以得到武器援助的西征，在10月底失败，国民党代表态度硬起来，实际上要求取消红军，导致中共表示拒绝。

中国共产党此前一边同东北军、西北军、山西军等作战，一边利用释放战俘，给各军将领写信，派人与将领会谈，给各军将领发公开信等办法，向各军渗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它耐心地实行“团结群众，用群众的力量，利用国民党将领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等要求与红军联合的变化，逼蒋介石走到与我们联合”的总方针（毛泽东在11月13日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毛谱》上卷，第609页）。尽管陷入军事上的不利状况，但它仍坚持中国共产党、红军和抗日根据地的独立自主，以推动各党各派各界各军联合起来、给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从内战转到抗战。用毛的自下而上的人民民主道路去顶回蒋的自上而下的国家统一道路，以形成这种政治上有利的态势。

在这期间，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扣留前来督战的要求给予红军以毁灭性打击的蒋介石，逼迫其由内战向抗日转变。

在12月1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12月15日，以毛泽东为首的红军将领致电国民党、国民政府，呼吁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中央文件》第11册，第124页）。但是，在得知苏联和共产国际支持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国内各界各派不赞成西安事变的情况后，中共中央就改变方针，在采取东北军、西北军、红军准备迎击南京政府亲日派讨伐军进攻的同时，呼吁以南京与西安的团结抗日为基础的和平解决。就是说，中共想要以西北大联合为立足点，实现“逼蒋抗日”。12月24日，周恩来在得到蒋“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周选》上卷，第73页）的口头承诺后，同意释放。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从内战走向抗战的转折点。

1937年1月20日，接到提议变更苏维埃制度的共产国际来电，

与对西北问题表示强硬态度的蒋介石的口信(杨奎松《1995》,第399—400页),2月10日,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打电报,提出了五项要求与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和释放政治犯,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完成对日抗战的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的生活。四项保证是,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执行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2月15日至25日举行的国民党三中全会,通过由宋庆龄等提议的恢复总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之提案,21日还通过《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决议》说“共产党人……倡输诚受命之说”,以取消红军、取消苏维埃政府、停止赤祸宣传、停止阶级斗争为接受“输诚”之最低限度之办法。然而,4月30日,共产党认为,国民党的四个条件与共产党的通电“原则上是相当接近的”,“国共合作的原则是已确定”(《中央文件》第11册,第169页)。

2月,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在西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就合作的具体条件开始磋商。3月下旬,周在杭州会见蒋介石,向蒋传达共产党“拥护三民主义及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同时表示中共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谋与蒋介石和国民党合作,但决不能忍受“投降”、“改编”之诬蔑。蒋介石则强调领袖问题,说共产党不必谈与国民党合作,只是永久与他合作,要商量其办法。中共中央采取起草民族统一战线纲领,结合新的民族联盟包含国共两党及赞成这个纲领的各党派及政治团体共同推举蒋介石为领袖的方针(《中共中央关于同蒋介石谈判经过和我党对各方面策略方针给国际的报告》1937年4月5日。《中央文件》第11册,第178—184页)。

蒋介石和国民党虽然从内战向抗日、国共合作的方向转变,但仍企图夺取共产党、红军、苏维埃区域的独立性,并吸收合并它。共产党致力于解决在承认三民主义、国民党和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地位这种政治上的让步,只有自己掌握领导权才取得抗战胜利这种

历史使命感相对立的难题。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翻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从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写的《批注集》中，毛泽东作了如下叙述：

“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言，资产阶级因握有经济命脉，至今还居于主导地位；然在革命领导上面说来，由于无产阶级之觉悟程度与彻底性，而资产阶级则是动摇的，无产阶级却居于主导地位。这一特点，影响到中国革命之前途。无产阶级要在政治上、物质上都居于主导地位，只有联合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如果工农小资产阶级多数觉悟与组织起来的话，那么，革命之决定的主导的作用，就属于无产阶级了。”（《批注集》。第89页）

在这儿，毛依据矛盾的哲学，特别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互相转化的理论（后述），展望前途：对于在经济、政治（全国政权）、军事（200万军队）实力上处于优势、占有主导地位的国民党，实力上处于劣势的共产党，依靠在领导革命的思想上的优势，进行政治斗争，使人民觉悟起来、组织起来，由于获得他们，逐渐加强力量、转化为实力上的优势以夺取主导地位。

毛泽东在3月23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矛盾、民主、领导权的三个问题（《毛谱》上卷，第664—665页），5月3日在苏区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又对其宗旨进行详细的阐述，力图从理论上解决上述的难题（《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毛集》第五卷）。

首先，毛泽东抓住目前形势说，“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地位”，认为国民党自三中全会以来，开始由内战、独裁、与不抵抗的政策向和平、民主、抗战的方向转变，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其次，他主张国内矛盾应通过民主的方法来解决，即必须“将政治制度上一党一派一阶级的独裁专制政体，变为各党各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以及争取“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准备动员人民进入抗战。关于中共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的五项要求与四项保证，他说，“国民党抛弃内战、独裁与不抵抗政策，共产党抛弃两个政权对立的政策”，是“两党的让步”。他提出共产党的“让步的限度”是“在苏

区与红军问题上共产党领导的保持，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共产党独立性与批评自由的保持”，明确表示抵抗国民党压力的立场。毛一方面把三民主义重新规定为“对外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对内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与增进人民幸福的民生主义”，宣誓将其作为“民主革命的提纲”而坚决实行；另一方面，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党纲”而高举，以保持主义的独立性。

毛泽东更是站在以中国人民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革命为基轴的历史观上，提出了国共两党参加国民革命，1927年资产阶级叛变革命后共产党单独承担民族与民主革命，1931年以后共产党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又参加革命这种观点。他由此论断中国革命不能由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由无产阶级的领导，强调“抗日救国总参谋部的职务”和政治领导的责任，只能由共产党来承担。他把政治领导解释说：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动员口号，把那作为动员全国的总目标和具体的方针；共产党人应成为执行其方针的模范；发展与巩固同各阶级的同盟；扩大和提高共产党。这大概是由人民运动从下面施加压力、推动政权的方针吧。另外，把代替苏维埃工农民主共和国的民主共和国，毛规定为其阶级性质是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及一切同意革命的分子的联盟，其前途可能走向非资本主义的。在这儿他描述了抗日救国、人民民主、共产党的政治领导、非资本主义的前途结成一体的理论。这可以说是《新民主主义论》的嚆矢。

4月4日，中共中央给刘少奇发出指示，说：“应该向反蒋的地方军阀坚持的解释，只有同蒋介石南京政府共同合作抗日，才是中华民族的出路”，我们决不拒绝利用这些力量去推动南京政府更加走上民主化的道路”，然而必须反对进行分裂（《中央文件》第11册，第176—177页）。6月24日，毛泽东等致电张云逸，指出：应坦白地向广西派将领李宗仁、白崇禧说明，“只有以抗日民主与蒋比进步才能生存发展，如以军阀政策同蒋比前后，则只有失败”（《毛谱》上卷，第682页）。他谋求为了抗日实现自下之民主与自上之统一的并立与均衡。

毛泽东的构想大概是这样吧！逼迫蒋介石国民党使“团结御侮”



的目的优先于国家统一的方法，使其从内战转到抗日，作为交换共产党和承认三民主义、国民党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并在名义上加入其国家统一的圈子里。但是，实质上立足于共产党、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割据、独立自主，以此为中心支柱，促进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自主与联合。由下面的人民民主来顶回蒋介石国民党上面的独裁，支撑国家统一以加强全民族的抗日力量。在其中，共产党从政治领导上升为实力领导。

我以为，在毛泽东的人民民主思想和救国会四领袖的联合战线的组织原则中，有着各团体抵抗强大敌人而自立、联合的共同的逻辑。

6月8日在庐山，蒋介石同周恩来举行了会谈，内容如下：

蒋提出：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同等数目的干部合组之，蒋介石为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将来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之党。可与第三国际发生代替共党关系，并由此坚固联俄政策。红军编制为三个师，（不设总部设政治训练处指挥之。朱德、毛泽东两同志须（离开军队）出来做事（《中共中央关于同蒋介石第二次谈判情况向共产国际的报告》，1937年6月17日。《中央文件》第11册，第265—267页）。

对此，周恩来持有异议。周回到延安后，中共中央肯定蒋介石有合作诚意，但要保持自身的独立性，特别是军队的指挥权，推荐朱德为改编后的红军指挥人。6月29日，在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毛泽东就国共谈判发言，表示一边要以“保持独立性”为原则，对于蒋介石想用国民革命同盟会来限制共产党和红军的意图，主张“还是在他定的圈子里做事”，我们不能因为这种限制就与他分裂，现在的政策是逐渐地冲破他的圈子（《毛谱》上卷，第684页）。同蒋边团结边斗争的毛的方法，在这儿得到了鲜明地体现。

1937年7月7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开始。蒋介石已不能否定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为了让红军开赴前线，8月把其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任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

7月15日以前,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给蒋介石提交由周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言》表示:“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已经与中国国民党获得了谅解,而共赴国难了”(《周选》上卷,第76页)。9月22日,国民党公布了共产党的《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说:“国民……咸认整个民族之利害,终超出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也。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例证。”“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蒋集》第2册,第2431页)。他还是在使个体(各个人、各团体)归一于全体(国家、民族)的调和论思想中,笼统地包括中国共产党。尽管如此,中共中央认为“我们宣言及蒋氏谈话,宣布了统一战线的成功”,把蒋谈话看做“确定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中央文件》第11册,第348页)。

## 第二节 《实践论》与《矛盾统一法则》

毛泽东在从1936年到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初的这段时间里,集中研究了苏联哲学,并构筑起了《实践论》和《矛盾统一法则》(后来的《矛盾论》)这些自己的哲学。概而言之,书中可以看出由武装斗争到《实践论》、由统一战线到《矛盾统一法则》这样一条思想发展的线索。哲学教科书《辩证唯物论》(《毛补》第五卷。初稿由大连大众书店出版。其中注有“出版年不详”,据推定为1945年秋冬或1946年出版。龚育之(1983,第68页)当中,《第二章 辩证法唯物论》中收录有《一一 实践论》,《第三章 唯物辩证法》中收录有《一 矛盾统一法则》。据说包括这一版本在内的当时各种版本,“全部以1937年9月的誊写版印刷为准”,“中间没有修改过”(同上,第70页)。

1931年列宁格勒国立联合出版社普里博伊出版了共产主义学院列宁格勒支部哲学研究所的西洛可夫、爱森堡和其他五位哲学家党员执笔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日本的广岛定吉、直井武夫合译了该书,并于1932年4月由东京白扬社出版。中国的李达、雷仲坚从日文译本将其译为中文,并加上“1932年9月6日李达识”的“例言”,

由上海笔耕堂书店出版(以下略称为《西洛可夫本》)。毛泽东在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期间精读了1935年6月刊行的中译本第三版,标注了点、线等符号,并在栏外作了“批注”。另外,他还在1937年7月以前精读了由米丁主编、沈志远翻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12月。以下简称《米丁本》),也进行了圈点并作了批注。这在形式上有点像列宁的《哲学笔记》,在内容上也通过《西洛可夫本》和《米丁本》吸收了列宁的《哲学笔记》的思想。这些都收录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以下略称为《批注集》)中。以这些工作为基础,毛泽东于7月写成了《实践论》,并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做了讲演,8月7日又写成了《矛盾统一法则》,也在该大学进行了讲演。

我们想要通过仔细研究如下的变迁过程,弄清1937年的毛泽东的思想。即列宁《哲学笔记》→《西洛可夫本》、《米丁本》→《批注集》→《实践论》、《矛盾统一法则》→《实践论》(1950年12月修订版)、《矛盾论》(1952年4月修订版,《毛选》第一卷)

在内容上,《西洛可夫本》作为“哲学上列宁的阶段”,主要以列宁的《哲学笔记》为依据,强调了“理论与实践的深刻的辩证结合”,及“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对立的斗争的法则、统为统一的内在的对立”。在作用上,它主张“哲学的党性”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一方面批判了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德波林“把哲学从政治中分离了出来……复活了理论与实践的脱离”,是“带有孟塞维克色彩的观念论(今译为唯心论)”,是“左”倾机会主义。另一方面,它又批判了布哈林主张的“均衡论”即“对立的和解论”,认为它不承认“对立统一法则”即“过程是自始至终依着矛盾,依着统一物之分裂而发展”,是“机械的唯物论”,是右倾机会主义。他要通过彻底进行哲学上的“两种世界斗争”,承担起“社会主义时代”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一翼。具体来说,他批评托洛茨基像解决“资本主义经济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一样,以“国际革命”来解决苏联“大规模社会主义工业与分散的小布尔乔亚(今译为小资产阶级)农业之间的矛盾”和“普罗列达里亚(今译为无产阶级)与农

民层的矛盾”，以及布哈林通过“缩小产业的发展速度”，促进“个人农业的成长”来解决这些矛盾的想法，而拥护斯大林通过“苏联的工业化、基于全境集体农场化而对富农阶级的清算，以及国营农场建设的成长”正在逐渐解决这个主要矛盾的主张。

毛泽东为了尽可能正确地理解《西洛可夫本》、《米丁本》，并吸收其精髓，把自己的思想提高到“哲学上列宁的阶段”而竭尽全力。为了确立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半阶段——抗日战争的路线、政策而反复锤炼自己的哲学，这是他所担负的课题。与同时代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斯大林相比，他更接近于“为应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感受到了锤炼推敲自己的认识论的必要性”（和田春树《1977》，第19页）、从而精读了黑格尔的《大逻辑学》的列宁。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通过斯大林而吸收了列宁的思想。

《西洛可夫本》强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以生产和阶级斗争等“历史的社会的实践”为“源泉”和“基础”，认识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法则而产生的，而且“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一切历史以及无产阶级革命，证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正确”以及“实践正是真理的标准（尺度）”。可以认为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把《西洛可夫本》的这一论点与自己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军事路线是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产生并经实践证实了其正确性这一情况结合了起来。《实践论》的理论结构有独创性，语言简明易懂，内容深远。他要在自己革命战争的实践和理论的基础上吸收列宁的思想及最新的苏联哲学，使两者互相渗透，进而构筑起普遍的实践论、也即认识论。文章中到处充满了这样的宏伟气魄。

《实践论》的基础，大概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中的《第一章 四 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在其中，他确立起了“军事的规律，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在我们头脑中的反应”，“客观实际”即“敌我两方面”是“学习和认识的对象”，是“研究的对象”，“只有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毛集》第四卷，第97页），这样的基轴。这里包含有以下三段逻辑：

1. 客观实际即敌我矛盾中的一方面，作为身体存在的实践主体

即我,为了解决敌我矛盾而参加革命实践。

2. 属于身体的一部分的头脑,即主观或认识主体,以客观实际也即敌我矛盾为认识对象而构成主客观矛盾,寻求与客观相符合,推进侦察、思索、判断的认识过程,把握规律。

3. 实践主体即我把掌握的规律应用于行动,实施基于认识而确定的决心、计划,通过革命实践来检验认识,解决主客观矛盾,战胜敌人而解决敌我矛盾。

《实践论》在这一革命战争逻辑的基础之上,作为思想材料,主要吸收了《西洛可夫本》的《第一章 唯物论与观念论》中的《八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发展哲学上伊里奇(列宁)的阶段》和《第二章 当做认识论看的辩证法》中的《一 认识与实践、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二 认识过程的阶段与动因》、《三 论理的东西与历史》、《四 真理论》,以及《米丁本》的《第三章 辩证法唯物论》的《第五节 社会的实践为认识的标度》(以下括号中所标记的,是作为思想材料而吸收的《西洛可夫本》和《米丁本》的节数)。

《实践论》是由三段话构成,末尾由三句总结。

第一段说“通过实践而产生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生产活动和阶级斗争等社会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真理性的标准”。这大概是吸收了列宁的《哲学笔记》中“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一般性的价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价值”(《列宁全集》33卷205页——俄文原著的页数),《西洛可夫本》的“实践是认识运动的基础。实践正是真理的标准(尺度)”(二)、“但在实践上能够实现理论,必须是从现在之社会的实践产生,而正确反映自然及社会之发展路程的那种理论”(二),《米丁本》的“人类社会所得到的关于周围世界的一切知识……是由于过去一切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由于在阶级社会内推动这一发展的阶级间的战斗”等理论。

第二段说明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这一认识的发展过程。这大概吸收了《哲学笔记》中的“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同上,第61页),《西洛可夫本》的“从感性

的认识推移到论理的认识”(二)、“在生产和阶级斗争中,人类的认识,表现为能动的起作用的动因,参加于世界的改造”(一),《米丁本》的“要改造现实就需要认识现实的规律性”等理论。只不过毛泽东更强调了认识“起着改造世界的作用”(《批注集》,第15—16页)这一认识的能动作用,在《实践论》中提出了“主观能动性”这一自己特有的概念,认为是它使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理性认识发展为革命实践。

第三段讲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形式,循环发展以至无穷,而实践与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一实践、认识的无限循环发展过程。这大概是受到了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第二章第五节中的“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绝对真理”,《西洛可夫本》的“社会的历史的实践之发展,使得我们对于现实的认识越发上进到更高级的阶段”(三)等理论的影响,但可以认为它更强烈地表现出了毛泽东自己的独特想法。第一,他主张中国革命战争的逻辑,就是在把握和使用局部即根据地战争的具体规律的过程中,把握全局即全中国的战争的普遍规律,从小战斗到大战役,再到全国规模的战争不断推进,适应这一敌我矛盾的“场”的变化而发展我们的认识,客观过程从一个发展阶段向另一个发展阶段推移时,适应这样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指导者使自己和革命参加者每个人的认识都急速变化。第二,可以认为它表现了毛泽东固有的哲学或者说宇宙观和人生观,就是,他在其中提出了无限的“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即总体事物,与其中存在着的,作为无产阶级、共产党、革命人民的一员的有限的我是相对的,我通过斗争解决自身直接面对的局部矛盾,经过实践、认识的无限发展过程来改造总体宇宙,推翻中国和世界的黑暗面而实现光明世界,运用强迫手段改造那些反对改造的人,“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从这里我们能看出,毛泽东的思想从使体魄和精神的能力发展到至高地位的“精神之个人主义”,到使实践能力和认识能力无限发展的“主观能动性”,从“全体人民自由发展的光明社会”到“世界共产主义时代”,这样一条从五四新思想到“马

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大致的发展历程。

毛泽东的这一哲学，继承了李大钊的“青春”、“今”的“宇宙即我，我即宇宙”的哲学。李说明了青年在第一阶段超越现实，与“不变”即“无尽之青春”（宇宙全体生命）一体化，获得无尽的气魄，第二阶段通过内在于现实中并不断地突破（“冲决”）束缚（“网罗”），扑杀“白首（白发、衰老）之我”，孕育“青春之我”，来促进“变”也即“青春之进程”，打破自我、家庭、中华、人类、地球、宇宙的“白首”而恢复“青春”这样一种“起死回生”的哲学。对于作为李的“宇宙——我”框架的源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天——人”<sup>①</sup> 框架，毛泽东也继承了下来，但他将其内容从调和论改变为矛盾论，将统治的哲学颠倒为革命的哲学。

此外，《实践论》还具有超过《西洛可夫本》和《米丁本》的框框的特色。首先，《西洛可夫本》规定了认识的主体“不是从社会游离了的个人，而是社会的人类，社会的阶级”。《实践论》一方面同《西洛可夫本》一样，认为实践、认识的主体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革命的人民”这些集体，另一方面，他又提出了构成集体的革命指导者及革命参加者各个人把握自己分担的局部战争的规律，并使用它解决敌我矛盾，从而成为认识、实践的主体。还有，《西洛可夫本》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真理，是已经由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历史，以及无产阶级革命（俄国革命）而证实了的。而《实践论》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可能在经济落后的殖民地产生。因为虽然同时但不同地”（《毛补》第5卷，第224页）。看来他大概是主张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的全局革命理论，只能现在和此后由中国人自身通过自己局部的革命实践而产生。这表现出了毛泽东的独创性。

《实践论》在内容上从《西洛可夫本》和《米丁本》中吸收“哲学上列宁的阶段”的同时，还从中学到了在实践上把自己置于正统马克思

---

<sup>①</sup> 所谓“天”，就是“作为万物的父母而生产一切，同时内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并成为他们存在之根据的自然”（小丝夏次郎，第246页）之意，汉民族的“人生观的根底深处，存在一种把人看做万物中之一物，对自然与人不加以区别，万物同根，天地人一体的思想”（同上，第28页）。我想要以这一学说为一条引线来研究这一问题。

列宁主义(中)的位置,把不同理论作为“左”或右的机会主义,作为异端而进行排斥的手法。比如说,他批判“中国 1927 年的陈独秀主义和苏联的布哈林主义”是“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是“顽固派”、“右倾机会主义”。他还批判“中国 1930 年的李立三主义以及在苏联尚可作为一个共产主义派别看待时的托洛茨基主义”是“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把幻想看做真理,把仅在将来有实现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的“冒险主义”、“左翼清谈主义”。毛泽东把自己在中国共产党中的地位,放到了与斯大林在苏联共产党中的地位等同的位置。

关于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并丧失了南方根据地的王明“左”倾路线,《批注集》依照遵义会议的决议称其为“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批判它“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第 9 页)。《实践论》对王明路线并未直接言及,但他把自己的“农村包围城市”路线定位为“由实践产生且经实践证实了的真理”,这为 1945 年批判“红军夺取中心城市”的王明路线是脱离实践的“左”倾教条主义打下了基础。可以说,与其从形式上将自己在中国的地位置于同苏联的斯大林同等的位置,他更有意在内容上把斯大林——王明路线作为“左”倾路线来批判。

此外,关于《实践论》还遗留有两个疑问。第一个疑问是,对于认识从实践中产生,认识的基本来源是实践这一思想,与头脑即主观把客观实际即敌我矛盾作为对象来认识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思想,该如何进行综合性的理解的问题。1. 站在存在于敌我矛盾之中的我也即身体,通过实践而解决敌我矛盾这样的立场上,在这种意义上,全体过程就是实践。2. 但是从方法的层面上讲,全体过程的第一阶段是认识,作为身体一部分的头脑,也即主观或认识主体以客观实际即敌我(包括我的实践)这两方面为对象进行认识(将客观纳入主观之中);第二阶段是实践,身体即实践主体适用已认识的规律于客观进行实践(将主观“形成并进入”客观之中),解决敌我矛盾。对此我们是否又可作如下理解:认识的对象并不仅限于“实践”,而应是



包括“真实的情况”和“人们的行动(也即一般人所说的实践)”(《毛选》第1卷,第238页)这两个方面的“实际”?第二个疑问是《实践论》规定社会实践的内容包括“物质生产”、“阶级斗争”、“科学实验”(这大概参考了《米丁本》将社会实践的内容分为“物质生产”、“阶级的战斗”、“政治的生活”、“科学上的创造”的理论),以便使之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领域相照应的问题。这样作为知识分子的实践而被认可的,在文化生活的范围内只有科学实验,虽然后来专业文学、艺术创作活动被认为是社会实践,但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被认为如果不离开本专业参加阶级斗争和物质生产,就无法进行认识,其主观能动性不是被限制得太狭窄了吗?

如前所述,《西洛可夫本》依据列宁的矛盾学说和阶级斗争论,把布哈林的均衡论和阶级调和论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而拥护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毛泽东在《第三章 唯物辩证法》的前言中,认为学习辩证法的目的是“改造这个世界”,是中国人“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要求干部和革命的同志们学习它。

《矛盾统一法则》的思考没有《实践论》那么成熟,全文分七节,采用了先叙述矛盾的一般理论,然后通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实例对之进行说明的哲学教科书式的叙述方式。但是,实例当中最重要的是阶级斗争,文章以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的俄国革命为模型,将用民族战争的方法解决“整个中国社会对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主主义革命的方法解决“人民大众与封建制度的矛盾”、以及用政治斗争的方法解决争夺革命的主导权的国民党、资产阶级与共产党、无产阶级间的阶级矛盾,作为贯穿全文的主题。在由于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侵略的加剧,“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与服从地位”(《毛集》第5卷,第189页)的形势下,在致力于如何结成并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何使共产党担负领导责任的实践过程中,是将自己的理论基础提高到“哲学上列宁的阶段”的高度——可以认为这是毛泽东的动机。他大概是要运用矛盾理论从各种各样的角度来研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应付形势的多种多样变化吧。还有,通过中国革命的

实践,深化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矛盾理论,大概这也是他的意图之一。

《毛泽东选集》的《矛盾论》的解题中有“为了克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而写的”的说法,本文中又加上了一笔对教条主义的批判。《矛盾统一法则》一文大概也有这样一种意图,就是要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中创出中国共产党自己独有的理论、路线、政策,克服将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的理论、路线、政策照搬到中国的王明的教条主义。但是,当时是王明等共产国际代表先提出了统一战线,而在中国的中共中央接受了这一主张,从这个角度说,没有理由批判王明是“左”倾。就本文来看,《矛盾统一法则》是一篇担负着双重任务的论文,第一是追求团结、同一性,即克服中共党内的宗派主义并防止冒险主义,顺利达成由国共内战到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改变,这一反“左”目标;第二,同时又担负着斗争、斗争性,即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批判的自由,动员人民起来抗日,对国民党施加压力使之坚持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这样的反右任务。可以认为这就确立起了“以斗争求团结”的毛泽东路线,为克服“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同国民党只团结不斗争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奠定了立足点。

《矛盾统一法则》主要从《西洛可夫本》的《第三章 辩证法的根本法则——由质到量及由量到质的转变的法则》的第1节和第4—10节,《米丁本》的《第四章 唯物辩证法的诸法则》中的《第一节 对立体一致的法则》、《第二节 量变质和质变量的法则》中吸收了思想材料(以下各节末尾的括号中标记的是作为思想材料而吸收的《西洛可夫本》和《米丁本》的节数)。

《矛盾统一法则》也在末尾对序论部分及各节进行了总结。序论部分在末尾被概括为“矛盾统一律是宇宙的根本法则,也是思想方法的根本法则”。它引用列宁的《哲学笔记》中的“就本来的意义讲,辩证法是研究客体本质中的矛盾”(《列宁全集》第38卷,第249页),提出“这个法则是辩证法最根本的法则”,而《批注集》也在此处注有“列宁的辩证法定义”。

《一、两种发展观》论述了与把世界一切事物看做永远不变化的或由于外部原因而发展的形而上学的发展观相反，辩证法认为事物是通过内部矛盾而发展的（《西洛可夫本》4、10。《米丁本》1）。他认为社会的内部矛盾主要是阶级矛盾，依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内因论，认为“帝国主义的压力加速了中国社会的变化，也是通过中国内部自己的规律性而起变化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原因，是国共分裂、内战及国民党独裁造成的中国之弱。他主张如果结成民族统一战线并彻底执行革命战争，就能够驱除日本的“自强”的哲学。

《二、形式论理的同一律与辩证法的矛盾律》中说，辩证法和形式论理学的绝对同一律针锋相对，反对“反动的同一律”而主张“革命的矛盾律”（《西洛可夫本》第六章）。建国后的《毛选》中将这一章全部删除了。

《三、矛盾的普遍性》把“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每一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这两方面叫做“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文中并引用了恩格斯的“矛盾就是运动”，及列宁的《哲学笔记》中的《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的矛盾统一的法则就是“承认（发现）一切自然（社会和精神也在内）现象和过程中的相互排除的对立倾向”作为论据。在矛盾运动的实例当中，他特别重视“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的根本规律”，列举了战争、党内思想斗争的例子（《西洛可夫本》8。《米丁本》1）。

《四、矛盾的特殊性》论述了在各种物质的运动形式、各发展过程、各发展阶段中具有各自的特殊矛盾和本质，“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必须认识到矛盾的总体的特殊性和矛盾的各方面的特殊性。文中认为“列宁主义的主要特点，就是研究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各种具体形式的科学”（《毛补》第5卷，第253—254页）；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矛盾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来解决，殖民地的民族矛盾通过民族战争的方法来解决，国内矛盾通过民主革命的方法来解决；关于国民党和共产党，尤其重视在统一战线结成、破裂、再结成的各阶段中两党的关系，作为矛盾的两个方面的两党的特点，以及两党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人民大众等各方面的关系。

而且,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即共性和个性,本节提出“共性包含于个性之中,共性表现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之存在也就不能有共性之存在”(《毛补》第5卷,第258页),非常强调个性。可以认为,这是要像《实践论》一样,开辟一条中国革命的新的道路——革命指导者和参加革命的每个人先认识自己参加的局部的特殊的法则,再通过解决敌我矛盾的实践认识全局的普遍的法则,从而解决敌我矛盾这样的道路(《西洛可夫本》1。《米丁本》1、2)。

《五、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讲了“在复杂的过程中,有许多矛盾存在,其中一个为主要矛盾,由于它的存在与发展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存在与发展”(同上,第259页),以及“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是主要的,他方是次要的,其主要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同上,第261页)。《西洛可夫本》把“生产力及生产关系间的矛盾”“生产之社会性及私有形式间的……矛盾”看做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看做“过渡期之根本的主要矛盾”(第282—283页)。关于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实践与理论的矛盾、新经济政策中社会主义要素与资本主义要素的矛盾,他认为价值、生产力、实践、社会主义要素是“矛盾的主导方面”,“有主导的作用”(同上,第295—296页)。毛泽东吸收《西洛可夫本》的“主要矛盾”、“矛盾之主导的方面”“互相转化”的概念,把“矛盾的主导方面”又称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再添加上“非主要(或说次要)矛盾”、“矛盾的次要(或非主要)方面”的新概念,创出了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的互相转化理论,及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的互相转化理论<sup>①</sup>。

---

<sup>①</sup> 中岛岭雄于1964年最先发现了《教程》(《西洛可夫本》)“在毛泽东执笔《实践论》、《矛盾论》的过程中,是被大加利用的材料”(《现代中国论》,第52—53页)。他在将《教程》与《实践论》、《矛盾论》进行比较对照的四个例子中,关于《矛盾论》的第一个例子,是《教程》的“矛盾的主导的方面”与毛泽东的“主要矛盾”的比较对照。第二个例子是,《教程》的“运动过程的各阶段”中的“固有性”(独占、商品交易独占等)在某些阶段不是本质的东西,而在特定阶段上却变成本质的(也有相反的情况),与毛泽东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互相转化的观点的比较对照。这两个例子在想法和表达方式上均有相似之处,但概念是完全不同的。至于毛泽东从《教程》中吸收了什么,在其上新添加了什么,由此创出了什么样的新理论,中岛并没有解释得很明白。

关于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的互相转化理论,本文以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它规定着其他诸阶级间的矛盾这一原理为原型,来把握在中国如果帝国主义不用战争压迫,而是用政治、经济、文化的形式与封建阶级结成同盟。共同压迫,人民大众就会用国内战争起来反对;如果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中国内部的各阶层就能够暂时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帝国主义与中国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包含封建制度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在内的国内矛盾则下降到次要地位。本文用这一法则说明了从苏维埃革命向抗日战争的转变。

关于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互相转化的理论,本文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处于主要地位,起着主导的作用,但在革命前夜和革命后,无产阶级转化到主要地位,起着主导的作用,而资产阶级作了相反的转化的俄国革命为先例,展望了在民族战争中帝国主义从主导的方面、优势地位转化为被打倒的地位,中国则“由被压迫地位向自由独立的地位转化”。作为国内的例子,它举了在苏维埃地区,农民由被统治者转化为统治者,地主由统治者转化为被统治者的事实。可以认为在它的根底深处,存在着根据地理论。它就是根据地由于深受农民支持,诱敌深入,弱化了强大的敌人而强化了弱小的我方,逆转了力量对比而使我方战胜了敌人这一理论。而且,关于争夺反帝反封建革命的主导权的国民党、资产阶级与共产党、无产阶级的矛盾,他极力主张:虽然资产阶级因握有生产手段和统治权,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如果无产阶级凭借其觉悟的程度及革命彻底性的优势,联合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话,就在政治上、物质上都居于主导地位,担负起“革命的决定的主导的作用”。此外,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实践与理论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他说一般情形下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起主导的作用,但有时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也会起主导的作用,主张把《西洛可夫本》中所说的一个方向变更为两个方向,更为活跃的重视人的能动性的辩证法观点(《西洛可夫本》5、6、7)。

《六、矛盾的同—性与斗争性》讲了“矛盾的两方面”,“各以他方

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不可分的统一体中”（互相依存），“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互相转化）的“矛盾的特殊性、相对性”；他也讲了“不管在其共存时或其转化时，都有斗争的存在的，尤其是表现矛盾转化时”的“矛盾和普遍性、绝对性”。文中引用了列宁的《哲学笔记》中的“辩证法是关于矛盾怎样能够是同一性，又怎样是同一性（怎样变成同一性）——在怎样的条件之下矛盾变成同一性而互相转化……等等问题的学说”（《列宁全集》第38卷，第97—98页），以及“矛盾的统一（合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发展运动是绝对的”（同上，第358页），把它们作为论据。根据这一理论，他明确了“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订立抗日统一战线”（同一性），“无产阶级须得提高政治警觉性，密切注视资产阶级的政治动摇，及其对共产党的腐化作用、破坏作用，保证党与阶级的独立性”（斗争性。《毛补》第5卷，第269页）两个方面，驳斥了阶级调和论与思想统一论（《西洛可夫本》6、9。《米丁本》1）。

《七、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讲了矛盾、斗争是普遍存在的，“某些矛盾在某发展过程中，到达了外部物体力量的形式互相冲突时，矛盾的斗争便表现为对抗”（同上，第276页）。列宁批评了布哈林把矛盾和对抗同一看待，认为社会主义没有对抗、没有矛盾的主张，以及托洛茨基也把矛盾和对抗同一看待，认为社会主义存在着矛盾即对抗的看法，依据“对抗和矛盾断然不同。在社会主义下，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同上，第277页）。看来本文依据这个理论，防止像第一次国共合作那样，矛盾发展为对抗（战争），通过斗争维持统一战线（《西洛可夫本》5、6。《米丁本》1）。

列宁的《哲学笔记》被认为是以“具体的、全面的、动态的、实践的认识”为目标的，（和田春树《1964》，第42页），而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统一法则》使这种倾向更彻底了。这种“宇宙矛盾——人的实践”的革命哲学，给认为多数的民众的大联合一定能战胜少数的强权者的大联合的“人民”理想主义，与正视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并产生将之逆转为敌弱我强的方法的“实际”现实主义的结合，提供了理论基础，

起了使苏维埃革命的理论发展为抗日战争理论的跳板的作用。而且它诞生了把人民群众自下站起来与共产党自上领导相结合的理论，为培养共产党员的道德和能力的党的建设即整风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

从毛泽东为了将自己的中国革命的思想提高到“哲学上列宁的阶段”而集中精力进行哲学研究的姿态中，我们能感受到他的宏伟气魄。这就是，要使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统治的贫、弱、愚的落后中国起死回生，除了走由具有严格的理论和组织的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强行实行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俄国革命的道路以外，别无他法。

### 第三节 《论持久战》与《论新阶段》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企图“速战速决”，占领北平（北京）、天津后，进攻华北一带。8月13日，日军在上海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并于11月击败中国军队，然后溯长江而上，12月13日，占领首都南京。而中国则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迁都武汉继而又移至重庆，顽强地坚持抗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陕甘宁苏维埃区域改称为边区，担负着抗日战争的一部分任务。毛泽东为了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一方面坚持抗日拥蒋，拥护蒋介石、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实力上的领导地位，通过保卫抗日根据地向政府要求民主、施加压力，以使蒋介石和国民党继续抗日、联共，而不至于转向反共、投降。另一方面，共产党以掌握政治上的领导权、发挥“总参谋部”的作用为目标，竭尽全力提出全民族总战略，并努力把自己的党、军队和根据地建设成为抗日的模范。

抗战开始后，蒋介石命令红军迅速出击。但是，毛泽东认为战争是长期而且是残酷的，考虑到红军的特长和陕甘宁苏区周边的10万国民党军队的威胁，便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没有急于出兵，制定了先出动军主力的三分之一的兵力的方针。毛泽东提出如下的任务分担：国民党军队作为主力军担负正面的攻势防御的正规战争，八路军

作为“战略的游击支队”，担负侧面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以钳制敌人大部，消灭其中一部，协助友军作战。

毛泽东在8月22—25日于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报告，主张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持久战，创造根据地、钳制敌人、支援友军、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的基本任务，“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作战原则，力求统一思想。但是，周恩来提出了打“运动游击战”的提议，会议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党内大多数干部以及前方将领仍旧主张相对集中兵力参加正面抵抗”（杨奎松，第308—309页）。结果八路军主力全部出动，9月25日进行了平型关战役（取得胜利，损失亦很大）那样的重大作战行动。毛泽东说红军的拿手好戏是游击战（不是运动战），主张分散兵力，“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而不是集中打仗为主”（《毛文》第2卷，第19页），实现由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转变。以后毛总结经验，把八路军的方针确定为：“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毛集》第6卷，第125页）。

毛泽东作为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书记（主席）（副书记为朱德、周恩来），依着军委提出大的方针，朱德（总指挥）、彭德怀（副总指挥）的八路军总指挥部按照军委的方针和当前的情况具体进行部署来指挥八路军在华北的作战。首先，毛派八路军三个师开赴山西，致电总部要求以一一五师（师长林彪）位于晋东北，一二〇师（师长贺龙）位于晋西北，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位于晋东南，从侧翼和后方攻击日军，以支援国民党军队在山西的正规防御战。11月8日省会太原失陷后，毛认为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他电令一一五师一部转移到晋西南，从四面包围日军占领下的交通线和城市，建立根据地继续进行游击战，接连粉碎日军的围攻。从1938年春开始，他电令派山西山区的八路军，开展到日军后方的河北、山东、河南、安徽的平原地区。留在南方的红军，1937年12月被整编为新编第四军，开进到江苏、安徽的平原地区。

毛泽东以战略眼光来研究游击战争，写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



问题》一文(1938年5月30日发表)。关于在日军后方把游击区转化成根据地的问题,他认为“消灭或打败了许多敌人,摧毁了伪政权,发动了民众的积极性,组织了民众的抗日团体,发展了民众武装,建立了抗日的政权”(同上,第28页)这个过程是很必要的。他主张通过“深入的民众的工作与灵活的作战方法”,就能够粉碎日军的围攻。这是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的继承和发展,但把土地革命政策改变为“减租减息”。

在日军攻陷徐州后,并准备进攻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时,毛泽东立足于抗战十个月以来的经验,5月26日—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做《论持久战》的演讲,继续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为基础,并对其进一步发展,把“人民”理想主义与“实际”现实主义出色地结合在了一起。

首先,日本 1. 强, 2. 退步、野蛮, 3. 小, 4. 国际形势之寡助; 中国 1. 弱, 2. 进步、正义, 3. 大, 4. 国际形势之多助——毛泽东把双方的特点归纳为这四个要素,以此作为立论的依据。他一方面批判只看到第一要素,认为在军力、经济力与政治组织力敌强我弱,而说中国会失败、灭亡的亡国论(国民党汪精卫等)。毛强调应最为重视第二要素,即日本作为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的退步性、野蛮性,“就要最大地激起它国内的阶级对立,与中国的民族对立(中国全民族与日本统治者的对立),与世界大多数的国家与人民的对立”,“这是日本必然失败的主要根据”;相反,中国近百年的解放运动中积累起来的进步性、正义性“能唤起全国的团结,激起敌国人民的同情,号召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同上,第61—63页)。他把面对少数地主阶级的压迫大多数农民必将反抗、并取得胜利的农民革命理想主义,发展为少数日本统治阶级压迫、欺骗日本民族,强行发动侵略战争,对此大多数中国民族必将自觉抵抗、并取得胜利的民族革命理想主义。他批判因日本武器先进中国就会失败、灭亡的“唯武器论”,说:战争的“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与军力、经济力相比,人力、人心更重要。在此之上加上第三要素的小与大及第四要素国际形势的寡与多,毛泽东论断最后胜利是中国的。

另一方面，他依据正视第一要素的敌强我弱的实际力量对比，提倡持久战的“实际”现实主义，批判认为中国短期内能够取得胜利、毫无根据的速胜论（共产党的王明等），展望持久战的三个阶段。

### 一、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

敌强，深入进攻，攻占广州、武汉、兰州三点，并把其联系起来，我弱，继续防御并后退。应以运动战为主，而以游击战与阵地战辅助之。

### 二、战略的相持阶段，即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战略反攻的时期。

敌之停止进攻，力量对比走到平衡地位，我正规军正面防御，一部分转入敌后、配合民众武装、作游击战争。在这最艰难的时期，争取军队的进步、政治的进步，人民的动员，文化的向新方向的发展，游击战争的出现，国际援助的增长等向上的变化，我方转弱为强。

### 三、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

由于我之力量的增长，国际援助的增长与敌之困难的增加，我之力量超越敌之力量。以运动战与阵地战为主，游击战为辅，推回敌人，把他们赶到鸭绿江边。

可以认为，毛泽东是这样构思的：把苏维埃革命的根据地扩大为抗日战争的全中国，就是说，把全中国改造为一个大根据地（诱敌深入），让八路军、新四军成为全国的模范，在敌后建立无数小根据地，以人民战争方式来进行抵抗，使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一步步发生变化。

毛泽东把最为困难的第二阶段，作为中国起死回生的关键，对其尤为重视，说：“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中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中民族努力的程度”（同上，第82页）。中国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后退，不过到达某一定点，会停止后退，保持平衡，依据作用与反作用的法则，通过抵抗使我之力量与敌之力量平衡，中国全民族觉醒，使巨大的潜在力量现实化，我之转弱为强，超过敌之力量，推回敌于国外——我以为毛是以此为目标的。

毛泽东认为民族抵抗的原动力终究是民众各个人的自觉，即“自觉

的能动性”的发扬,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同上,第139页),“抗日战争就是要赶走一个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同上,第98页)。自觉的能动性相当于《实践论》中的主观能动性。“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人们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并付诸于行动,使主观见之于客观,自觉的能动性就是这种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人的能动性。从被敌人侵略、坐着不动,只有被灭亡的、消极被动的存在,向正确认识敌我矛盾,正确实践来解决矛盾的积极能动的存在转变,各个民众都变革自己——毛泽东在这里寻求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动力。

毛泽东把自觉的能动性具体地表现于战争中的,军队的行动自由权叫做主动性,与其相对名之曰被动性。他说,我们争取主动权,把敌人逼迫处于被动地位即不自由状态,以此获得胜利。对此,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把握抗日战争的主动性和被动性。

第一,力量方面:日本强、处于优势、主动地位;中国弱、处于劣势、被动地位。第二,不过通过正确的主观指导,在敌人处于全局优势和全局主动地位的情况下,人工地造成我们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具体地说,就是在全局我们在内线(被包围的防御作战线),以持久战进行防御(战略方针为“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在局部我方以优势兵力从外线(包围的攻击作战线)以运动战迅速歼灭少数敌人(战役与战斗方针为“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把局部的优势与主动集合起来,获得全局的优势、主动,争取胜利。第三,组织民众武装民众,造成敌人错觉,出其不意攻击敌人,使之丧失优势与主动。

毛泽东因为深刻地认识到客观物质条件方面的“敌之优势,我之劣势”,所以能突出战争领导者的主观指挥能力的提高和民众参加抗战的必要性。

从重视自觉的能动性的角度出发,毛泽东看破了日军大集团战略战役指挥许多弱点和不足,但战斗指挥即部队战术与小兵团战术却颇有高明之处。他主张:对教养高、自尊心强的军官与士兵,一方面了解与顺导其自尊心,“从优待俘虏、国民外交等等方法,引导他们了

解日本统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义”(同上,第129页);另一方面,让他们看到中国军队及中国人民的顽强的战斗力,给予歼灭性的打击,动摇其军心。他希望帮助日本人自己从统治者的侵略思想下解放出来,回归到作为人民的自我,化敌为友。可以说这是道义与科学相结合的思想。

《论持久战》提出:改正第一阶段以阵地战为主的错误,应以运动战为要,“所虑是国家主力和(国民党军)由决战而牺牲,上了敌人的当”(同上,第133页),力图说服蒋介石和国民党避免在武汉进行战略决战,应保存实力,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毛泽东8月6日在给王明、周恩来他们的电报中很实际地指示:要迟滞敌进,争取时间,避免不利的决战,不可守时则放弃武汉,保存军队力量,巩固蒋介石之地位。这实际上反对王明等在6月15日提出的“要像马德里保卫战<sup>①</sup>一样保卫武汉”的意见。《论持久战》还看到抗日战争不可避免地要发展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预测并期待着将来苏联等外国以其相当大量的军力与经济力公然攻击日本,援助中国。这正是“促进并等候国内的进步,国际的增援与敌人的内溃”的战略(同上,第133页)。

《论持久战》使苏维埃革命时期的人民战争、根据地和持久战的战略得到了发展,在抗日战争时期,把革命主体从农民扩大到全民族,展望把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合,极大地深化了思考,扩大了视野,明确地预见了通向胜利的道路。其预见是非常正确的,实际战争几乎就是按照其预见发展的。

1938年10月12—14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做《论新阶段》的报告,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一《论持久战》中的论断,已被15个月的抗战的经验所证明。关于武装斗争,他主张“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达到驱逐敌人之目的”

---

<sup>①</sup> 1936—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中,面对法西斯势力的正规军的叛乱,人民阵线政府依靠少量的正规军和武装起来的工人、市民及国际纵队的力量,奋力保卫首都马德里。毛泽东认为,成功保卫武汉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政治上动员全军全民起来奋斗”,中国“过去是没有过一个马德里的”(《毛集》第6卷,第140—141页),认为没有同保卫马德里一样的、保卫武汉的条件。

(同上,第168页),从持久战的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他的在战略相持阶段主力军(国民党军)应担负正面防御,阻止日军的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等应在日军的后方发展游击战争,创立和巩固根据地的任务,并呼吁坚持抗战。他肯定蒋介石在1937年12月17日《我军退出南京告国民书》(《蒋集》第2127页)中提到的“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毛也说“敌据城市我据乡村,所以战争是长期的,但乡村能够最后战胜城市”(《毛集》第6卷,第193页),承认蒋与自己的观点有相同之处。此外,关于世界形势,他看日本“北防苏联,东防美国,南对英、法,内镇人民”的苦境。他认为重新分割世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日、德、意法西斯国家首先侵略中国等“中间国家”,再与各大国开战。他看日本由于侵略中国的深入,又加深了与英、美、法、苏之间的矛盾,主张“中国反侵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的配合”。

《论新阶段》是使持久战第一阶段的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反映到政治方面的第一统一战线论,主张抗日战争的领导者是“国民党及共产党”。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1938年4月1日)的“总则”说,“确定三民主义暨总理(孙中山)遗教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绳”,“全国抗战力量应在本党(国民党)及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领导之下,集中全力,奋励迈进”(《国民党》下册,第484页)。毛泽东遵守这些被定式化的圈子,与日本和亲日派的反蒋反共、建立汉奸政府的方针针锋相对,提出全国一致拥护蒋委员长、国民政府和国共合作。他称“孙中山先生蒋介石先生是前后两个伟大的领袖”(《毛集》第6卷,第198页),给予了蒋最高的赞誉,肯定蒋介石的抗战和进步,批判国民党内守旧分子的阻碍。他认为国共合作是把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战后新中国的建设一起作为一项任务的长期合作。他说共产党员彻底完成“现时实际任务”即三民主义之后,发展到“将来远大理想”即共产主义阶段,把这两种主义联系起来。他把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的民主共和国,叫做“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同上,第233页)。

关于国共两党的长期合作，毛泽东想要创造相当于军事方面的“主力军”与“游击支队”的关系的、政治方面的统一战线中处于“领导和骨干”、“第一党地位”的国民党、与处于“第二党地位”的共产党之间的正常关系，提出与国民党“一党主义”不同的“各党共存，互相结合”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他建议的第一种是，“国民党本身变为民族联盟，各党派加入国民党而又保其独立性”，但与第一次国共合作不同，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都是公开的，将加入党员之名单提交国民党的领导机关，不招收任何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第二种是，“各党共同组织民族联盟，拥戴蒋介石先生作这个联盟最高领袖，各党以平等形式互派代表组织中央地方的各级共同委员会，为着执行共同纲领，处理共同事务而努力”。第三种是“现在的做法，没有成文，不要固定，遇事协商，解决两党有关之问题”（同上，第228—229页）。这是针对上述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同盟会”提案的反提案。

不过，早在1938年2月10日，王明的谈话（擅自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毛集》第5卷，第305—321页）就批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党外无党”的政策。蒋介石对此做出反应，会见周恩来，阐明“无意取消各党派或不允许其存在，惟愿融成一体”（《周谱前》第403页）。3月1日，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议“民族革命联盟”（《六大以来》上册，第921页）。蒋介石在大会闭幕词中说：“国内现存一切党派，都必然消融于三民主义之下”（《蒋集》第1038页）。在此路线下，国民党组织国民参政会，召集各方人士参加，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让各党派青年加入。10月4日，周恩来向蒋介石递交毛泽东、王明的信件，说明六中全会的提案。然而，12月6日，蒋介石对周恩来“跨党不赞成”，“最好合成一个组织”（《周谱前》，第427页）。1939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在复蒋电中说“两党为反对共同的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而进行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事，所谓两党合并则纯为另一事。前者是现代中国之必然，后者则为根本原则所不许”（《毛谱》中卷，第106页）。“事实上，国共两党关于组织“大党”问题的谈判”，到此结束（杨奎松《1992》，第78页）。

一人即最高统帅让多数即各个体服从自己、自上统一全体抵御

外敌，还是各个体作为抵抗外敌的主体自立联合、自下实现统一——这种哲学上的对立，是无法通过创立“大党”来解决的。

然而，对1938年7月成立的国民参政会，毛泽东在批评它作为代表人民的机关还不充分，但也认为“企图使全国政治生活走向真正民主化的初步开端的意义”（《毛集》第6卷，第157页），提出为了抗战胜利，要“确保人民言论、集会、出版、结社之自由及保证各抗战党派的合法权利”的问题（同上，第159页）。《论新阶段》在此加上战区与敌人后方的民主制（人民选各级地方政府再由上级加以委任。战区各级政府采用民主集权的委员制并设立各级人民代表机关），强调“实行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政治，密切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发挥抗日政权的最大能力”（同上，第212页）。为了抗日，毛泽东想要以自下而上的人民民主来支撑并辅助国民党自上而下的国家统一。

此外，对于国民党提出的组织由各党派青年参加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提案，中共中央表示赞成，意图通过三青团改造国民党。《论新阶段》中阐明，中共党员得到国民党同意，加入三青团的话，与参加民族联盟一样，不组织秘密党团，不收非共产党员入党。然而，中共中央的设想并没能够实现。

《论新阶段》中针对党的建设指出：中国共产党员应在民族战争中起模范作用，“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实施”（同上，第242页）。另外，毛泽东主张：“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的斗争中去”，“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同上，第261页）。这意味着毛泽东在与王明的思想斗争中取得了胜利。

当时的苏联和共产国际对日、德东西夹击很警惕，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寄予厚望，过分夸大国民党、政府和军事力量，惟恐国共关系紧张，国民党脱离抗战。王明信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季米特洛夫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斯大林的“中共要全力加强国民党和蒋介石长期抗战的决心”的谈话，于1937年11月底回国。12月9—1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12月会议）上王明做报告，反对提改造国民政府的要求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

过统一战线”，反对提出国共两党谁吸引谁的问题，主张“共同责任、共同领导”。毛泽东被孤立，但仍坚持持久战、游击战、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毛谱》中卷，第41、481页）。王明在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的政治局会议（三月会议）上做政治报告，强调“一个军队”，“统一指挥”，而毛泽东则主张持久战、战略退却、保存实力、分割指挥、自力更生、国共合作（民族联盟或共产党员重新加入国民党）、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发展党员、选拔干部等。

毛泽东在1945年6月，指出了王明问题的症结之所在：“对自己的事（指中国革命问题）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指苏联）却操心得太多了”（师哲，第263页）。王明等人认为“苏联是世界无产阶级的惟一祖国……服从社会主义苏联的利益作为自己一切政策的出发点”。恰恰相反，毛泽东坚持以中国革命为目的，这意味着“只是把苏联的存在和巩固，看做是便于自身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外部条件而已”（杨奎松，第316页）。可以认为，毛泽东是进一步想建立这样的一种关系：中国人民靠自己的力量，通过革命斗争，摆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控制来支援苏联的防卫、建设以及世界人民的革命（以后的中间地带论）。

三月会议后任弼时被派往苏联，把同意“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但对于国民党，共产党的独立性和领导作用是必要的这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统一战线政策，向共产国际做了说明，使他们得以了解。又由于王明的后盾——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人米夫被清除，共产国际做出指示：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党内团结问题。王稼祥在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这一指示，这帮助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取得了胜利。以上经过让中共中央痛感，不能盲目遵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而需要用自己的头脑分析形势确立方针，以及进一步认识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来创造自己理论是非常重要的。

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呼吁从敌之进攻，我之防御的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即相持阶段。他之后暂时没有认为阻止住了敌人的进攻，1939年9月16日，他说相持阶段已经到来，之后又认为1938



年10月25日武汉失陷以后为第二阶段。

在此期间,毛泽东在延安开办各种学校,指导其办学,经常亲自去讲课。在抗日军政大学,制定“抗日救国”的总方向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把抗日战争长期抗战、长期合作的理论本身作为活的教材来使用,总计培养了20多万军事政治干部。他希望颠倒数千年来做官和读书人不耕田的历史,以“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个人身上,文武配合,知识与劳动结合起来”(1939年4月24日),来培养新干部。在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他说“让知识与劳动团结起来,消灭过去劳心(脑力劳动)与劳力(体力劳动)分裂的现象”(同年2月2日),这也体现了同一宗旨。毛想要通过转换旧中国由读书人统治的价值观念,来改造干部,解放人民的力量,这在晚年发展成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在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陕北公学,毛泽东对学生说:“有了人民、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进步这三个条件,中国不会亡国”(1938年3月29日),并主张抗日需要大大发展共产党,而且需要鲁迅那样的“非党布尔什维克”。毛等创办鲁迅艺术学院,培养抗战文艺干部与文艺工作者。毛在陕北公学演讲,把鲁迅精神归纳为“政治远见、斗争精神、牺牲精神”这三点,给予无上的称赞说:“孔夫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新中国的圣人”(1937年10月19日,《毛文》第2卷,第43-44页)。此外,他认为应学习鲁迅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原则<sup>①</sup>。又说:“不管他是写实主义派或是浪漫主义派,是共产主义派或是其他什么派,大家都应当团结抗日。当然对我们来说,艺术上的政

---

<sup>①</sup> 1936年周扬等中国共产党员欲结成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中国文艺作家协会,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则想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并由胡风提出,从而引发了争论。鲁迅面对徐懋庸的批评,指出文艺作家协会会有“宗派主义”,现在有人说“不是‘国防文学’就是‘汉奸文学’”,欲以‘国防文学’一口号去统一作家”。他反驳了“国防文学”的主张说,“我以为应当说:作家在‘抗日’的旗帜,或者在‘国防’的旗帜之下联合起来,不能说:作家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联合起来”,提出了自己的组织原则。“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1936年8月3-6日。《且介亭杂文末编》)。

治独立性仍是必要的,艺术上的政治立场是不能放弃的”(1938年4月21日,同上,第121页),主张以“一切爱国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第一条,“我们自己艺术上的政治立场”为第二条(同上,第122页)。毛把鲁迅的组织原则作为统一战线的统一性与独立性之间的矛盾来继承,这是非常重要的。邹韬奋等人的救国会联合战线的组织原则也有共同的基础。除此之外,他还在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中国女子大学等也做过演讲。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基础。1938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其逝世13周年纪念日上发表讲话说:只有“三民主义的纲领,统一战线的政策,艰苦奋斗的精神”(同上,第111页),才是孙中山的“最伟大的遗产”,呼吁接受并发扬光大之。

抗日战争中,共产党的力量逐渐壮大,蒋介石对此忧心忡忡,欲加以限制。国民党对共产党制造的杀人、捕人、封报、进攻边区、武装冲突等一系列“摩擦”增多起来。毛泽东说:以斗争(反“摩擦”)来维护统一战线中的基本原则的统一,斗争正是为了统一(1938年9月24日),认为蒋介石和国民党是抗日、进步的,“‘摩擦’是局部现象,是可以改变的”(同年11月)。1938年底,汪精卫对日投降之际,毛泽东认为蒋介石具有抗日反汪的进步性与限制共产党的顽固性的两面性,联共与反共的两面性,虽然认识到由于反共摩擦增加的事实,但还是打出“拥蒋反汪”的方针(1939年1月5日)。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虽然主张继续抗日,但也提出要防止共产党的思想影响,4月以极其秘密的方式,把《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分发给地方的党部和政府。毛泽东对国民党的防共政策,提出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同年2月5日)。

1939年3月10日,在苏共第十八次大会上,斯大林做了“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已经成为事实了”的论断,欲放弃与英、法、美等民主国家团结一致制止法西斯国家侵略的政策,置身于两个帝国主义国家集团间的战争之外。5月30日共产国际判断,英、美、法欲把战争引向苏联向中共中央发出转变策略的指示:(一)由于英、美、法的远东

慕尼黑政策<sup>①</sup>，国民党妥协投降的可能性就是目前最大的危险。(二)中共应当开展反对国民党的妥协、投降与反共的斗争。(三)中共党的基本任务，仍是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给统一战线的破裂造成任何借口(杨奎松，第329页)。着眼于“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的配合”的中国共产党，被迫于此对国际形势和国共关系的乐观估计改变。5月3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了共产国际的指示，6月7日发出了反对国民党投降危险的指示。

6月10日和13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和结论，首先在“目前形势的特点”中指出：“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已经成为最大的危险，而其反共活动则是准备投降的步骤”(《反投降提纲》，《毛文》第2卷，第196页)；作为造成此形势的三因素是：(1)日本的诱降政策，(2)英、美、法强迫中国与日本妥协的压力(远东慕尼黑)。(3)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毛把其中的(3)作为主要的原因，尤为重视中国内部的因素。接着他指出“抗战的前途”：(1)大部抗战，小部投降；(2)小部抗战，大部投降；(3)由小部抗战再到大部抗战。他假设此三种对峙阶段说，我们力争第一种相持局面，不得已再是第二种，且其前途还有第三种。到此共产党依然以坚持国共合作继续抗战为目标，但在国民党大部投降的情况下，共产党回到内战时期红军的革命根据地的地位，坚持抗战，促使从国民党内部分化出抗战派的这样的方针。并且，毛泽东做出预测：在混乱局面之下，共产党将成为全国人民的救星，中国人民对苏联希望必增加，国际必是一个战争与革命局面，日本与英、美、法的冲突是可能的；不能设想不民主的政府如现政府能够抗战到底，取得最后胜利，“可能出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府(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同上，第213页)。他再进一步提出“当前的任务”：坚持六中全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与三民主义的方针，防止重蹈1927年失败的覆辙；对于投降与反共的意料之外的袭击，共产党、舆论、群众要做好组织上思想上的准备。他又警告蒋介石对共产党存在着敌意，“我们必

---

<sup>①</sup> 英国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1938年9月召开的英、法、德、意参加的慕尼黑会议决定割让苏台德地区给德国，以便使其进攻苏联。共产国际认为英、美、法欲把慕尼黑会谈方式用于远东，使国民党投降于日本，以便使日本进攻苏联。

须严防他及其部下破坏我党”，同时主张，“只要蒋领导抗战一天，我们还是拥护的”（同上，第 220 页），“拥护并帮助并监督并批判国民党与蒋……克服其投降的倾向”（同上，第 232 页）。毛强调：对摩擦要坚决抵抗，决不能过此限度，“自卫的防御的反摩擦斗争之目的，在于巩固国共合作，“统一不忘斗争，斗争不忘统一，二者不可偏废，但以统一为主，摩而不裂”（同上，第 222 页）。

9 月 16 日，毛泽东把中共中央在七七宣言中提出的口号用更简洁的语言来表达：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毛集》第 7 卷，第 55 页）。

我以为，在毛泽东，《论持久战》是抗日战争的总战略，《反投降提纲》是准备其后所能预测到的最坏情势，提示克服最坏情势，重新回到总战略的方法。中国共产党虽然被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所动摇，但由此能够重新树立坚持抗战的态度。而且，可以认为，在此对蒋介石与国民党的两面性进一步深化了认识，为以后毛泽东自己的政权构思作了铺垫。

事实上，1939 年底至 1940 年春，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之际，八路军击退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队。在山西阎锡山的晋绥军（旧军）12 月进攻在晋西的新军（青年抗敌决死队，共产党领导）和八路军，6 日毛泽东指出这是旧军对抗日的叛变，由新军提出“反对叛军”的口号，并给以还击。他抓住阎锡山还没有公开投降反共这一点，主张“在拥阎下反阎”。1940 年 2 月，中共代表带着毛泽东的愿望和平解决摩擦的信件与阎谈判，划定了双方活动区域的分界，保持合作，通过反摩擦斗争恢复了抗日、团结。

另一方面，毛泽东分析国际形势。对于 8 月 23 日苏德订立互不侵犯协定，9 月 1 日他肯定了其积极意义，指出：“打破了张伯伦、达拉第等国际反动资产阶级挑动德苏战争的阴谋，打破了德意日反共集团对于苏联的包围”，“在东方则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增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中国的投降派”（《毛集》第 7 卷，第 9—10 页）。对 9 月 3 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毛泽东 9 月 14 日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到 20 年爆发的“第二次帝国主义战

争”，从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开始为第一阶段，现在进入了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的(1)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统一战线，(2)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统一战线，(3)社会主义的苏联，(4)各个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由这四个部分组成的反法西斯反侵略的统一战线，演变成第二阶段的除去(4)只有(1)(2)(3)组成的“反战争反侵略的统一战线”。而且，他主张：(1)(2)(3)的“革命的统一战线”用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战争，打倒战争祸首，推翻资产阶级，把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从资本主义压迫之下解放出来，从帝国主义战争中解放出来。”“现在的时代就是战争与革命的新时代”(《毛军》第2卷，第478页)。

9月24日，毛泽东对埃德加·斯诺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一道，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完成民族民主革命之后，“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毛文》第2卷，第213页)。国际形势向着打倒资本主义的革命方向发展这种判断，有助于毛泽东的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展望。

#### 第四节 新民主主义、整风运动、联合政府

毛泽东于1944年5月21日《在六届七中全会上的工作报告》(《毛文》第3卷)中，将抗日战争分为三个阶段：(一)1937年至1940年，日本以主力对付国民党，根据地人口近1万万；(二)1941年至1942年日本以主力对付共产党，根据地人口降到不满5000万；(三)1943年至1944年根据地人口上升到8000多万，党员发展到90余万，军队有47万。通过转移统一战线的重点，致力于党的建设，来克服因武装斗争而增大的困难。

这期间毛泽东始终坚持“抗日——民主”这一基轴。在1938年10月以后的战略的相持阶段，他一方面通过“武”即反“摩擦”斗争来阻止国民党从抗日联共向投降反共转变，另一方面通过“文”即《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9日以《新民主主义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为题作演讲，2月刊载于《中国文化》，改换题目后刊登于《解放》)，把“中国向何处

去”这一对新中国的展望交予全国舆论，想要以此来打破“妥协空气和反共声浪”。1936年以后，毛将国民党改造为民族联盟的愿望未能实现，从而将活动的重点转移到促进根据地农民和大后方中间势力觉悟，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国民党施加压力以使其继续坚持抗战、团结、进步。《新民主主义论》是对应持久战第二阶段的第二统一战线论，主张抗日战争的领导者是“国民党或共产党”。

关于历史观，毛泽东根据早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15日)中就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毛集》第7卷，第101页)，“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残余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这就是现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同上，第109页)。他用辩证唯物论的矛盾论来把握中国历史，并在此基础上吸收了斯大林的“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这一历史唯物论的发展阶段论(《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他认为：中国经历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自周秦以来延续了3000多年；鸦片战争以来，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入破坏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同时勾结中国封建残余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把中国变成了殖民地(九一八事变以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说，因此，中国通过“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是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毛集》第7卷，第129页)。据此毛泽东树立了这样一种乐观的历史观，即只要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中国就可以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并发展为社会主义。

《新民主主义论》引用蒋介石在1925年说过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句话，根据斯大林的理论，即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变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一理论，认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在1919年的

五四运动后，从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变成了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同上，第159页）。他把五四运动看做由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文化革命统一战线”，并把这种独特的文化革命史观，作为把民主主义革命分为旧八十年、新二十年的又一论据。

所谓“新”意味着新的领导阶级。毛泽东在政治方面，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极为慎重地表述为：“主要的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一个阶级，而有中国无产阶级参加进去了”（同上，第106页），“已经不是旧的、完全被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参加领导或领导的”（同上，第154页），“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中国资产阶级如能尽此责任，那是谁也不能不佩服他的，而如果不能，这个责任主要的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同上，第162页）。

他说中国新政治力量的代表“主要的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同上，第188页）。这可以理解为：毛依然要求国民党作为第一大党和主力军，担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责任，同时把共产党作为与国民党一起参加领导的合作者加以突出，表明当国民党大部分投降时，由共产党取而代之继续领导抗战。

《新民主主义论》主张，建立与“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的“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欧美）”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苏联）”相区别的、第三种类型的“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继承孙中山主持的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公有，而非少数人可得而私者”的思想。毛泽东将其国家形式定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构成这一战线的阶级，虽然包含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同时又有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的资产阶级，但说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他们不断觉悟，“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与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同上，第163页）。他说，不过，国

家民主化工作尚未着手,而将希望寄托在当时开展的宪政运动上。他还依据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与孙中山的思想,将新民主主义经济看做是由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的国有(“节制资本”)、资本主义的私有、农民的土地所有(“平均地权”)构成的。他并对资产阶级警告说,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的,国际上帝国主义不容许,社会主义不容许,国内要是像1927年那样,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企图自己独占抗日成果的话,就必将被粉碎。毛驳斥奉行三民主义“一个主义”、狂叫“收起”共产主义的顽固派说,共产主义者把包括“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内的新三民主义作为最低纲领,此外还有社会革命的最高纲领,呼吁“还是比赛吧”。

《新民主主义论》文化方面说: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新文化“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与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同上,第190页)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文化思想、新民主主义新文化对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展开了进攻,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空前的民族英雄”,所谓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同上,第192页)。毛泽东主张“无产阶级的领导”,虽然在政治上谨慎地表现,但在文化上却是直截了当,毫无保留。可以认为,毛在政治方面,向国民党施加压力,让它继续抗战,在文化方面,自负地认为,五四运动后至今乃至将来均应由共产党来领导。另外,他将新民主主义文化定性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文化”,意味着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文化的大众化,即:“民众就是革命文化无限丰富的源泉”、人民大众是“文化部队”,“革命的文化工作者是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官”,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同上,第203—204页)。文化的大众化问题为1942年的《文艺讲话》所传承下来并加以展开。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继承孙中山的政治经济思想,继承鲁迅的文化思想,并由此把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历史与现状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在《新民主主义论》的基础上，毛泽东继续对国民党施加压力。1940年3月6日他提出了抗日根据地政权的“三三制”构思，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毛选》第2卷，第742页），3月11日提出“发展进步势力（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争取中间势力（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反对顽固势力（欧美派大资产阶级）”的“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他将大资产阶级与中等资产阶级明确区分开来。9月6日他将大资产阶级规定为“是带买办性的，与外国资本有联系，大银行、大商业及与外国资本联系的大工业属之”，“现时主要当权者，‘如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虞洽卿等，并通知要‘将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大地主与开明绅士加以区别’”（《毛文》第2卷，第298页）。中国共产党将中国资产阶级在国民革命时期分为反动的买办阶级（附属于北洋军阀和外国资本）和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附属于广州国民党政权），在国共内战时期把丧失革命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分为中等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时期又认为包括大资产阶级在内的民族资产阶级重又具有了革命性。但毛泽东改变了这种区分，“把大资产阶级与他们过去一向视为革命对象的买办资产阶级完全视为一体了”（杨奎松，第340—341页）。1941年10月7日，王明向毛泽东说，《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和《新民主主义论》是只要民族资产阶级，这不好，应同大资产阶级、蒋介石把关系搞好，“太‘左’了”（《毛谱》中卷，第330页）。他从反面尖锐地抓住了问题。

1940年6月德军进攻，英军退出欧洲大陆，法国贝当政权投降。毛泽东于6月26日在政治局作报告，分析国际形势，认为因为日德意扩大战争，美英法与之相对抗，所以在中国英美法图谋远东慕尼黑危险不存在了，日本在策动中国投降。他判断：国内形势是由于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和中间势力的抗日积极性，是迫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也不能剿共，总的形势于抗战有利。毛在此基础上作报告，讲述《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7月7日发出），号召把全党变为“团结全国抗日力量的核心”，克服困难，克服投降危险，争取

时局好转(《中央文件》第12册,第420页)。

在此政治方针下,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左权)为打破日军“八月进攻西安,切断西北交通”的计划、阻止国民党投降,于7月20日下令突袭正太(正定—太原)线等日军统治的铁路。8月20日八路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发起百团大战,第一阶段(8月20日至9月10日)破坏铁路;第二阶段(9月22日至10月下旬)攻击铁路沿线的日军和汪精卫军的据点和县城;第三阶段(10月6日至12月上旬)展开反击日、汪军的“扫荡”作战。

此次作战,政治上鼓舞了全国的抗战士气,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威。中共中央评价其为给予友军、大后方和日军占区人民以良好之影响,“给予敌人向重庆等地进攻计划以延缓的作用”(9月10日《中央文件》第12册,第488页)。蒋介石于9月11日致电称赞道“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七十年》第220页)。

不过,百团大战在军事方面虽然第一阶段的作战取得了成功,但第二、第三阶段的损失较大,付出的代价高于日军(《石岛纪之》,第133页),后来日军加强“扫荡”使根据地陷入了困境。彭德怀本人在强调此次作战的意义的同时,在晚年也反省说:由于把日军南进的方向错误地估计为西进,过早发动战役,为求突然打击“不待军委批准”就开始战斗;迫使日军加强了对我华北根据地之进攻;后期又没休整部队,蛮干地指挥,导致出现很多伤亡(《彭述》,第238—239页)。毛泽东虽然知道其胜利并称赞了此次作战,但后来把百团大战的意义限定为“游击性的进攻”、“反‘扫荡’的战役进攻”,后来暗示对战术的批评。

另一方面,国民党为抑制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势力的急速壮大而发生的“摩擦”在各地增加并激化。特别是蒋介石和国民党把华中新四军的发展视为对其战略要地的威胁,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向黄河以北转移。9月27日日德意三国结盟后,毛泽东在10月底认为蒋介石在英美路线和贝当(对日投降)路线之间动摇,11月初判断蒋介石要驱共产党部队于黄河以北,置它于日蒋夹击而中消灭之。中共中央终于下决心,准备以精兵15万进攻国民党后方河南与

甘肃等地，同蒋介石搞最后大决裂（《毛军》第2卷，第569—570页）。但害怕蒋介石对日投降和日本对苏联进攻的共产国际和苏联制止中共，采取要求拥护蒋介石和国民党，打击亲日派，并制止国共冲突的方针（杨奎松，第345—346页）。

1941年1月6—14日，奉国民政府命令北上的新四军八千人，在安徽省南部遭到8万国民党军包围袭击，除一部突围外，几乎全军覆没，军长叶挺被俘（皖南事变。第二次反共高潮）。1月17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下达命令，以进攻抗日军队（国民党军队）的阵地“抗命谋反”等为由，取消新四军番号，罢免军长叶挺，交军法审判。毛泽东因皖南事变改变认识，1月20日任命了新的新四军军部，并提出了包括取消1月17日蒋之命令在内的解决事变的12条办法，决意同国民党“彻底破裂”，“推翻蒋介石的统治”，决定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势，四个月或六个月后转入攻势的方针。1月2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中把皖南事变与蒋的命令看成是自“西安事变以来，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由革命转向反革命的转折点或分水岭”，主张代替反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组织“抗日民主的国政府”，进行抗日战争。不过，中共中央强调，“在蒋介石……没有宣布所谓八路军与共产党叛变以前，我们亦不公开提出反蒋口号”，“对于日蒋间的矛盾，即使是很小，亦须加以利用”（《中央文件》第13册，第26—30页），留下了既可团结也可斗争的余地。

1月下旬，日军发起豫南战役，向国民党军队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促使毛泽东再次改变了看法，认为“军事反共事实上既已终结”，蒋介石求得同共产党妥协办法（《毛军》第2卷，第633—634页），主张“利用日蒋矛盾仍是我们政策中心”，只有“军事守势，政治攻势”才是“只会迫蒋抗日、不妨蒋之抗日”的正确方针（《毛文》第2卷，第329—331页）。中国共产党因为向舆论宣传坚持抗战团结、反对内战的方针，而得到中间势力、国民党内部以及苏、美、英等外国的支持。蒋介石于3月6日在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上，虽然主张军令统一、政令贯彻，将对新四军的制裁正当化，但也“保证”“以后绝无剿共的军事”（《参政会》下卷，第887页），7名中国共产党参政员因抗议皖南事变未

出席会议。

毛泽东在政治上再次确认了中日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国共矛盾为次要矛盾的观点，回到皖南事变以前所推行的包括争取蒋介石在内的抗日、团结、进步的基本方针，要求国民党实行“亲苏、和共（与共产党和解）、改良”，以尽量延缓破裂。不过，他在心理上放弃了与蒋介石国民党“长期合作”、“共同建国”的幻想，将重心转移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府上来。另外，可以认为，毛泽东更加明确地意识到有必要摆脱反对同国民党破裂的共产国际而在思想上独立。

毛泽东提出：依靠“精神和物质，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来解决伴随着1940年至1943年日军大举进攻（“扫荡”作战。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和国民党政府发动三次大规模反人民斗争（“反共高潮”）而来的严重困难（《毛集》第9卷，第282页）。

抗日根据地在政治上实行三三制，要求共产党员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克服“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的错误思想”（《毛集》第8卷，第37—39页）。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经济上确认抗战以来实施的“减租减息”（租额减低原租额25%、不得超过收获总量的37.5%，年利定为10%为最高标准）承认“农民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农救会协助政府实行“减租减息”的法令，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决定》同时承认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一部分开明绅士并是赞成民主改革的，农民将交租交息于地主，借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中共要发挥农民“自动积极性”，组织变工队（劳动互助组织）、合作社来发展生产。它为减轻人民负担，在实行“精兵简政”的同时，开展大生产运动，呼吁军队、机关、学校人员“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让他们从事农业、手工业、工业等生产劳动，衣食住尽量自给自足。同时，它力图通过生产劳动来克服党的干部和军队干部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和军阀主义的作风。

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发起了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整顿干部和党员作风的整风运动，其动机是在于依据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的实际成绩，通过党的建设，克服给中国共产党造成重大损失的王明路线在十年内战后期“左”的错误，和抗日战争时期右的错误，使毛泽东路线在

全党得到公认，确定毛泽东的最高领袖地位<sup>①</sup>，以及对抗日战争开始后入党的占党员人数90%的80万新党员进行思想教育。

整风运动的准备时期(1938年9月至1942年1月)，始自毛泽东在对王明胜利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中国共产党思想独立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将重点放在历史即内战后期和抗战初期党的路线问题上。他在1940年12月25日的党内指示《论政策》(《毛选》第2卷)中，主张应区别土地革命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政策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41年5月19日，在延安干部工作会议上他做《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批判理论和实际相分离的“主观主义”的态度、作风，提倡“有的放矢”(为了要射中国革命这一“的”即目的找“矢”即方法，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使理论和实际运动结合起来)和“实事求是”(研究客观存在着的事物中的规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作风。他具体地提议研究周围环境(敌、我、友三方的动态)，研究近百年的中国史，对于干部的教育，确立以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法为中心。但这个报告“毫无影响”，6月后编了党史文献集《六大以来》，在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1941年9月10日—10月22日)上大家才承认十年内战后期中央领导的错误是路线错误(《毛谱》中卷，第469页)。毛泽东在9月会议上作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确定了整风的基调(9月10日)，并就任中央学习组组长，在各地成立并指导以高级干部为对象的高级学习组(在延安有250人)。

毛泽东在这时候写了《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其中一部是《驳第三次“左倾路线”(节选)》(《毛文》第2卷)，批判当时王明路线的9篇文章。他其中批评：王明路线“不根据于客观实际，而仅仅是根据于主观愿望，胡乱制造出来的”(同上，第345页)自己的路线，造出了评论别人思想的主观主义政治路线和排斥凡不

---

① 有人说，毛泽东是融“道”(思想、理念——毛泽东思想)、“术”(策略、方法——驾驭党员和人民的权谋术数)、“势”(地位、权力——拥有最后决定权的政治领袖、思想导师)于一体的、韩非子的“古代政治术”(高华，第81页)。他尖锐地指出了问题的所在。

合自己胃口的一切人的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因此到处造出了机会主义。毛反对王明路线提出“马克思主义的起码观点”，即通过调查研究客观地存在着的实际情况，把握其内部联系，据此规定行动方针，改造客观情况。另外，他为9月会议起草了《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结论草案》，分析思想方面的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政治方面的过左，军事方面的冒险主义、保守主义（包含拼命主义）、逃跑主义，组织方面的宗派主义等错误，并且将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定位为克服了军事路线、领导方式和干部政策等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毛谱》中卷，第351—352页，这成为1945年4月20日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础）。10月8日，在书记处工作会议上，他将王明在1938年武汉的活动批判为犯了对大资产阶级让步太多的右倾错误。13日王明称病，未出席政治局会议，但传达了他同意毛泽东8日作的结论的意向。

整风运动开展时期（1942年2月至1943年9月）是以毛泽东的两篇报告《整顿党的作风》（2月1日）、《反对党八股》（2月8日）为开端，延安一万多名干部参加。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放在对思想方法、工作作风、表现形式的整顿上，明确表示：打倒敌人要有共产党这样性质的革命党，共产党必须整顿三风（学风、党风、文风），整齐队伍，一致步调。

首先，毛泽东把学风规定为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对待马列主义的态度问题、工作态度问题，从而反对主观主义。他指出“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毛集》第8卷，第68页），一面主张尊重知识分子，反过来又告诫知识分子不要大摆其知识架子、将自己的态度放谦虚一点。他说知识只有生产斗争知识和阶级斗争知识，要求知识分子改造自己，“使一切仅有书本知识的人回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同上，第70页）。他一方面要求理论家“能够真正领会马列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并且应用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同上，第67页）创造“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向客观实际得到了证明的理论”（同上，第71页），强调要抛弃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教条主义。他另

一方面要求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将感性的局部的知识发展成为理性的普遍的知识，教导他们不要犯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的经验主义的错误，劝告工农出身的干部要学习理论，必须首先学习文化基础知识，但认为这两种主观主义中，与经验主义相比教条主义更为危险。他在这里强调“实际”的观点。这是《实践论》的主导，但他关于《实践论》一点也未触及，主张要宣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他也许是回避冒犯当时被视为最高理论的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权威。

其次，毛泽东关于党风，反对宗派主义，一方面对于党内的宗派主义的残余，反对将局部利益、个人利益放在全党利益之上的倾向。他把只以自己所属的部队、地方、工作部门为重，不考虑其他单位的“本位主义”批判为失掉了共产主义的精神，要求如果外来干部、军队工作干部、老干部与本地干部、地方工作干部、新干部的关系如果弄得不好，这个责任主要地应该放在处于领导地位的前者，给予解决，主张坚持“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同上，第76页），使党达到团结统一，以利战斗。他另一方面，对于党外的宗派主义的残余，反对鄙视党外人员倾向，要求共产党员懂得他们与党外人员相比较是少数，“如果不与党外干部、党外人员相互联合，敌人就一定不能打倒”，应该尊重党外人员，和他们合作。他在这里强调“群众”的观点。

毛泽东对于文风，把类似于八股文（明清时期科举考试时采用的对仗形式的文体）的“党八股”即千篇一律的空洞的、使革命精神窒息的文体，批判为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表现形式，要求将文体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以便于群众懂得、相信和付诸行动。他还说“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种东西，都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在我们党内则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同上，第92页），把整顿三风看成是改造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问题。

关于党内斗争，毛泽东否定了十年内战后期“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那种打击同志的做法，提倡“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思想改造的方法。参加整风的党的干部和党员一方面学习党中央规定的22种

文件<sup>①</sup>，另一方面结合学习，检查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

响应毛泽东的整风呼吁，从3月中旬至4月上旬，知识分子踊跃发言（“延安之春”）。其中特别是王实味<sup>②</sup>（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共产党员）的《野百合花》（《解放日报》3月3日等）暴露延安的“黑暗”，批评共产党干部的“等级制度”、“特殊主义”，“衣分三等，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要求上层对知识青年、下层给予“爱”，引起众人的共鸣）。

毛泽东从王实味的文章中感觉到对领导人的敌意和对体制本身的攻击。3月31日，他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对王进行了严厉批驳说，（王等的）“绝对平均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冷嘲、暗箭”的办法是“销蚀剂”，“不利于团结”（《毛文》第2卷，第409—410页）。4月上旬的一天晚上，他读了中共中央研究院的墙报《矢与的》中刊载的王实味的三篇文章后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在矛头从指向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转移到知识分子的右倾、自由主义的情况下，5月召开了文（学）艺（术）座谈会<sup>③</sup>，2日做引言，23日做结论，指出问题，指示了解决的方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把同1943年10月19日发表于《解放日报》的讲话内容大体相同的《毛集》版简称为《文艺讲话》，把注<sup>③</sup>的某作家日记中记载的讲话简称为《笔记讲话》，依据《宇宙的矛盾——人的实践》的基

---

① 毛泽东的上述三篇报告和《〈农村调查〉序言二》、《反对自由主义》、《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合计7篇报告、著作，中共中央的决定、康生、刘少奇、陈云的报告、著作，《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党史简明教程》）结束语，斯大林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斯大林、列宁、季米特洛夫的相关文件。

② 有人尖锐地指出：因为知识分子王实味的平等、博爱的观念，自由、民主的理念，攻击了表现为毛泽东“领袖至上”的观念、中国农民暴动的“论功行赏”传统原则的延安的等级差序制度”。毛和党、军高级干部驳倒王，将其肃清（高华，第328—329页）。他大概把这看做建国后领袖的个人崇拜、个人专断以及共产党的特权阶层化、等级制度同知识分子的自由化、民主化要求之间的矛盾端倪吧。

③ 关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罗钢（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培元（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合著、近藤龙哉翻译的三篇论文：（1）《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历史考察》、（2）《关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版本的历史考察》、（3）《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历史背景的考察》，从1999年至2001年刊载于《野草》第63—68号。罗钢、王培元发现了当时参加座谈会留下详细记录的某作家日记，采访现存的参加者，研究文献，取得优秀的成果。据（1）座谈会上有三种声音：坚持“暴露黑暗”的萧军、丁玲等作家，主张



轴,对《文艺讲话》的骨架可作如下把握:

中华民族为取得抗日战争胜利,解决敌我矛盾,同武装军队(武之战线)一样,以文艺为武器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文化军队(文之战线)也是必不可少的。文艺应该以抗日战争之主体占全体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也就是革命的主力军工人、农民、士兵和革命的同盟者小资产阶级为接受对象。在这里,“第一是为着工农兵,第二才是为着小资产阶级”(《毛集》第8卷,第122页)。文艺工作者应该到文艺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人民生活、群众斗争中去,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剥削压迫的事实(认识),把它组织起来,集中起来,典型化、造成作品(实践),以帮助人民群众觉醒起来,感奋起来,走向团结和斗争,改造环境。文艺专家应该一方面指导向群众普及文艺的工作者,一方面又向他们学习,应该注意墙报、通讯文学、小剧团、歌唱、美术等萌芽状态的大众文艺,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文艺应该向工、农、兵普及,从工农兵的现有的文化水平的基础上、沿着他们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

《文艺讲话》要求文艺工作者作为进行抗日战争的中华民族的一员发挥更大的作用,指示了锻炼自己提高自己的积极的方向。它指出他们不熟悉接受对象工农兵和他们的干部,不懂他们的语言,自己的作品就不会为他们所接受。它要求他们克服自身的“轻视工农兵,脱

---

“歌颂光明”的周扬、何其芳等作家,“从基层和前线回来的文艺工作者”柯仲平、欧阳山尊等。这三种声音“对等平等”地展开“思想交锋,充满民主气氛”。据(2),某作家所记录的《讲话》核心在于“知识分子必须深入到工农兵中去,改造思想感情,转变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关于立场,它只是说“党员有党员的立场”,后来又加了一点“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关于对象即“读者”,它说有1万名干部和学生(准干部),后来“接受对象”又扩展为“工农兵及其党政军干部”。关于文艺和政治,《笔记讲话》说:“文艺工作在党工作内的位置,非超党、超阶级的,而是服从目前具体任务的。《文艺讲话》中的“文艺从属于政治”这一段被推定是为胡乔木加进去的(对于这一问题,胡自己于1991年2月也批评它“有局限性”、“是不通的”。胡乔木,第58页)。“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一处在《笔记讲话》中也没有。据(3),通过王实味等的主张,中央研究院决定整风运动检查委员会由群众选举选出,毛泽东对此抱有强烈的危机感,力图阻止这一方式传播到各机关、学校。4月3日,书记处通过整风由各部门负责人领导的《决定》。从5月2日起,毛召开文艺座谈会,“为下一段对王实味的斗争奠定了思想基础”,从5月27日让中央研究院召开“党的民主与纪律”座谈会,批判王实味。整风运动“使知识分子从原来的‘先锋和桥梁’,一下子沦为‘改造’、‘反省’、‘检讨’的对象”。

离人民大众”(同上,第124页)的缺点,把“自己思想情绪与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情绪打成一片”,把屁股(立足点)从小资产阶级方面转移到工农兵方面,为此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同上,第115—116页),进行自我改造、阶级转移。毛泽东说:我是知识分子出身,开始革命战争后,同工农兵在一起、相互熟悉时从以知识分子为美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转变为以工人农民士兵为美的(无产阶级)的感情,“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他以自己的体验为实例,把成功的武之战线的办法应用于认识混沌的文之战线。毛主张的核心是在于“必须彻底解决个人与群众的关系的问题”(同上,第148页)。

《文艺讲话》在民族论和人民论的层面上总是可以理解的,但关于阶级论层面尚留有疑问。毛泽东一方面把文艺创作活动认为“社会实践”(同上,第137—138页),把文艺工作者的自我改造定位于其中。另外,关于文艺界的统一战线,他承认“小资产阶级文艺家”“比较地倾向于革命,比较地接近于工农兵”,主张“要帮助他们克服缺点,争取他们到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战线上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毛集》第8卷,第136页)。如果那样的话,那么是不是首先应该在抗日民主这一民族的、人民的课题上基本上肯定小资产阶级的主体性和革命性。

但另一方面,他对文艺工作者说,不要“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而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把两个阶段的立场视为绝对对立,要求文艺工作者二者择其一、转变阶级,严厉批判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在这里对于统一战线对象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家,是要求同共产党员同等程度的、或超过其的革命性,这不是无理要求吗?

《结论》之(四)对文艺工作者的“糊涂观念”举了八例,一和二是把“人性论”“人类之爱”论等超阶级的观念依阶级论加以否定,在三、四、五、六中禁止以鲁迅的杂文笔法暴露延安之黑暗,强辩“‘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过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同上,第142页)《笔记讲话》坦言“鲁迅的笔锋,革命的,我们延安便不行。(《野草》第65号,第140页)。

另外,《文艺讲话》说“文艺服从于政治”(《毛集》第8卷,第135页),“(文艺)当然就要服从阶级与党的政治要求,服从一定革命时期的革命任务”(同上,第134页),实际上是要求文艺工作者单方面地服从共产党。它只是领导他们要深入“群众”和“实际”,并未想创造出,处于改造过程中的他们基于自身主体性和实践,再基于“群众”和“实际”,批评共产党的缺点,共产党接受其批评进行自我改造的双向循环。那么,《文艺讲话》不就成了为压制知识分子批评共产党缺点的“紧箍咒”(《西游记》里玄奘法师用来制服孙悟空的咒语能使悟空头上套的金箍缩紧,使他头疼)了吗?笔记《讲话》实际上是说“整风的历史意义为紧箍咒”(《野草》第64号,第123页)。

鲁迅的文学观所具有的结构是立于文学的客观任务表现和自我内在要求这两极,前者是指“为人生”,“要改良这人生”(《我怎么做起小说来》,1933年3月5日。《南腔北调集》),后者是指“好的文学作品,向来多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sup>①</sup>“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革命时代的文学》,1927年4月8日。《而已集》),作家成了“革命人”(同上)、“作家的无产阶级化”(《上海文艺之一瞥》1931年8月12日。《二心集》)这个基轴把这两极结合起来。《文艺讲话》从鲁迅那里继承和发展文学的客观任务的基轴和人的革命化的基轴,但并不能认为集中注意力继承文学家自然而然地内心表现这个基轴。它说“把自己的作品当做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有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王国”(《毛集》第8卷,第122页—123页),依据阶级论彻底否定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它不是由此束缚压抑文学家的主体性吗?可以认为《文艺讲话》作为文艺指导理论在深度和广度上存在不足。

---

① “文章”“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又无益于益知、训诫、致富、弋功名,但以“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为本质之美术之一,“涵养人的神思”、启示“人生之阔机”“人生之诚理”,由此“人乃以几于具足”,另外教人以“自觉、勇猛、发扬、精进”,“(中国等)凡苓落颓唐之邦无不以不耳此教示始。”这种文学观继承文学“不用之用”论(依据《庄子人间世》)之“无用之用”。“摩罗诗力说”1907年。《坟》)。也就是说,正因为文学在不能获得力量、财富、知识等的意义上是无用的东西,故此才有超越那些人生不可缺少的、振奋民族生存的根源的某种作用,像鲁迅这样的文学观在连续着。

《笔记讲话》论断(在日本和国民党军事包围中的根据地)“军心民心巩固或动摇——最基本的问题”(《野草》第65号,第130页)。《文艺讲话》立足于此观点,为了遏制由于文艺工作者内部的、文艺工作者同共产党干部之间的、文艺工作者同工农兵之间的隔阂、分裂而产生的动摇,加强团结,从而提出把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情绪和工农兵的思想情绪打成一片这一新的目标。当然也可以认为,是为处理当前紧急的具体问题所迫而提出的一个紧急的具体的思想政策。

毛泽东的目标是在于将“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的旧文学、旧艺术的“历史的颠倒”“再颠倒过来”(《书信》,第222页),恢复“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本来面目,最终使人民自己成为创造文化的主体。他力图将政治革命扩大、深化为文化革命。

《文艺讲话》促使以农民乐于接受的形式描写新农民形象的“人民文学”诞生。1943年10月20日,党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把它规定为“马列主义的中国化的教科书”。11月7日党中央宣传部做出决定:要发展戏剧(话剧、歌剧)工作与新闻通讯工作,动员与教育群众坚持抗战发展生产。但当时遗留了如何处理知识分子批判共产党政权的缺点这一新的难题。

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以后,在5月27日—6月11日召开的中央研究院“党的民主和纪律”座谈会上,王实味受到批评,10月被党委会开除党籍。同年被戴上(1)“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2)“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3)“反党五人集团成员”等政治罪名,第二年遭逮捕、拘押、审讯。在1947年国民政府军进攻延安,中央机关人员撤离、转移山西的行军途中,王被党中央社会部干部处决。中共对于党员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政权的批评,不是作为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来解决,而是推到敌和我、反革命和革命的政治问题领域加以“解决”的。但是毛泽东在1962年1月批评处决,说王虽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但“不应当杀”(《选读》,第836页),并说是保安机关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毛泽东逝世后,1982年(3)的罪名被否定,1986年(2)的罪名公开平反,1991年公安部复查,纠正(1)的罪名,恢复了王实味的名誉。

全党普遍的整风运动是以党的干部参加学习小组，阅读文件，自我反省的形式，按学风、党风、文风分阶段地展开，1942年6月2日毛泽东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主任，康生任副主任，领导整风。

1942年9月1日，政治局发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决定，强调为了抗战胜利，党领导军队、政府、民众团体等一切组织，在党内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1943年3月20日，政治局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领导整个党工作）主席，书记处（根据政治局方针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工作。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个人。“七大”上朱德和周恩来也被选举）主席，规定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这意味着，毛泽东的政治领袖的地位得以确立（毛泽东于1945年6月19日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8月23日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43年4月3日政治局规定整风运动的任务主要是：一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克服自由主义），二是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审查干部的工作）。中共对后者开展“抢救”（救助沦为特务者）运动，“一年内清出的“特务”曾高达15000多人”（胡乔木，第280页。延安干部是30000人）。毛泽东说不要搞“逼、供、信”，指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7月30日指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sup>①</sup>毛第二年开始道歉，三次说对这次运动的错误负责。

这期间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把群众路线的概念明确规定为“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并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列主义的认识论，或方

---

<sup>①</sup> 又说，从那以后推行恐怖的“群众专政”，强迫坦白，依暴力震慑全党，使全党臣服于毛泽东的威权之下（高华，第579—580页）。

法论”(1943年6月1日,《毛集》第9卷,第27—28页)。

这是把《实践论》提到的处在敌我矛盾中的我的认识、实践过程,更加具体地展开为我之内部的群众和党的认识、实践的循环运动。

此后运动走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期(1943年9月至1945年6月),再次回到历史,即党的路线问题。

毛泽东于1943年10月14日,将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路线概括为以下四个特点:(一)以速胜论反对持久战;(二)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独立自主;(三)军事上反对游击战主张运动战;(四)在组织上闹独立性,不服从中央(《毛谱》中卷,第475页)。

1944年4月12日,政治局对于在1931年初至1934年底的“左”倾路线的态度做出了结论。

这些结论是:(一)避免重犯错误,弄清思想,对于犯过错误的同志应采取宽大的方针,力争团结。(二)“对于任何问题应采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左”倾路线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是错误的,但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党内是没有争论的。(三)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是基本正确的,因为它确定了现时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确定了当时的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批判了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但它亦有缺点,没有指出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四)1931年上海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是合法的,但选举手续不完备。(五)党内的宗派主义经过遵义会议以来的几次变化,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虽然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思想形态的残余存在,但可以通过整风学习克服过来。必须解决党内存在的“山头主义倾向”(《学习和时局》、《毛选》,第3卷)。

如上所述,毛泽东在对“左”倾路线的政治的思想的胜利上拥有自信,并力图实现全党团结。

按毛泽东指示的方向,由任弼时起草、经过毛泽东本人七次修改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历史决议》将王明路线定性为第三次“左”倾路线,批判了其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的错误,并指出其社会根源是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的反映。这是基于《党史简明教程》批判托洛茨基派为“小资产阶级倾向”，把王明路线定位在《实践论》中的“左”翼清谈主义的李立三主义、苏联的托洛茨基主义以及世界各国的超“左”思想这一线上。这样一来，毛泽东就同斯大林一样，坐在批判、克服“左”和右的倾向的正统之位上。中国共产党为了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建设新中国，把毛泽东正式摆在党组织的最高点，力图整顿党员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最大限度地发挥各人的主观能动性（民主），以及统一党员思想，确立“全党服从中央”的严格纪律（集中）。

苏联为了准备对付德国进攻，力图确保东线安全，1941年4月13日，与日本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保证不侵犯满洲国，招致中国人民和政府的反对，恶化了中苏关系。6月22日，德军进攻苏联，第二天，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把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定为“驱逐法西斯日本强盗出中国，即用此援助苏联”（《毛集》第7卷，第333页）。虽说当日本进攻苏联时八路军将准备配合苏军作战，但毛泽东又指出，因为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们采取巩固敌后根据地，实行广泛的游击战争、开展长期斗争的方针（《毛军》第2卷，第650—651页）。他并未采取为保卫苏联而不顾牺牲大规模进攻日军的方针。毛想要确立中国共产党以中国革命为目的坚持抗战，因此援助苏联这一独立自主、相互支援的思想，这才真正是整风运动的动机。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主持修改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宣言”和“指示”，认为“英美及太平洋各国的抗日战争是正义的解放的战争”（《中央文件》第13册，第251页），呼吁结成反日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和军事同盟。中共认为日美战争的开始对中苏两国是有利的，并乐观认为“法西斯阵线的最后失败局面与反法西斯阵线的最后胜利局面已经确定了”（同上，第249页）。毛泽东以积极态度表示，如敌（日本）攻苏联或苏联攻敌，我们即有充分精力配合苏军作战。他将1942年秋，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突破德军包围线视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

(《毛集》第8卷,第172页),增强了胜利的信心。

在国内,1942年5月下旬毛泽东提出缓和国共关系,6月底表示愿同蒋介石一谈,得到蒋的同意,10月派林彪到重庆,和周恩来一起与蒋介石会谈,但是,共产党要求承认在抗日战争中急速扩大的党、军队、根据地、作战区域等的合法地位,而国民党为了统一要求交出共产党的军队和政权,二者的对立未能消除。1943年3月蒋介石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强调在中国国民党统治之下的国家统一,指责共产党是“企图破坏抗战、妨碍统一”的“变相的军阀和新式的封建”的“反革命势力”。共产党认为这暗示国民党要在两年以内消灭共产党,从而提高警惕,6月以后揭露并制止国民党军队进攻陕甘宁边区的计划(第三次反共高潮)。1944年4月至12月在对日军打通大陆南北交通线的作战中(一号作战),国民党军队大溃败,国民党政权威信扫地。

1943年12月,开罗会议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向蒋介石表达了希望国民党与共产党在中国能够组织一个联合政府愿望。1944年6月,访问中国的副总统华莱士劝告蒋介石准共产党参加政府。毛泽东从访问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的外交官谢伟思处得到消息,8月23日,明确表示赞同美国政府关于在中国组织联合政府的提议(杨奎松,第383页)。9月15日,中共代表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作提案,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的联合政府,得到以中国民主同盟为首的大后方舆论的支持。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介入调处国共关系,带着在重庆经国民党修改认可的协定草案飞到延安与共产党谈判。11月10日,他和毛泽东一起在五项草案上签字,其内容为:改组国民政府为联合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为联合军事委员会;由联合政府承认国民党、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等。但是,蒋介石与国民党拒绝这个草案,提出了三项反对提案,着重于允许中国共产党军队加以整编,列为正规国军。以后,两党继续谈判,但终未达成一致。

毛泽东在1945年3月31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对党的第七



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作说明(《七大集》)。他把报告的骨架概括为：“纲领”是“团结全党全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的原则是“放手动员群众”(同上，第97页)，具体的纲领是“联合政府”。并且他说明提出“联合政府”口号的背景在于以下三点：“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大溃退；欧洲一些国家建立联合政府；国民党说我们讲民主不着边际”(同上，第101页)。

关于革命阶段论，他指出：“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蒋介石的)专制主义为第一”，“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强调一下共产主义的无限美妙”(同上，第100页)。

对蒋介石的态度，他说：“批评了他九分，批评很尖锐，但留了余地，有希望，虽占一分不足”。关于联合政府，他估计有了三种可能性：第一种是，“我们交出军队去做(独裁政府的)官”；第二种是，“以蒋介石为首，形式是民主，承认解放区，实质仍是蒋介石的独裁政府”；第三种是，“在我们拥有150万军队，1亿5000万人民时，在蒋介石的力量更加缩小、削弱，无联合可能时”，“以我们为中心”(同上，第102—103页)。毛说，第一种情况下，军队是不交的，但因为可以做宣传工作，所以不要拒绝做官。看来似乎是，他想要目前致力于开辟第二种局面，然后逐渐地过渡到第三种局面。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开幕。4月23日，毛泽东在《开幕词》(《毛集》第9卷)中，将这次大会规定为“打倒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指出现在西方和东方处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前夜。他提出在对日胜利后的任务是：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力争光明前途，反对黑暗前途、即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毛并没有指名批评蒋介石，把共产党的路线与国民党的路线从正面加以比较，请求人民的支持。他说，依靠拥有121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拥有9500万人口、91万军队和220万民兵的解放区，依靠全国人民的援助和世界人民的援助，中国人民是有可能实现这一任务的，还自信地说，“我们的党已经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之重心”。

4月24日，毛泽东向大会提交《论联合政府》书面政治报告（公开刊登于《解放日报》）。

《论联合政府》其内容是：第一，它作为“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主张团结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打败日本侵略者，然后，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政府，建设新中国。第二，它关于“国际形势与国内形势”，乐观地认为国际形势是在英美苏中法五大国的团结下，世界人民将打倒法西斯，建设持久和平的世界，鼓励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对于国内存在的强大的“民族敌人”和“国内反动势力”，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充分地存在。第三，它作为“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把国民党政府压迫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与（共产党的）中国人民觉醒与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相比较，自信地称前者于战争中失败，后者已经成为抗日战争的“主力军”。第四，它“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首先提出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政治是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经济是以“耕者有其田”和“节制资本”为支柱，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与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文化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论联合政府》是与《新民主主义论》相比较，在把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规定为与旧民主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相区别的形态这点上是相同的，在把国民党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国家制度”，视为“完全破产了”而加以否定这点上有所不同。而且，它在说“我们的资本主义太少了”，进一步强调要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上，以及在呼吁“几万万人民的个性解放与个性发展”上有特色。它其次提出具体纲领，包括：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废止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人民的自由，人民的统一，人民的军队，土地改革，发展工业，发展文化教育和尊重知识分子，解放少数民族（组织中华民主共和国联邦），和平、独立、平等、友好的外交政策。

毛泽东在4月24日作口头政治报告，于5月31日作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补充了《论联合政府》。其中我想提醒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是采取继续拥护蒋介石的态度。

毛泽东虽反省认为“我们曾经设想改造国民党(《论新阶段》里讲的党内合作),这件事似曾犯过错误”,“一直到今天还是请他(蒋委员长)洗脸”,“请修改他那个错误政策”(《七大集》,第113-114页),召集“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打电报给(蒋)委员长,请他组织联合政府”(同上,第139页)。另外,他指出抗战初期因为要打日本,就要有个头子,我们说“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下抗战到底”,但是他后来要反共,则“改为要建立一个联合政府,把他那个政府改组一下”,虽没有谈拢的希望,但仍不拒绝跟他谈判,在没有破裂以前还要谈判,极力阻止内战,如果蒋发动内战,“我们党就要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打倒蒋介石”(同上,第222-223页)。毛采取如下的政略和战略:共产党反对内战、独裁,要求和平、民主,在情理上立于优越于国民党之位,得到舆论的同情(“文”),当国民党先发制人发动内战时,共产党以情理之优势取得人民支持,进行抵抗而胜利(“武”)。

第二是为了应付内战,指示夺取东北(满洲)。

毛泽东就国内形势说:要对中国可能变成美国的半殖民地、国内外的大骂、战局不利、爆发内战、散掉若干万党员和党内意见分歧,经济困难等,“准备吃亏”,表现出比《论联合政府》更深刻的危机感。他说“内战越推迟越好,越对我们有利”(同上,第194页),号召努力制止内战,准备蒋介石发动内战。他指示准备转变,“由农村转变到城市,由游击战转变到正规战,由减租减息转变到耕者有其田”。他说:“现在我们的根据地,因为分散,是不巩固的,没有工业就有灭亡的危险”,如果有了东北,“(拥有工业的)大城市和根据地打成一片”,那么,“我们在全国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了”(同上,第219页)。他对日苏战争爆发时便让八路军进军东北做好了精神准备。

第三是更加详细地展开并强调了“个性解放”、“个性发展”。

毛泽东说,“在我们党内,在我们解放区,人民有了比较充分的自由,有独立性和个性”(同上,第223页)。他认为:中国在封建制度下,人民没有人格、自由、独立性、个性,即没有财产所有权,人民为了恢复个性,进行革命斗争,比如组织工会,搞减租减息,建立武装和政权。

另外，他引用了《共产党宣言》中对共产主义的设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主张：每个人不能发展便没有社会发展，党员在服从党纲、党章、决议的大原则下，尽可能地发展人格独立性和自由，发挥能力，发展“创造性的个性”，使党性与个性统一。我想注意把攻击目标集中在国民党的独裁、专制主义、封建的、法西斯主义上，尽可能地把中国的资本主义要素作为朋友，在此战术下，在毛泽东思想变动中出现了最为强调个性和自由的高峰。

《论联合政府》是展望持久战第三阶段和战后的第三统一战线论，是为了在抗战胜利前夜，打败日本侵略者，阻止战后蒋介石发动内战，一边宣传抗日战争中共产党路线优越于国民党路线的一切合理之处，使舆论面临“要么选择国民党，要么选择共产党”，一边也要求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政权。可以理解为毛泽东虽然看透了几乎没有同蒋介石和解的可能性，但仍然努力争取和平，来延缓蒋介石发动内战，以便在内战爆发后可以立于比蒋介石更有利之地。

毛泽东在6月11日大会闭幕词中，讲到“愚公移山”的故事：从前愚公想挖掉太行、王屋两座大山，每天挖山不止，上帝为此而感动，派两位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中国共产党也要挖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即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上帝即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如果为此感动，一齐起来同我们一起挖，就一定能挖走这两座山。看来似乎是古代的天与现代的人民在毛泽东那里是融合在一起了。

同日，大会还通过了作为《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总纲》，其中明确写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中央文件》第15册，第115页）。这意味着，毛泽东的思想导师的地位得以确立。

8月9日，毛泽东从抗日战争主体的中国人民的立场出发，发表表示欢迎的声明，指出苏联宣布对日作战，使得“对日作战时间将大大缩短”，称“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新阶段已经到来了”，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反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

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毛集》第9卷，第305—306页）。看来，他判断从《论持久战》的第二阶段过渡到第三阶段，即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已经到来。

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发布投降诏书，日军停止战斗，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 第四章 人民的解放——人民 解放战争(1945—1949)

中国共产党为了拯救民族危亡而参加抗日战争,与国民政府和其军队向内地后退相反,反而向日军背后渗透,领导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开辟广大的解放区(抗日根据地),扩大军队,继续开展游击战。中共在大后方(国民党政权统治的西北、西南地区),坚持统一战线要求建立联合政府,赢得舆论支持,进而发展成为一大政治势力。毛泽东论断了国民党政府压迫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是失败的,(共产党的)中国人民觉醒与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是成功的。他强烈主张,抗日、民主的主力 and 模范的解放区 1 亿人民、120 万人的军队和 120 万人的共产党,应该成为和平、民主的主力 and 模范,登上战后中国的政治舞台。

毛泽东和共产党起初同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进行谈判,达成“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协议。后来蒋撕毁协议,全面进攻解放区,中共对来犯的国民政府军(以下简称“国民党军”)实行战略防御,提出反内战、反独裁,要求恢复民主。最后中共转变为战略进攻,实行土地改革,宣布“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将战争、革命进行到底。但它追究以蒋介石为首的战犯挑起内战的责任,保持和平、民主的目的。

这一时期,毛泽东主要是以“论联合政府”为政治指导,以“论持久战”为军事指导,除“中间地带论”以外并未提出新的理论。他站在通过整风运动和党的第七次大会构筑起来的、以毛泽东即政治领袖兼思想导师为顶点的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统一之上,接受各地有才干

的领导人源于具体实践的信息和建议，一边充实全国的总战略，一边发出大胆且细心的个别指示，指挥党和军队，运用自如，赢得胜利。在这样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中，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才干和军事才干。那时是毛的理论在丰富实践中结出果实的时期。

## 第一节 从“和平、民主的新阶段”到自卫战争

关于“和平、民主的新阶段”，毛泽东实践《论联合政府》的政略和战略，应付和平和战争两种情况，一面向蒋介石要求建立联合政府，用此阻止内战，一面在东北建立根据地，准备内战。

1945年8月10日，接到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消息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命令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命令，迫使日伪军（傀儡军。日军或亲日政权组织的、协助日军的军队）投降缴械，接收其所占地区，11日命令一部分部队向东北进军。8月11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决定，要求迫使敌伪向我投降，扩大解放区，夺取武器和资源，武装基层群众，提高我军战斗力，作好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精神准备。八路军拒绝11日蒋介石发出的“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的命令，向敌占区进击。

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讲演，论断“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毛选》第4卷，第1130页）。看来他根据矛盾论的原理，认为民族矛盾降到次要矛盾，国内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吧。他指出：正是因为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同大部分的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的战斗，应该取得抗战胜利的果实；要阻止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蒋介石想篡夺这一果实、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不要像1927年陈独秀，对蒋介石的突然袭击不进行斗争，失掉人民取得的胜利果实。16日，毛以朱德的名义致电蒋介石，要求制止内战，废止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8月14日和20日，蒋介石致电邀请毛泽东来重庆“共同商讨”国际国内重要问题。中共中央认为这“完全是欺骗”，是为发动内战作舆论准备。但是，21日或22日斯大林发来电报，要毛泽东赴重庆进

行谈判说：日本投降，国共应言归于好，共商建国大事。如果继续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毛谱》下卷，第13页）。22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改变方针，向各级党委、各军区发出指示：由于苏联不可能援助我们，蒋介石接收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我军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扩大农村；美苏均不赞成中国打内战，我党在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下准备同国民党谈判。

8月2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分析形势说：中国和世界已经进入了和平建设阶段，第三次世界大战目前不会爆发，中国人民和苏美英都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所以“内战是可以避免和必须避免的”，提出继承抗日战争的“抗战、团结、进步”精神与“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他自信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的功劳，蒋介石不能抹杀，全国人民对此有高度的评价。关于向国民政府提出的《目前紧急要求》14条的第1条“承认中国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他说“以斗争达到团结”。毛设想现在在全国范围内成立的联合政府会是“资产阶级（国民党）领导的而有无产阶级（共产党）参加的政府”、“独裁加若干民主的政府”，目标在于共产党更成熟，人民更觉悟，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学会利用国会讲坛作合法斗争，教育全国人民，锻炼共产党。而且，他提醒谈判如果不成功，国民党进攻的话，我们应该打，必须打胜仗（《毛文》第4卷，第4—12页）。

8月24日，毛泽东对23日蒋介石的第三次邀请，复电说：“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之大计”，表示接受。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主张“在抗日战争中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与牺牲”的解放区1万万人民，“也应继续作为全国民主建设的模范与和平团结的中坚，而尽其伟大的任务”，将“十四条要求”整理为以下6条“紧急措施”，要求国民政府实施。（1）承认解放区政府和军队，避免内战。（2）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3）严惩汉奸，解散伪军。（4）整编军队，办理复员，减轻赋税。（5）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取消妨害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6）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制定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民主的联



合政府，筹备普选的国民大会。然后中共声明，愿意与国民党及其他民主党派，求得协议，以期解决紧急问题，并长期团结一致，“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中央文件》第15册）。同抗日战争一样，在和平建国时期，中国共产党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共同目标，要同国民党合作、比赛，掌握主动权，加强自身的力量。

8月26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发言说：“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涉四个条件，这次去重庆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毛文》第4卷，第16页）。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同美国大使赫尔利，同乘大使专机抵达重庆。蒋介石表明“承认解放区，绝对行不通”（9月4日），蒋围绕军队和政权问题，同毛泽东争执（9月17日），蒋要求中共放弃军队和解放区，毛泽东表示不能同意（10月9日），基本对立并未消除。赫尔利要求中共交出军队和解放区，要么承认蒋介石的要求，要么破裂，面对这一逼迫，毛泽东回答不承认也不决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我虽然赞成军队国家化，但前提是国家民主化（9月21日）。

中国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王若飞谈判。谈判的结果，10月10日达成协议并签署《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定》，《中央文件》第15册）。《会谈纪要》由周恩来起草，采纳国民政府代表的意见进行修正而成的。邀请中共谈判的国民政府没有准备谈判方案，因此只好由中共方面先提出意见，进行讨论。《会谈纪要》的总论“一、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阐明“一致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业已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双方又认同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同上，第326页）。毛泽东的观点在这里得到大幅度的发挥。在其分论如二、政治民主化（结束训政，实施宪政。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问题）；四、人民自由；五、党派平等合法；

六、严禁特务机关；七、释放政治犯；八、地方自治等，关于政治问题的一般原则上达成共识。但是，在有关需要交涉的军事问题和政权问题的具体政策上，如三、国民大会（重选代表、延缓国民大会召开日期及修改组织法、选举法和宪法草案）；九、军队国家化；十、解放区地方政府；十一、奸伪；十二、受降等，国民政府不认可中共方面的主张，将双方观点一并记入，继续审议。中共方面提出将 100 万抗日军队缩编至 24 个师至少 20 个师，并将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等中和华南的 8 个地区抗日军队着手复员，想使华北和东北解放区的合法地位得到承认，但是国民政府并不接受。可以说，中共取得了政治民主化和党派平等合法的“名”，而国民政府对军队国家化的“实”却不肯让步。

10 月 11 日，毛泽东返回延安，在政治局会议上报告谈判的经过，就《会谈纪要》列举两大好处：第一、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第二、达成一致的 6 条，都是有益于中国人民的。12 日，他起草中共中央的指示，指出：“和平基本方针虽已奠定，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仍不可避免”，对国民党军的进攻“必须提起充分注意，战胜这些进攻”。17 日，他在延安干部会议做报告时讲，“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毛选》第 4 卷，第 1159 页）。这些都被以后发展的历史所证实。

10 月 20 日，关于和平建设过渡阶段的形势和任务，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指示（《毛文》第 4 卷）。指示指出：目前开始的 6 个月左右期间，是“抗日阶段转变至和平建设阶段的过渡期间”，中共的任务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以下简称“国统区”。重庆、南京、上海、北平等）扩大民族统一战线，在解放区对国民党军的进攻进行自卫和扩大解放区，为此创建野战军。指示提出明确的方针：通过打败进攻华北和东北的国民党军，迫使他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地位，然后两党妥协下来，转到和平发展的新时期，就是“以斗争之手段达到团结之目的”。毛泽东想要运用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种方法，来实现《八十

协定》规定的和平、民主、团结、统一。

中共军在接收日军伪军所占地区扩大解放区的同时，对企图控制华北、东北向解放区进攻的国民党军进行反击，10月到11月在平绥（北平—绥远）路、同蒲（大同一蒲州）路、平汉（北平—汉口）路各铁路线都取得胜利。

为了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保卫解放区，争取和平，毛泽东起草党内指示，强调减租和生产，特别是要在新解放区解放农民将其作为革命战争的主体，减租不是“政府恩赐的”，必须是“群众斗争”的结果（11月7日）。另一个指示要求“使广大群众，在此（减租减息）运动中翻过身来，并组织起来，成为解放区自觉的主人翁”（12月15日《毛选》第4卷，第1175页）。同时毛提醒使地主还能生活。他同样要求，使工人等取得增加工资和待遇的利益，同时使工商资本家还有利可图。可见，毛谋求把武装斗争与统一战线结合起来。

此后把“军队国家化”作为首要目标的国民政府，与把“政治民主化”作为首要目标的共产党之间，继续进行着论战。12月18日，周恩来讲：中共反对国民党一部分人所提的第一方案，就是“先将军队交给政府，再由政府给一点民主（政府用请客方式，请几个人去参加政府）”；国民政府不赞成中共提出的第二方案，就是“把政府改组为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人士参加的民主合作的政府，再由这个政府去统一全国的军队”；毛泽东提出第三方案，就是“政治民主化做一些，军队国家化做一些，两者平行，逐渐达到一个民主宪法的政府”，对此在原则上国民政府已经同意，但在作法上意见并不一致（《政协》上卷，第53页）。蒋介石在1946年元旦的《广播演说》中写道：“军令政令的必须统一”，“参加政府的各党派不能拥有其自主的军队来作政争的工具”，“全国军队必须统辖于国家，听命于政府”（《蒋集》第2册，第2213页），强调“军队国家化”来给中共施加压力。对此，中共在1月7日的《解放日报》社论中主张：通过政治协商会议来“停止内战，结束一党专政，改组国民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对蒋反驳说：“民主是因，统一是果”，“政治民主化是因，军队国家化是果”（《政协》上卷，第27、37页）。可以认为，中共希望在用第二方案抵制第一方案的过程中，实现

第三方案。

1945年12月19日，周恩来向国民党代表表示：中共希望在政协开幕前停止内战。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国共停止敌对行动，并派遣特使马歇尔前往调停。27日，美、英、苏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也要求停止中国内战。1946年1月5日，政府代表和中共代表拟定《关于停止军事冲突之协议》。10日，公布停战命令（政府代表和中共代表《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商定办法，会同声明》）。13日，双方停上了军事行动。从1月10日到31日，召开了由国民政府召集、由8名国民党员、7名共产党员、5名青年党员、9名民主同盟成员、9名无党无派组成的政府协商会议（以下简称“政协”），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案等5项协议。

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对政协协议非常乐观，指出：“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一次伟大的胜利。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与议会斗争”（《中央文件》第16册，第62—63页）。毛泽东认为这是“很大的胜利”。他同意选出中共方面的5人为宪草审议委员、8人为国民政府委员（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和刘少奇）、4人分任行政院副院长（副总理）、部长。当时，苏联大使劝告中共，应当准备学习法国的经验，把主要工作转移到争取群众方面来（就是说，放弃武装斗争，走合法的议会的道路。杨奎松，第422—423页）。

但是，2月12日，政治局讨论马歇尔提出的“整军（整编军队）方案”时，毛泽东表示：美蒋要以‘统一’来消灭我们，我们要用一切可能逃脱被消灭；全国军队统一，原则上我们只好赞成，实行步骤要看具体情况，这是我们与法国不同的。另外，他还主张扫除以军队国家化来换取国家民主化的思想（同上，第427页）。但中共此后也继续进行谈判。2月25日，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三人军事小组签署了《整军方案》，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继续“边打边谈”。

另一方面，国民党利用特务和暴徒，破坏2月在重庆各团体举行

的庆祝政协成功大会，闯入北平的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办公室，3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决议，推翻宪法草案修改原则等政协决议案。毛泽东将蒋介石规定为“资产阶级中派”说：他的主张有两条，第一条是“一切革命党全部消灭之”，第二条是“如果一时不能消灭，则暂时保留，以待将来消灭之”（《毛文》第4卷，第97页），并主张要迫使蒋介石和中共妥协合作。

在东北，在苏军进攻时，中共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余部协助苏军，关内的中共军迅速进入东北，1945年10月底，组成以林彪为总司令的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1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扩大控制地区，增加兵力。但是，11月，国民党军突破山海关中共军阵地，进入东北。由于苏军采取给国民党军交还长春铁路沿线和大城市的方针，所以中共军队采取“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向后撤退，向东满、西满、南满和北满分散。

毛泽东12月2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在东北代表党中央的中央局）的指示，指出：要正视国民党在东北一定时期内将强过共产党的事实，要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农村建立根据地，努力做群众工作，花三四年时间积蓄力量。所谓群众工作，就是发动人民进行清算汉奸罪恶的斗争、减租和增加工资运动、生产运动，在这些斗争当中，组织群众团体，建立党，建立群众的武装和人民的政权，把群众斗争从经济斗争提高到政治斗争，参加根据地的建设。他想要继承湖南农民运动、苏维埃革命以来的工作方法，通过使人民反抗压迫、解放自己、组织新团体，产生出革命战争的原动力。另外，指示指出：应当注意对于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工作，争取工人和知识分子，吸引他们参加军队和根据地的建设工作（《毛选》第4卷，第1179-1183页）。

1946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对东北问题主张：现在国民政府是接收东北的机构，国民党一党包办，因此应该改组它，尽量吸收东北民主人士与国内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应承认东北现有抗日民主部队，避免军事冲突；应承认东北各县的民主自治政权；应限制国民党军的数量；应禁止利用伪军接收东北。这与要求承认关内解

放区军队和政权具有同样的性质。但是，国民政府仰仗美军从海上输送的大军，强行武力接收东北，挑起了内战。东北民主联军在苏军撤退后，占领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但国民党军5月22日占领长春，北上打到松花江南岸，6月停战后才停止北上。东北民主联军得以确保哈尔滨，在北满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毛泽东从4月22日开始重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特别在“第一章 阶级社会与国家”的“(暴力)革命才能消灭资产阶级国家”的一句画了最多圈，杠杠画得最粗。为贯彻打倒蒋介石政权的革命斗争，他吸收了理论的力量(逢先知,第26—27页)。

毛泽东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实践《论持久战》的战略，就是敌强我弱，首先对敌人的进攻我方一边抵抗一边后退，待我由弱变强，最后我方反攻并取得胜利的理论。但这与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相比较有所不同，就是并没有中间战略的相持阶段，实行“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进攻”这一两个阶段。

国府军占领长春，使得中国共产党决心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战争。5月28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蒋自进长春后，在全国更积极备战”，“现内战已临全面化边缘”。2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各军区首长电，指出：“国民党在东北扩大战争，在关内积极准备对我大举进攻，因此我应有对敌作战之充分准备。”另外，作为对国民党占领东北和关内大小城镇的报复，6月7日至16日，军委令山东军区部队占领由伪军控制的大小城镇。

6月17日，蒋介石经由马歇尔向中共提出强硬、苛刻的停战条件，即要中共退出热河、察哈尔两省、山东的烟台和威海、东北的哈尔滨、安东、通化、牡丹江和白城子以及6月7日以来占领的山东的大小城镇。25日，蒋又要求中共退出胶济(胶州—济南)铁路沿线、苏北以及6月7日以来占领的山西、河北的大小城镇。

6月19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致华北各军区首长电，指出：判断蒋介石准备大打，“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我大打必须在蒋大打之后，以

示衅由彼启”（《毛文》第4卷，第121—122页）。22日，他为中央起草至东北局等电，指出：7月初蒋向东北及全国进攻。毛明确提出先让敌人进攻，然后我方再反击取胜（“后发制人”），恢复和平的政略和战略。另外，他命令山东、太行、晋冀鲁豫、晋察冀各军区，乘蒋军全力向北之际，猛扑其后背，通过运动战大举歼灭敌人（杨奎松，第440页）。他想通过关内的战争来支援东北的战争。毛泽东预测蒋介石会在停战后的7月初开始全面内战，但是早在6月26日，国民党军就向半年包围的鄂东豫南的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中原军区部队一部向东突围，主力分北路和南路向西突围。这成为全面内战的起点，7月至10月，国民党军向华东（江苏、安徽、山东）、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绥远即现内蒙古）、东北的各解放区发动进攻。

开战时国民党军的总兵力为430万人（正规军200万人），中共军的总兵力为127万人（正规军61万人），兵员比例大约是3.4：1。国民党军拥有美械和日械装备，及飞机、海军舰艇、坦克、炮兵，而中共军依靠在战场上缴获的步兵武器，两者之间的技术水平差距比兵力差距更大。国民政府与共产党的控制地区的比率为76：24，人口比率为71：29，拥有大城市、交通干线和现代工业的前者，与在这些方面几乎为零的后者之间的差距，更是悬殊（《毛传》，第764—765页）。

6月28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发出通报，将日本投降后10个月的解放区的变化概括为：地区扩大了2倍至3倍，创造了东北战略区域，人口（由实数5000万）增加到2倍半的1亿3000万，军队主力由分散变为集中，开始能攻城能守城，通过解决土地问题巩固根据地。没有了日本人，代替日本人位置的、依靠美国支援的中国反动军队比日军战斗力要差（《中央文件》第16册）。就是说：我方力量比抗日战争时期增强了，与敌人的差距缩小了。据此毛泽东探索适应新的情况的新的作战方针。

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为‘七七’九周年纪念宣言》，严厉批判“中国反动派”的卖国、内战、独裁政策以及支持中国反动派的美国反动派，提出独立、和平、民主的口号。中共为了实现中国的独立、和平、民主，作紧急呼吁：一、停止冲突，二、重开政治协商会议、改组国

民党一党专政政府成为民主联合政府，三、实行复员裁兵，美军撤退，四、美国政府停止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宣言》高举从全面内战恢复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达成一致的和平民主这一目标，请求全国舆论的支持。另一方面，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和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电，注意尊重国民政府和美国的代表，拉拢美国一切人员（7月6日）。由此可见，毛仍然追求通过国、共、美的谈判来停止内战的可能性。

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7月20日）、和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党内指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9月16日）中，扼要地阐述了以自卫战争来粉碎国府军向解放区的进攻、恢复和平的军事方针和政治方针。

毛首先掌握了国共双方的长处与弱点：“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得出“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的结论（《毛选》第4卷，第1187页）。他想要把敌人的武器优势要用我方的人心、人力的优势来克服（“人民”理想主义。战略上“以一当十”）。

关于自卫战争的政治方针，毛提醒党员和解放区人民要理解，为了进行运动战取得最后胜利，必须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另外，他还强调“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以及“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两点。关于农村问题，他一方面讲，“应坚定地解决土地问题，紧紧依靠雇农、贫农，团结中农”，想要使其成为参加、支援武装斗争的主体。他另一方面说，在解决土地问题之际，对一般富农、中小地主分子要放宽些，对汉奸、豪绅、恶霸分子要放严些，力图吸收更多的富农、地主到统一战线中来，减少敌对分子，巩固解放区（1946年5月4日的党内文件《五四指示》拥护农民群众在反对汉奸、清算、减租、减息的斗争中，自然发生地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也举出“没收和分配大汉奸土地”和“减租以后，地主自愿出卖土地，佃农以优先权买得此种土地”这两种方式，还没有到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阶段）。关于城市问题，毛主张团结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一切进步分子，也团结一切中间分子，孤立反动派，要求争取国民党



军队内部一切可以反对内战的人，孤立好战分子。他致力于将主力军与同盟军、武装斗争与统一战线、农村与城市等矛盾的两方面并存、均衡并结合起来。

关于经济方针，毛要求作持久打算，指示：要依靠节约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力戒浪费，检查和纠正贪污现象，努力生产，必需品特别是粮食和布匹的自给等“自力更生”，在满足自卫战争需要的同时，改善人民的生活。

关于军事方针，毛要求有别于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主、打运动战为辅的抗日战争，而应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打游击战为辅。就是说，当敌人分几路向我军前进时，“我军必须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即集中6倍、或5倍、或4倍于敌的兵力、至少也要有3倍于敌的兵力，于适当时机，首先保证歼击敌军的一个旅（或团）”（同上，第1197页）。这个旅（或团）应当是敌军中较弱的（“实际”现实主义。战术上“以十当一”）。该战术的长处在于全歼和速决，主要目标放在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不放在保守或夺取地方上。他指示在主力集中歼敌时，必须同地方兵团、游击队和民兵的积极活动，互相配合。歼灭包括击毙、击伤和俘虏三层意思，俘虏国民党军异常之多，通过教育其中大部分兵士，可转变成为中共军的兵士，这是人民解放战争的特征（后面叙述）。

另一方面，怎样处理从1945年到1946年由合作转向对立的美苏关系，与中共军反对国民党军进攻的自卫战争之间的关系，也是个重大问题。从大战末期到战后，美国将国民政府的统治作为前提，支持其进行的民主化。苏联基本上与美国同一步调，赞同马歇尔调处国共关系，劝告中共中央学习法国的道路。这实际上意味着，赞同将武装抵抗组织整编成正规国军，共产党人参加新政府做内阁部长。苏共认为中共没有打倒蒋介石政权的力量。1945年11月以后，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进入东北，苏联在警戒美国插手东北的同时，担心自己卷入中国内战，同美国发生冲突，要求中共不要在美军附近作战，不要给美蒋以口实，使苏联陷入困境。由于1946年初美苏关系开始恶化，苏联想确保东北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对美蒋采取强硬态度，支持中共

扩大势力,认为国共战争对本国有利。剩下的问题只是“国共内战是否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杨奎松,第439页)。

1946年4月,毛泽东将1945年8月23日作出的目前不能有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内战是可以避免这一判断修改为:“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他指出:有美、英、法同苏联妥协,扩大通商贸易关系的可能,但这种妥协只能是世界民主力量向反动力量斗争的结果,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不需要实行国内的妥协,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毛选》第4卷,第1184—1185页)。毛确立了这样一种观点:比起同大国妥协还是决裂来,世界人民对反动力量的斗争能否胜利,才是决定和平还是战争的根本。

8月6日,毛泽东对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进一步发挥了这一观点,指出:所谓美苏战争只不过是美国反动派用以掩盖美国人民和美国反动派之间的矛盾,美国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其他国家间的矛盾的“烟幕”。美国反动派要和苏联打起来,首先必须进攻美国人民,实行法西斯主义,接着来的,以反苏的恐怖为借口,控制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日本、中国、半个朝鲜、南太平洋、大英帝国等,后来所说的“中间地带”)。他论断:美国人民应该联合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进攻,只有这个斗争的胜利,才能遏阻第三次世界大战。

毛泽东认为,日本帝国主义以反苏为借口,首先进攻日本人民,实行法西斯主义,其次进攻中国,中国人民以持久战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用此阻止其对苏联的进攻。毛将这一抗日战争的经验应用于战后的世界。根据这个后来所谓“中间地带论”,毛主张正是由于中国人民抵抗美帝国主义和美国走狗国民党军的进攻,取得胜利,才得以阻止美苏战争即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说,他打破了以美苏对立的视角来看世界、把国共内战视为其中的一部分的观念,即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存在的依靠大国的自上而下的从属的思想,树立了中国人民立足于自己的根据地,成为认识并解决世界矛盾的主体这样一种自下而上

的独立自主的思想。而且,毛由此,一方面要粉碎蒋介石将国共内战扩大到美苏战争的妄想,另一方面要说服斯大林:中国革命不会发展到美苏战争,这对苏联的对美交锋有利。

毛泽东显示出不畏惧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的气概,指出:“原子弹只是一只纸老虎(paper tiger)……看起来是可怕的,但不像人们设想的那么强有力。往远看,真正的力量不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的。”同看起来强有力却被打倒的沙皇、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帝国主义一样,美国反动派与中国反动派也是纸老虎,“我们中国共产党只有小米加步枪,但最后将被证明,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大炮强大”。“最后一切反动派必定失败,我们一定胜利”(《毛集》第10卷,第53—55页)。

反抗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侵略、压迫的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才是阻止世界战争的原动力,这一思想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的理论基础。

关于战争指挥,毛泽东指示了如下作战计划:在华北的“南线”,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攻取豫东,陈毅指挥的山东军区部队攻取津浦(天津—浦口)路的徐州蚌埠之间(6月22日毛泽东电报。下简称“毛电”),粟裕、谭震林指挥的华中野战军占领津浦(天津—浦口)路的蚌埠、浦口之间(6月24日毛电),分别出击,在野战中消灭敌军有生力量,进而南下至大别山、安庆、浦口之线,掩护李先念、郑位三指挥的中原军区部队突破包围,将着重向北的国民党军抛在北面,使其处于被动(passivity)地位。但在收到了各地国民党军要大规模进攻各解放区的情报后,毛泽东先后接受粟裕、陈毅等人的建议,将中共军的战略转变为: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7月4日毛电)。中共军于7月中旬至8月下旬在苏中、9月初在鲁西南,大胜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

毛泽东向华北“北线”贺龙指挥的晋绥野战军(6月25日毛电)、聂荣臻、萧克指挥的晋察冀野战军和程子华指挥的冀热(热河。现在的河北)辽军区部队指示作战计划:要在国民党大打后,保卫地方与夺取三路(平汉、正太、同蒲)四城(保定、石门〔石家庄〕、太原、大同。6

月 28 日毛电)。但此后中共军不能攻占大同,国民党军占领集宁,从集宁和北平两面夹击张家口,聂荣臻、萧克提出不可坚守张家口、要歼灭由北平西犯之敌的建议。毛泽东批准建议,指示:“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准许其做出放弃张家口的准备(9月18日毛电)。

在延安的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根据全国总战略,指示各地区的个别战略,当地首长再在依此实践的过程中提出不同意见,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灵活地接受这些意见,调整各地区的战略,同时修改全国的总战略。这种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循环有效地发挥,延迟了进攻国统区的外线作战方案的实施。毛泽东提出的新战略,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首先要依据解放区的有利条件,实行内线作战,主动(initiative)地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集中兵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逐渐缩小敌我之间的力量差距(《毛传》,第 770—777 页)。

10月1日,毛泽东起草党内指示《三个月总结》(《毛选》第4卷),自豪地讲,3个月的作战业已证明,7月20日的“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此项断语是正确的。他说:蒋介石除了无法克服政治上经济上的基本矛盾以外,在军事上战线太广与兵力不足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正规军的190个旅(一个旅约8000人)之中的25个旅在3个月内已被歼灭,剩下的有半数不得不负责守备,野战军的兵力在逐渐减少。他展望通向胜利的前景:如果在今后的3个月中再歼敌25个旅的话,就可能停止蒋军的进攻,并可能部分地收复失地,夺取战略上的主动,由防御转入进攻。如果歼敌第三个25个旅的话,就可以收复大部至全部失地,并可以扩大解放区。那时国共军力的对比,必起重大变化。实际上,截止到全面内战爆发一年后的1947年6月,中共军以平均每个月8个旅的速度,歼灭国民党军正规军97个半旅78万人,包括杂部共计112万人,转入了战略进攻。可以说毛泽东的预见是非常准确的。

毛泽东高度评价:中原军区部队突破包围,在陕南、鄂西坚持游击战争,支援老解放区的作战;在关内的作战牵制了蒋介石原拟调赴东北的主力部队,使东北的中共军得到休整军队和发动群众的时间;

歼灭了为数不少的伪军、保安队、交通警察部队等国民党军非正规军。此外，他还提出，扩大兵员和军事训练、发展生产、解决土地问题、地方部队坚持游击战等强了解放区的政策，指出国统区群众斗争的发展，和世界各国人民民主斗争的高涨这一有利条件，激励人们要有必胜的信心，争取军事形势的根本转变。

1946年7月至10月，中共军歼灭国民党军正规军23个旅、包括非正规军在内总数达30万人，其中起义被俘的和毙伤的各占一半，大部分俘虏参加中共军。中共军损失12万人，其中负伤的有八成，其中八成人治愈后又回到部队（《毛传》，第777页）。如果在这个数字上加上日后所说的俘虏士兵有九成参加中共军的数字，中共军反而增加了9万人。由于国民党军不想将3000中共军俘虏补入自己的部队，很少有伤愈归队的，国民党军就减少了30万人。像这样有生战斗力的减少与增加，是国共战斗力差距逆转的最大原因。<sup>①</sup>可以说，人民解放战争是占人口的大多数的中国农民换穿军服，从国民政府军转向人民解放军（中共军）来决定胜负的战争。

这期间，国民党军占领了解放区县以上城市153座，中共军收复了48座县城，解放区大幅度地缩小。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致使国共和平谈判完全破裂。根据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的指示，9月30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致函蒋介石，声明：“如果国民党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解放区的中心之一）及其周围的一切军事行动，中共不能不认为国民党业已公然宣告全面破裂，并已最后放弃政治解决的方针”（《周谱前》，第649页）。但是，10月11日国民党军还是占领了张家口。尽管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国民大会决议案，承认国民大会召集日期为政协决议事项，同意召开各党派参加的团结的国大这一精神，但当天国民党却单独决定、宣布11月召开国民大会。中共中央要求根据停战协定恢复1月13日国共双方军事位置，将实行政协一切决议为政治商谈的准则，反对这个一党召开的分裂的“国大”，

---

<sup>①</sup> 毛泽东1948年1月15日就200万俘虏士兵、8万俘虏军官一事说到：“……国民党士兵，一个不杀，其中大部分可以参加我们的部队，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国民党军官，经过改造可以为我们所用。”因此要进一步提高估算由俘虏带来的中共军的增加率。

拒绝交出参加“国大”的名单。民主同盟也拒绝参加。尽管如此，国民政府还是于11月15日召开国民大会，并于12月下旬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发表声明：“现在开幕的一党‘国大’会”，“最后破坏了政协以来的一切决议、停战协定与整军方案，隔断了政协以来和平商谈的道路”。周随即将董必武等少数代表留在南京，自己率领中共代表团返回延安。毛泽东坚定了以战争手段打倒蒋介石的决心，11月1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发给各中央局的指示中，指出“蒋介石自走绝路”，代替自卫战争第一次使用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名称。

11月21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召开了三人会议（中共中央会议）。周恩来说：谈判虽然决裂了，但收获甚大，“使党的和平民主方针，与蒋的独裁内战方针，被群众所认识”，我们的方针是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而以武装斗争为根本。毛泽东赞扬了中共代表团一年来的工作，说“谈判主要是为了教育人民”，“代表团不能早回来，一定要在开‘国大’以后，这样战争与分裂的责任才清楚，才不致失去人心。打起仗来，人心如不属我，我就输了”。他说：“现在是否要提出打倒蒋介石？我们做这个工作而不提这个口号，口号仍然是恢复1月13日停战协定生效时的双方位置和实现政协决议”（《毛文》第4卷，第199页）。三个人将意见统一为仍留下国共谈判的可能性，但要以战争手段打倒蒋介石。

12月9日，毛泽东向西方记者表示，11月4日在南京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应当废弃，另订平等条约。

1947年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指出解放区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和蒋管区（国统区）人民运动的发展，预示着中国新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大革命将要到来，并可能取得胜利。他关注前一年11月因政府当局压迫摊贩而引起的上海市民骚动，和12月底因美军强奸中国女学生而引起的北平学生运动。另外，毛还非常重视在城市发生的罢工、罢课，和在农村爆发的抗议为内战而征兵、征粮的民变运动。而且，在全国各城市，学生运动高呼“反饥饿、反内战、反压迫”的口号，反抗蒋介石用“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的镇压，

日益扩大、高涨。5月30日，毛泽东把学生运动同反蒋内战的人民解放军的战争相并列，定位为第二条战线。他分析蒋政府统治下的经济矛盾，认为“在中美商约的基础上，美国的独占资本和蒋介石的官僚买办资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控制着全国的经济生活。其结果就是极端的通货膨胀，空前的物价高涨，民族工商业日益破产，劳动群众和公教人员的生活日益恶化”（《毛选》第4卷，第1225—1226页）。

从1946年11月至1947年2月的4个月的军事形势，与前4个月相比较，国民党军的进攻进一步受挫，中共军扩大歼灭战的规模，歼敌41万人。国民党军占领87座城市，而中共军也收复或占领87座城市。

蒋介石把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1947年3月，在东线，顾祝同指挥国民党军60个旅45万人向山东解放区发动进攻。华东野战军（山东、华中两野战军合编组成。由陈毅、粟裕指挥）诱敌深入，5月中旬在鲁中孟良崮全歼美械装备的精锐主力，到7月底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在西线，胡宗南指挥国民党军34个旅25万人向陕甘宁解放区发动进攻。西北野战兵团（由彭德怀、习仲勋指挥。后改称西北野战军）2万人，按照毛泽东的作战指挥，撤离延安，诱敌深入到地形险要、有群众支持和有回旋余地的解放区，采取“蘑菇”战术与敌周旋使敌疲劳饥饿，取得了3次歼灭战的胜利。8月西北野战军歼灭敌军主力，开始转入内线反攻。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人率中共中央留在陕北，一边转移一边指挥全国各战场作战。刘少奇、朱德等人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经由山西转向河北，担负中央委托的任务。

人民解放军（1947年2月后中共军的总称）在国民党军陷入守势的东北、热河、冀东、晋南、豫北的各地区开始局部反攻。1947年3月至6月的4个月，解放区虽然被国民党军占领95座城市，但人民解放军收复或占领了153座城市，歼灭国民党军40万人。特别是东北民主联军通过5月13日至7月1日的夏季攻势，迫使国民党军收缩在长春至山海关铁路沿线的狭长走廊地带，转为防御。

## 第二节 战略进攻与土地改革

1947年人民解放军处于转入战略进攻的转折点上,指挥战争的中枢——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有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刘少奇(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彭德怀(总参谋长、副总司令)五人。毛泽东转战陕北期间,重要的作战方针,与代替彭德怀任代理总参谋长的周恩来商议决定后发出指示。后来周恩来说过: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世界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毛传》,第812页),来巧妙地形容毛泽东的工作方法特征。

毛泽东在战争的第二年,部署华北的人民解放军主力进攻长江以北的中原国统区,开展外线作战,要在全国范围内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他想要通过这样的作战解除国民党军向山东和陕北的重点进攻,在一年内歼灭敌人100个旅,扭转在兵力上敌强我弱的局面。

按照毛泽东的作战方针(7月23日毛电),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人,1947年6月30日强渡黄河、在鲁西南歼灭国民党军后,从8月7日开始长驱南进,27日到达大别山,在抵抗敌军进攻的同时,11月开辟了鄂豫皖边根据地。8月下旬,陈赓、谢富治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一部8万人强渡黄河南下,11月下旬开辟了豫陕鄂边根据地。9月上旬,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主力18万人渡过黄河,在鲁西南部歼灭国民党军,下旬越过陇海(江苏海州[连云港]—甘肃天水)铁路南下,11月下旬发展了豫皖苏解放区。毛泽东的计划获得了成功:陈谢大军南下,解除国民党军对陕北的进攻,协助刘邓大军进击中原(7月19日毛电);陈粟大军在黄河、淮河、大运河、平汉线之间开辟、巩固根据地,协助建立鄂豫皖与鄂豫陕两大根据地,协助保卫山东根据地,协助恢复苏中、苏北根据地(9月11日毛电)。三路大军相互支援歼灭国民党军,清除土匪,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和政权,1948年5月,创建并巩固拥有3000万人口的新的中原解放区,直接威胁国民政府的统治中心——



南京和武汉。

毛泽东称赞三路大军纵横驰骋于长江、淮河、黄河、汉水之间的中原地区，歼灭大量敌军，调动和吸引国民党军南线 160 个旅中的 90 个旅于自己的周围，“迫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1948 年 3 月 7 日。《毛选》第 4 卷，第 1293 页）。这一时期，进行内线作战的陕西、山东、河北、山西的人民解放军逐渐转入反攻，东北民主联军也发动秋季攻势，配合关内南线（8 月 29 日毛电），形成了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的总态势。

毛泽东判断“整个形势于我有利”（10 月 8 日），于 10 月 10 日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公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宣言》称作战目的是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抗日战争以后蒋介石对渴望和平的人民发动了内战，逼得全国人民除了团结起来打倒蒋介石以外，再无出路。《宣言》认为蒋介石现在的内战政策，是 1927 年以来的十年内战、抗日战争中的消极应战、镇压人民、仇视共产党等“一贯反人民政策的必然结果”。《宣言》痛斥蒋介石推翻了签订的停战协定、通过的政协决议以及宣布的四项诺言（人民自由、政党的合法地位、实行普选、释放政治犯），进攻解放区人民，在城市镇压、逮捕、屠杀人民，将其定为“内战罪犯”。《宣言》指责蒋介石为得到内战的军事援助、不惜向美帝国主义出卖国家权利的卖国行为，进行内战、维持独裁的行径，以及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等四大家族掠夺 100 亿美元以上巨大财富的行径。

关于基本政策，《宣言》首先主张，“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及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毛集》第 10 卷，第 78 页），鲜明地对比了独裁与民主，内战与和平，腐败与廉洁，官僚资本与民族工商业、职工、灾民贫民，地主土地所有与农民土地所有，大汉族主义与“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及自由加入中国联邦的权利”，卖国外交与平等外交等，蒋介石政府与人民解放军之间的对立。

《宣言》将蒋介石的罪状集中在内战上，希望将所有反对内战者吸收进统一战线，瓦解国民党、政府、军队，也就是最大限度地扩大我、友，最小限度地缩小敌。它明言要“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对于放下武器的蒋军官兵，一律不杀不辱，愿留者收容，愿去者遣送”（同上，第79页）。

当天，人民解放军总部统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sup>①</sup>的规定，重新分发给全军，命令要严格执行。它发誓，与蒋介石的“反人民”、腐败正相反，人民解放军实践“为人民服务”的高尚道德，将人民从美蒋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以此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国家权力正当化。

也就在同一天，中共中央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宣布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将在农村打倒地主权力和在全国推翻蒋介石政权结合在一起（后叙）。

12月25日到2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书面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涉及到军事、土地改革、整党、经济、统一战线、国际政治等各领域，制定了“打倒蒋介石，建设新中国”的具体行动纲领。

关于军事，报告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在1947年7月至9月间，已经到了由战略防御转到战略进攻的历史转折点。它认为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优势和美帝国主义的援助，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蒋介石战争的“反人民的性质”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人民解放军的战争所具有的“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性质”“必然要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一人心方面的优势是战胜蒋介石的政治基础，这已经由18个月的战争所证明。报告提出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为主的十大军事原则，其中第9条“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及大部分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同上，第101页），最鲜明地表现了这场战争的性质。

关于经济，报告指出，将“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

---

① 三大纪律：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归公。八项注意：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官僚资产阶级)为首的垄断资本(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三点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谋求国家、集团和个人的双方利益)、劳资两利(劳动者和资本家双方得利)”,作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总目标。

关于统一战线,报告说,中国共产党靠土地政策获得了农民群众的拥护,在国统区获得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广大群众的同情,反美反蒋的民族统一战线比抗日战争时期更加扩大,强调统一战线中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重要性。

关于国际形势,报告批判蒋介石依靠美国、妄想“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断定“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超过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认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能够“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使之不能发生,推翻一切反动派的压迫,夺取人类永久和平的胜利”。

在这一时期,关于土地改革,毛泽东继承苏维埃革命时期政策的主线即没收地主的土地、公共土地和富农多余土地,主要按人口平均分配,“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剥削富农,与消灭地主”的阶级路线,顺应动员农民参加人民解放战争这一当前的课题,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政策。1947年7月21日,他提出“土地改革应该采取平分土地的方针”、“土地改革要和统一战线相结合”(《毛文》第4卷,第268页),批判苏维埃革命时期王明的“左”的错误,称我们也给地主、富农一律平分土地,打倒官僚资本而保护民族工商业。9月6日,毛向7月到8月在河北主持全国土地会议、负责起草《大纲》的刘少奇指示:“应该采取彻底平分土地的方针”。

10月10日公布的《大纲》宣布:“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它规定彻底平分土地:将乡村农民大会及其委员会,贫农团大会及其委员会,区、县、省等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委员会为土地改革的合法执行机关;乡村中一切地主土地和公地由农会接收,连同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

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乡村农会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以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的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分给缺乏这些财产的农民及其他贫民，并分给地主同样的一份”（《中央文件》第16册，第547-548页）。这是“对贫农、雇农的土地要求给予最大限度的满足”（古岛和雄，第66页）。但是，中农土地面积在平均数以下的大多数获得利益，而平均数以上的少数被没收多余的部分，这就“存在着阻碍团结中农的要素”（同上）。为解决这一矛盾，1948年在《大纲》上添上了一条“在平分土地时应注意中农的意见，如果中农不同意，则应向中农让步，并容许中农保有比较一般贫农所得土地的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量”的“中共中央注”。其目的是想将依靠占农村人口70%的贫农、雇农，和团结占农村人口20%的中农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同时兼顾。农民通过土地改革打倒了作为国民政府基础的地主权力，建立了农民政权，巩固中共政权的基础，大大提高积极性，促进生产的发展。他们向前线提供粮食、衣服，主动参加解放军（全面内战的两年时间，获得土地的农民有160万人参军），组织运输队、担架队、铁路破坏队等来支援前线，组织民兵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据说国统区的农民听到土地改革的新闻后，也欢欣鼓舞。很可能大多数农民出身的国民党军士兵越来越怀疑战争的目的，斗志低落。

11月29日，毛泽东修改中共中央指示稿向各中央局、分局介绍“凡在土地斗争尚未深入的地方，发生右倾观点”、“凡在土地斗争已经深入的地方，则发生‘左’倾观点”这一苏维埃革命时期的经验，指示：“应在放手发动农民群众彻底平分土地的坚决斗争中，适当地纠正业已发生与业已妨碍群众利益的过左行动”（《毛文》第4卷，第322页）。在十二月会议的书面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将《大纲》的方针公式化为“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及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及半封建的剥削制度”（《毛集》第10卷，第104页）。毛在十二月会议的讲话规定统一战线的原则为“孤立敌人而不是孤立自己”，要警惕右或“左”的倾向。

1948年上半年，毛泽东利用大约半年时间集中研究土地改革和

统一战线相结合的具体政策，相继发出指示。他一方面倾注力量将暴风骤雨般的贫农、雇农彻底“翻身”的能量作为原动力，推进土地改革和人民解放战争。这种能量是与打破贵贱、贫富的不平等和权力支配的“小康”、一举实现人人平等的“大同”这种自古以来农民叛乱的传统相联系的。另一方面，他认为在其反面发生了贫雇农同中农对立，打击小地主和富农，破坏民族工商业，排斥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殴打和杀害大地主和反革命分子等情况。这同《论联合政府》中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广泛发展”相矛盾，要费尽心力克服会使反美反蒋统一战线崩溃的“左”倾思想，促进整体人民革命向前发展。“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五个政策问题”（2月27日）串结为一的薄弱环节，就是如上贫农雇农的积极面和消极面的两面性。这是毛回归到湖南农民运动和苏维埃革命的原点，同时活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开辟了革命的更高阶段。

1948年初，毛泽东将十二月会议关于土地改革具体实施政策的讨论，归纳进《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1月18日。《毛选》第4卷）的党内指示之中，以后将其进一步发展。他指示既要反对在全体上、在战略上过高估计敌人力量的右倾错误，又要反对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轻视敌人、不注意争取一切应当争取的同盟者的“左”倾错误。

毛泽东首先指示：必须将贫雇农在土地改革与农会中及乡村政权中的带头作用，放在第一位，即是他们团结中农和自己一道行动；反对“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主张在乡村雇农、贫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联合一道，在全国工农商学和少数民族、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打江山坐江山”<sup>①</sup>。

---

<sup>①</sup> 毛泽东想要领导贫雇农、教育他们，让他们自觉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众的革命中的、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4月1日。《毛集》第10卷，第141页）中的自己的地位和任务，把眼光放远，看长远的前途。他又说：“我们赞助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为了便于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迅速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并反对“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同上，第138页）。

他指示对于中农划错了成分的，应一律改正，有剥削收入的农民，其剥削收入占总收入 25% 以下者，应定为中农，必须纠正在农民代表中、农民委员会中排斥中农的倾向，和在土地改革斗争中将贫雇农同中农对立起来的倾向。

他指示对于中小工商业者，应当保护并奖励发展工商业，达到增加生产和“劳资两利”的目的，工人生活必须酌量改善，但是必须避免过高的待遇；对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的绝大多数是可以参加革命或者保持中立的，应加以团结、教育和任用，只对极少数的反革命分子，才经过群众路线予以适当处置（他说：在知识分子的阶级划分上，将着重点不放在地主、富农、中农等社会出身方面，而放在军人、政府职员、工人、职员、技师或工程师、教员、记者、艺术家等社会职业方面上。5月21日）。他指示：关于开明绅士（曾经赞成抗日和减租减息、与根据地政权合作，现在赞成反美反蒋与土地改革的地主阶级人物），必须视其政治态度与工作能力、区别对待；对于新富农（靠自己的劳动耕种积蓄了土地、财产，而且雇佣一些劳动力进行耕作的人），应和旧富农（亲自劳动，但也把一部分土地租给他人耕种，剥削地租的人）加以区别，对老解放区的新富农按照富裕中农对待。

他指示：对待地主和对待富农必须加以区别；对大、中、小地主，对地主、富农中的恶霸和非恶霸也应有所区别；除对极少数真正罪大恶极分子经人民法庭认真审讯判决，并经一定政府机关批准枪决予以公布外，必须少杀；我们的任务是消灭封建制度，消灭地主之为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占全国乡村人口 10% 的 3600 万地主及富农，看做是国家的劳动力，而加以保存和改造（2月27日，他指示保护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

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大部分是地主富农的家庭出身，所以在农村实行给地主、富农个人以出路的政策，加强在城市团结大多数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

毛泽东毕竟还是希望，把最大限度地发挥革命主力军的力量，与尽可能扩大同盟军结合起来，使两者并存，因此对农村各阶级、阶层

的政策作了大胆而又谨慎的规定。

毛泽东为顺利地推进土地改革,对日本投降以前的“老解放区”,日本投降至大反攻所解放的“半老(解放)区”,大反攻后解放的“新解放区”,实施《大纲》采取分地区、分阶段平分土地的政策。他为了解决把贫雇农“翻身”成为革命的动力,和不断保持、扩大广泛的人民的统一战线相结合这一难题,主张通过实践逐步提高农民的自觉与组织程度,逐步提高党的干部的领导能力,他所依据的就是改造自己与改造世界的人的主观能动性。他并把这种渐进的方法用“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力的”“土地改革总路线”(1948年4月1日,《毛集》第10卷,第137页)的公式表示出来。

关于土地改革与整党,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央指示(1948年2月22日)指出,将“老解放区”和“半老区”分为三类,采取不同的工作方针,更缩小了平分土地的范围。其中,他主张整顿那些“利用政治地位为非作歹、侵占土改果实的党员及干部”(《周选》上卷,第295页)。这大概是他要克服党员的土豪劣绅化及基层共产党权力的变质。

毛泽东在1947年的十二月会议的书面报告中谈到,为实行土地改革,必须整党(整顿共产党的思想、作风,通过解散党支部、开除党员党籍与再登记整顿组织)。他指出,在此时党员已扩大到270万人的中共地方组织和农村基层组织中,许多地主分子、富农分子、流氓分子乘机混入,造成“阶级成分不纯”,他们把持了许多党、政府的部门和民众团体,欺压人民,使这些组织脱离群众,使土地改革不能彻底,并指示对于这种“作风不纯”要依靠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加以克服。1948年1月18日,他又指示:“对于某些犯有重大错误的干部和党员以及工农群众中的某些坏分子,必须进行批评和斗争”,一方面“应当说服群众,采取正确的方法和方式,避免粗暴行动”。“另一方面则应使这些干部、党员和坏分子提出保证,不对群众采取报复。应当宣布,群众不但有权对他们放手批评,而且有权在必要的时候将他们撤职或建议撤职、或建议开除党籍,直至将其中最坏的分子送交人民法庭审处”(《毛选》第4卷,第1272页)。毛修改周恩来起草的中央指示,

并加进了几段话：“一切党的支部，均应公开”，在“党的批评检讨会议”“应该让党外群众参加”，“将党内所有的好现象和坏现象都公布于众，接受群众的监督、批评或拥护”（2月22日）。他把基层党组织应该克服的缺点概括为“成分不纯（地主富农分子）、思想不纯（地主富农思想）和作风不纯（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这三点（10月10日）。

以人民为革命主体，将人民大众的对敌斗争置于第一位，以此为标准，要求革命党通过不断的自我改造，站在时代前列，发挥领导作用。从湖南农民运动以来，毛泽东的革命观就是建议让共产党接受党外群众的监督、批评与处置，以克服思想、作风、组织上的缺点来开展整党运动。这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开展整风运动、整党运动的渊源。

人民解放军也从1947年9月至1948年春进行“诉苦”（控诉受封建压迫之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整军（整顿军队）运动，提高指战员的政治觉悟与战斗力，并把国民政府军的80万俘虏改造为人民解放军战士。毛泽东主张将“三查”、“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定位于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士兵代表协助连队首长管理伙食和农副业生产，监督经济开支）、军事民主（在练兵时实行官兵互教，兵兵互教；作战时，在连队首长指导下，召开士兵大会讨论作战方法）三大民主当中，主张开展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来克服官僚主义。他又谈到，“应当使士兵群众对于干部中的坏分子有揭发其错误和罪恶的权利”，“应当使士兵在必要时，有从士兵群众中推选他们相信的下级干部候选人员、以待上级委任的权利”（1948年1月30日。《毛选》第4卷，第1275—1276页），想要依靠士兵群众的批评与建议来纠正干部的错误和腐败。另外，毛又恢复了在苏维埃革命时期实行的各级党委制和连队中的士兵委员会，中央军委总政治部通知：应将连队党的支部会议完全公开，党支部开会应邀请士兵委员会的非党战士参加，保证他们在会议上对党员有自由批评与建议之权，“使支部不脱离群众，使党员接受群众监督”（1948年2月17日，《中央文件》第17册，第44页）。整军运动也是在军队内部的整党运动。这种在军队内



部所进行的民主运动，是对井冈山工农红军的“民权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1948年3月21日，毛泽东从陕北的杨家沟出发，渡黄河经山西进入河北，在城南庄做短暂停留后，5月27日到达西柏坡，在这里坐镇指挥了三大战役。

从1948年4月30日到5月7日，在城南庄召开毛、朱、刘、周、任五位书记一起参加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确定：一、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二、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三、转变无政府无纪律状态，适当缩小地方权力的三项方针，以后将此三项方针概括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三项任务。从9月8日到13日，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九月会议上，毛泽东在报告中讲道：第二年歼灭了国民党军队正规军92个旅，总计150万人，几乎取得了同第一年相同的战果，并预测若今后三年取得相同比例的战果，用五年时间共歼灭500个旅的话，就从根本上打倒了国民党。

当时人民解放军拥有正规军149万人，总兵力280万人，国民政府军拥有卫立煌（东北）、傅作义（华北）、刘峙（华东）、白崇禧（中原）、胡宗南（西北）五大战略集团，第一线正规军174万人，总兵力365万人。在兵力差距缩小的形势下，毛泽东开始发动三大战役。

第一，毛泽东提出“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基本战略，从9月开始在东北发动了辽沈战役。林彪、罗荣桓指挥下的东北野战军主力70万人，同被分割在长春、沈阳、锦州等孤立地区的国民党军55万人作战，遵循毛泽东的攻克锦州，歼灭从长春、沈阳而来的援敌的作战方略，11月2日，共歼灭国民党军47万人。毛泽东看到由于这一胜利，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敌军只有290万人，我军增至300万人以上，今后不用三年，大约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改变了对原来取得全国胜利时间上的预计。中共将拥有工业的整个东北地区作为解放区，成为进行全国解放战争的坚固的后方根据地。

第二，毛泽东又以徐州为中心，在横跨江苏、安徽、河南、山东四省的广大地区发动了淮海战役。1月为了打破敌军对中原的刘邓军

的围剿，毛致粟裕电，提出渡长江转战江南，但粟裕认为不渡江南而留在中原作战更为有利，9月建议举行淮海战役。毛灵活地接受了这一建议，扩大作战规模，确立了“隔断徐州、蚌埠，歼刘峙（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主力的总方针”（《毛军》第5卷，第267页）。11月，粟裕、谭震林指挥下的华东野战军与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指挥下的中原野战军共60万人民解放军，在刘、陈、邓、粟、谭组成的总前委（邓为书记）的统一指挥下，同国民党军80万人作战，1949年1月，歼敌55.5万人，消灭了“南线”的主力。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成为解放区，直接威胁着国民政府首都南京。

第三，毛泽东发动平津（北平、天津）战役，林彪、罗荣桓指挥下的东北野战军与聂荣臻指挥下的华北野战军共100万人民解放军，在由林、罗、聂组成的总前委（林为书记）的统一指挥下，包围从滦县到张家口铁路沿线500公里狭长地带进行防御的傅作义指挥下的国民党军60万人。为阻止在北平、天津的蒋直系24个师海运江南，遵照毛泽东的包围诸城市之敌、隔断诸敌之联系、各个歼敌（“围而不打”，“隔而不围”）的指示，人民解放军于12月22日、24日，先后攻克新保安和张家口，1949年1月14—15日攻克天津。17日在塘沽的5万国民党军乘船逃往南方。对于原为阎锡山山西军系统，与蒋介石直系之间有矛盾的北平的傅作义，中共从1948年11月开始保持接洽，在解放军保证官兵生命、财产之安全，对傅作义战犯罪责予以轻减或赦免后，傅军20万人到北平城外接受改编。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战役共歼灭和改编国民政府军52万人，整个华北地区成为解放区。9月10日，绥远的国民党军通电起义，接受改编。

人民解放军通过三大战役的胜利，歼灭了在长江以北的包括卫、傅、刘三大战略集团的国民党军主力154万人，而且除其中死伤的25万人以外，129万人起义、投城、俘虏的大多数国民党军成为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量，为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在后方的毛泽东注视着全国的战局，进行着又大胆又谨慎的整体性战略领导。具有极高实践能力的前线指挥员，将毛的整体战略与自身在战场上的具体战术恰当地结合起来，二者相得益彰。从毛泽东的

电报中也可以看到,后方与前线意见上的差异与对立屡屡发生,但他们都是在思想、理论、路线基本一致上的不一致。毛泽东既坚持了经自己深思熟虑后所产生的战略构思,同时又灵活地采纳粟裕等前线指战员的合理的不同意见,或延期实施,或调整顺序,将战略构思变得更具有现实可操作性、更丰富。正因为毛泽东和各地指战员的军事领导能力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解放军战士的自觉性与斗志,以及解放区人民支援前线的热情超过了估计的水平,才取得了远远超出预测的大战果。

### 第三节 和平谈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在长江以北歼灭国民政府军主力,获得最后胜利已经十分明朗,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为《人民日报》所写的新年献词中写道“将革命进行到底”,号召粉碎美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和平”阴谋,“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地、彻底干净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把国民党政府的罪状集中在1946年发动内战的战争责任上,提出蒋介石、李宗仁等43名要员为头等战争罪犯(《毛集》第10卷,第203页。《毛选》删除战犯名字)。然而,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宣称在国家的独立完整,人民的休养生息,维护宪法、国体、法统,保障军队,人民维持自由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这种实质上主张国民党统治的正统性的五个前提条件下,进行和谈,并暗示他本人引退。1月8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吴铁城向美、苏、英、法的驻华大使发出和中共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函请四国政府出面调停。斯大林“不能不担心这是否是美国准备借机插手中国事务的一个借口”,1月10日致电毛泽东,“委婉地要求中共中央直接与国民党谈判,以便制止美国的卷入”(杨奎松,第447页)。

中共中央接受了斯大林的提案。1月14日,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毛泽东主席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15日刊载于

《人民日报》》，提出自己的历史认识，说：自1946年7月，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下，背弃人民的意志，破坏了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发动全国范围的反革命的国内战争”（《毛集》第10卷，第217页）。《声明》提议与南京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与军事集团，在下列八个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1）惩办战争罪犯；（2）废除伪宪法；（3）废除伪法院；（4）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5）没收官僚资本；（6）改革土地制度；（7）废除卖国条约；（8）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这既是对蒋介石五个条件的全面否定，又是对现存政权的革命宣言，等于是要求无条件投降。

14日和15日，向东北局、各中央局、各前委等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电报，指出：在八项条件下愿意进行和谈的声明，是为了揭露南京政府的和谈骗局，“双方的条件都是对方所不能接受的，战争必须打到底。”2月1日至3日，毛泽东和斯大林派遣的苏联共产党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进行了会谈，并对于当前的重要课题，如军事形势、新政权、经济建设、军队、对外政策、领土、帝国主义、人民生活、土地改革、民族资产阶级、多民族以及对王明等犯错误的党的干部政策等，系统地谈了自己的见解。在谈话中强调比过去我们预计的时间会要短些，就能过长江，攻克南京，占领上海等大城市；美军并不想直接卷入中国内战，只是间接干预；我们党一贯执行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政策，虽然遇到的困难不少，我们充满信心，向着目标前进，不达胜利，誓不罢休（师哲，第375—385页）。毛泽东尽量使苏联方面的认识接近他自己的认识。

1月21日，蒋介石宣告“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中华民国总统职权。22日李宗仁发表文告，宣称“中共方面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毛泽东订立并联合迫使蒋介石下野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反对蒋党的战略。2月22日，毛泽东同周恩来会见上海和平谈判代表团的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24日举行非正式的谈判，达成八点秘密协定，这个协定只交给李宗仁。3月5日，中共

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指出：“南京反动政府方面在这个谈判中的推动力量是桂系军阀，国民党主和派和上海资产阶级。”蒋介石及其死党企图破坏谈判，准备作战。我们不拒绝谈判，要求对方完全承认八条。“其交换条件是不打桂系和其他国民党主和派；一年左右也不去改编他们的军队；南京政府中的一部分人员允许其加入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对上海和南方资产阶级的某些利益允许给以保护”（《毛选》第4卷，第1435—1436页）。毛说：这个全面性的谈判，如能成功，是有很大大利益的，不能成功，则待进军以后逐一进行地方性的谈判。

毛泽东3月23日离开西柏坡，25日到达北平。4月1日，由周恩来等六人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同以张治中等六人组成的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包括邵力子、章士钊），在北平开始和平谈判。毛泽东4月4日、5日写的《人民日报》社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要求李宗仁、何应钦政府包括张治中代表团在内，“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国帝国主义决裂，站在人民一边。毛坚定地说：“无论你们签订接受八项条件的协定也好，不签这个协定也好，人民解放军总是要前进的”（《毛集》第10卷，第266页），否定了以长江为界搞“南北朝”的策划。4月8日，毛会见张治中，称为减少南京代表团的困难，可以不在和平协定中写战犯的名字。7日李宗仁给毛泽东致电，披沥实现和平的决心，表示国共合作的愿望：“至立国大计，决遵孙总理之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同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8日毛泽东复电李宗仁，把和平谈判的目的规定为：“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毛文》第5卷，第276页）。

国共双方非正式地交换意见的阶段结束，4月13日进入正式谈判阶段，周恩来和张治中经过谈判，15日提出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协定前文确认了毛泽东在1月14日声明中的历史认识，即认为“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南京国民政府在美国政府帮助之下，违背人民意志，破坏停战协定及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发动全国规模的国内战争”，“南京国民政府应对于此次战争及其各项错误政策担负

全部责任”，并把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的立场，联俄、联共及扶助农工的政策，临终遗嘱中所示的国共合作思想，作为国共双方从内战走向和平而应回归的原点。文本以毛泽东的八项条件为基础，并委婉地保留个别宽大处理的余地，汇总八条二十四款，结尾之处收录毛泽东给李宗仁回电的上述部分。

周恩来说：尽量采纳国民政府代表团的意见，但是，对于国民党军队改编和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接收地方政权两点，我们决不能让步，并宣称南京国民政府如果不接受这一修正案，我军必将于4月20日渡过长江作战。国民政府代表团表示接受和平协定，16日代表和随员各一名把协定带到南京，然而20日国民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因此，深夜人民解放军发动了军事进攻。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向人民解放军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因为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所以作了如下指示：(1)歼灭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和主权的独立与完整；(2)缉拿以蒋介石为首的战争罪犯；(3)同国民党地方政府、地方军事集团在和平协定的基础上签订地方性的协定；(4)包围南京李宗仁政府，给予和平协定上签字的机会。毛想要在人民解放战争中最大限度地贯彻和平协定的精神。同日，周恩来援引西安事变时张学良的例子劝说张治中不要回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全员留在北平。

毛泽东在和平谈判期间也进行了渡江作战的准备。他把淮海战役的总前委作为渡江作战的总前委，2月指示作战计划：让东北野战军一部分12万人钳制总部在武汉的白崇禧部25万人，以利于中原、华东两野战军夺取南京。4月3日，他同意邓小平起草的《沪杭战役实施纲要》。1月下旬以来，为避免和白崇禧部发生冲突，他一直在进行秘密交涉。4月20日深夜和21日傍晚，东集团的第三野战军（原华东野战军。三野）35万人、中集团的三野30万人、西集团的第二野战军（原中原野战军。二野）35万人，合计100万人，在江阴至湖口长达500公里的长江中下游，百万雄师强行渡江，突破了总部在上海的汤恩伯部45万人的防御战线。三野于4月23日攻下南京，5月3日

攻下杭州,5月27日攻下上海。二野南下控制浙赣铁路,截断国民党军退路。人民解放军在渡江战役中歼敌40万人(其中包括俘虏、起义、投城38万人)。第四野战军(原东北野战军。四野)一部于5月14日强渡长江,17日攻下武汉三镇。

渡江作战之际,在长江航行的紫石英号等四艘英国军舰向人民解放军开炮,解放军进行还击。针对丘吉尔在英国下院宣称“实行武力的报复”的发言,毛泽东于30日以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的名义,提出抗议声明,表示:“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为防备帝国主义诸国的武装干涉,他把二野全军作为战略预备队布置在浙赣铁路,其他各地也部署了军队。

在国内,毛命令一野(原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向西北(甘肃、宁夏、青海),二野(司令员刘伯承)向西南(四川、贵州、西康、云南),三野(司令员陈毅)向福建,四野(司令员林彪)向中南(广东、广西),分别发起进攻。到1949年年底,中国大陆除西藏外,基本上解放。伴随政府军的溃败,国民政府亦依次迁至广州、重庆、成都、台北。

在那期间,毛泽东为和平解放倾注全力,也得到章士钊、张治中等国民党系人员的帮助,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其中包括:8月4日,原同盟会会员、时任湖南省主席的程潜在长沙起义,宣布和平解放;9月25日、26日,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省政府主席包尔汉率部起义,宣布和平解放。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贯彻依靠人民支持、以优势兵力夺取政权的战争、革命的方法,把和平谈判限定为要求起义或投城,同时保留个别宽大处理的余地。不过,他制定国内和平协定,追究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发动内战的战争责任,是公开承诺继续坚持抗日战争后的和平、民主的姿态,是顺应希望摆脱内战苦痛的全国民心的。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劳动节口号,其第五项中提议“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1日,毛泽东给李济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沈钧儒(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写信,号召一切

“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得到了赞同。1949年6月15—19日，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各党派、团体、个人、少数民族、海外华侨等23个单位的代表集合在一起进行筹备活动，9月21—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织中央人民政府。

为《共同纲领》打下思想基础的文章是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sup>①</sup>（1949年3月5日）和《论人民民主专政》（同年6月30日）。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3月5—13日）上的报告中主张实行“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选》第4卷，第1437页）。他认为革命在全国胜利和土地改革之后的中国社会的基本的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应采取对内节制资本和对外统制贸易的经济政策。关于经济，从国民经济中现代性工业占10%，农业手工业占90%的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现状出发，为了发展生产，他提出相当于1947年12月阐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该经济形态构成为：领导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国家应当利用和限制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落后分散的农业和手工业个体经济，再加上向社会主义形态过渡的、组织个体经济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国家与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他号召，依靠中国人民的勇敢勤劳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援助下，迅速地开展经济建设。

---

<sup>①</sup>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人从在人民解放战争中致力于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转变为接收国民党官僚资本、建立起占国民经济比重10%以上的国营经济、在军事上、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取得支配地位后、对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杨奎松[1997]，第172—179页）。这是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观点向最重视两个阶级的斗争的“现实政治力量对比的强弱”的重点转移（同上，第181—182页）。这一观点是很重要的。



在外交方面，他主张我们打倒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对中国的控制权，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一切卖国条约，取消一切帝国主义的宣传机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确立“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的原则。然而，他提醒：我们保护普通外侨的合法的权益，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但是不急于获得帝国主义国家的承认，只要它们不改变敌视中国的态度，就不给它们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我们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主义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他采取这样的开放的态度。

毛泽东撰写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28 周年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7 月 1 日刊登在《人民日报》。文章主张：“人到老年就会死亡，党也是这样”，共产党员要立足于“懂得事物生存和发展的规律”的辩证法的宇宙观，眺望“人类进步的远景”，“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界”（《毛集》第 10 卷，第 291—295 页）。看来，这似乎是根据“大同”把“小康”（阶级、国家权力、共产党）相对化，劝戒党员不要把自己绝对化。毛亲自参加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现实，同时又追求无阶级社会的理想，通过强韧的自我保持两极矛盾。

在哲学上把无产阶级、人民共和国与共产党相对化这个基础上，文章在历史上强调马列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把它们作为通向“大同”的惟一道路的“小康”，并使其正当化。

文章说：自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以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为首的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救国而学习西方，但是行不通。“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的梦想。很奇怪，先生（西方）为什么老是侵略学生（中国）呢？”“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学习它，“走俄国人的道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战胜了受美帝国主义援助的蒋介石。因为中国是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与共和国（中华民国）让位给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和人民共和国。“康有为著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这意味着，只有毛泽

东找到了这条道路)，“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毛集》第10卷，第295页)。

毛泽东立足于自己的思想经历，宣告中国共产党最大限度地继承鸦片战争以来为了救国而进行的西方化即近代化的努力，最大限度地联合五四运动以来反对帝国主义的广泛的各种人及各种思想，并对其进行领导。看来，毛想要根据最彻底地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取得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事实，达到确立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正统性这一目的。另一方面，他给蒋介石和国民党定罪为一贯反人民反革命。然而毛和中共把蒋和国民党置于抗战主力的位置，并没有把他拉下马；战后和他们达成和平、民主协议，他们破坏合作，维持独裁强行发动内战时，中共通过反击获得了人民支持。毛泽东抛开了这种自己所领导的又斗争又团结的许多曲折的历程，这有使历史单纯化、一面化之嫌。

文章指出，在1920年代，在怎样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问题上，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是基本上一致的。在国内，中共继承孙中山《遗嘱》(1925年3月11日)中“必须唤起民众”，把它发展为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国外，中共继承“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各国人民，共同奋斗”，把它发展为联合苏联、联合各民主主义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

文章又指出，孙中山领导实行国共合作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1924年1月23日)中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蒋介石的“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独裁”就是其延伸；《宣言》中说，“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中共的人民民主主义就是其延伸。在这里，毛自负地认为，不是蒋，而是毛才是孙中山思想真正的继承者；而且，革命领导者由孙中山所依靠的民族资产阶级转移到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的工人阶级。

文章对各种疑问和异论,进行反驳。其中首先关于国际政治,它立足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对立的观点,宣称我们一边倒向后者,没有第三条道路,这是很重要的。正因为毛泽东只认识到中国在两阵营的对立中通过革命而加入社会主义阵营,暂时搁置今后本国与中间地带革命的关系这一重要问题。

其次是关于国内政治,文章强调,“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这种人民民主专政是尤为重要的。文章主张,人民有选举权,人民在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政府,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给予人民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权;对反动派(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帮凶们)不给予选举权和自由权,通过军队、警察、法庭等国家机器对其实行专政。

此外,文章一方面重视共产党通过国家保护人民,让人民用民主的方法即说服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改造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向着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前进,消灭阶级和进入大同。它又说:为了私营企业国有化,需要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教育,为了农业社会化,需要对农民进行教育;另一方面,国家采取强迫的方法,对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这还是重视教育。看来,毛泽东思考,与打倒现在存在的压迫人民的政权的革命相比,人民设计创造现在没有存在的新世界的建设,为了把人民的自然成长性提高到目的意识性,为了改造反动派,由共产党进行教育更为重要。

对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实施,毛泽东做了具体的指示:以武力打倒某一地方的国民党政权后,由人民解放军组织军事管制委员会,建立革命专政,在其之下成立政府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政府提出重要问题让代表讨论,征求意见。8月13日,毛出席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并作讲演,希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样的会议,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克服困难,从而为召集普选

的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毛谱》下卷,第548页)。毛指示,建立人民代表会议,以防止党和政府的“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使会议由共产党领导,“养成民主精神”。

1949年8—9月,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五篇文章,批评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和国务卿艾奇逊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以把中国人的历史认识清醒起来。毛指出,中国的内战是“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害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的战争”(8月18日。《毛集》第10卷,第325页)。而且,他从这一胜利时期回顾历史说: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是“帝国主义侵略而引起了(中国人)反抗”的历史(9月16日。同上,第350页)。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在中国造成他们自己的掘墓人,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特别是占农村人口70%的贫农)、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中国人民憎恶帝国主义,发扬革命精神,团结一致,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中国人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利用封建主义思想武器失败了,利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进化论、天赋人权说、资产阶级共和国等思想武器也失败了;俄国革命后,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的社会革命论,“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同上,第353页)。看来,这意味着受帝国主义侵略而濒临灭亡的中国人,由不能正确认识敌我矛盾、接连失败的被动地位,转入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认识敌我矛盾,以正确的实践来解决他的主动姿态。毛认为,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即“救亡”这一课题是连续不断,反抗的思想武器即方法是由旧学、新学转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反抗帝国主义的、具有多种不同思想的广大人民作为革命的主体,使其团结起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担负起思想武器的作用——这种思想继承“抗日——民主”的逻辑。

艾奇逊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终将推翻外来(苏联)制度,其实是要推翻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做美国的第五纵队,毛泽东利用他的这一帝国主义的逻辑,教育虽然相信美国但还有爱国心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呼吁先进的人民,要团结人民内部的中间层、中间派、落后的分子,争取他们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不让帝国主

义把他们拉过去。但是毛指出,只有持续进行艰苦、长期的斗争,“才有希望在平等和互利的条件下和外国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8月14日。同上,第321页),揭示了以斗争求共处的踏实而开放的斗争方针。

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变不平等为平等的人民革命,从解放底层即农村出发,经过22年的战争,从解放局部扩大到解放全中国,掌握顶点即国家权力,自下而上统一了国家。毛泽东接受对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即列宁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创造出共产党领导农民革命战争这一中国独特方法,取得了抗日战争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的美苏冷战下的国共内战的胜利,基本上解决中国近代的“救亡”的课题。

在取得了革命胜利,致力于创建国家之际,毛泽东主张被压迫、被剥削人民成为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断认识矛盾、以实践解决矛盾,变不平等为平等,向着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消灭阶级、国家、政党的“大同”社会前进。他从外部对帝国主义进行“人民、矛盾、大同”这一绝对批判,主张这条路已被实践检验。这与早期马克思从内部对资本主义进行的绝对批判、“无产阶级,自我异化,共产主义”相照应。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现代雇佣工人阶级)是“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的阶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导言》),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他主张工人把自己劳动对象化的产品成为异己的、对自己敌对的对象,是资本家的私有财产;工人一旦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他就同自己的生产行为、类存在物<sup>①</sup>、其它人相异化,因此,只有在扬弃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人们才会扬弃自我异化,获得人的本质(《经济学·哲学手稿》)。

毛泽东认为人民(其主力为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特别是贫农、雇农)是被敌人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剥削,苦于贫困与失业,不能吃饭,因而只有反抗敌人通过革命才恢复自己的独立与生存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个人的总体,是帝国主义的“掘墓

---

<sup>①</sup> 人通过生产活动这一自由的自为的活动,作为个别人,在个人的活动和个人的关系中,保持作为超越个人的类的、普遍的共同生活,把自己固有的力量认识为社会的力量、并把它组织为社会的力量——这样的存在。

人”。毛以人民为主体即我把握敌之侵略与我之抵抗为矛盾，探索正确认识敌我矛盾、以正确实践来解决它的道路，接受了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打倒发动世界战争的帝国主义这种列宁的思想。俄国革命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的办法，解决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毛将其作为标本，认为中国近代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残余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欲通过民主主义革命的方法来解决它。对1931年以后成为主要矛盾的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的矛盾，毛教育人民要争取矛盾的互相转化，把日本由矛盾的主要方面、优势地位转到被打倒的地位，中国由矛盾的次要方面、被压迫地位向自由独立的地位转化。

具体地说来，毛泽东一方面基于人总是反抗压迫，多数民众的大联合能战胜少数强者的大联合这样的信条，认为对少数日本统治阶级压迫、欺骗日本人民侵略中国这一民族压迫，多数中华民族特别是农民必将自觉抵抗，并取得胜利，确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人民“理想主义”，“战略上以一当十”）。另一方面，他正视军力、经济力、政治组织力方面敌强我弱的现实力量对比，提倡持久战，倡导变全中国为大根据地，以人民战争方式进行长期抵抗，建立敌人少数处于劣势、我居多数占据优势的无数的根据地，积小胜获得最后的大胜（实际“现实主义”，“战术上以十当一”）。毛运用这种持久战的战略战术，领导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和反抗“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毛集》第10卷，第330页）的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鸦片战争以来被帝国主义侵略，处于次要地位、被压迫而濒临灭亡的中国人民，终于在1949年转化到主要地位，恢复了独立与生存，战胜了帝国主义。中国人民在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中，显示了巨大的潜在力量，由弱变强，敌我双方力量对比达到均衡，甚至我反而优于敌，最后战胜了敌人。

毛泽东对前途做了如下展望：人民由此继续前进，经过以斗争解决矛盾的实践与认识的无限反复循环，强迫改造反对改造的人们，达到“大同”，即“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与改造世界”的“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



## 第二部 建设者毛泽东





1949年，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席取得了革命胜利，还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结合中国近代的“救亡—民主”的框架与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的思路，将国内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与国外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看做是中国的两个基本矛盾，并以此领导了建设。

对外在东西方冷战中，毛泽东寻求国家的独立与平等，采取了人民战争的姿态，对抗敌视新中国的蒋介石政权及其支持者美国。首先，他是向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与战争政策，维护了世界的持久和平（东西轴心）。之后，他将重心转到了支援以越南为首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依靠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战争来阻止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南北轴心）。对内他致力于国家统一和经济建设，引进了由“应付世界战争的新总体战体制”、“共产党和国家结合在一起，一元化地控制社会的、党、国家和社会团体打成一片的集权政治，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和计划经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教化（国家意识形态化）”组成的苏联国家社会主义的框架，和“推动快速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用党内斗争处理‘左’右不同意见”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斯大林模式，用人民战争的方式加以运用。毛提出了共产主义=“大同”的目标，在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下，动员全体人民群众，力图实现人人自觉及快速增加生产力，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方向前进。

毛泽东将“宇宙矛盾——人的实践”的革命哲学原封不动地用到建设当中，教育人们：要努力培养“为人民服务”的集体主义道德（“大公无私”）和改造世界、改造自己的能力即主观能动性。革命的主体五亿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成为建设的主体，创造平等的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以此一“人民平等”的原理（横向的组织）为基础的。拥

有 450 万党员的共产党成了“执政党”，构筑了“中央——地方(省、县)——基层(乡、镇、单位)”的“领导——服从”的巨大的金字塔型组织，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它以这一“共产党的领导”的原理(纵的组织)为钢筋。毛泽东是想把“毛泽东——共产党——人民群众”(以下简称“毛——党——人民”)的循环结构，从根据地扩大到国家。身为政治领袖和思想导师的毛本人作为核心，保持横的与纵的两方面的均衡。他一方面力图发动群众运动，使人民作为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断地认识矛盾并通过实践加以解决，朝着“大同”的方向前进，另一方面，尽力要求共产党实行群众路线，使其集中人民群众的意见，制定方针，领导人民群众执行方针。而毛又谋求将群众运动和群众路线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取代了过去的儒教和王朝，成了中国统一的普遍原理。可以认为，毛希望利用在形式上类似旧中国的“君——臣——民”的环流结构的新的循环结构，<sup>①</sup>而在内容上将其颠倒过来。

下面，我想内在地追寻毛泽东思想发展过程的同时，正视毛领导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所造成的巨大牺牲与损失，以“人民”理想主义和“实际”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为线索，考察其思想在从革命向建设发展的过程中，哪些是一贯的？哪些发生了变化？

---

<sup>①</sup> 由“君——臣——民”构成的天下王朝体制，是在“位于顶点的帝王对天下人民的综合体”——“天”“负责，也就是天子”(对人民负责)，和“君臣集团对自然的生存(天下的人民)单方面的君临统治”(“上下秩序的命题”)，这两个契机的均衡之上成立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在所说的天→天子=帝王→人民=天的权威的环流构造之上成立的相对的上下秩序”(《西顺藏著作集》第二卷，第 202 页)。“毛——党——人民”的循环构造是站在这样的观点上：“因为世界上有压迫人民的敌人存在，人民要推翻敌人的压迫，所以要有革命党”(《毛选》第三卷，第 811 页)。党是人民的革命工具，群众路线是“人民→党→人民”的认识与实践的循环构造；开门整风和整党，接受人民群众的批评，整顿自己的思想、作风与组织，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党→人民”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循环构造。据此防止党将自己绝对化，颠倒为“主人(人民)的主人”。毛泽东既是党的领袖、导师，又是人民的领袖、导师，发挥循环构造的核心作用。在把依赖君主而生存的客体(天下的人民)转变成革命和建设的主体这层意义上，希望新的循环构造颠倒旧的环流构造。

# 第一章 朝鲜战争与社会主义改造 (1949—1956)

##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与朝鲜战争

人民解放战争打败了得到美国援助的国民党政权,取得了胜利。在此基础上,1949年9月21日至30日,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所组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以下简称为“政协”)在北京召开。它给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画上句号,并决议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致开幕辞说,中国人在近代由于“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而落伍了,通过一百多年的斗争,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列入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毛选》第五卷,第5页)。这表明,自鸦片战争以来“救亡”的课题已基本完成了。并且,他提出了今后的课题:国家的巩固、经济建设、文化建设。

10月1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30万人民群众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凡愿意遵守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重要文献》第一册,第21页)。毛泽东作为领导了中国革命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又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作为国家统治者领导建设。毛泽东与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朱德（军委副主席、政府副主席）、刘少奇（军委副主席、政府副主席）、周恩来（军委副主席、政务院总理）、任弼时（中央秘书长），组成了党的最高领导层。

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重要文献》第一册），在序言中指出：“中国人民由被压迫的地位变成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同上，第1—2页）。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1949年3月5日—23日）做出决议：“使中国有可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央文件》第18册，第196页），但在以此为基础的《共同纲领》中，却根本没有提及社会主义。

关于国际政治，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另起炉灶”（不承认国民党政府缔结的旧外交关系，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向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将帝国主义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后，建立外交关系）等方针（《周选》下卷，第85—88页）为基础，根据“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共同纲领》第五十四条）的原则，呼吁与各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相继得到了以苏联、东欧、朝鲜、蒙古等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为首的缅甸、印度、锡兰、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各国，以及英国、挪威、丹麦、芬兰、瑞典、瑞士、荷兰等西欧各国的承认，并建立了外交关系。

可是，美国自19世纪以来，推行门户开放政策，努力确保中国市场，在1947年以后，将国际政治看做是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将中国革命看做是由于“苏联帝国主义”的扩张而导

致“丧失了中国”。因此，它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阻挠中国加入联合国，把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视为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而继续予以支持。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对斯大林鸣不平，说十年内战时期他因王明路线受到打击排挤，斯大林立即插话说：“胜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师哲，第435页）。斯大林意图维持苏联1945年8月与国民党政权缔结的雅尔塔协定的产物《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毛泽东与其进行了斗争，让其接受了将旧条约替换为以“防御日本及其同盟者的可能的侵略”和“承认外蒙独立”为基本精神（致党中央电，1950年1月3日。《毛稿》第一册，第213页）的新条约。毛泽东将周恩来等人叫到莫斯科，从1950年1月开始进行正式谈判。2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各协定。据此，中国在1952年年底前收回自1945年失去的东北的权益，从苏联得到了总额3亿美元、年利为1%的贷款<sup>①</sup>。毛泽东回国后，在解释缔结这一条约及各协定的意义时说：“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1950年4月11日。《毛稿》第一册，第290页）。

1950年6月25日爆发的朝鲜战争，对建国尚不足一年的新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毛泽东决定中国参战，领导了战争与和平谈判，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周恩来作为副主席，辅佐毛泽东主持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关于毛泽东决定赴朝参战，和田春树在《朝鲜战争》（1995年）一书中，“强调了中国的革命、国共内战和朝鲜战争的连续性”（第78页），

---

<sup>①</sup> 可是，在秘密的《补充协定》中，中国的东北和新疆事实上成了苏联的“势力范围”（《外交史1949—1956》，第25页）。1958年3月10日，毛泽东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还有两块‘殖民地’，即东北和新疆，不准第三国的人住在那里，现在取消了”（《万岁》丁本，第164页）。沈志华的《中苏条约交涉中利益的冲突及其解决》（《思想》2001年8月号），用前苏联的文件，证明了意图维持旧条约的斯大林作了两次让步的具体过程：第一次是同意了毛泽东缔结新条约的要求，第二次是接受了周恩来的提议，就是将废除旧条约及关于东北的中长铁路、旅顺口、大连港的旧协定与承认外蒙的独立结合起来的提议。但是，我对沈志华的上述说法持有疑问：由于斯大林希望获得“面向太平洋的出口与不冻港”的战略目标没能在东北实现，作为其代价，支持了金日成的朝鲜战争计划。

他的看法如下：

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中国内战的朝鲜人部队，于1949年5月和1950年1月转籍到朝鲜人民军。部队的42000名士兵大概“有一种很强的意识，就是中国革命已经胜利了，这回该轮到朝鲜啦”（第26页），很可能“当时的中国领导人作为共产主义者，忠实于国际主义，……认为应在尽可能的范围内进行帮助”（第38页）。但是，对于具体的行动，毛泽东是慎重的。1949年5月17日，他对金说：“没必要短时间内进攻南方，……因为中共还在和国民党军队打仗”（第357页）。1950年4月10日在莫斯科，金日成和朴宪永的武力解决方案获得了斯大林的支持，“受到‘最终的结论要同毛泽东商量之后再决定’这一指示”。5月13日他们访问了北京。“中国的领导层恰恰是出于对朝鲜同志的情义，和与美军的战斗是像命运似的不可避免的这一认识，才同意参战的”（第38页）。

这种看法大体上是正确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依据将人民反抗侵略作为革命战争动力的“正义战争的防御战”思想、坚持对南方进攻北方反击这一形式，警告美国插手的可能性以及劝告北朝鲜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完全胜利之前不要进攻南方。

另外，和田春树在《朝鲜战争全史》（2002年）中，引用了刚发表的俄罗斯的新资料，弄清了朝鲜战争从共谋到开战的经过：1949年3月14日，金日成和朴宪永寻求对武力统一政策的认可，当初对此并不同意的斯大林，通过1949年末开始同毛泽东的会谈，“相见”了“中国革命”，1950年1月便提出了“按照中国革命的激进路线，推动亚洲革命的方向（第95页）”<sup>①</sup>；由此，金日成的政策“得到了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认可与帮助，北朝鲜首先开始了进攻”（第12页）。并且他还

---

① 《朝鲜战争全史》认为，1950年1月4日《真理报》刊登刘少奇在世界工联亚洲、大洋洲、工会大会上的开幕词（1949年11月16日），“表明了苏共支持刘在论文中提出的武装斗争与群众斗争相结合的中国革命的道路是亚洲人民解放的‘基本之路’的主张”（第94—95页）。的确，刘少奇说，由统一战线、共产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武装斗争所构成的中国革命的道路，“有可能成为情形相类似的其他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解放的基本道路”（《刘稿》第一册，第135页），他强调了武装斗争与群众斗争相结合。不过，他虽举了越南、缅甸、印度尼西亚的民族解放战争、马来西亚、菲律宾的游击战、印度的武装斗争的例子，但对于日本，却讲“进步的人民运动”和“进步的工人运动”；关于朝鲜，只说了

弄清了下述事实：斯大林主导了停战谈判，并把全权委托给毛泽东领导，支持他会谈，1952年对希望达成谈判协议的金日成给予同情。这样，和田春树将朝鲜战争看做是东北亚战争，力图进行全面的论述。

以此为背景，我们来考察参与朝鲜战争的毛泽东的思想。

如前所述，毛泽东提出了这样的逻辑：只有中国等位于美苏中间地带的人民战胜美国反动派及本国内的它的走狗的进攻，才能遏制第三次世界大战。在冷战下，他依据这个逻辑发动人民解放战争，打垮了得到美国的资金与武器援助的国民党政权；而在这一过程中，为准备对付美国出兵干涉，部署了大量的军队。毛泽东建国后继续国共内战，判断越南、台湾海峡、朝鲜中的一方免不了与美军作战，所以1950年4月30日海南岛解放以后，他将第四野战军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作为战略预备队集结于河南，以应对上述三个方面（姚旭，第7页）。毛泽东做这种准备，是将金日成的武力统一朝鲜作为中国革命延伸的“朝鲜的人民解放战争”来加以支持的。

1950年6月25日，在反击韩国军队进攻的借口下，北朝鲜军队向南开进。美国将此看做是受苏联指令的国际共产主义的侵略，同一天，使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要求北朝鲜撤回三八线以北的决议；27日杜鲁门总统发表声明，采取了美军出兵韩国、向台湾海峡派遣第七舰队、加强对菲律宾、印度支那的军事援助的措施。6月28日，毛泽东主张：“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和坚决的反抗”（《毛稿》第一册，第423页）。他谴责美国向台湾海峡派遣舰队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同时表明了中国是站在朝鲜、菲律宾、越南等被侵略者方面。他是用亚洲各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一独自的世界构图（南北轴），来对抗美国称之为

---

“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傀儡李承晚，要求建立统一的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运动”，采取了考虑各国的特殊性的慎重态度。在我看来，假使斯大林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利用刘少奇的演说，要求日本进行武装斗争，批准了朝鲜的武装斗争的话，那么就是无视了刘的慎重的态度，没有充分研究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而是将其作为普遍性强行推广到其他国家。



共产主义对自由世界的侵略的世界构图(东西轴)。

同一天,中央军委决定把以战略预备队为主力组成的边防军,集结到鸭绿江北岸。9月5日,毛泽东指出:美国的长处是“铁多”,弱点是“战线太长”,“运输路线太远”,“战斗力太弱”(“一长三短”)。他提倡这样的打法:“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毛文》第六卷,第93—94页)。

7月初和8月与9月,毛泽东建议北朝鲜方面,要防备美军在仁川与汉城之间登陆(《战争史》第一卷,第118页),但却未被接受。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作战,南下的朝鲜人民军全线溃败。韩国军队于10月1日、美军于9日越过三八线向北进攻,劝告金日成投降。中国政府通过印度警告美国,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周谱 后》上卷,第83页)。

10月1日,毛泽东接到了北朝鲜的出兵请求,2日起草了给斯大林的电报,说:“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关于作战方针,他说:第一,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军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不过,如果第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问题就好办了。关于苏联的援助,毛泽东认为,要歼灭美军需要用美军四倍的兵力和一倍半至两倍于敌人的火力,要求尽快将武器送过去,要求派遣空军保卫大城市(逢先知、李捷,第137—139页,及卷首的电报手稿的照片版)。这里展示了毛泽东对抗美援朝战争的基本设想。

然而,在同一天的书记处会议上,不赞成出兵的人占多数,所以这封电报就没发。3日,毛泽东通过苏联大使罗申给斯大林发电报,谈了多数人的意见,列举了下述理由:因为我军装备极差,无胜利把握;这将引起美国和中国公开冲突,苏联也可能被拖进战争中来;和平建设计划将被打乱,引起国内不满。电报又说:因此“暂不出兵,同时准备力量”;我们将召开党中央会议,对此问题尚未做出最后决定;

我们准备让周恩来和林彪去和您商量(《战争史》第一卷,第163页)。

4日,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毛泽东在听取了出席者所谈的出兵不利的理由后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彭述》,第257页)。出席会议的彭德怀认为,毛泽东的讲话是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结合,他经过深思熟虑,于5日找毛泽东谈话,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赞成出兵,于是决定由彭任指挥。8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将边防军改编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命令出兵朝鲜。

11日,周恩来和林彪与斯大林进行谈判,要求苏联给予武器装备和提供空中支援。当天斯大林和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说:关于7月份定好的空军的掩护,苏联无法准备,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才能出动。毛泽东12日将出兵推迟,13日再与彭德怀等政治局委员商议后,再度确认要出兵。于是他给周恩来发电说:“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水丰电站)将被控制”(《毛稿》第一册,第556页),提出了对苏联的要求。斯大林同意以借款而非现金的方式提供武器。但是,苏联说只派遣空军保卫中国的领土,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斗。17日,毛泽东命令停止出兵;18日,在中共中央会议上听取了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汇报后,又决定出兵,命令志愿军从19日起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

到实际出兵,毛泽东虽曾左右摇摆,但他独自进行了反复思考,耐心说服了党的高层领导,请求苏联进行军事援助,最终实现了自己的初衷。

实际上,苏联空军自1950年11月1日起,在鸭绿江地区上空与美国空军作战。自1951年第二季度至停战,在朝鲜北部的清川江以北地区上空,苏军掩护了铁路运输与后方目标(《战争史》第一卷,第169页)。

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说服

中国老百姓，只有在朝鲜阻止美军的侵略，才能保住革命所解放了的家与国。出兵后的11月4日发表的由中国共产党等11个党派组成的《各民主党派共同宣言》指出，美帝国主义者与此前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样，企图“并吞朝鲜”、“侵略中国”、“统治亚洲”、“征服全世界”，号召“救邻即是自救，保卫祖国必须支援朝鲜人民”（《重要文献》第一册，第455—456页）。毛泽东是想将近代最大的抗日“救亡”运动的能量，原封不动地用到全体动员抗击美国上。

关于战争的进程，毛泽东制定了下述总战略：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军以人民志愿军的名义出兵，避免中国与美国两个国家间进入战争状态，将战争局限在朝鲜，用地面战打击敌人，迫使美国进行外交谈判，不要发展成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认为，志愿军虽然因第四次战役、第五次战役失败而改变了军事方针，但基本上完成了既定目标。

针对第一线10个师13万人的敌军，从10月19日开始，毛泽东一举派遣人民志愿军18个师26万人进入朝鲜，在兵力上占了上风。在10月23日致彭德怀和高岗的电报中指示，劣势武器装备的我方要战胜优势的敌人，应遵循“从稳当的基点出发，不做办不到的事”的原则。作为具体的战术，毛泽东提出了三点：利用敌人毫无预料的突然性全歼伪军（韩国军）两个、三个甚至四个师；依靠夜间行军作战来避开敌人飞机的杀伤与妨碍，各个歼灭大城市之外的敌军和美军的增援师，“迫使美国和我进行外交谈判”；在敌人的援兵到来之前，依靠运动战以及打孤立据点，歼灭美军和韩国军的几个师（1950年10月23日。《毛稿》第一册，第588—589页）。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北部山岳地带，用人民解放战争的运动战的打法，开始战略反攻。10月25日至11月5日的第一次战役，主要打击了韩国军队；11月25日至12月24日的第二次战役，诱敌深入，取得了近距离战的胜利，迫使美韩军队退到了三八线以南。在这个过程中与朝鲜人民军配合作战。12月3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与金日成会谈，决定对外不公开，设置中朝联合司令部，进行统一指挥，由彭德怀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朝军队从12月31日至1951年1月8日进行了第三次战役，越过三八线，占领了汉城，逼近了37度

线。彭德怀对越过三八线持慎重态度，但毛泽东致电给彭德怀。指出英美等国军队想让我军停在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停在三八线以北，政治上会不利。

1月13日，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通过了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的五项提案，但毛泽东却拒绝该提案提出的“先停战后谈判”方案，决定提出由“在同意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的基础上举行有关各国的谈判，以迅速结束朝鲜战争”（《执政四十年》，第28页）等组成的四条方案，得到了金日成的同意，17日由周恩来提出。毛泽东之所以拒绝了五项提案，是因为他有通过第四次战役、第五次战役将美军赶出朝鲜的强硬的预见。

然而，装备占优势的联合国军队进行了大规模反攻，开始了1月25日至4月21日第四次战役<sup>①</sup>。由于疲劳、伤亡与补给不足等原因，战斗力下降的中朝军队开始转为防御，并后退至三八线以北。2月8日中央军委指示志愿军，采取“长期作战”与（派遣国内部队）“轮番作战”的方针。2月下旬毛泽东听了彭德怀速胜不可能的说明，指示“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彭述》，第261页）。毛泽东在3月1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转达了实行轮番作战、长期作战，消耗美军，迫其撤退的方针（《毛稿》第二册，第151—153页。《周军》第四卷，第162—165页）。中朝军队从4月22日至5月21日发起第五次战役，向南进攻，但损失很大，撤回到了三八线，战线呈胶着状态。

5月31日，凯南向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传达了美国停战谈判的意图。6月3日，毛泽东与金日成商量，决定“实行边打边谈的方针”<sup>②</sup>（《战争史》第三卷，第18页）。6月13日，金日成与高岗去见斯大

---

<sup>①</sup> 目前在中国，有人批评志愿军总部根据中央军委的要求而制定的“全歼敌人，全部解放朝鲜”的作战目标，“对于敌方的力量还估计不足”，犯了战略判断的错误（徐焰，第95页）。

<sup>②</sup> 关于6月3日毛泽东与金日成的会谈，《朝鲜战争全史》改变了自己原来所持的中国方面“很显然是想试图说服金日成开始停战谈判”（《朝鲜战争》，第213页）的见解，认为斯大林于13日说服高岗、金日成开始停战谈判，21日，一面约定提供相当于60个师的装备，一面使毛泽东接受了停战谈判的建议（《全史》，第309页）。可是，假使6月3日毛与金同意“边打边谈”的话，那就既与13日之前毛对邓华的指示一致，也与要求斯大林强化战斗力相符。看来和田未必认为21日毛才被迫接受了停战谈判建议。

林,说希望停战。

6月13日以前,毛泽东向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传授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总的战争指导方针和“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毛纪事》,第863页),并让其传达给彭德怀。7月1日,彭德怀对此表示赞同,发电报说:“坚持以三八线为界,双方均过得去”(《彭选》,第412页)。

7月10日,停战谈判在开城开始,之后在板门店进行。中朝军队大致沿着三八线,从东海岸向西海岸挖了上下两层的“地下长城”,即建成纵深防御阵地,坚持阵地战。通过五次战役,结束了战略进攻与运动战的阶段,进入了积极防御与阵地战的阶段。这种阵地战是过去的革命战争所没有的新战法,毛泽东高度评价了指挥官与士兵在实践中所产生的智慧。

1952年6月以后,美军猛炸北朝鲜,斯大林对希望达成停战谈判协议的金日成表示同情。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26日毛泽东决定<sup>①</sup>在送还俘虏问题上让步,实行停战;7月27日,朝鲜人民军、中国人民志愿军与联合国军双方代表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毛泽东说:依靠人民与比较正确的领导,劣势装备的中国军队战胜了优势装备的美军,将美军打回到三八线;取得了军事经验,知道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1953年9月12日。《毛选》第五卷,第103页)。毛泽东将以上四点视作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重要意义。可以认为,在世界战争(核战争)爆发的威胁下,中国进行了一场现代化的国际的局部战争,达到了保卫自己的国家与对朝鲜履行国际义务的既定目的,所获得的经验为以后应付中苏论战及越南战争打下了基础。

---

<sup>①</sup> 当初中朝方面坚持日内瓦条约的规定,立即送还俘虏。1952年1月美国方面提出根据自由意愿送还(将希望去台湾的俘虏不送还中国军队),双方因此产生了对立。对于联合国军的11559名(其中美军3198人)、中朝军队132473名(其中中国军队27000人)俘虏,毛泽东果断提出了一个让步的方案:先交换伤病俘虏,接着再送还自己要求回去的俘虏,剩下的(自己不要求回去)俘虏交给中立国(然后决定去向)。这个方案得到了实施。

然而，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所遭受的损失也是巨大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方面发表的伤亡人数是：美军29万人，中国军队36万人（其中死亡15.6万人）（徐焰，第360-361页），但联合国军方面正式发表的美军伤亡人数为13.7万人（其中死亡3.3万人），它估计中国军队的伤亡人数为90万人。看来毛泽东在1953年的讲话中之所以强调了重工业建设，就是因为尝到了美中军事技术差距过大的苦头，痛感有必要加速本国的工业化，推进国防现代化。可以认为，这之前的1952年7月10日，毛泽东指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毛稿》第三册，第489页），和1953年9月之后提出的以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为目标的过渡时期总路线，都是出于同样的动机。另外，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志愿参加了人民志愿军，在总司令部担任俄语翻译与机要秘书，1950年11月25日被美国空军投下的凝固汽油弹炸死，年仅28岁。可以感到，身为父亲的毛泽东是让儿子代替自己去了朝鲜。

朝鲜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在亚洲援用“遏制共产主义政策”，形成了由日本、韩国、台湾与东南亚条约机构（1954年9月设置。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等八国加盟。印度支那包括在适用范围内）组成的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圈。中国通过与美国势均力敌的争斗，提高了国际威信，确立了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老二地位。1954年4—7月，以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参加了日内瓦会议，与美、英、苏、法一起，作为五大国之一，参与解决朝鲜统一问题与印度支那停战问题。

那之前，在1946—1954年的印度支那战争中，1950年1月中国接受了胡志明的请求，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派遣了军事顾问团和政治顾问团，加强了对武器、粮食和衣服的供应，支援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抗法战争。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出于共产主义者的国际主义考虑，而且，也把越南看做与朝鲜、台湾海峡一起并列为值得警惕的三个方向之一，支援其阻止来自美国的侵犯，保卫祖国。1954年7月缔结了日内瓦协定，关于越南，它规定以北纬十七度线为暂定军事边界线实行南北分割，两年之内通过实施普通选举实现统一。

其间,6月周恩来访问了印度与缅甸,分别发表了共同声明,提倡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和平外交五项原则”。12月1日,毛泽东会见缅甸首相吴努,主张各国独立与平等,说:“国家不应该分大小”,“(大国和小国)也应该是完全平等的”,“大国不应该损害小国,不应该在经济上剥削小国,在政治上压迫小国,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外交》,第191页)。1955年4月,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亚非二十九个国家制定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万隆十项原则,努力扩大和平区域。南亚、中东、北非诸国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关于台湾,美国1951年2月与其缔结了《共同防御协定》;强求日本与蒋介石政权讲和,1952年4月缔结了《和平条约》;1953年2月解除了台湾海峡的“中立化”,允许国民党军队在沿海岛屿从事干扰大陆的工作,1954年12月缔结了《共同防御条约》。

对此,中国于1954年8月由全国政协通过了各民主党派倡议的解放台湾共同宣言,9月中国军队炮击金门岛,1955年1月占领了一江山岛,2月国民党军队从大陈岛撤退,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4月23日,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发表声明,说:“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4月27日,毛泽东对巴基斯坦驻华大使说:“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一切问题应通过谈判来解决,打仗的办法不好”(同上,第204页),极力主张和平共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接受了这个建议,1955年8月至1957年12月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举行。

## 第二节 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与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关于国内政治,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首先慎重地对待新民主主义革命留下的课题:集中力量歼灭国民党残余部队;进行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中共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地主阶

级进行集中攻击，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保存富农经济，力图恢复国民经济；取消了帝国主义各国的经济特权，对外国资本，将大企业国家所有，将一般企业置于政府的监督之下，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将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民族工商业。走上“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共同纲领》，第三条）的道路——这个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是由国营、合作社、个体、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多种经济成分组成的。另一方面，基于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国内基本矛盾的观点，根据土改所强化的工农联盟这一条件，为了克服资本家贿赂党员、干部，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现象，从1951年末开始，以党员、干部为对象，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从1952年初开始，以资产阶级为对象，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群众运动。由此处分了一部分党员、干部，给民族资产阶级以打击，加强企业内部的共产党与工会的力量。

1952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超过了建国前的最高水平，恢复国民经济的时期结束。1951年春后着手编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年起开始实施。1952年9月，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1953年6月15日又在政治局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对此正式进行了讨论。6月30日，他言明：“现在朝鲜停战，土地改革结束，国内工作的重点正在转到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毛选》第五卷，第83—84页）。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上明确记载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与“社会主义改造”，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为了促进政治、经济的改革，着手进行文化改革，要求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1956年基本完成了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比预定的时间大为提前。

我们将重点放在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上，考察毛泽东的思想是如何主导上述变革过程的。



## 一、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

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的战略方针是，正如七届二中全会所决定的那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实行新民主主义，“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受到了“一九五三年……中央决定全党的干部学习”（逢先知，第33页）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党史简明教程》）的第九章至第十二章的国民经济复兴（1921年—1925年）、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1926年—1929年）、农业集体化（1930年—1934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完成及新宪法的实施（1935年—1937年）这种阶段划分的影响，特别是将拖拉机与农业机械化的大批生产作为前提条件，消灭富农、强行推进农业集体化的经验的强烈影响。刘少奇在1951年3月讲，中国共产党“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刘选》下卷，第62页）。5月，他又说：“单靠农民的力量转到社会主义去是不可能的。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和帮助，有了国家工业化，才能供给农民大量的机器，然后实行土地国有化、农业集体化才有可能”（《集体化》上册，第32页）。这是国家工业化先行论。

自1950年冬至1953年春，中共中央在新解放区通过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打倒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完成了土地改革，而且，为了发展农业生产，采取了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另一方面，土地改革的过程中，在采取没收富农剩余土地政策的老解放区，1950年东北局首先对发展富农经济表示了担心。接着，山西省委在1951年4月17日的报告“进一步提高老解放区的互助组织”中建议：一部分农民成了富裕中农，正在向富农的方向发展，互助组正在涣散解体；欲提高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一些的合作社形式，战胜农民的自发的趋势，增强公共积累和按劳分配，逐步地动摇、削弱、否定私有制基础。5月4日，华北局表示反对这种意见。7月3日，刘少奇严厉批评山西省委说：“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共和国》，第二册，第36页）。

可是，毛泽东对刘少奇、刘澜涛（华北局书记）、薄一波（政务院财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讲：我不能支持你们，而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毛泽东讲的道理是：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制基础也是可行的。大家都被他说服了（薄一波，第191页）。9月，召开毛倡议的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后，陈伯达起草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毛泽东亲自起草了“通知”，12月15日把它印发到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要求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决议》肯定，农民发扬起来对“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与“劳动互助的积极性”俱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和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基本要素之一”（《重要文献》第二册，第510页）。它提出了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三种形式：简单的、临时性的、季节性的劳动互助；常年互助组；以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后来的初级合作社），强调稳步前进，坚持农民自愿与互利的原则，防止“强迫命令”与“放任自流”这两种错误。

1952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长李维汉起草的《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稿）》上写“批语”：“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毛选》第五卷，第65页），并修改了草稿。

9月24日，在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毛泽东发言，大意是：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至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薄一波，第213页），掀起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讨论。他提出的论据是：在工商业中，国营的比率增大了，私营的比率减少了，将来民族资本家将离不开共产党；在农业上发展互助合作，10年后有可能允许地主、富农加入。同年10月，出席苏联共产党第19次代表大会的刘少奇，受毛泽东的委托，给斯大林送去了书信，说明了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构想——工商业中国营经济比重的增加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比重的减少，农业中农民

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与限制富农发展的办法,手工业中组织合作社的运动等(《共和国》第二册,第18—22页),得到了斯大林的赞同。可以认为,刘少奇为毛泽东的思想所吸引,改变了他自己当初的设想。

1953年6月15日,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批判了刘少奇等人“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观点,主张:“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与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毛选》第五卷,第82页)。在8月12日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将“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看做是离开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批评其制定者薄一波为“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12月,毛泽东最后确定了总路线的表述,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定为“过渡时期”,将“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定为“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完成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化三改造。《毛稿》第四册,第405页)。“相当长的时间”被预想为从1953年起的15年,用三个五年计划,如果加上之前所述的恢复时期的话,共18年,截止到1967年。关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毛泽东是想开创一条与苏联及刘少奇的国家工业化先行论不同的、国家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齐头并进的独自的道路。

与总路线的理论探求相对应,党中央在农业合作化的实践中,基于《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1952年推进了互助合作运动,参加的农户与上年相比翻了一番,达到了40%,但冬天出现了“冒进”、强迫命令的倾向,所以1953年3月对此进行了纠正。党中央为了应付由于工业化的发展对城市粮食需要的增大,一方面在10月决定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另一方面又召开了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12月通过了决议,想要依靠农业合作化来实现粮食增产。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以纠正冒进为借口,强迫解散合作社、“确保私有”及“四大自由”(借贷、租佃、雇工、贸易的自由)等,认为邓子恢为部长的党中央农村工作部的重视个体经济积极性的政策,是“惠及富农和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毛选》,

第五卷,第120页)才是主题,即“纲”,主张走合作化、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从1951年决议(草案)中的发挥农民个体经济与劳动互助两方面的积极性这一逻辑转换而来的。

自1953年秋起,开始出现了建立初级合作社的高潮。合作社由1951年的300个增加到1953年的14000个,再到1954年秋的10万个和年底的48万个,1955年发展到65万个,但统购粮食中有购了过头粮与过急冒进的做法,侵害了中农的利益,致使农民出卖和宰杀家畜、生产情绪低落。1955年初,党中央采取纠正措施,3月上旬毛泽东在同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中指出:“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牛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并指示“停、缩、发”三字方针(《编年史》,第80页)。农村工作部实行三字方针后,农村的紧张局面开始扭转。不过,毛泽东5月17日在十五省市书记会上,批评了对合作化的消极情绪,强调了“发展”。农村工作部提议、政治局批准的计划是:到1956年春,由现有的65万个合作社增加50%,发展到100万个。6月下旬,毛泽东要求翻一番,发展到130万个,与坚持原计划的邓子恢展开了争论。毛泽东仔细检查了农村工作部的文献档案,将邓的思想定为右倾(“事物在时间中运动,到那个时候该办了,就要办,你不准办,就叫右倾”。《毛选》第五卷,第214页)。

1955年7月29日,毛泽东给农村工作部《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最近情况简报》写了“批语”,让参加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的人员传阅。毛泽东主张:要发挥贫苦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看到农民的两面性——即“集体经营与个体经营两种思想的矛盾”,用15年的时间,赢得集体经营思想占优势;要教育贫农不要“揩油”(掠夺中农的利益),要以发放贷款的办法支持贫农,同时应当教育中农顾大局,只要能增产,只要产量收入比过去多,小小的入社时的不公道,也就算了。他教导说:要教育贫农和中农的两方面的人顾大局,要看到问题的本质,看到事物的主导或主流方面,要有坚定的方向,要不动摇,对非本质、次要方面也不能忽略,解决存在着的一切问题(《毛稿》,第五册,第229--230页)。

毛泽东将这个“批语”的意思加以展开，7月31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指出：“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来到”，“……群众运动走在领导的前头，领导赶不上运动”（《毛选》第五卷，第168—169页）。他1927年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将暴风骤雨般的农民运动作为国民革命的最根本的力量加以肯定，要求革命党不要对此加以反对、批评，要站在前面加以领导。这显然是那种态度的再现。毛泽东主张：社会主义建设与革命战争一样，要依靠人民做动力、党领导的群众运动加以推进；贫下中农是这场群众运动的承担者——因为他们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分得了土地，却由于人力、畜力和农具的不足，生活仍然感到困难或者还不富裕，因此“有一种组织合作社的积极性”、“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他认为：大多数农民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他们正因为贫苦，才想要自己加以克服，发挥主观能动性。他们就是曾为革命战争主力的贫农、雇农的后身。

另一方面，毛泽东批评农村工作部：他们“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群众运动的后头走路，批评、埋怨说走快了，制定许多清规戒律进行束缚；他们只看见了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力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富裕的农民，忘记了大量的贫农和不富裕的农民，悲观地看待目前合作社的情况为“超出了干部的经验水平”，这是错误的思想；经验是只有用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中学习的方法去取得的。毛泽东批评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同上，第183页）；同年3月末至5月初采取“坚决收缩”方针，解散浙江省53000个合作社中的15000个的做法，是“犯出右的错误”。

毛泽东分析了目前中国农村的矛盾，认为存在着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与个体农民的所有制。他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认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贫困，也有些人欠了债、出卖土地、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发展下去，向两极分化的现象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因此，他主张，只有“实行合作化，在

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同上，第187页)，才能巩固工农联盟。作为具体的政策，他指示：要纠正“排斥贫农入社、不照顾贫农的困难”，和“强迫富裕中农入社、侵犯他们的利益”(同上，第169页)这两方面的错误；坚持增加农作物产量的原则与自愿、互利的原则，先由贫下中农组成合作社，然后再去吸收富裕中农，避免命令主义；在已经巩固的合作社当中，可以接收少量的、态度好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加入，让他们参加集体劳动，加以改造。为了建立并整顿合作社，毛泽东周密地考虑到了建立并整顿共产党与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乡支部，教育并训练干部，向农民进行宣传与说明，制定全国、省、专区、县、区、乡的全面的规划与分期实行的规划等事宜。

而且，在理论方面，毛泽东在坚持农业合作化的步骤应当和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骤齐头并进这一基本方针的同时，突破苏联及刘少奇的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机械化先行论，提出了独自的合作化先行论。他是想在工业落后的中国，创造出一种国民经济循环——通过依靠贫苦农民的积极性，让合作化先行，农业积累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资金，向工业提供商品粮食与工业原料，重工业向农业提供生产资料，轻工业向农业提供生活资料。可以说，这是一个基于中国国情的设想。

毛泽东的报告触动了全党，全国各省开始反对右倾思想、推进合作化。在10月召开的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邓子恢及农村工作部作为右倾机会主义受到了批判。毛泽东用十一天阅读了各地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120篇，修改了其文章，给其中的104篇写了评语，写了两篇序言，编成《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12月出版。在评语中，毛泽东非常乐观地写道：“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是有的，但是整个的运动是健康的”(同上，第219—220页)；“一切地方的党组织都全面地领导了这个运动。农民是那样热情而又很有秩序地加入这个运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最广大的群众第一次清楚地看见了自己的将来”(同上，第223页)；“总之，1955年的下半年，我国的阶级力量对比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大为上升，资本主义大为下

降”(同上,第232页)。同时,毛泽东向全党要求:党发动群众加入合作社这一工作,采用“不是命令主义的或者简单从事的方法,而是向群众讲道理、作分析,完全依靠群众自觉自愿的方法”(同上,第236页)。而且,他强调了对农民开展政治思想工作的必要性,说:“反对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精神,是使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地过渡到大规模合作化经济的思想的和政治的保证”(同上,第244页)。

在《关于农业合作化》中,毛泽东提出的计划是:1958年全国农户的半数加入初级合作社,到1960年之前,剩下的一半加入初级合作社,之后到第三个五年计划结束的1967年之前,逐渐过渡到将生产资料公有化的高级合作社。不过,实际情况远比这快得多,到1956年底之前,全国农户的96%加入了农业合作社,88%加入了高级合作社,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可以认为,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好的传统——“凡是上级组织已经决定并下达了的任务,下级党组织和各级干部总是保证提前或超额完成”(庞松,第419页)这一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传统,加重了反右倾的政治压力……共产党在各省竞相且伴以强制性地领导农民、推进合作化这一“来自上边”的力量造成的。另一方面,拥有在党的领导下,以群众斗争的方式完成了土地改革经验的大多数贫下中农,对于毛泽东所发出的摆脱贫困只有依靠合作化、不能依靠个体经营这一号召,激起了远远超过预测的强烈共鸣,开展了波涛汹涌的群众运动这一“来自下面”的力量发挥了作用。

农业合作化运动急速发展,加速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向公私合营过渡,1956年底基本完成;同样也加速了手工业的合作化,同年底基本完成。可以说,在实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还没有实现国家工业化之时,实现了三个社会主义改造,事实上由同时并进论变成了所有制改造先行论。

1981年中共中央所作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1956年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评价为:

“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并且也指出：工作中存在着缺点与偏差，在长时间遗留了一些问题。恪守这个大框框的党的理论家丁一指出：

通盘考虑当时的状况，又不可能待条件完全具备之后再搞农业合作化。这主要是因为，第一，农业生产力的大幅度发展和先进农具及其他生产资料的获得有赖于国家实现工业化，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要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又首先要求农业能够尽快生产并提供大量商品粮食、工业原料和资金。在暂时不可能得到大工业强有力支持的情况下，能使农业生产较快发展的唯一途径只能是大力开展互助合作，靠简单协作所产生的新生产力增加农产品产量，以此冲破工农业互相牵制的困境……合作化运动期间我国农业生产没有降低反而逐年增长的事实证明，毛泽东指出的这条路符合中国农业发展和社会前进的特殊规律，是我们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作出的正确的选择……从主观上看，毛泽东在形成开拓中国农业合作化特殊道路的正确大思路的同时，对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和大工业提供强大物质技术基础这样一些实现农业合作化的重要条件却长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样一种观念上的缺陷，势必会使他对中国农业合作化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估计不足，产生求大求快的急躁情绪。（《始末》，第246页至250页）。

丁一还说：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与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内部积累增加，装备大型农具，初步实现了机械化、水利化、电气化等，今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所以能够进行的诸种条件的形成，“离开当年的农业合作化是难以设想的”。

这是非常意味深长、有说服力的见解。

## 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可以认为，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样，毛泽东想要用人民、特别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发动群众运动，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实践、去认识，共产党依靠群众路线对此加以领导的方式，来推进社会主义建



设。因此，他要求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来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方向。可以认为，他力图将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根据地所着手开展的知识分子与农民相结合、创造新文化的做法，扩大到国家的规模，将人民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革命，发展为打倒剥削阶级的旧文化，创造人民群众的新文化的文化革命。

据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时，作为拥有现代科学或文化知识与专业技术的脑力劳动者的知识分子（后分为科研、教育、工业和工程的技术、卫生、文化艺术五个方面）有200万人。关于新中国的文化建设，1950年6月6日，毛泽东提出了“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毛选》第五卷，第19页）的目标。同一天，他又主张对知识分子进行团结、教育、改造。“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同上，第23页）。1950年人民政府组织了各种各样的学习会，让各大中学校教师、学生以及各机关干部等约100万人学习政治协商会议文件，学习社会发展史，学习《新民主主义论》。知识分子学习了“劳动创造人类世界”、“阶级和阶级斗争”、“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些基本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点（杨春贵，第一编第一章）。

1951年9月，北京大学带头，北京、天津的各大学开始进行思想改造运动。9月29日，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周选》下卷）的报告。他结合自己虽生在清朝官僚的家庭、但却参加了革命的经历，号召知识分子从反对外国侵略的民族立场，进一步到反对封建买办势力的人民立场，更进一步到实现共产主义的工人阶级立场，将《毛泽东选集》作为体现中国工人阶级思想的伟大著作加以推广。关于态度问题，他要求区别敌、我、友，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态度鲜明地站在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一边。之后，各个大学都展开思想改造运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每个人都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肃清封建买办思想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推动教育改革。11月，教育部将此扩大到全国规模，91%的高等学校教职员、80%的大学生、75%的中等学校教职员参

加。教师、学生参加三反五反运动及土地改革运动实践，深化、充实了思想改造运动。

10月23日，毛泽东将各领域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定位为：“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毛选》第五卷，第49—50页）。11月30日，中共中央印发指示到地方各级党委、团委及同级政府的党组和教育、公安两部门的党组或党委：“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清除学校中的反动遗迹，使全国学校逐步掌握在党的领导之下”，“在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中和专科学校以上（即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当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肃清其中的反革命分子”（《毛稿》第三册，第526—527页）。这是一场将思想改造（教育）与肃清反革命（公安）表里如一地进行的残酷的阶级斗争。

根据党中央宣传部的建议，北京文艺界开展了整风学习；根据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各界的民主人士、无党派人士、专家进行了学习，等等。思想改造运动波及全国各界的知识分子，于1952年秋基本结束。

有人说，“经过思想改造，在知识分子中基本上清除了反动的政治思想影响，开始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编年史》，第39页）。

作为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应该学习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经典”，毛泽东编辑了《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自己的著作在建国前虽出版了单行本、论文集、选集等几种，但却是不完整、不统一的。所以，1950年2月斯大林建议：为了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应编辑、出版毛泽东的选集，毛泽东同意了，请他派理论家协助。5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毛自己主持编辑、出版工作，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等毛的秘书为其主要成员。党中央编译局局长师哲与苏联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费德林将毛泽东的论文译成俄文，以便尤金（斯大林向中国派遣来的党的理论家）看稿。斯大林读了尤金推荐的《实践论》，让《布尔什维克》第二十三期予以刊发，12月18日，《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介绍并

推荐它。《实践论》得到很好的反响。1951年1月，苏联出版了《实践论》的单行本。毛泽东让《人民日报》于12月29日刊登了《实践论》，30日刊登了《真理报》的编辑部评论。

从1951年2月初至4月底，毛泽东在石家庄休息，专心编辑第一卷（1926年3月—1937年7月）、第二卷（1937年7月—1941年5月）、第三卷（1941年3月—1945年8月），1951年10月正式出版了第一卷。毛亲自主持编辑工作：一、选定编目；二、修改内容；三、撰写和修改题解与注释；四、参加校对。毛泽东最初决定不收《矛盾论》，接着决定大幅度补充和修正后收入，进而在1951年3月8日给陈伯达、田家英的信中谈到：“此件在重看之后，觉得以不加入此次选集为宜，因为太像哲学教科书，放入选集将妨碍《实践论》这篇论文的效力”（《毛稿》第二册，第155页）。1952年4月出版的第二卷中收入了《矛盾论》，在第二次印刷时，移入了第一卷。第三卷于1953年4月出版。毛泽东审定第四卷（1945年8月—1949年9月）所收的篇目，但亲自动手比较少；1960年10月出版（刘金田）。

这一时期，毛泽东不断地发起批判知识分子思想的运动。

1951年有一些人，包括共产党员在内，歌颂描绘19世纪中叶山东农民武训乞讨攒钱兴办义学，教育穷人子弟的故事片《武训传》。5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亲自撰写了中心内容的社论《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毛泽东把《武训传》和歌颂它的意见严厉的批评为：“丑恶的行为”，“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看来，他想要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中树立这样的历史观：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人民斗争的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

在1953年9月的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上，政协委员、哲学家梁漱溟发言说，工人的生活九天之上，农民的生活九地之下，差别太大，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毛泽东将此看做是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攻击，反驳说：“差别是有”，“把工人的工资同农民的收入平均一下，拿一部分给农民，那不是要毁灭中国的工业吗？”（《毛选》第五卷，第113页）而且，毛泽东还追溯在国共合作交涉

时梁帮助蒋介石的历史，攻击说：“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同上，第107页）。梁漱溟不服，说主席把我的发言看做是恶意，因为论据不充足，就追溯过去，证明我一贯反动。他要求，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之后，主席点头说：“好，你本无恶意，我误解了”（梁漱溟，第136页）。可是，毛泽东反驳说：“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但是，我们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协委员还可以继续当下去”（《毛选》第五卷，第112页）。在从批判俞平伯扩大到批判胡适思想的过程中，1955年报刊上出现批判“梁漱溟反动思想”的文章。

可以认为，毛泽东由于明白总路线强加给农民过重的负担：让他们为国家工业化积累资金及提供粮食、原料，以为，梁漱溟提到这个问题，是想引发农民的不满，破坏工农联盟，因此而生气。而且，毛泽东感到梁漱溟顽强抵抗，伤了自己的威信，于是进行了过分的反击。

1954年9月—10月16日，毛泽东支持年轻研究者李希凡、蓝翎批判老权威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指示要批判胡适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之后，将批判俞平伯扩大为批判胡适，进而发展为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运动。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周扬（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艺界党的领导人）与左翼文艺理论家胡风（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的谈话情况的报告上写下了这样的评语：“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毛稿》第五册，第9页）。他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看过后，还给了周扬。这是针对周扬报告中所说的胡风“表示承认错误，说他是以小资产阶级的观点来代替无产阶级观点，思想方法片面，并有个人英雄主义，以至发展到与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对抗”而言。自1952年以来，胡风遭到了党在文艺界的领导人周扬、林默涵、何其芳的批判。他于1954年7月22日将一封信和“三十万言书”送交党中央，想“表明违反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不是他，而是林、何二人”（李辉，第159页）。不过，胡风批评党的文艺界领导人的宗派主义式领导：用共产主义世界观、工农兵的生活、思想改造、

民族形式、题材这“五把刀子”，削弱了作家的创作。看来，毛泽东将此看成是对自己让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进行自我改造的《文艺讲话》的思想本身的攻击，看做是使用了以“清君侧”为借口、反叛君主的古老策略，因此将胡风的思想规定为是“反党反人民”。

在读了胡风从前的朋友舒芜四月份提供的 1944—1950 年胡风的私信与胡风的自我批判后，毛泽东进一步将胡风等人定性为“反党集团”（之后定名为“反革命集团”）。他大概是先将胡风对周扬等人的顽强抵抗皆看成是对自己的权威与权力的反抗，后由此进一步追溯过去，“发现”了胡风一贯反对共产党的历史。5 月 13 日的《人民日报》同时刊登了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与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毛泽东亲自写了不署名的编者按，驳斥道：如“自我批判”所言，真正拥有“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与立场”的知识分子，“是愿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且愿意受党的领导的”；他们会有采取如“材料”所见那样的敌对、仇视和痛恨“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的态度吗？胡风的书信与从前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出版物臭味相投。没有事实证据，单凭毛泽东的嗅觉就定性为“反党集团”。5 月 24 日、6 月 10 日《人民日报》接连发表了第二批、第三批材料，都附上了毛亲自执笔的不署名的编者按。从 5 月下旬至 7 月下旬，主要地动员了知识分子，几乎每天都展开了进行粉碎“反革命集团”的大批判。

党中央宣传部与公安部共同成立了胡风问题专案组，搜集材料。胡风集团成员被逮捕、监禁。胡风被监禁十年后，1965 年被判处有期徒刑 14 年、剥夺政治权利 6 年。同年底虽被假释出狱，但 1967 年又被监禁，1970 年被加判为无期徒刑。毛泽东死后，胡风于 1979 年被释放。1980 年中共中央宣布：“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应属错案错判，予以平反。1985 年 6 月 8 日胡风去世。1988 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撤销了关于胡风的“五把刀子”、“宗派活动”、“文艺思想”的政治性结论，为其进一步彻底恢复了政治名誉。

一方面，胡风是“在晚年鲁迅的身边，为鲁迅所信赖”（丸山升 [2001]，第 91 页）的人们中的一个，是“鲁迅的自觉的、坚定的追随者”（刘再复。李辉，序 第 3 页）。另一方面，他相信自己的“主观战斗精神”

的主张，与毛泽东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有一脉相通的地方。其人物与思想在中国的文化界占有重要的、独特的地位。如果毛泽东从正面接纳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思索、讨论的话，或许有重新探讨、构筑自己的文艺领导思想的可能性。可是，实际上毛泽东将问题从用道理进行相互批评的学术讨论的“民主”领域，硬塞进政治斗争的“专政”领域，用国家权力认定胡风为“反革命集团”，对其进行了严惩。这件事，一方面给胡风等人及中国文化界以深刻的打击，使知识分子慑服在毛泽东思想的权威之下，其做法与1942年进行的批判王实味有共通性。

李辉说，“批《文艺报》、批胡适思想，已经确立了毛泽东的思想在学术界的权威地位，那么，文艺界胡风文艺思想这一块顽石，是绝对没有继续存在下去的可能了”（第206页）。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毛选》第五卷，第390页）的话，那么抑制知识分子的思想的自由与表现的自由，削弱了中国文化界的活力的做法，反过来又影响到毛自身，使其思想僵硬、创造力低下，增大了专政的因素、缩小了民主的因素。

关于1955年的阶级斗争，毛泽东说：“我们主要做了四件事：一个是进行反唯心论的斗争；一个是镇压反革命（1955年和1956年扩大了肃清胡风事件等潜伏中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令一千四百万人参加）；一个是解决粮食的问题；一个是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这一切“都带着对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性质”（七届六中全会的“结论”，10月11日。同上，第199页）。胡风事件与农业合作化一起，被定位为：为实现社会主义改造而进行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他对知识分子，让其从学习马克思主义（自觉）与批判资产阶级思想、镇压反革命（强制）两方面开展思想改造，与其说发展其积极面，不如说将重点放在克服其消极面上，但对贫下中农，却打算让其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主义积极性，来完成所有制的改造。他的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与对农民的态度是不大相同的，其两种态度之间的距离有些过大。

## 第二章 中苏论战与社会主义建设 (1956—1966)

### 第一节 《论十大关系》与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956年,毛泽东对全国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涨非常高兴,对现状与前途很乐观,思考和行动都非常活跃。

关于社会主义,毛泽东一方面以《联共党史简明教程》第九至十二章为蓝本,引进了“准备对付世界战争的新总体战体制”(和田春树,第102页),即由“共产党与国家黏合在一起,进行一元化控制社会的党、国家、社会团体打成一片的集权政治;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计划经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教化(国家意识形态化)”所组成的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框架。同时,他吸收了可以概括为“推动高速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通过党内斗争来处理‘左’右的不同意见”的这种社会主义建设的斯大林模式。另一方面,由于受到了苏共第二十次大会批判斯大林及匈牙利事件的冲击,从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毛泽东想要克服苏联社会主义的缺点、错误,开创中国独自の社会主义道路,提出了《论十大关系》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为《人民内部矛盾论》)的新理论。

1956年1月14—20日,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号召“向科学进军”。毛泽东坚信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能够迅速发展生产力的理论，号召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进行技术革命与文化革命，先接近后赶上世界水平。他虽然将重点放在“专”（专门知识、技术）上，但说，农民的个体经济已集体化，资产阶级已变成公私合营，知识分子也有改变的可能性，对“红”（共产主义政治思想）也很乐观。在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前提下，毛泽东希望争取 12 年的和平，基本也已完成工业化（1 月 20 日，《万岁》丁本）。

毛泽东对 2 月 14—25 日苏共第二十次大会批判斯大林，“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毛泽东提出了基本观点，在政治局反复讨论，由陈伯达执笔，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人民日报》编辑部执笔”的形式，4 月 5 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下简称《一论》）的文章。《一论》一方面肯定了苏共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在高度评价斯大林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法西斯的功绩之后，指出他因为欣赏个人崇拜，违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所以产生了肃反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警惕、农业政策失败、南斯拉夫问题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错误。同时，《一论》还批判了作为政策基础的斯大林的思想方法是“陷入了主观性和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情况、脱离了群众”（《重要文献》第八册，第 230 页）。并且，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主观与客观、个人与集体等矛盾的观点，介绍了中共依据在革命中形成的群众路线，克服了个人英雄主义，及掌握政权后克服共产党的官僚主义等脱离“群众”与“实际”的错误的经验。同时，还介绍了自己克服李立三、王明等将斯大林的主要打击中间势力论搬到中国革命的教条主义错误的经验，表示要继续反对教条主义。另一方面，《一论》不同意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的态度，强调要对斯大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正确性，及作为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上，第 238 页）的错误进行全面地分析，认为其成绩多于缺点。

通过苏联对斯大林的批判，毛泽东从摆脱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的束缚中获得了精神上的解放，更加大胆地探索中国独自の社会主义道路。从 2 月中旬到 4 月下旬，他听取了经济工作部门的汇



报,总结了问题的焦点。在4月26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与5月25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sup>①</sup>(以下引自《万岁》丁本。〔〕内引自《毛选》五卷,〈〉内引自薄一波)的讲话,号召“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一切可用的力量”,来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他是想将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主观能动性的革命方法也贯彻到建设当中。

关于“第一,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毛泽东认为,由于我们接受了苏联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偏重重工业、轻视轻工业与农业,导致粮食减产、生活用品不足等。这是不对的。他主张要开辟“用更多地发展轻工业与农业的方法,来发展重工业”(《万岁》丁本,第43页)的道路。他说,通过增加投资的比率来发展农业与轻工业,通过满足人民的生活、更快地增加积累来发展重工业,不要采取苏联那样的使农民负担过重的租税政策及降低农产品价格、抬高工业产品价格用于国家积累的剪刀差政策。

关于“第二,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毛泽东判断国际形势: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十年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毛泽东主张要以发展目前占30%的内地工业为主,今后要将90%以上的重工业建在内地,对全国的工业实行平衡的、合理的布局(以利于备战)。但是,兼顾目前占70%的沿海工业,应新建、扩建一批重工业。他说:“充实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好好地发展沿海工业,可以使我们有力量来发展内地工业,支持内地工业”(同上,第44页)。他尤其重视发展沿海轻工业与培养技术干部。关于“第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毛

---

<sup>①</sup> 在1956年4月25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和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其整理稿(删除了对苏联的批判)传达给了党的高级、中级干部。1965年末由刘少奇建议、毛泽东批准,让县团以上各级党委学习整理稿。1975年,由主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的邓小平向毛泽东提议,并得到了毛的同意,由胡乔木主持进行综合整理,编成了新的整理稿,得到了毛的校阅与同意。该稿于毛死后的1976年12月26日,首次公开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毛稿》第六册,第105—106页;第十一册,第490—491页),1977年收录进《毛选》第五卷。薄一波所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忆》,补充了1965年的新整理稿中亦未收录的内容(第460—490页)。我首先以被认为是旧整理稿的《万岁》丁本为基本,然后在其中添加了《毛选》第五卷的新整理稿与薄一波的补充,进行思考。

泽东主张：在敌人的包围下积极进行国防建设，在不远的将来，制造汽车、飞机、大炮、原子弹。为此，应使军、政费用从国家预算的 32% 降到 20%，增加经济建设费用。

关于“第四，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毛泽东基于任何事物都有独立性与统一性的哲学，主张同时兼顾这三个方面。他说：工业方面要给劳动者个人好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就调整工资，以此发挥其主动性和积极性；通过给生产单位（工厂）以一定的独立性，允许保留一部分利益来发挥其主动性和积极性，更好地推进国家工业化。毛泽东讲到：农业〔不要采取苏联那种把农民挖得很苦、损害其生产积极性的政策〕。1954 年有粮食虽减产却增加了粮食收购量的缺点，所以第二年减少了收购量，农民手里有了余粮，必须在增产的基础上使农民的收入年有增加。生产单位（集体经济组织）要积累，〔但是节约生产费、管理费〕，将公积金用于扩大再生产，将公益金用于农民的福利，为农民服务。国家通过税收来增加积累，采取缩小剪刀差的政策，采取工业产品薄利多销的政策。

关于“第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毛泽东主张，〔避免苏联“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性也没有”的作法〕，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扩大地方的权利，发挥积极性，“有（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中央）一个积极性好得多”（同上，第 51 页）。他说：中国的宪法虽将立法权集中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统一”），但只要不违背中央的政策，按照需要，地方可以制定章程、条例（“特殊”）。〈要研究州可以立法的美国的政治制度〉，省、地、县、区、乡应当有独立性，发挥其积极性。毛泽东是想借助地方分权化来促进地方工业化。

此外，毛泽东阐述了“第六，党和非党的关系”（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继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来镇压反革命、抵抗帝国主义、建设社会主义，但是反对官僚主义，精简机构）。“第七，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从苏联的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不正常的关系中接受教训，〕反对大汉族主义、改善民族关系）。“第八，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依靠人民的强大力量与党的正确政策，对消极因素 = 尽量不杀反革命分子，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

人,使其转化为积极因素=非反革命分子)。“第九,是非关系”(通过争论,分清是非,帮助犯了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第十,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批判教条主义,独立思考、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世界上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长处)。毛泽东希望从斯大林与苏联的错误、缺点中汲取教训,建设中国的新的社会主义。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接受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框架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斯大林模式,用中国的人民战争的方式加以运用,想要以党和国家为主导,给地方与社会=生产单位、生产者个人以权限、利益,发挥其积极性的重要论文。所谓“关系”,即是“矛盾”(《毛选》第五卷,第288页)。毛泽东迄今为止,在阶级斗争上,在捉住政治中的各种矛盾上倾注了主要力量。关于矛盾的同一性,将重点放在对抗性的敌我矛盾的“互相转化”(把敌强我弱逆转为敌弱我强)上。与此相对,他在这里主要就生产活动方面,阐释经济上的各种矛盾,将重点放在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的“相互依存”(本书第112页)上(只有第八将敌我矛盾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尤其是从第一至第五,将革命的主力农民作为建设的主力,虽然让工业、重工业、国家、中央=主要方面做主导,却不想像苏联那样压制、打击农业、轻工业、社会、地方=次要方面,而是想通过兼顾其利益、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来发展主要方面。毛泽东是想创造出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分别发展、促进其互相发展、整体发展的关系。

其后,1958年5月,毛泽东进一步发挥《论十大关系》的思想,批评斯大林让东欧与朝鲜搞的土地改革等“从上而下”的“和平改革”的方法为“恩赐观点”<sup>①</sup>;将中国的建设方法定型化为:“从下而上”的“群众运动”与“从上而下”的“政府的指示命令、规章制度”的结合(《万岁》丁本,第205页)。11月,毛泽东批评斯大林的方法为“一条腿走路”(同上,第248页),说赫鲁晓夫不是“两条腿走路”的做法(同上,第

---

① 这是一种不是让农民对地主实行阶级斗争以获得土地,而是由革命政府将从地主手中没收的土地作为恩惠赐给农民的观点。

255页)。《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理论，它指导了大跃进与三线建设，也影响到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艺术与科学的方针。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就其要旨向科学家和艺术家作了讲话，提倡独立思考的自由、辩论的自由、创作与批评的自由以及发表、坚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谋求科学与艺术的发展。

9月15—28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作了政治报告，他断定：“（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重要文献》第九册，第56页）。“斗争的主要任务……已从解放社会生产力……转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上”（同上，第93页）。关于政治报告的大会决议说：“基本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我国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的“实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将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迅速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同上，第340—342页）。这是阶级斗争熄灭论。不过，刘少奇也承认斗争还继续存在，共产党与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合作，“既团结，又斗争”；“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之间的斗争，还在继续一个很长的时间”（同上，第85页）。他说，主要方法是说服、教育，但个别的也可采取强制改造方法。

关于经济，大会决议基本上完全同意毛泽东的农业集体化先行论与《论十大关系》。它指出：农业对工业化有重大的影响，因为目前还无法建设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工业与化学肥料工业，所以“要充分发挥农业已基本实现合作化这个优越条件，依靠合作社的集体力量和政府的支援”（同上，第343页），兴修水利，增施肥料、改良土壤、推广新品种、农具、提高复种指数、改进耕作方法，防治病虫害灾害，来增加单位面积产量。这可以看做是大跃进中开展“农业革命”的预告。另一方面，它同意周恩来、陈云提出的综合平衡论与反“冒进”论，指出“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的或‘左’倾冒险的倾向，积极地而

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同上,第347页)。

关于国际形势,大会决议认为,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民族独立运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和平运动力量的高涨,“坚持军备备战政策的美国侵略集团”日益孤立,进而乐观地认为,有缓和世界紧张局势、实现持久和平的可能性。不过,大会决议也注意到:帝国主义采取的侵略、紧张、压迫政策,使“战争的危險仍然存在,我们决不可以放松警惕”(同上,第352页)。

在八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党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周恩来(党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朱德(党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家副主席)、陈云(党中央副主席、副总理)、邓小平(党的总书记、副总理)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根据8月毛泽东的建议,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决定在1957年下半年,开展以在延安曾开展过的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和新增加的反对官僚主义为主题的整风运动。

关于十月中下旬苏联与波兰关系的恶化,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向苏联共产党发出了警告,主旨为反对苏军的武装干涉;关于10月23日—11月4日发生的匈牙利事件,中共中央反对苏军从匈牙利撤退,劝告苏联借助武力保卫匈牙利社会主义政权,使苏联摆脱了困境,得到了赫鲁晓夫的感谢。毛泽东与中共中央认为,这两个事件的原因在于: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以致右的危險出现和修正主义的泛滥。尤其警惕铁托于11月11日发表的普拉演说,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2月29日。以下简称《再论》),主张反对修正主义,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俄国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再论》采取与《一论》相同的方式讨论、执笔、发表。实际的执笔者为胡乔木。

《再论》在序言中,拟定了共产党之间争论的基本条件:我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共产党内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与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共产党之间等矛盾)必须服从于解决敌我矛盾(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

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等矛盾)这一总的利益,应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

《再论》的“第一,对苏联革命与建设的基本道路的估计”,将十月革命的道路概括为:共产主义政党经过革命斗争取得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工业的国有化与农业的集体化,消灭剥削、私有制度和阶级,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与文化,为过渡到共产主义而奋斗,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承认各民族平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与各国劳动人民、被压迫民族互相支援。它极力主张这是各国无产阶级应走的共同道路,这正是毛泽东本人的革命与建设的方略。

“第二,对斯大林功绩与错误的估计”,《再论》首先高度评价斯大林是捍卫、发展十月革命道路的领导者。接着,它反对西方资产阶级认为斯大林错误的根源在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见解,反驳了铁托对斯大林搞个人崇拜是“制度的产物”、国家搞的经济管理产生了官僚主义机构的批评,主张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是正确的,斯大林错误的根源在于运用制度的方法(政策、工作方法与工作作风)及思想方法不正确。这是一种第三方的观点,它同时也批评了苏共所持的斯大林错误的原因在于他个人,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无关的看法。言外之意,是显示中共通过整风运动来克服斯大林的错误的自信。基于自己的经验,能动地接受对斯大林的批判,这是中共的高明之处。不过,反过来,由于过于自信,将制度与其运用方法机械地分割开,没有想进一步重新彻底检讨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缺陷,对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

《再论》的“第三,反对教条主义与反对修正主义”,在反对“左”=教条主义的同时,想要防止由于走过火,帮助右=修正主义发展,重现匈牙利事件。它一方面,批评了斯大林的教条主义错误:不将无产阶级专政与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民主相结合,在建立政权后没有将专政的主要锋芒对准国外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没有健全民主与法制,“克服官僚主义的倾向”;在阶级消灭后,仍强调“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妨碍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健全与发展”(《重要文献》第九册,第582页)。关于匈牙利,它一方面指责其破坏了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与

革命积极性,就是说犯了“左”的教条主义错误;另一方面,又强调了由于无产阶级专政尚未建立,未受到打击的反革命分子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发动武装叛乱,以致帝国主义乘隙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右的修正主义的危险。这是基于毛泽东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可能从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12月23日、24日,吴冷西,第29页)的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对匈牙利事件进行的解释。可以认为,当时毛泽东的思路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应以克服“左”的教条主义为主要方面,以防止右的修正主义为次要方面。

“第四,关于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批评了斯大林的大国主义,主张将苏联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保持各国共产党政党的独立、平等,通过协商,达到意见、行动的一致,加强团结。毛泽东是想创造出一种不同于过去共产国际从上而下地对各国支部=各国共产党下指令的旧的方式。

中国向外部世界发出宣言:我国拥护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取得了国家工业化与卫国战争成功的斯大林的成绩,克服其错误。为了将这一主张对内阐明,认识并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的矛盾,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就“人民内部矛盾”作了讲话。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话纲要)》(《毛稿》第六册,以下简称《讲话纲要》)在内容上相呼应,据推断是接近讲话原稿的整理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稿)》(《学习文选》1,以下简称《讲话稿》),一共讲到了十二个问题。其中的(一)、(二)、(八)、(九)尤其重要。

《讲话稿》主张,(一)关于“两类矛盾的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第一类的敌我矛盾(对抗性)与第二类的人民内部矛盾(非对抗性)两类矛盾。用专政的方法来解决前者,用民主集中的方法解决后者。《讲话纲要》说:“对待思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用粗暴的方法——行政命令的方法与武断压制的方法”(《毛稿》第六册,第310页)。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内部矛盾,马克思、恩格斯谈得很少,列宁只简单地说:“对抗虽消灭了,但矛盾还存在”,来不及全面地进行分析——《讲话稿》如此整理了学说史,严厉地批评了斯大林“左”的方面:“混合了这两种矛盾”,没有分别“敌人对我们(共产党)的批

评”与“人民批评共产党”，“批评了人……就有坐班房的危险，就有杀头的危险”（《学习文选》1，第194页）。它虽批评了“敌我不分、视敌为我”的右与“过度强调敌我矛盾”的“左”双方，但却将重点放在反“左”上，他指出，革命时期王明的“左”翼教条主义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渊源在斯大林。《讲话纲要》和此对比强调中共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经验：延安整风运动确立了“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克服了“左”；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实现了团结；建国后将此适用于人民内部，进而又适用于解除了武装的敌人。它主张，中国虽然存在着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的矛盾，但我们将其作为第二类的矛盾，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势必倒向对抗”（《学习文选》1，第193页）。

（二）关于“肃清反革命”，自负地认为，“苏联太‘左’，匈牙利太右”。比较起来，中国虽然也有缺点，但“做得比较好”。他批评斯大林“真正反革命肃清了”，但“杀错了许多人”。他夸耀说，中国受苏联的“左”的影响，在（苏维埃革命时期的）南方根据地犯了错误，但在延安由于采取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克服了这一点。它将自己的行为正当化，说：革命之后的三年间杀了七十万人和以后的三年间杀了七万人的大肃反，是很必要的。因为“那一批不杀，人民不得抬头”（同上，第197—198页）。可是，它又提议，基于“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由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要主持进行检查。

《讲话稿》主张，依靠（八）（对知识分子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对民主党派的）“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政策，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它批评斯大林长期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存在，直到1952年才承认，不过不彻底。它论断：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因为“没有剥削者”，所以“这些矛盾皆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同上，第212页）。《讲话稿》认为，中国是六亿人口中占五亿数千万的小资产阶级的大王国，极力主张不能禁止、压制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



顽强地表现自己,要让他们表现,进行辩论。要采取具有说服力的辩证的方法、“治病救人”的方法来批判他们的唯心论,要“长期耐心地进行教育”。它强调说:“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同上,第219页),马克思主义是在与不同事物做斗争、互相批评中方能发展的。同时,它还说,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与旧社会一样,新生事物由于被官僚主义者及顽固派所压抑,所以要被社会承认,要经过艰苦斗争。毛泽东还决意扩大言论自由的幅度,使科学、艺术活泼发展,政治充满活力。

关于(九)“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请愿”这些问题,《讲话稿》将学生闹事、工人闹事及农民打扁担等看做是“人民内部经常不断地发生矛盾”,提出了加以解决的办法。(一)“努力克服官僚主义,使之不闹”;(二)“让闹不让闹,我说还是让闹”,不要说“反革命”、“造反”;(三)“闹起来草草收兵好不好?我说让他闹个够。”(四)将闹事“看做是我们改善工作,教育工人、学生的过程”,不要一闹事就开除。他承认共产党与政府和人民之间存在着矛盾,要求采取能动的、积极的姿态:通过共产党与政府接受人民的抗议,克服自己的官僚主义及工作中的缺点,且教育人民的做法来解决矛盾。

可以看出,《讲话稿》提出了(一)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之间的关系;(二)敌我之间的矛盾;(八)友我的矛盾;(九)我们内部的党和政府与学生、工人、农民之间的矛盾。此外,它还阐明了(三)“社会主义改造”(农业集体化的优越性、贫下中农拥护、富裕中农不满);(四)“资本主义改造”(资本家的改造);(五)“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政治、思想工作的强化);(六)“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尤其批评了干部“升官发财”的思想);(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计划生育、救灾、统销、就业,小、中、大学的升学);(十)“闹出乱子是坏事还是好事”(二重性,又好又不好);(十一)“少数民族同大汉族主义”(解决大汉族主义问题);(十二)“工业化的道路(与苏联不同,优先发展重工业与发展轻工业、农业之间的相互促进)”。

总的来看,毛泽东是想在继承斯大林、准备对付第三次世界大战、推进工业化的同时,用克服其错误、充分发挥人民的主动性、积极

性来建设社会主义。他的思路站在“救亡——民主”的延长线上。对外，他认为帝国主义对亚洲、非洲的争夺是世界的主要矛盾，制定了社会主义与民族独立运动合作，保卫和平，反对帝国主义的方针；帝国主义如果发动大战，就与其作战，“赤化”全世界。对内，他一方面从理论上抓住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另一方面，想要在实践中认识中国正在面对的各个领域的各种各样的矛盾，将这些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推进建设。他的思想里有一个核心：从外部对帝国主义进行的绝对批判，其核心为：“人民、矛盾、大同。”这意味着，六亿人民成为主体，认识中国与世界的矛盾，通过实践来加以解决它，朝着“大同”前进。毛泽东充满自信、非常乐观，语气从容不迫，有幽默感，内容精彩，很吸引人。

3月12日，《在宣传会议上的讲话(纲要)》中，毛泽东主张先在共产党内进行整风，“教条主义与机会主义(修正主义)……都要批判”两方面，说：“现在最突出的问题(比起阶级斗争来)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毛稿》第六册，第375—376页)。他仍然将重点放在反“左”上。关于五百万知识分子，毛泽东乐观地认为，大多数都是爱国主义者，都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说，要用十年的时间对他们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让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他想长期耐心地改造知识分子。他还说要采取“放”的方针、而不要采取“收”的方针，不要怕乱。其基调是对“专”的重视与对“红”的乐观。

在发表《人民内部矛盾》讲话前后，毛泽东在北京频频讲演，还游说到天津、济南、南京、上海，进一步详细阐述其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这里，我们确实可以感受到史华兹所说的“不断地转换的心态”(〔1989〕，第20页)。其内容是新的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与迄今为止的阶级斗争思想之间的矛盾，和对“左”=斯大林的批判与对右=对匈牙利事件重现的警惕之间的矛盾。可以认为，毛泽东以反“左”为主要方面，以反右为次要方面，保持矛盾，在两方面之间摇摆着前进，寻找着突破口。

例如，毛泽东一方面反对抵制“百家齐放”的陈其通等四人的教条主义及李希凡对王蒙的片面批评，称赞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

人》对官僚主义的批评。但另一方面，他又批评王蒙的小说有资产阶级思想（2月16日），肯定了陈等人对党忠心耿耿。而且，他一方面说“只能够采取百家争鸣这个方针，大家讨论……去争，以后会得出真理”，“如果采取强迫、压制的办法，我们的民族就没有活力，变得单纯，不讲道理”。另一方面，他理解党内的反对意见所说的“百家争鸣，说是共产党只有一家，其他有九十九家把我包围”，他说服道：“在世界观这方面的问题上……是两家争鸣。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3月17日，《学习文选》1，第247页）。进而，关于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毛泽东一方面说“有一些民主党派跟我们唱对台戏比较好”，“我们都应该进行民主的讨论，平等的讨论，互相争辩”。另一方面，针对党内的反对意见所说：“（民主党派）有什么资格监督共产党？究竟江山是谁打下来的呀？”毛泽东说：“相当有道理”（3月18日，同上，第261—262页），显示他自身似乎也有这种意识。而且，毛泽东一方面说：“我们共产党，有时还要借党外的力量帮个忙，叫作内外夹攻嘛！把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这些东西吹掉一些”。但另一方面，他又强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这样两种思想方面的斗争，这个时期还要更长些”（同上，第268—269页）。

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亲自召集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开座谈会，说希望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开门整风”。接受来自党外的批评，整顿共产党的思想与作风）。

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共产党中央4月27日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其中如下三点尤为注目。（一）它尖锐地批评了共产党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即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国民党作风的残余、特权思想、对待群众用打击、压迫的方法。（二）它提出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三）它号召各级党政军的主要领导人员，与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使领导者同群众打成一片。如果中共能够贯彻这三点，使整风成功，开创一条适当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的道路的话，不仅能够在国内使共产党与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大踏步前进，而

且还能够国际上显示克服斯大林的“左”的错误，建设更加自由、平等的新的社会主义的实际例子。

不过，5月15日，毛泽东写了党内文件《事情正在起变化》，将重点从反“左”转到反“右”。共产党从6月8日，正式开始反右派斗争。共产党将批评自己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指责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加以“反击”。它将自己接受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的批评，整顿自己的作风的整风运动反转了方向，转变为反右派斗争（本章第二节）。

将这种转变收录到人民内部矛盾论当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发表稿》），于6月19日首次由《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毛选》第五卷）。《发表稿》仍由十二节组成，将《讲话稿》的第六节与第十一节相互替换，只修改了一些小标题，结构几乎一样。可以认为，关于《讲话稿》与《发表稿》的关系，以下三点很重要。

第一，要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主要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加以解决。《发表稿》坚持、深化了《讲话稿》中的这一根本性的观点。

“在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中，《发表稿》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对抗性的敌我矛盾与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在人民内部矛盾中，有些矛盾有对抗性的一面与非对抗性的一面。如果处理得当，对抗性的矛盾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如果处理得不适当，非对抗性的矛盾就会变成对抗性的矛盾（匈牙利事件）。而且，毛泽东说：“基本的矛盾依然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将这种历史的唯物论公式移植于辩证法的唯物论的哲学=宇宙观、人观的土壤之上，这个哲学认为：“对立统一的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通过实践解决它来使社会发展。毛泽东根据这个理论，构成了如下极为活跃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形象。

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冲突、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来解决，只有革命才能够解决。与此不同，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得到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是更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因为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

建成,有与生产力发展相矛盾之处,所以我们要不断地解决各种矛盾。上层建筑是适应经济基础的,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国家机构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及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的缺陷等,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相矛盾的,所以我们要不断地解决各种矛盾。经济上,社会主义社会要求生产与消费的平衡与统一,但若这种统一被矛盾与斗争所打破,我们需要做出局部的调整(纠正具体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缓和激化了了的矛盾),恢复平衡与统一(“一”)。

社会主义社会里存在着“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的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毛选》第五卷,第401页),这个矛盾表现为“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同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人之间的矛盾”,将此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加以解决(“十二”)。

这样一来,《发表稿》主张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向自然界开战,发展经济与文化。这是一幅人们通过不断改革生产关系,改革上层建筑来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图像。毛泽东以支撑革命战争的《实践论》、《矛盾论》哲学为基础,将它进一步向前发展,构建了支撑经济建设的人民内部矛盾论哲学。可以认为,“人民内部矛盾论”以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为前提,描绘了一幅活跃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形象:生产者=人民成为主体,改革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发展生产力。可以认为,它突破了八大决议中“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偏于从上而下的倾斜于维持秩序的思考方法。

第二,《讲话稿》将重心放在反“左”,反对官僚主义、教条主义,欲克服斯大林的错误上。与此相反,《发表稿》反映了从“开门整风”向反右派斗争的转向,将重心转移到反右、反对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欲防止重现匈牙利事件。和对知识分子的进步乐观的《讲话稿》不同,《发表稿》一方面对民主党派与知识分子提高了警惕性,更加严格要求他们进行自我改造,并借助“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理论将此正当化。但是,另一方面,它仍煞费苦心地想要坚持将明显化了的共产党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主要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态度。

1. 关于国家,《发表稿》盛赞了目前共产党领导下的空前的“国

家统一”，并将此与过去的国家分裂和混乱进行了对比。它强调了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剥削者、破坏者的作用，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的作用，即解决敌我矛盾的专政的作用（“一”），敲响了“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常常向我方派遣特务，进行破坏活动”的警钟（“二”）。

2.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发表稿》设定了“人民”=“赞成、拥护、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与“人民的敌人”=“反抗社会主义革命，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社会集团”（同上，第364页）之间的绝对的对立（“一”）。在将“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作为“香花”（有益的言论）与“毒草”（有害的言论）识别的标准，提出了“六条标准”：是否有利于（1）全国各族人民团结；（2）社会主义改造、建设；（3）人民民主专政；（4）民主集中制；（5）共产党的领导；（6）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尤其将社会主义道路与党的领导两条视为最重要（“八”）。可以认为，这是由于认为共产党统治国家的正统性受到知识分子的批评而面临着危险，所以公开表明：只有共产党领导、人民服从的“纵的组织”，才是统一国家、团结人民的支柱。这是压制批评，使统治正当化。它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在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上，偏于国家。

3. 关于世界观的改造，《发表稿》论断：“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暴风骤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不过，“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两个阶级之间）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同上，第389页）。这是给反击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统治国家的不满与批评而爆发的反右派斗争，提供了理论上的根据。

不过，《发表稿》不是将共产党与批评者之间的矛盾立即看做敌我矛盾，主张将批评者作为反革命加以镇压，而是想将其基本上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加以处理。它指示：思想斗争需要长时间才能解决，“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同上，第390页）。虽然剥夺了反革命分子、

破坏分子的言论自由,但却不能禁止“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要让他们发表;“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地发表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同上,第391页(“八”)。它教导知识分子,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同上,第384页(“五”)。

所谓世界观的改造,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树立,是指信奉马列主义理论及在中国革命中形成的、自己与“群众”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即体会、磨练“为人民服务”的道德与“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能力。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毛泽东、共产党和人民在革命中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力量的方法。而且,《发表稿》采取了一种比较宽松的态度,画了一个价值序列的同心圆,其中给大多数知识分子定了位,说: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爱国的”,大多数“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一部分“已成为共产主义者”,期待他们努力进行自我改造,为社会主义建设尽力。

不过,《发表稿》不是在政策的层次接受知识分子对从共产党员的作风到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批评,以走向整顿作风与改善制度,而是事后定了“六条标准”,禁止批评,从保卫国家与改造世界观这一不同的层次反击批评者。它将政策层次上的不同意见,看做是思想层次上的背叛正统的异端,强行“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压制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与表现自由。由于毛泽东从重视“专”、扩大自由来发展科学与民主的方向,转向了重视“红”,严格要求忠于社会主义制度,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及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方向,所以知识分子产生了闭塞感,降低了积极性。

第三,关于对待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打扁担等群众闹出乱子问题的态度,《发表稿》与《讲话稿》是基本上一致的。《发表稿》也主张:(一)“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二)如果“闹了事”,应“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

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同上,第396页)。与对知识分子的批评采取的态度不同,毛泽东接受工人、农民、学生群众的抗议行动,改造共产党的作风的主动的、积极的态度是一贯的(“九”)。

## 第二节 反右派斗争与大跃进

### 一、反右派斗争

毛泽东为了在中国演示通过整风克服斯大林的“左”的错误的实例,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进行了深刻的思索、周到的准备,开始了接受党外人士的批评、整顿共产党的思想与作风的“开门整风”。可是,仅过了两周的时间,他就将重心从反“左”转移到反右,三周后发动了反右派斗争。关于这个转向,虽然毛泽东事后说,“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是不是阴谋的“阳谋”(7月1日。《毛选》第五卷,第437页),但那是事后的辩白。1942年3月以后的延安整风运动中,他既然有过经验将批判的矛头从批判王明等党的上层教条主义转为批判王实味等党的下层与知识分子的“自由化”,就“开门整风”,他设想了两种可能性:首先,将反“左”作为主要方面、反右作为次要方面,以保持矛盾;其次,在运动中,当右的主张超过所预测的范围,矛盾激化了时,就将反右作为主要方面,转向了反右派斗争。

毛泽东不顾党内多数人的反对,强行推进“开门整风”。北京大学有一学生写了《我的忧虑与呼吁》说:“党中央已开始分裂。毛主席的‘鸣’‘放’的方针,遭到了党内百分之九十的人的反对与党内保守势力的反击。有人想逼迫毛主席下台”。对此,毛泽东写了“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6月6日,《毛稿》第六册,第493页)的批语,似乎是认为其中包含真实情况。

从5月8日至6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集民主党派与无党派的代表人物开了13次座谈会;从5月15日至6月8日统战部与国务院召集工商界人士开了25次座谈会,让他们批评中共。党外人士首先批评了共产党员的作风,不久就突破了毛泽东设定的框框,开



始批评“共产党领导”的制度。可以认为，将制度及其运用方法机械地分割开的《再论》的逻辑中，有牵强之处。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森林工业部部长罗隆基发言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5月10日左右，毛泽东听了之后，下定了反击的决心。他觉得，毕业于清华大学和威斯康辛大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的“大知识分子”罗隆基是瞧不起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小知识分子”毛泽东。可以认为，由于他将相当于旧中国的“皇帝兼圣人”、“内圣外王”的理想的政治领袖兼思想导师的绝对的权力与权威，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的启动力，大量地活用，所以对有损自己威信的攻击过度敏感，过分反击。

5月15日，毛泽东写了党内文件《事情正在起变化》，再度确认了立足点：“只要没有这种领导，社会主义就不能建成，我们民族就要受到绝大的灾难”（《毛选》第五卷，第426—427页）。他指示说，民族资产阶级对共产党提出的批评，“大多数是对的。必须接受”，在坚持整风方向的同时，将批评者中的一些人定为“右派”，予以敌视，姑且让他们尽情地说，让人民知道他们是“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改用了“引蛇出洞”的战术。16日，发表了党内指示，肯定了通过公开讨论，揭露了迄今为止党中央完全不知道的共产党员的特权、傲慢、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及与党外人士之间有很深的隔阂等各种各样的矛盾，同时又阐述了相同的方针。25日，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代表说：“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第二天，将此作为运动鼎盛期惟一的公开讲话让《人民日报》予以发表。由于他想要像万里长征等革命战争那样，活用“毛—党—人民”循环结构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所以他警告知识分子，千万不要伤害作为这个结构的生命线的领导人的威信和群众对他们的信赖。

毛泽东指示党内向反右转向之后，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在5月21日的座谈会上主张：共产党内决定了政策之后，不要立即执行，应将政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作为“政治上的设计院”，要事先交他们讨论

(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予以刊登。罗隆基与储安平的发言第二天也于该报刊登)。罗隆基在5月22日的座谈会上提议说,应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政协中成立一个由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及各方面人士参加的委员会(“平反”机构),清查三反五反及肃反当中的冤屈。《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在6月1日的座谈会上谈及: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矛盾的根源在于“党天下”的思想;建国之初,党外人士在六位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当中有三位,四位政务院副总理当中有两位,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1954年宪法体制建立以后),国家副主席只设一人(朱德),十二位国务院副总理当中,党外人士一个也没有。共产党应注意缓和矛盾,尊重党外人士的国家主人翁的地位。他们都只不过赞同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倡导的联合政府,批评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突出“共产党的领导”,联合政府被躯壳化了的作法,坚持了作为联合政府一员的民主党派的权力。

6月8日,毛泽东发出了党内指示,称批评者中的一些人为“右派”,开始了反击。毛泽东将右派的言行看做是与匈牙利事件同质的,认定他们是想“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共产党政权)”。一直拼命地忍耐着接受民族资本家与知识分子的批评的共产党员,尤其是工人、农民出身的干部,将党外人士批评共产党时所用的“大鸣、大放、大字报”转用为自己的武器,开展了比毛泽东更激烈的反击。毛泽东虽说:“那些是建设性的批评,加以接受,并改正自己的错误、缺点;那些是破坏性的批评,予以反驳。”但反驳“破坏性的批评”却压倒了接受“建设性的批评”。7月1日,毛泽东写了无署名的《人民日报》社论,给章与储又加上了“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的更严重的罪名。

在9月20日—10月9日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将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加以理论化。说:今年创造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四大”)”这种“最革命、最生动、最民主的群众斗争形式”,称赞据此“发挥群众的主动性、责任心,克服领导者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领导者与群众就容易打成一片了”(《讲话提纲》、《毛稿》第六册,第592页)。他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说这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矛盾、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上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提法是不对的(《毛选》第五卷,第475页)。这种阶级斗争理论与“四大”的斗争形式,后来用到了文化大革命中。

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逐渐增多,到1958年前半年达到55万人,占500万知识分子的约11%(民族资本家为70万人)。毛泽东说,右派分子虽是“敌对的力量”,但要与地主和反革命分子相区别,“不捉人,又不剥夺选举权”(也许有个别的人,要取消他的选举权,让他劳动改造)。改正了以后,可以把右派分子帽子摘掉,归到人民的队伍(同上,第491页)。可是,实际上右派分子受到了开除公职、劳动改造、监督劳动、降职、减薪等不同处分,甚至连家属也受到了歧视。其他的知识分子也畏缩不前,丧失了积极性。共产党与知识分子之间产生了深刻的不信任,统一战线被躯壳化。这对中国来说,是巨大的损失。

想要用从根据地扩大到全国的“毛一党一人民”的循环结构、在以人民战争的方式运用于“高速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党内斗争”这一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快速奔走的毛泽东,将章、罗、储的不要使联合政府躯壳化的主张看做是使社会主义倒退到新民主主义,破坏共产党与人民的思想统一。他们对他们的批评,没有采取下述的积极的主动的态度:作为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长期过程中当然发生的不同意见加以接受、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加以解决的。可以认为,毛泽东对民主党派与知识分子,有一种抗日战争与人民解放战争中共同对敌作战的战友的团结感情,而且,认为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的这种自信过强,所以,他对于他们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急剧过渡的强烈不满,以及对他们由共产党一党统治所感受到的沉重的压抑感的认识,是不充分的。因而,一旦允许党外人士发言,他们的批评就喷薄出来,变得无法控制。毛泽东对此颇为吃惊,于是就从过度的乐观转变到过度的悲观。

可以认为,毛泽东看到由于自己制定的批评官僚主义的目标与

百家争鸣的方法非常正确，所以引起了远远超过自己预测的巨大的反响。在文化界，右派拉拢中间派压倒了左派；因此他将批评者中的一些人作为反叛自己所代表的正统无产阶级思想的异端资产阶级思想加以压制，作为阶级斗争处理矛盾。他也防备与匈牙利事件一样，知识分子批评共产党有诱发民众的武装叛乱的危险，所以将其思想萌芽用“四大”的群众思想斗争来压倒他们。并且，毛泽东说，美帝国主义与蒋介石是拥护储、章、罗的主张的。他将反右派斗争定位在国际性的敌我矛盾当中：准备对付美、蒋侵略的人民战争，阻止想要瓦解国家的思想统一的“民主主义的个人主义分子”的出现。

当时，毛泽东提出的目标是，“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1957年7月，《毛选》第五卷，第456—457页）。但是，他目前却将许多民主党派成员与知识分子排除在外。他自己否决了下述可能性：为了社会主义建设，让人民的团结与知识分子的批评同时并存，将其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加以保持的同时，由整顿作风向改革制度前进。

有学者认为，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及社会主义的思想，受到了民族资产阶级右派的“第三条道路”、“中间路线”（政治是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经济是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这样的资本主义的道路）的挑战与农民的农业社会主义（平均主义。想要回避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挑战，前者反映在共产党内，党就偏向于右倾政策；后者反映在党内，党就偏向于“左”倾政策（李君如，第21—27页）。的确，可以认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以“新民主主义论”为理论基础，立足于第一条战线即农村的农民的革命战争（武装斗争），紧密地结合第二条战线的城市的知识分子和资本家的和平、民主的斗争（统一战线），取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灵活性与强韧性衰落了，“实际”现实主义低落，在与共产党合作进行革命的两翼当中，反右派斗争给其中的一翼知识分子与民族资本家以沉重的打击，平衡崩溃，机能失调，大跃进对另外的一翼农民期望过高，导致了狂奔失去控制的失败。

1958年3月20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了中国国内的三

大阶级关系(四个阶级);4月6日,在汉口会议上,他将其分为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残余和右派(占人口的5%的3000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作为第一剥削阶级,把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上层小资产阶级(包含富裕中农)作为第二剥削阶级,把工人与农民作为两个劳动阶级。制定了劳动阶级=左派,团结第二剥削阶级=中间派,孤立、打倒第一剥削阶级=右派的斗争方针。革命时期,毛泽东以经济地位与对革命的态度为标准,作了阶级分析;建设时期,他几乎不考虑社会主义改造所带来的地位的变化,以改造以前的阶级出身和现在对共产党的态度(是否交心。“无心无意”=右派、“半心半意”=中间派、“全心全意”=左派)为基准,作阶级分析,实行“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

同年5月5日,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作了报告,说:“我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苏联是1936年),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资产阶级右派在1957年的进攻中所表现的就是如此”。“但是,在我国目前的具体条件下,上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重要文献》第十一册,第286页、288页)。刘的报告得到与会者的一致同意,修改了八大一次会议对于主要矛盾的分析,而且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这一毛泽东的新论点,正式得到了全党的承认。

## 二、大跃进

毛泽东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照抄苏联的模式不满意,为此提出了《论十大关系》,根据将社会主义建设的斯大林模式用人民战争的方式加以运用的毛泽东模式,实际地发动了大跃进,想将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的主观能动性的革命的方法贯彻到建设中去。

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的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上讲话，警告要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发动核战争的可能性，同时断定：“东风（社会主义的力量）会压倒西风（帝国主义的力量）”（《毛稿》第六册，第630页）。他与报告讲15年后可以超过美国的赫鲁晓夫而相呼应，非常乐观地认为，15年后中国的钢产量将赶上并超过英国，社会主义阵营如果能争取15年和平，那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的和平。

有人说，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当中，面临的主要是阶级斗争与建设中的速度规模这两大问题（《七十年》，第459页）。关于速度，1955年底，毛泽东提出了反“右倾保守”（急进）；1956年春，周恩来和陈云采取了反“冒进”的措施（渐进）；1958年1月，毛泽东批评了反“冒进”（急进）。5月的党的八次大会二次会议，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与大跃进，同意了批评反“冒进”的刘少奇的报告（急进）。周恩来和陈云被迫作自我批评，但周恩来认为，自己的错误是主要依靠行政命令实现社会主义建设这一目标的方法上的错误，是人民内部和党内的矛盾，而不是要不要建设社会主义的、关于目标的敌我性质的矛盾，以此坚持了自己的立场（丛进，第124页）。

大跃进是想以人民战争的方式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依靠“在农村存在着大量的过剩人口的背景下，为了将这些劳动力转化为生产力”，创造了“以农村为主要领域的新的积累方式”的“毛泽东模式”（高桥满《中苏》，第71—72页），开创中国独特的建设道路。中共中央提出了农业依靠农田水利建设、深耕密植、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将使粮食作物由去年的1.95亿吨增产90%，达到3.5亿吨的目标。1958年是大丰收，但由于农村劳动力集中于炼钢与水利建设，不能全部收割粮食，所以只收获了2亿吨。6月份，毛泽东提出了工业钢产量由去年的535万吨向1070万吨倍增的目标，毅然掀起了依靠土法高炉的全民炼钢运动。钢铁虽生产了1073万吨，但土法高炉所炼的300万吨质量很差，基本上无使用价值。

在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看到农民自发地创办了大型合作社、公

共食堂、托儿所、农业大学等设施,从2月前后,开始构思“公社”。他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超过。(薄一波,第732—733页)。他同意农民所用的“人民公社”的名称,将其特征概括为“一大(规模)、二公(所有制)”。北戴河会议将人民公社具体化为一个公式:“政(基层行政机关)社(经济组织)合一”、“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将其定位为:“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

可是,受农村所刮的“浮夸风”的影响,党中央过大地估计了粮食的增产量,致使收购量猛增,错误地以为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了,于是将注意力转到了工业上,过大地设定了以钢铁为首的工业增产目标(高指标);为了实现目标,过度地征用了农村的劳动力、资材和粮食。其结果,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农业生产低落,在农村与城市引起了粮食危机。出现了积累急剧增加与消费压缩、工业增产与农业减产、重工业增产与轻工业减产、社会购买力增加与商品供应量不足的问题,国民经济失衡,大跃进失败。从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付出了莫大的牺牲(丛进,第272—273页)。1960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从第二年开始调整政策。

以下,以“共产主义精神”、“资产阶级法权”和“共产风”三个概念为中心,考察毛泽东发动并推进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思想,及发现其中的缺陷并打算克服,终于转换为调整政策的逻辑。

### 1. 反右“共产主义精神”——北戴河会议(1958年8月)

毛泽东打算以农民的“共产主义精神”为动力,推进大跃进和人民公社。1958年4月,毛泽东说,“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毛稿》第七册,第177页),通过抵抗第一贫穷、第二文化水平低,处于白纸状态(一穷二白)的不利条件,人民群众发奋而起,自觉地、自发

地拼命工作,已没有了过去的“奴隶”相,做了“主人”了。这是将通过抵抗外敌侵略这一不利条件,民族觉醒,发奋而起的革命战争的思想,应用到了经济建设上。而且,看来似乎是毛泽东认为,共产主义“本来是有群众的自发的因素”(《学习文选》2,第314页)、是“全人类自觉地改造自己与改造世界”这个自己的思想正在这场运动中逐渐地实现。1958年,他对来访的赫鲁晓夫说:比起全国解放,比起朝鲜战争胜利及工商业的改造,大跃进更令人感到愉快。

关于共产党领导为主体即人民群众运动的思想,第一,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将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全体人民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三大差别”(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10月。以下简称《诸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I 费尔巴哈》)及“资产阶级法权”的逐步的消失、对外防卫以外的国家职能的消灭,这些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五个条件,写进了八月的北戴河会议的《关于在农村设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稿》(《毛稿》第七册,第360页)。当时,毛泽东熟读《共产党宣言》,找到了只有加速公有化的发展进程,才能加速生产力的发展的理论依据(李君如,第159—161页)。第二,毛泽东主张,恢复22年革命战争中军事共产主义,即官兵平等、战斗中相互扶助、供给制、为人民服务等内容,以教育干部与群众。作为其反面,毛泽东要求打破建国后共产党进入城市,受中国资产阶级与苏联的影响而形成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的法权”,即等级制与薪水制、干部的“特殊化”与脱离群众等现象(《学习文选》2,第300页,第304页,第313页)。毛泽东认为,干部参加劳动,和群众打成一片,平等相待,是令群众“干劲冲天”地进行大跃进的关键。所谓“资产阶级法权”,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与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是指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消费手段在“按劳”获得的权利(劳动的等价交换原则)。但毛泽东将此扩大解释为:它不仅是经济上的不平等产生的根源,而且也是政治上的干部与群众之间的不平等产生的根源。他依据将(1)所有制,(2)人与人的关系,(3)分配作为生产关系的三个方面的列宁的理论。将“资产阶级法权”的概念从(3)扩大到了(2)。第三,毛泽东将人民公社与中国历史上



的农民战争的“原始社会主义”的传统结合起来(12月7日、8日,八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指出,在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斗争与现在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中,在“极端贫困农民的广大阶层,梦想平等与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这一点上相同。二世纪末三世纪初,魏的张鲁所搞的五斗米道中,就有免费医疗、“吃饭不要钱”、义舍、“政社合一”、劳动与军事相结合等与人民公社近似的地方。

总而言之,毛泽东是想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革命战争的体验及农民战争的历史<sup>①</sup>的基础上,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当时,他虽主张社会主义制度与共产主义思想相结合,但重点显然还是在共产主义思想上。

毛泽东依赖人民的生产热情和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战争胜利的自信,及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信念,强行发动了大跃进。他没有充分估计到经济建设的巨大困难和作为主体的“毛一党一人民”的能力不足之间的力量对比,没有采取周恩来、陈云等人在经济建设的实践中所得出的智慧——党的第八次大会上承认了的“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若与革命战争进行比较的话,可以认为,“人

---

<sup>①</sup> 沟口雄三所说的“儒教社会主义”(《作为方法的中国》,第187—195页)与“基督教徒在社会运动中实现基督教伦理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在用词方法上有区别。可以看出,对马克思主义者主导的中国社会主义,研究者把关于儒教的一个主观的解释作为罗网从上面给罩上,只从中国的社会主义中拣起了与儒教有共通点的地方。他没有内在的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本身。“儒教社会主义”论对儒教评价过高,有牵强之处。他没有论证作为有思想体系的客观的存在中国思想史中的一个(不是惟一绝对的)思想流派“儒教”,决定性地规定着中国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说,1. 他没有明确地提示关于毛泽东的革命、人民公社运动、中国的“社会主义”的重要论点,是以当时毛泽东论文的何处为材料而立论的。2. 他没有论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动力的“共产主义精神”的思想源泉,不是所列举的(1)马克思主义理论,(2)中国革命的军事共产主义的经验,(3)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原始社会主义”(张鲁的五斗米道是道教)而是儒教。3. 他没有解释清楚蒋介石继承季陶对孙文所作的儒教的解释,依据阳明学的儒教的国家资本主义和毛泽东的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出发的反儒教的国家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对立与斗争。

沟口雄三的《另一个“五四”》(《思想》1996年12月号),把梁漱溟的思想看做是“‘礼治’社会主义”(“儒教社会主义”的另一种说法?),如果是梁自己为实现其所信奉的儒教的理想而构思并实践社会主义的话,那样看待就没有上述的那种牵强。可是,他利用“梁的礼治思考是适合毛的路线的事实”,而且,以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公式”、“意识形态的视点”、“政治论”为借口,在谈“国家”、“土地的公有制”、“重工业化”、“男女平等和教育制度、医疗制度、交通、通信网等”革命与建设的成就的同时,没有内在地研究实际地实现了这些的主体,即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及中国人民的实践与思想本身。对此,我持有不同看法。

民”理想主义遥遥领先，“实际”现实主义大幅度下降，追不上前者，因而失去了平衡。

2. 从反“左”、“共产风”——第一次郑州会议(1958年11月)至庐山会议(1959年7-8月)之前

1958年9月10日公布《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之后不到两个月，10月底，全国99%以上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在其过程中，发生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左”的错误。毛泽东首先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着手调查与纠正。从反右转向了反“左”。

在11月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关于斯大林的“诸问题”，毛泽东批评说：“没有共产主义运动如何到共产主义”（《学习资料》续1，第186页）展示了中国朝着共产主义前进的态度。然后，他引用斯大林论文中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客观规律、商品生产、价值规律，主张要区别所有制的两个阶段（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区别社会的两个阶段（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这两个过渡需要时间，必须发展生产力；为了朝着共产主义前进，在发展自给生产的同时，必须发展商品生产。他在坚持共产主义思想的同时，将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制度。关于“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改变了过去的主张，认为必须打破严格的等级制及干部与群众之间的不平等的关系等部分，但必须保留工资制及必要的差别和“多劳多得”等其他部分。这意味着虽然政治上的“资产阶级法权”打破了，但经济上的“资产阶级的权利”还保留着。若用12世纪南宋钟相<sup>①</sup>领导的农民起义的口号来描述的话，就是虽实行“等贵贱”，但却抑制“均贫富”。12月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做出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采纳了毛泽东的主张，明确地指出了人民公社必须“继续发展商品生产，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另外，同月，毛泽东将云南省因劳动过重而导致浮肿病产生及死亡率增多的报告向党内传达，以引起注

---

<sup>①</sup> 钟相在洞庭湖周围，借助被推断为是摩尼教的宗教，教化、组织农民20多年，宣传“等贵贱，均贫富”。组织义兵3000人，令其子统帅，想要帮助南宋王朝，抵抗金的侵略。高宗皇帝向南逃亡，下令将勤王的义兵遣散。1130年，钟相率领农民武装起义，号称楚王，立年号为天载，焚烧官府，镇压官吏，夺取官僚地主的财产还给农民。战败后，他被南宋王朝处死。

意。同时，他还说：“以不死人为原则”（《学习资料》续1，第204页）。这时，他已察觉到了大跃进中最严重的问题。

1959年2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会第一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国家贫农、下中农想揩中农的油……一有机会就讲平均主义。不要把富裕中农当做地富反坏去剥夺。”他指出了作为人民公社的承担者的最值得期待的贫下中农的缺点，指示要保护财产及“按劳分配”等富裕中农作为劳动人民的正当权利。同时，他强调要主观能动性符合客观规律性，符合实际，说：“凡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就要受挫折”（《毛稿》第八册，第33—34页）。

在同月的第二次郑州会议的讲话及其提纲中，关于人民公社运动，毛泽东在高度评价广大的农民，尤其是贫农下中农及干部，发挥了作为共产主义者的积极性，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之后，也指出了缺点，要克服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共产风”<sup>①</sup>（《毛稿》第八册，第65—75页）。他批评了下边的党员没有搞清公社、生产大队（管理区）与生产队（旧高级合作社）、生产小队这三级之间的区别，实际上否认了生产队所有制，引起了广大农民的抵抗。他说，中央、省、地区、公社的党委会虽批评了生产队、生产小队（旧初级合作社）的“本位主义”与“瞒产私分”，但在那之前，首先要检查、纠正自己的“平均主义倾向”，“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与“过度集中的倾向”。对生产队的“权力、财力、人力”无偿上调，“过分集中于公社一级”。毛泽东主张，实行“按劳分配”与“（公社与生产队之间、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等价交换”等社会主义原则。他将生产队对上边的抵抗，作为保卫自己的劳动成果的“合理合法的正当权利”加以肯定。所谓“共产风”，不外乎穷富拉平、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共”有各种财“产”（猪、鸡、鸭及为大办公共事业和食堂而

---

<sup>①</sup> 后来，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彻底执行〈紧急指示信〉的指示》告诫：“共产风”不完全来自农村，有许多是直接间接地从上面来的，所以“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织和军总政治部”“不容许由于自己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领导和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而引起下面干部的‘共产风’、浮夸风和命令风”（《重要文献》第十三册，第680—681页）。追究了引起下面干部刮“共产风”的上层干部的责任。

借来的房屋、椅凳、刀、锅、碗、筷等个人财产无偿归公社所有)等“剥夺农民”的风潮。毛泽东反省,我们在公社所有制的问题上走得过快,他提议采取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将生产队(旧高级合作社)作为基本的核算单位,得到会议的同意。他在此基础上描画全体构图:“依靠自己的努力、公社的照顾和国家的支持”,“把较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扩大公社的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和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就是说,“把安排人民生活、安排公社积累和安排国家需要这三面的工作,同时统筹兼顾”。关于“共产风”,他虽严厉地批评公社干部和上级干部,但对贫农下中农加以说服教育,“应当有志气”,“用不着依靠占别人便宜”,“自力更生为主,争取社会和国家的帮助为辅”,用自己的双手“艰苦奋斗”。

关于纠正“共产风”,毛泽东收到了下述的《关于湖北省麻城县万人大会的情况报告》。麻城县召开万人大会,县、公社、管理区三级党委首先层层检讨,承认错误,基层干部大受感动,也纷纷检讨,上下关系更加密切了。之后,公社调生产队的钱物,立即退还;缺口粮的立即供应,该支援的穷队立即予以贷款。几天后,县委要求各生产队都把去年的账目算清,同时动员社员参加算账,要求生产队的贪污干部承认错误,召开社员代表大会,让干部搞清算。

毛泽东夸奖了这个报告,并附上了评语:“每一个县、社都应这样做。算账才能团结;算账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身来,一身干净;算账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账才能教会五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监督公社的各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办坏事,实现群众的监督,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这个评语传达给了中央、省、地区、县的党委(4月2日、3日,同上,第187页)。1963年以后的“四清”(清理账目、仓库、财物、工分)运动,就是对此的继续。

毛泽东将以人民战争的方式运用社会主义建设的斯大林模式的毛泽东版,用到实践,力图国家工业化与农村工业化“同时并举”。他一边呼吁自觉、自发地发扬不谋私利,为人民服务的“大公无私”的精神,即“我的就是你的”的“共产主义精神”。结果下边的县、公社的党

组织随意从基层组织与农民那里征调财物、劳力、生产物，刮起“你的就是我的”的“共产风”，进而，在其上又添加上“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生产瞎指挥风”（“五风”）。毛泽东接受了自己的主观动机与客观结果正相反的事实，着手纠正。为此，他修改了自己当初打破“资产阶级法权”的主张，肯定了“多劳多得”的经济上的“资产阶级法权”，即“我的就是我的”的原则，并指示实行。这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思想，是相对于国家与集体，主张尊重个人的权利与利益的。它成了克服大跃进的缺点的指导准绳。1962年9月制定的《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中明确记载，人民公社各级组织应尊重、保障社员的“权利”（第四十四条）。正是此处显露端倪的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及人民与党的关系，才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核心问题。不过，看来，毛泽东对“共产主义精神”与“资产阶级法权”和“共产风”三者之间的关系的理论考察，是不够充分。第一，“资产阶级法权”，本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与列宁的经济上的概念扩大解释为政治上的概念，因而主张保留经济上的“资产阶级法权”，只破坏政治上的那个法权，在理论上是缺乏条理的。为了克服干部与群众之间的不平等，有必要建构别的理论。第二，有这样的一方面：因为毛泽东过高地评价了人民的“共产主义精神”，提出了过高的增产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所以才引起了上级与人民公社的干部征收生产队的财物、积累、劳动力、生产物，将其集中于公社的“共产风”。“共产风”的强制推行，只不过是“共产主义精神”自觉、自发的补全之物。在超越个人权利和利益的人观上，两者是同根的。可以认为，毛泽东对这些事情的反省不深。

在纠正“左”的过程中<sup>①</sup>，关于1959年的钢铁生产，党中央将1958年8月制定的3000万吨的目标于同年12月下调为2000万

---

<sup>①</sup>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发出了一封致省、地区、县、人民公社、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共产党员的“党内通信”，指示纠正的极左偏向如下：（1）包产，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只管现实可能性。（2）密植的程度不要服从上级的命令，要由生产队与生产小队商量决定。（3）抓紧节约粮食。（4）逐步实行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5）因为农业机械化需要10年时间，所以这4年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6）要讲真话，不要因上面压力就讲假话（《毛稿》第八册，第235--238页）。这里，他准确地把握住了大跃进的问题点，指示了踏实的对策。

吨,1959年4月下调为1650万吨,5月根据陈云的提议,下调为1300万吨。

### 3. 反右:反右倾运动——庐山会议(1959年7—8月)及其之后

1959年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前,毛泽东自己承认“去年是打了一个败仗”(李锐[1989],第17页)。他抓住了问题的本质说:大跃进的缺点之一是没有平衡;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过去安排经济计划的秩序是重、轻、农,今后恐怕要倒过来(《编年史》,第158—159页)。

庐山会议<sup>①</sup>上,他由于谋求在肯定大跃进的成果之后克服“左”

---

<sup>①</sup> 据当时贵重的记录、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等记载,毛泽东反驳彭德怀说,积极参加大跃进的30%的积极分子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他主张:“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批评彭德怀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态度是“资产阶级动摇性”。同时,他模仿1928年斯大林攻击布哈林反对高速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政策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说法,指责彭德怀为“右倾机会主义”,将他看做是停留在新民主主义,没有接受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不是政策的相对的对立的层次解决论争,而是上升到了两个阶级、两个世界观的绝对的对立的层次,正统压服了异端。毛泽东指示:处理这类党内斗争,不可把它当做敌我矛盾去处理,而必须把它当做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万岁》丁本,第309页)。

左派指责彭德怀将矛头指向毛泽东,要使毛主席下台,毛泽东说,如果将错误全部公开,一定灭亡,那我就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他甚至说,我没后乎(“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指朝鲜战争中,在彭德怀司令部的长子毛岸英战死一事)。毛泽东用领袖的威信,与彭对质,他叱责说:“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你们要瓦解党”,毛泽东想守住他的“毛—党—人民”的循环构造。他将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定位在国际矛盾当中,看做是与美国和蒋介石攻击三面红旗及赫鲁晓夫的批评相呼应的。彭德怀对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作了自我检讨(检查了思想、工作、生活上的缺点与错误,追究了其根源),承认其思想根源在于没有改造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维护党的总路线、维护党的团结一致、维护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威信”。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判定彭德怀等四人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解除了彭德怀的国防部长职务。随后任命帮助毛泽东最猛烈地批判了彭德怀的林彪(1958年5月担任党的副主席、副总理、元帅)为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

作为军队的最高领导者的彭德怀,根据他在各地视察,直接听到、看到的农民的悲惨状况、及来自农民出身占多数的军队内部的不同意见,大胆直率地批评了三面红旗。毛泽东因此担心他们批评会毁掉自己靠革命奠定的权力基础,关闭通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所以就拼全力予以压制。其结果,“反右派,封了党外的口,反右倾,封了党内的口”(李锐[1992],第123页),中国受到了更大的损失。

毛泽东号召之后,在党内的高级干部中,右派与左派虽自由活泼地进行了论争,但却没有确立将其集中、从内部形成统一意志的程序,在内在由民主到集中之前,冒出了越过自己设定的范围的彭德怀的批评,所以毛亲自对此加以反击,将反“左”转变为反右,自上强行结束了论争。这其中与反右派斗争共通的逻辑,表现了中国社会的体制。

的缺点这一方向上统一党中央的意志,召开了参加者自由陈述意见的“神仙会”。可是,在那里却将彭德怀(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元帅)提出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左”错误。“总想一步迈进共产主义、脱离实际与群众、过早否定等价交换的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这一口号等),看做是对三面红旗的全面否定和对毛泽东的领袖威信的挑战,反击彭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毛泽东发动了反右倾运动,将 365 万人<sup>①</sup>划为“重点批判对象”、“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丛进,第 232 页)。将反“左”转为反右,继续大跃进,重工业虽增产了(钢 1387 万吨),但农业却大幅度减产(粮食 1.7 亿吨),基本建设的增加所带来的积蓄率的上升挤了人民的消费。在农村,虽然谷物减产,却增加了收购量,导致粮食不足,浮肿病及死亡增加。由于急于从生产队所有制向公社所有制过渡的指导思想强起来,而且又大刮“共产风”,因而给农业生产与农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损害。

后来,在 1961 年 1 月 18 日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庐山会议反右,把纠‘左’打乱了”(《万岁》丙本,第 259 页)。在 6 月 12 日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反省说:“(庐山会议以后的)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结果却传达了)”(《毛文》第八卷,第 273 页),“1960 年春看出‘共产风’又来了。……提倡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养猪场、大办交通、大办文教,这五个‘大办’一来,糟糕!”(同上,第 274 页)。

毛泽东号召党的干部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亲自组织了读书小组,从 1959 年 12 月 10 日至 1960 年 2 月 9 日与陈伯达等党的理论家一起阅读讨论。当时留下来的发言记

---

① 在《编年史》中,关于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下简称为“右倾”)的人数,据 1959 年 10 月 14 日的资料,国家机关重点批判了 791 人,各省也揭发批判了一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人民解放军中“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划了 1848 人。据 1980 年平反时统计,军中被定为“分子”或戴上其他政治帽子的达 17212 人(第 161 页)。与丛进所列的数字有很大的出入,因而可以认为都不是那么正确的数字。

录<sup>①</sup>有两种。

4. 反“左”：从调整——（《十年总结》）（1960年6月）至七千人大会（1962年1—2月）

1960年6月14日，毛泽东在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将计划指标还要加以调整，争取“主导权”，周恩来十分赞成其意见，建议降低粮食、棉花、养猪的指标，刘少奇、邓小平等都很赞成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意见，最高领导层统一了思想，下定决心调整计划指标（《周传后》，第582—584页）。18日毛泽东写了《十年总结》，承认“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还不深刻地认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强调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与调查研究（《毛稿》第九册，第213—218页）。这在相当大程

---

① 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读书笔记》（《万岁》丁本）中，如下所示，凝结了三面红旗的思想。

1. 农民与农村。作为“半私有者”、私有观念容易改变的贫农、新下中农、老下中农拥护人民公社，私有观念浓厚的上中农、富裕中农一部分人反对，一部分人拥护（第329—330页）。要把大城市的居民分散到农村去，建设许多小城市，在原子战争的条件下，是有利的（第377—378页）。不要农民涌入城市，在农村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创办经济中心及高等学校，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将农村的生活提高到与城市相同的水平（第398—399页）。

2. 工业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大跃进得出了“得不偿失”的结论，但从整体和长远来看，这是很值得的，因为大炼钢铁运动打开了整个中国经济建设的局面，在全国建设了新的钢铁基地（第365页）。全民所有制的生产关系当中也有矛盾。要不断改进。劳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两参（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一改（改革规章制度）”三结合（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中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与工人的三结合）及“集中领导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加以改造（第347—348页）。在产品分配时，应强调艰苦奋斗、扩大再生产、共产主义的前途远景，不能强调个人的物质利益（第386页）。苏联在斯大林时代过于强调集体利益（公），现在又过于强调物质的（个人的）利益（私）；中国讲公私兼顾，说“大公无私”、“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的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的利益也随着改善（第371页）。

3. 共产党干部的特权阶层化。社会主义社会还有保守的阶层和类似的“既得利益集团”及三大差别，必须通过斗争解决非对抗性的矛盾。必须教育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的干部子弟，不要完全靠父母与先烈，要完全靠自己（第351页）。在旧社会，被压迫者文化低但是聪明些，压迫者文化高但却愚蠢些。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高薪阶层也有危险，他们的文化知识多些，但却是同那些低薪阶层比较起来，要愚蠢些，我们的干部子弟就不如非干部子弟（391页）。

可以认为，如上所述，毛泽东对苏联的经济理论一边吸收，一边批评，力图建设比苏联彻底平等的、让工人农民成为主人的、防止共产党干部变质为特权阶层而使他们服务于人民的中国社会主义。别的版本《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毛文》第八卷）也有和这个《读书笔记》有重复之处。



度上恢复了“实际”现实主义。夏季粮食减产，在全国出现了未曾有过的粮食不足的局面。7—8月的北戴河会议讨论了“调整”，8月底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1月党中央传达了周恩来起草的《紧急指示》指示：成立人民公社以来，县及县以上的机关与单位向人民公社平调的、县与公社向生产队、县与公社及队向社员个人手中平调的财物，必须退款偿付。它力图纠正“共产风”。1961年1月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批准了八字方针。

毛泽东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谋求克服生产队之间的、公社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1961年3月，他亲自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农业六十条)，稳定了农民的生产情绪，促进了农业的增产。5—6月，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削减城市人口，将曾作为共产主义因素加以提倡的公共食堂办或不办由公社社员讨论决定，取消了供给制。9月，毛泽东建议将基本核算单位从生产大队(旧高级合作社，平均250户。旧生产队)下调为生产队(旧初级合作社。平均30户，改名为生产小队)，实行“三级(公社、大队、队)所有，队为基础”。中共中央经过反复讨论与调查，1962年2月把它写入指示之中。

1959年7月以来，毛泽东为了克服干部的“共产风”等“五风”，主张活用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sup>①</sup>，1962年9月，让写进《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当中。他是想借鉴革命战争的纪律，重新编定党政干部经济建设的纪律。这个《修正草案》在毛泽东逝世前再没有修改过。其中明确记载的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三十年不变的原则，在文化大革命中，张春桥等人基于“穷过渡”(以贫困为动力的过渡)，即“人越穷，越要革命”的精神，但毛泽东都没有松过口(薄一波，第947页)。

---

<sup>①</sup> 党和政府干部的三大纪律——(1)认真执行党中央的政策和国家的法令，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2)实行民主集中制；(3)如实反映情况。八项注意——(1)关心群众生活。(2)参加集体劳动，(3)以平等的态度对人，(4)工作要同群众商量，办事要公道，(5)同群众打成一片，不特殊化，(6)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7)按照实际情况办事，(8)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提高政治水平(《重要文献》第十五册，第641—642页)。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是想开辟一条将农村存在的剩余劳动力转化为生产力的中国独特的建设道路,留下了农田与水利基本建设、工业生产力增大、开创了地方工业与农村工业等成果。不过,这场运动因上层领导能力不足与下边失去控制的狂跑,付出了莫大的牺牲,遭受了失败,于是转变到调整政策。可以认为,“带着自下涌现的前所未有的热情与生产积极性而开展的大跃进运动,由于各级领导者的计划性、技术指导能力等方面的不足,进展不顺”(山本市朗,下,第57页),这种批评是恰当的。毛泽东的责任是极为严重的。不过,我以为,在毛泽东领导这场运动,并努力克服其缺点的苦战恶斗中,包含了“共产主义精神”与“资产阶级法权”及“共产风”的关系等,关乎个人与集体和国家的关系的及关于人民与党的关系的重要问题。这些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来说,都是值得研究的。

另外,对毛泽东来说,大跃进失败的教训是深刻的。他在60年代指导经济工作时没有再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同意陈云等人的意见,继续支持调整(石仲泉,第272—276页)。这一时期毛泽东思想中经济(调整)与政治(阶级斗争)脱节的问题,提供了弄清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线索。

这期间,毛泽东在1958年12月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提议不做国家主席的候选人,获得了批准。在1959年4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被选为国家主席。林彪(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元帅)1958年5月被任命为党的副主席,在庐山会议上最猛烈地批判了彭德怀,1959年9月被任命为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

### 第三节 调整与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理论

1962年1月,毛泽东承担了大跃进失败的责任,主张实行民主集中制与认识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群众”与“实际”)。但此后,由于认为在刘少奇等人实行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中出现了右倾偏向,于是在半年后的八月他又转为反击。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中共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

会议(七千人大会),召集中央、中央局、省、地、县五级及企业与军队的领导干部七千余人,谋求总结大跃进的经验,统一全党的认识,推进调整。会议定了个框框:不否定三面红旗、不否定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处分,即不伤毛泽东的威信,在这个大前提下,想要自由地讨论大跃进的缺点与错误,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疏通上下感情。可以说,这是将前述的麻城县的1万人大会的作法推广到了全国。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在肯定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基础上,指出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为:①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过大,国民经济失去了平衡。②关于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明确,违反了按劳分配与等价交换的原则。③要在全国建立许多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④过高地估计了农业增产的速度,致使城市人口猛增,加重了城市供给的困难与农业生产的困难。他将指标过高、要求过急等错误的原因,归咎为领导者的错误作风:经验不够、违反了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削弱了民主集中制。

1月27日,刘少奇发表讲话,说粮食减产的主要原因,在一些地方是“天灾”,但在一些地方却是“人祸”;成绩与缺点和错误的比重,总的来看,成绩虽是主要的、第一位的。但在一部分地区缺点与错误是主要的、第一位的。三面红旗现在不取消,继续保持,并为之奋斗,但五年后、十年后再总结经验,做出结论。他留下了将来重新研究这次会议的框框——不否定三面红旗的余地。

据说毛泽东在内心对刘少奇的讲话是不满意的。1月29日林彪的讲话与刘少奇正相反,主张: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最近几年的困难,是因为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警告与思想去做;要准备应付世界战争,用毛泽东思想统一我们的思想。毛泽东称赞林彪的讲话“很好,很有分量”(2月20日。《毛稿》第10册,第62页)。

27日讲话之中,刘少奇肯定了庐山会议反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他没举证就给彭扣上了“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都有国际背景(与苏联的关系)”、“他在党中央进行派别活动,他阴谋篡党”的沉重罪名。但他又说,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信,不

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刘由此创造了重新审查被定为右倾分子的党员,并为其甄别平反的条件(丛进,第494—496页)。

与会者对大会有许多不满,如时间过短,不能畅所欲言;若说反对分散主义,就应该发扬民主和反对官僚主义,改变庐山会议以来的下级不能给上级提意见的情况等。为此,毛泽东延长了会期,召开了“出气会”。1月30日上午,各省批评省委;从1月31日至2月7日,小组会议批评了省委、中央局、国家机关、中央机关及其负责人,负责人也作了检讨,就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

1月30日下午,毛泽东发表讲话(《人民日报》,1978年7月1日发表)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共产党多年的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首先由我负责,省委、地委、县委、区委、企业与公社党委的第一书记,也应各负其责。毛泽东是想借助处于最高地位的党的主席承认自己的责任,来促进下级批评上级和上级向下级作自我批评。

讲话由六点组成。第二点,毛泽东主张实行民主集中制,要求:要将工作中的是与非、正确与错误的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通过民主即“让群众讲话”的方法、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加以解决。他说,要批评那种相反的、害怕群众批评的态度、“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的态度,如果“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他特别要求省、地、县的党委第一书记,实行党委集体领导,少数服从多数,做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他说,要向能够采纳各种不同意见,从而取得了胜利的汉高祖刘邦学习,不要做不听别人的意见而败了的“霸王”项羽。成了“霸王”,就要“别姬”。同时,他还说,要通过民主让大家提意见,集中其中的正确意见,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依靠民主集中制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将人民内部的民主与对敌人的专政结合起来。第六点,毛泽东提出要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为了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项原则。

从“开门整风”转向反右派斗争,从庐山会议转向反右倾运动,毛

泽东的本来动机都是为了实行民主，让大家提出各种意见，并将其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加以解决。可是，结果却由于越过了自己所设定的框框，不同意见喷涌而出，变得无法控制，他就将其中的一部分看做是转化成了阶级斗争、敌我矛盾，进行了压制。由于毛泽东掌握着视为转化的判定权，没有明确规定其客观的标准，致使众多的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受到了打击，民族的元气受到了伤害。毛泽东也注意到了可以看做是“专制主义——无政府主义”这一旧中国的结构再生产的体制，虽努力去加以改造，但却没有取得成功。不过，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倾向于阶级斗争、敌我矛盾与集中和专政方面的毛泽东，面临由于领导干部的强迫命令与“瞎指挥风”的盛行而导致的大跃进失败与经济困难，倾向于人民内部矛盾和民主的方面，以至缓和了沉闷的空气，让人们自由讲话，拓宽了政策选择的幅度。

关于自己，毛泽东说：去年6月12日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他部分地反省了自己的错误：由于将庐山会议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了县以下，所以“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毛文》第八卷，第273页），“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同上，第275页）。

第四点，毛泽东谈了关于客观世界的认识问题，他说：“人对客观世界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他谈到：不是共产国际，而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革命的同时，为总结经验，认识规律，从1921年成立到1945年的第七次大会花了24年的时间。与此相同，社会主义建设也需要有一个反复实践，总结经验，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的过程。他鼓励与会者说，红军虽从30万人减少到了不到3万人，但受了挫折，得到锻炼，恢复了正确路线，比过去要更强些。他把长征的经验，用到大跃进上，指出最近四年当中，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在实际工作中犯过错误，吃了苦头，有了经验了，因此我们更强了。毛泽东充满自信地讲：经济建设，在建国后的八年中我们主要是照抄苏联，从1958年开始，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在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可能规定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碰过一些钉子，然而现在正在制造这个。这里再次闪

现出《实践论》的光芒。

并且，毛泽东还讲，欧洲一些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用了 360 年的时间。所以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的中国，要发展生产力，赶超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需要 100 多年。也就是说，毛泽东放弃了用 15 年的时间赶超英国的急躁想法，做好了打长期战的准备。他说：“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此处为《人民日报》所删除。薄一波，第 1031 页）。毛泽东表明了自己辞掉经济建设的前线指挥一职，退居第二线，委任陈、刘、周、邓等人的意思。同时，他还说：“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围绕经济领导能力，毛泽东进行了相当彻底的自我批评。实行民主集中制与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是相当于“群众”与“实际”、民主与科学。看来毛泽东主动地接受了刘少奇对大跃进的批评的一部分。可以认为，这是当时毛泽东选择余地中的最佳方案。

这个讲话的基调是温和的，但毛泽东在第五点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反映了中苏关系的恶化，忧心如焚，断定：“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他把警惕性转向国内，警告：中国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就会变成“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的“修正主义国家”。为此，他表明了“反修防修”的态度。关于第三点的联合哪一些阶级、压迫哪一些阶级的问题，毛泽东说，世界上 90% 以上的人民群众要革命，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及修正主义，我们必须站在人民群众一边。他说，在国内，我们站在 95% 的人民群众（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爱国的知识分子和资本家、民主人士）一边，压迫 4%~5% 的人民的敌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反共的右派分子）。他极力主张人民群众即革命的主体的立场，强调了阶级斗争和敌我矛盾。半年后，他突出了这种“反修防修”的思想。

随着这次大会的民主集中制与实事求是的思想潮流，党中央以刘少奇为中心，以恢复国民经济为目标，不仅在经济方面，包括政治和文化方面都加快了调整。

2月，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认为，现在的经济困难比七千人大会的估计还要严重。为克服困难，陈云提出了六条措施：①把十年经济计划分为恢复和发展两个阶段，五年的恢复阶段恢复农业，降低工业速度，采取集中统一与稳步发展的方针。②减少城市人口。③制止通货膨胀。④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⑤农业增产。⑥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从工业、交通转移到农业和通货膨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的内容，商定成立中央财经小组，任命陈云为组长、李富春为副组长。之后，陈云代替毛泽东，领导了调整国民经济。陈云得病后，由周恩来领导中央财经小组。

同月，党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提议：①不提世界战争不可避免论，采取和平政策。②为渡过困难，加速建设，有必要采取缓和的方针，而不是采取加剧紧张的方针。③在国际斗争中，要小心谨慎，注意策略，避免把美帝国主义的锋芒全部集中到中国来；对中印边境问题，要设法打开僵局，要高度警惕赫鲁晓夫居心不良和力图孤立中国，甚至不惜同我们分裂。④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能力）进行对外援助（丛进，第500—502页。王稼祥，第444—460页）。可是，毛泽东却没有接受，1963年5月和1964年2月，将这种说法概括为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和，少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 and 党的“三和一小”，将其批评为修正主义。

1962年3月，在全国话剧、歌剧和儿童创作剧座谈会上，周恩来讲话说，知识分子属于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无产阶级应与他们结成联盟。刘少奇召集最高国务会议，坦率地对民主人士说明了经济困难与共产党工作的缺点。3月至4月，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强调了经济调整、政治团结和民主、文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4月至5月，中央统战部进行了统一战线工作的调整与少数民族工作的调整。

4月以后,对在大跃进等运动中批判和处分错了的党员、干部,邓小平主持加速加以甄别平反(“平反风”)。6月,鼓德怀写了一封长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八万言书”),为自己申辩,要求中央审查,然而中央不能予以接受。5月以后,中央农村工作部长邓子恢提出了在集体经济组织中实行生产责任制的建议,得到邓小平和陈云等的支持。然而,毛泽东不满意,1963年5月和1964年2月,将邓子恢的建议概括为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的“三自一包”,批评为修正主义。

4月底以后,刘少奇修改、补充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39年7月演讲。以下简称为《修养》),刊登在党的机关杂志《红旗》上,9月出版了单行本。《修养》卖得很好,很受读者欢迎,开始取代《毛泽东选集》,担负起国家指导思想的作用。刘的《修养》旧版与《关于党内斗争》(1941年7月)的演讲,“顺应党内干部要求缓和党内斗争的心理,谴责王明等在党内人为制造斗争”(高华,第223页)。可以认为,《修养》新版力图缓和1959年批判彭德怀以来激化、扩大了党内斗争,意在掩护经济调整。

毛泽东半年没有出席党中央的会议,离开北京,去了上海、山东、杭州、武汉等地,听领导干部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认为刘、周、陈将形势估计过于严重(“黑暗风”)。7月上旬和陈云谈话,陈云解释说,应允许个体经营与合作经济长期并存,目前应发挥个体的生产积极性,以克服困难。毛泽东听后,当场没有表态,第二天非常生气,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是修正主义”(“单干风”)。陈云默然不语,说身体不适,9月没参加八届十中全会(薄一波,第1086页)。毛泽东虽支持调整,可由于其中不仅涉及到“大跃进”,甚至还追溯到反右派斗争和农业合作化,所以他认为出现了否定自己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意见,因而颇为警惕。毛泽东一创造民主的气氛,让人自由地发言,扩大政策选择的幅度,就越过了自己设定的框框,不同意见喷涌而出,所以要进行压制。这样的“放——收”周期又出现了。

在8月6日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讲话,提



出了三点：阶级（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形势（是一片黑暗，还是基本光明，有黑暗）、矛盾（社会主义社会有什么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设定了讨论的范围（《学习文选》3，第303-305页）。

在8月9日的讲话中，毛泽东说：“你压了我那么久，从1960年以来，讲两年多了。”宣布要进行反击。他首先说：“共产党垮了，国民党来。”他把国共内战的敌我矛盾提到前面，把问题从经济的层次、纠正大跃进的错误，上升到作为其前提的政治的层次、保卫共产党的政权，警告说，农民已经发动起来，但还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地主、富农复辟的问题。其次，他反驳了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主张不搞单干粮食就不能增产的邓子恢等人，说单干“一年就要（两极）分化”，就会“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而军、烈、工、干属、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万岁》丁本，第425页）。他将贫困农民和富裕农民的矛盾提到前面，说，如果单干，农民中的“强劳动压迫弱劳动”。他将此看做是有的地委、省委书记就要代表富裕农民搞单干的资本主义道路，所以要反对。毛泽东把矛盾看做是地主、富农和共产党争夺农民，主张走共产党领导的、依靠贫农并争取中农，实行按劳付酬并照顾四属、五保的社会主义道路。他彻底贯彻阶级观点，比起富裕农民，更加重视革命的主力——贫困农民作为应该依靠的力量，这属于后述的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理论的下层方面。

毛泽东承认工作中的错误是高指标、高征购、瞎指挥、共产风、几个“大办”、安徽“三改”、引黄（河）灌溉，说这都是“认识上的错误”，重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问题才是根本的问题。他承认：“基本建设多招了2000万人，没看准，农民就没有饭吃，就要浮肿。”但却自负地认为：“正因为是共产党政权，所以才能让2000万人回到农村。”毛泽东主张，大跃进中的具体工作的错误要纠正，但远比这重要的，是反击趁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威信低落而发起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他甚至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部把帽子摘掉？”似乎是对周恩来所持的知识分子观提出了质疑。

9月24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表讲话说，社会主义国家

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他引用列宁的理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6月,以下简称为《“左派”幼稚病》)说,“革命胜利后,本国被推翻的阶级,因为国际上有资产阶级存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的残余,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因此,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甚至要复辟的”。他断定南斯拉夫和苏联都变成了修正主义,并批判了苏联的大国主义(后述)。涉及中国国内,他将右倾机会主义(彭德怀)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毛泽东突出了对抗内外的敌对势力,保卫中国共产党政权的问题。

另一方面,关于国际形势,毛泽东说,自己在开国初期也曾预测亚洲、非洲的共产党和工会会受摧残,但这个看法是不正确的。他乐观地认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斗争都是年年发展,古巴、阿尔及利亚、印度尼西亚、南越、老挝、埃及、伊拉克等国的形势非常好。他说:“我们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全世界人民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万岁》丁本,第433页),在世界各种矛盾中,最重视这个矛盾。在美国插手南越、新疆居民逃亡到苏联、中印边境局势紧张、台湾策划反攻大陆等国际环境恶化的形势下,将中国的敌我矛盾与世界的敌我矛盾结合起来,反对修正主义——从外部压迫、从内部瓦解我们对敌斗争的政权和主义的危险物,这属于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理论的上层方面。

毛泽东以阶级斗争理论为论据,批评了在调整中出现的单干风和黑暗风的同时,也批评了平反风(“三风”),说“不能一律都平反。”不过,他又说,对党内国内的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与此前相同,坚持1942—1945年整风运动中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犯了错误的同志如果改正了,我们就欢迎他,团结他,决不杀他。在前述的8月6日的讲话中,毛泽东将此理论化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上是敌对矛盾,我们当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学习文选》3,第305页)。他是想避免斯大林大肃反的错误。

另一方面,毛泽东采纳了刘少奇的意见,从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妨碍了经济恢复工作的大跃进的痛苦经验(本书第275页)中汲取了教训,说:“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工作与阶级斗争要平行”,“阶级斗

争不要影响我们的工作。”注意到了优先发展经济调整工作(《万岁》丁本,第435页)。

9月27日发表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全面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新论点。关于国际形势,它强调了全世界人民、特别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各国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及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和帝国主义、反动派及修正主义(南斯拉夫)之间的“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关于国内形势,《公报》宣布要粉碎利用我们经济困难的、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一伙的进犯大陆的策动,及地主、富农、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的颠覆活动。在这个基础上,它把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理论如下公式化了: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或更长的时间)(毛泽东添加:“在由资本主义……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

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添加)。

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重要文献》第十五册,第653—654页)

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理论,把阶级斗争存在的过渡时期,视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1958年刘少奇的报告中视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建成,在此之上加上了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延长了一个阶段,纳入了处分彭德怀的庐山会议的经验,强调了阶级斗争反映到共产党内的问题。比过去更加重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是

想更加彻底地进行阶级斗争。关于这个理论,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它将以工人和贫困农民为主力的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与全世界人民的反帝斗争,特别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用一个逻辑结合起来,让中国人民承担起对内斗争、对外支援的重任。

第二,它通过大跃进的实践,明确地提出了共产主义的目标,把社会主义规定为中国人民成了主体,朝着共产主义方向前进的力量,不断地打破内外想要倒退回资本主义的力量的斗争场所。把共产主义看做是“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与改造世界”时代的《实践论》哲学,和依靠党外群众的批评来克服共产党的官僚主义的开门整风和整党的思想,注入这里。但是,人民公社的设想中所列举的五个条件当中,没提“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这一物质的条件,而是把提高人民的教育等精神的条件,和消失三大差别、消灭国家等社会的条件,都塞进阶级斗争中,牵强地认为只有依靠阶级斗争才能实现共产主义。

第三,它依据了《“左派”幼稚病》等“外国武装干涉及国内战争时期”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列宁理论。看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这一理论对通过思想上的阶级斗争,来克服内部的共产党的变质与外部的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一目前的课题,是最合适的。

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理论,一方面内部包含了中国人民成了主体,借助“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一列宁主义的框架,来认识中国与世界的矛盾,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方法来解决矛盾,向着“大同”方向不断前进。这一思想就是“人民、矛盾、大同”这个从外部对帝国主义的绝对批判。

但另一方面,毛泽东转变为偏于自我防卫的被动的态度,就是从反面、消极面发现和铲除企图利用大跃进的失败,妨碍、毁坏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敌人,保卫共产党政权这一态度。我=“毛—党—人民”从正面、积极面实行民主集中制,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改造自己,提高道德与能力,收拾大跃进的败局改造世界——七千人大会的这种能动的态度被束之高阁。可以说,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理论成了永久反“反革命”理论。毛泽东将自己作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道

路的化身，加以绝对化；把政策上对自己的不同意见看做思想上背叛正统的异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道路来定罪、压制，并将此加以正当化。毛泽东从刘少奇报告的方向转换到了林彪讲话的方向上。他将重心从自我批评与自我改造转向了自我防卫，从团结与民主的方面转向了斗争与集中、专政的方面，走向了使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激化的方向。不过，另一方面，毛泽东着手进行三线建设（后述）与地方工业化，在这一实践的过程中努力去认识经济建设的规律。

《公报》在阐述了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理论之后，指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加强民主集中制，实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将推进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作为当前的任务。它谋求把政治上阶级斗争的激进主义，与经济上调整的渐进主义平行推进。

#### 第四节 中苏论战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力图依靠调整恢复经济的同时，以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方针，对外继续进行中苏论战，对内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革命，想通过回归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人民战争的基点，来获得国外的支持，统一国内的思想，打破困难局面。可是，对外在进行“抗美援朝”的过程中，中苏关系几乎成“分裂”状态；对内在接受贫下中农的批评，克服基层干部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的过程中，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对立表面化了。

##### 一、中苏论战

与革命相同，在建设方面，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将苏联的经验当做各国应走的共同道路加以学习，另一方面又将其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努力开创独自的道路，在接受苏联援助的同时，抵抗其大国主义的干涉，贯彻独立自主的方针，公然与其展开论战。

吴冷西曾是中苏论战时中共中央论文写作班子的一员，据他的

回忆录《十年论战》记载，毛泽东在处理重大事件的时候，通常是先召开少数人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常委会。相当于“八大”以前的书记处会议），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高龄的朱德与身体有病的陈云、林彪大都缺席），每次都让担任邓小平助理的书记处书记彭真及负责外交和理论的干部等有关人员列席。进行预备讨论，然后再召开较多人数的政治局会议或其扩大会议进行充分的讨论。看来，常委会是采取毛拿出一个原案，刘、周、邓及列席者在同意其基调之后，分别阐述各自的意见，扩大、深化认识，再由毛归纳要点、让邓执行的方式。讨论似乎是相当顺利、有效和充实的。

在中国方面看来，1956年开始了中苏对立的第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大会上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之事提出了异议（《一论》、《再论》），反对其提出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主张，《人民日报》的社论对此根本不提，只支持关于东西两大阵营的“和平共处”论与“和平竞赛”论。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共代表团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向苏联共产党提交了“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向社会主义）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的《意见提纲》，使《莫斯科宣言》在提及和平过渡的可能的时候，对非和平过渡的可能也明确地加以记载。而且，中共代表团提倡《再论》中所提及的新的联合方式，就是为了对抗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采取以苏联为中心、同时各国共产党独立、平等地经过协商来取得意见和行动的一致性的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联合方式；“宣言”中写明了在必要时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进行讨论、交流、了解与协议。

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和共产党在思想上占据优势地位、掌握着主导权，依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自下而上的人民民主，顶回并支持在实力上占优势的蒋介石和国民党进行的自上而下的国家统一，抗战到底。可以认为，毛泽东把这个中国的“抗日—民主”的逻辑，扩大规模，应用于世界。

1958年，中苏对立进入第二阶段。针对在美苏和平共处的世界

战略框架下压制中国的苏联大国主义的压力，中国进行了抵抗。

同年，毛泽东将苏联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及搞中苏共同舰队的提议，看做是想要封锁中国海岸的企图而加以拒绝。1959年6月，中共中央收到了苏共中央废弃两年前缔结的《国防新技术协定》（约定苏联提供导弹、飞机及原子弹等的样品）的通告，判断赫鲁晓夫采取了通过与美国妥协，压制中国来保卫世界和平的新方针。同年9月，中印边境发生军事冲突，苏联塔斯社发表声明，说中国阻碍世界紧张局势的缓和，使美苏首脑会谈“复杂化”。这在中国方面看来，苏联是想将中苏分歧向世界公开，要搞苏美合作来解决世界问题。

赫鲁晓夫结束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举行的首脑会谈回国，途经北京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的庆典。他暗中批评了去年中国炮击金门、马祖及本年的中印军事冲突，教训中国“不能用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这是不正确的”。他在中苏两党的会谈中主张跟美国搞和平竞赛。毛泽东反驳说，我们既赞成美苏首脑会谈，又赞成和平共处，应该看美国帝国主义的本质，艾森豪威尔有阶级局限性，很难说他真正爱好和平（《论战》，第220—221页）。赫鲁晓夫劝告中国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若将台湾像苏联过去内战时期的远东共和国那样加以处理如何（使其从中国分离出去）？毛泽东当即回绝说，我们与美国的关系问题是国际问题，我们要求美国撤出台湾，赫鲁晓夫同志可以劝艾森豪威尔撤兵；我们与台湾的关系这个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别人无权过问。看来毛泽东主张在1955年以来的中美会谈中，中国要求美军从台湾撤退，美国要求中国在台湾海峡“互不使用武力”，意欲制造两个中国；对此，苏联是应该站在中国一边而不应该站在美国一边。

1960年，中苏对立进入了第三阶段，围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展开了理论斗争。

同年1月举行的中央常委会扩大会议，同意去年12月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中“赫鲁晓夫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又不同于铁托”的评价。毛泽东主张，美国不会像他想的那样让步，苏联内部的许多人及众多国家的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

思列宁主义，民族独立运动还要继续发展下去的诸多条件，制约着赫鲁晓夫完全变为修正主义。会议一致同意“力争他变好，采取以团结为重的方针”（同上，第238—241页）。4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论文，主张为了赢得世界和平，必须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战争政策，现在仍然要坚持“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斯大林）的列宁主义的时代。不过，5月的美英法苏巴黎首脑会谈流产后，毛泽东分析国际形势说，目前不会发生世界大战；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即使冷战共处也比打大仗好。我们能争取10年、15年也好，更长的时间更好，使我们能把我国的建设搞好（同上，第270—271页）。

6月，毛泽东指示参加罗马尼亚劳动党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彭真，采取极为慎重的斗争方法：“坚持团结，坚持原则，摸清情况，后发制人，据理辩论，留有余地”（同上，第278—279页）。在大会上，代表团受到了“突然袭击”：《苏联共产党致中国共产党的通知书》认为当今时代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代”，赫鲁晓夫演说指责中国为“教条主义”、拒绝“和平共处”的“左倾冒险主义”、“分裂主义”。彭真根据“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进行了反驳。7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将双方的对立点归纳为：我们认为革命力量越壮大、越发展，和平的保证就越大、战争的危险就越小；赫鲁晓夫认为革命越发展，战争的危险性越大，和平的可能性越小（同上，第309—310页）。同月，苏联通知撤回派驻中国的全部专家，给陷于经济困难的中国以进一步的打击。

8月，越南胡志明访问北京与莫斯科，向中苏两国共产党提议，召开三个会：①中苏两党会谈；②由各个洲的共产党组成起草委员会；③世界共产党与工人党会议，通过宣言，团结起来共同对付主要敌人美帝国主义。此建议为中苏双方所接受。毛泽东对归国途中顺访北京的胡志明说，意识形态的争论可以争个面红耳赤，也可以从长计议，让实践证明谁错谁对，但大国沙文主义非抵抗不可，没有谈判、妥协的余地。他将中苏论争的两个方面加以区别，明确表示将重点放在后者（同上，第350页）。



9月,中国共产党将针对《通知书》的《答复书》派人递交苏联共产党,派出了以邓小平、彭真为正副团长的代表团赴莫斯科,两党会谈只有争论未得结论。毛泽东对回国的代表团说,我们要准备他们采取1948年对待南斯拉夫党那种办法,把中国逐出“教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主张做最坏的准备,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以不“破裂”为原则,要放手斗,在全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上争取达成协议(同上,第364—365页)。10月,中共代表团在26个国家的党代表参加的起草委员会上进行争论;11月,以刘少奇、邓小平为正副团长的代表团在81个国家(参加)的党的会议上进行了论争。由于多数共产党强烈要求团结,所以苏中两党分别让步,达成一致意见,12月,发表了《莫斯科声明》。毛泽东称赞了归途顺访中国的胡志明的功绩,说这次会议取得的第一个胜利就是明确了革命路线,第二个胜利是肯定了协商一致的原则(同上,第441页)。

1961年9月的中央常委会对明确记载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苏联共产党纲领草案》进行讨论。毛泽东将赫鲁晓夫看做是苏联的高薪阶层=特殊阶层=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代表,并说我们同赫鲁晓夫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即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在国家关系上是国际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同上,第463--465页)。刘少奇将赫鲁晓夫路线概括为“三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二全(全民国家、全民党)”。在采纳了新纲领的苏联共产党第22次大会上,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对赫鲁晓夫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之事(实际上包含了对中共的批判)进行了抗议,主张基于社会主义各国与世界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与支持、合作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平等、协商一致的原则,解决分歧。周恩来拜谒了斯大林陵墓,并敬献了花圈后于会议中途回国。

1962年9月24日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将焦点聚集在国家关系上,专门批判了赫鲁晓夫对中国的大国主义压迫,说苏联1958年提议要搞中苏共同舰队是想封锁中国海岸;1959年中印边界问题,赫支持尼赫鲁,攻击中国;中国建国十周年国庆时攻击中国;1960年的布加勒斯特会上围剿中国;莫斯科会议上与中国争论。他

将其源头追溯为 1945 年阻止（不许）中国革命的斯大林，对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几乎未提及。

10 月，美国从海上封锁古巴，要求将苏联拥有的核导弹撤走，核战争的危机迫在眉睫。苏联答应了美国的要求，危机得以回避。中国支持古巴抵抗美国的斗争，批评苏联把核导弹运进古巴为冒险主义，指责其撤走为投降主义。可以认为，这时的毛泽东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认为如果赫鲁晓夫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挥舞指挥棒的话，全世界人民的革命运动将被破坏。自 1962 年至 1963 年初，中共发表了七篇论文，反驳自己的代表团在东欧五国共产党大会上所受到的攻击。其中《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1963 年 3 月，《红旗》编辑部）最鲜明地表现了其独特的想法。

1963 年 2 月，苏共向中共提议举行中苏两党会谈，然后召开国际会议，停止公开论战。在 3 月 30 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中陈述了苏方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观点，说想将此作为两党会谈的基础。对此，中共中央在 6 月 14 日的回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二十五条》）中，最全面且简洁地概括了自己的观点。

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一方面是采取坚持马列主义、反对修正主义这样一种普遍原理的形态，另一方面将通过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实践对马列主义原理进行再造的中间地带论、过渡期阶级斗争理论等拥有特殊的结构论的毛泽东的思想，作为理论依据。

1960 年的莫斯科声明判断：依靠（1）世界社会主义阵营；（2）国际工人阶级；（3）民族解放运动；（4）爱好和平的国家以及力量这四方面力量的联合努力，能够防止帝国主义发动的世界战争。中苏两个共产党虽以此为共同基础，但围绕其中何者为主要的力量，双方的意见是对立的。双方对通过莫斯科宣言与莫斯科声明被写成文章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进行对立的解释，双方的争论就是以这种形式展开的。

苏联共产党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是我们时代的主要矛盾”，说：“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命运，在决定性的程度上取决于两个世界体系的斗争的结局。”苏共将“（1）社会主义阵营”，

尤其是拥有热核武器的苏联的军事力量作为主要力量；主张在此之上使国际工人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民主势力汇合到一起，使帝国主义停止发动世界战争，争取“和平共处”。它在其中指引了一条开展扩大生产力的“和平竞赛”、社会主义各国赶超资本主义各国、促进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以及被压迫民族的政治独立、经济独立的道路。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想要回归作为其基础的人民来颠倒立足于阵营、国家、共产党、核武器的苏联的逻辑。中共说：“那里有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黑暗统治，那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总是要起来革命的”（《二十五条》，第12条）。如果党的领导集团采取不革命的路线，那么“党内的和党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会代替他们在革命中的地位，起来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指古巴）；在另外一种情况下，“资产阶级革命派”就会起来领导革命（指阿尔及利亚）。其中贯穿着毛泽东的“人民反抗压迫”的信条。

由此，中共认为，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帝国主义之间及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断定认为在这四个基本矛盾当中，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侵略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同上，第8条）。它实质上认为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将“（3）民族解放运动”作为阻止世界战争的主要力量。它基于此，要求社会主义国家与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将民族解放运动看做是对自己的一种最可靠的支援，坚决地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不要把支援看成是一种负担或者恩赐。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主张过应该将暴风骤雨般势不可挡的农民运动看做中国革命的原动力，一切革命党不要批评他们，反对他们，要站在其前头领导他们。可以看到，他将确信人民是革命的主体，要求革命党服务人民、领导人民这一态度，扩展到世界范围。

基于这种对矛盾的认识,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中共反对苏共的以为“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的星星之火,会导致一场毁灭人类的世界大战”(同上,第14条),想通过压制局部的革命战争来争取“和平共处”的思考方法。中共主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朝鲜、越南、古巴、阿尔及利亚等)局部地区的革命战争并没有导致世界大战;这些革命战争的胜利反而直接削弱帝国主义的力量,大大增强了制止帝国主义发动世界大战、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其理论根据是1946年毛泽东提出、1958年前后公式化的中间地带论:美国的反动派,首先进攻美国人民,其次征服美苏的中间地带,然后进攻苏联。因此,美国人民与中国等中间地带的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并战胜美国及其走狗的进攻,以此就能遏止美苏战争=第三次世界大战。

相对于由依靠核武器恐怖均衡来维持和平的欧洲战线所产生的、在美苏共处的条件下进行改良的道路,中国主张,第二次大战后,中国、朝鲜、越南的人民战争对抗美国现代化的军事力量的亚洲战线所产生的世界人民的革命道路。在这一层面上,中国的建议被认为是有意义的。而且,应当看到,针对苏联把世界史看做是依靠生产力的发展,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阶段”过渡的时间性的思考方法,中国提出了依靠革命战争来解决帝国主义、反动派与被压迫民族、人民之间的“矛盾”这一空间性的思考方法。这里反映了由军事的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士兵站在最前列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与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农民为主力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两种革命类型的差异。进而,可以认为,这是由于先行于此的作为欧洲边缘的俄国与作为东亚中心的中国之间历史与文明的差异的影响所致。只是,中国共产党把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非常短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这一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阶段论完全束之高阁,偏倚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论,不免有只纠缠双方的对立点,使对话变得困难之嫌。

关于国家与革命的问题,中国共产党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目前应该领导反对垄断资本的斗争,保卫民主权利的斗争,反对法西斯危险的斗争,争取改善生活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扩军备战,保

卫世界和平的斗争，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由此主要打击的是针对美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和国内其他反动势力。而且，中共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要求用长远观点实现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在准备和平发展的同时，必须对革命的非和平发展作充分的准备，必须同把眼前的运动当作一切的社会民主主义划清界限（同上，第10—11条）。可以看出，中共不是内在地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变化与追求和平、民主主义、提高生活的民众思想与行动，让他们支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共同研究制定将当前的斗争与长期的目标相结合的革命战略，而是从外部硬套公式，要求他们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中共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足于从事战争与革命的农村的武装斗争，将此与追求和平与民主的城市民众运动结合起来，然而，在中苏论战时没有把人民解放战争的坚韧性、灵活性扩大到世界规模，进行进一步使其充实、发展的工作。

此外，中国共产党根据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存在着阶级斗争这一独特的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理论，反对苏联的“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主张（同上，第17—19条）。

1963年7月，中共应苏联的提议，派以邓小平、彭真为正副团长的代表团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两党会谈。出发前，毛泽东勉励代表团说，苏联是想迫我屈服，对此我们必须更加强调坚持原则，才能争取“破而不裂”；代表团达不成协议，不向赫鲁晓夫下跪，就是胜利（《论战》，第600页）。中苏两党会谈以双方各坚持自己的主张而告终。毛泽东称赞回国的代表团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两党会谈进行中的7月15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在《真理报》上发表了反驳《二十五条》的《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在这封信里，对于中国提出的对现代世界矛盾的认识（本书，第299页），苏共说：“使民族解放运动孤立于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之外。”对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苏共说：“不能同意中国领导关于在（由世界热核战争导致的）数以亿计的人的尸体堆上创造出‘高千百倍的文明’的观点”。对于国家与革命的问题

题,苏共说:“(盗窃国库者等等)罪犯在任何社会中也不构成一定的阶级。……同这样一些人作斗争时并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全面地进行了拒绝。

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毛泽东领导、常委会讨论、“中央反修文献起草小组”(组长康生、副组长吴冷西)执笔的反驳7月14日苏共公开信的9篇论文(以下简称《一评》—《九评》)。其逻辑由批判苏联所讲的所谓“和平共处”是指“苏美合作,主宰世界”与国家的“私”(利己主义),深入到公开指责其基础部位的赫鲁晓夫和苏共领导层的特权阶层化,即领袖和党的“私”(利己主义)。

《一评》是《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1963年9月6日),它针对苏共说中国缩小了中苏间的贸易,将思想上的不一致扩大到了国家关系的非难,中共揭露事实说,是苏联1960年7月16日突然照会,撤走技术人员,撕毁了数百条协议与合同的事实。

《三评》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同年9月26日),其中谈到,南斯拉夫在城市与农村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蜕化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沦落为美帝国主义的附庸;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买办资产阶级专政,这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复辟资本主义。它认定赫鲁晓夫是以铁托为师而学的。

毛泽东认为与赫鲁晓夫维持某种形式的统一战线为好,于是1964年4月16日,在赫鲁晓夫70岁生日的时候,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发了贺电。贺电说,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中,我们紧密地团结,尽管目前双方存在着分歧、不团结,但是,“我们坚决相信,这只是暂时的。一旦世界发生重大事变,中苏两党、两国和我们的人民就会站在一起,共同对敌”(《毛稿》第11册,第59—60页)。不过,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期间的5月27日的常委会上,决定同时开展三线建设(第一线=东北、沿海,二线=中间,三线=内地。在西南=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和西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地建设工业基地)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毛泽东说,这两大问题是同赫鲁晓夫的多年斗争中引起的,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力

气加强抵抗武装入侵的准备,同时防备发生苏联那样的修正主义,必须在我们党内、国内反修、防修。他对《九评》的内容进行了指示(《论战》,第777-778页)。

《九评》是《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1964年7月14日)<sup>①</sup>。它列举了从苏联的报纸、杂志上搜集到的国营企业、集体农庄的领导干部及“私人企业主”设立“地下车间”进行私人生产、进行商业投机活动等经济犯罪的材料,断定在苏联存在着新旧资产阶级分子,存在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并认为,他们这些资产阶级与党和政府机关中“蜕化变质分子”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构成了“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其政治上的代表就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它批判赫鲁晓夫实行下述一系列的修正主义政策,使资本主义势力急剧地膨胀起来。

(1)在“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下,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2)用所谓“物质刺激”,扩大了特权阶层与人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并加剧了阶级分化;(3)实行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与“自由竞争”,瓦解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4)依靠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农业经营,瓦解社会主义的农业计划制度与集体经济;(5)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性论、唯心主义及形而上学、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等反动思想,败坏社会主义的道德风气;(6)在所谓“和平共处”的幌子下,勾结美帝国主义,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九评》还进一步揭批,“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

---

<sup>①</sup> 《九评》看法很片面,但有看问题非常尖锐之处。它指出:苏联存在着共产党特权阶层同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社会内部暗地里增大了利己主义因素,因此社会主义制度和思想正在从内部削弱下去、变为空洞。可以说,这是预言以后苏联解体,并过渡到资本主义。也可以说,这是对于中国在毛泽东时代以后改革开放中发生的消极面,例如贫富差距增大、腐败和犯罪蔓延等的现象发出警告。为了思考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一问题,《九评》是值得回顾的历史文件。

权力来谋求自己小集团的私利”(《总路线》,第 475—476 页),占有远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它主张,他们与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组成的苏联人民、共产党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阶级矛盾,我们期待着“苏联广大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广大的苏联共产党人,终将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而走向共产主义”(同上,第 515 页)。它在结论当中,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列举了毛泽东的 15 条理论和政策,结尾阐述了毛泽东讲过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1. 真正的马列主义者;2. 为人民服务;3. 团结绝大多数人;4. 民主集中;5. 自我批评。并逐条以赫鲁晓夫为反面教员进行了批判。

归根到底,《九评》将共产党员提高道德与能力,为人民服务并领导人民,共同朝着共产主义前进作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持并发展社会主义的最后的据点。

在中苏论战时,中方的主张当中抵抗苏联的大国主义压力,贯彻中国的独立自主的想法及把赫鲁晓夫的压制各国人民的革命来回避战争、依靠美苏的核武器的均衡来实现和平共处的路线颠倒起来,提出依靠抵抗美帝国主义的世界人民的革命运动,尤其是民族解放运动来阻止战争的想法还可以理解,但跟它比较起来,对苏联社会进行的批判的逻辑是有缺陷的。可以看出,中共没有对自斯大林死后,从个人崇拜与恐怖的体系中解放出来,向着和平、改善生活与尊重人权的方向发展,靠发展科学技术与经济增长取得了成效的苏联社会进行内在的分析,终于只根据对社会主义制度、思想的固定观念,将与此不符的地方就攻击为资本主义。它将基于对立物的统一的哲学而形成的社会主义=“公”与资本主义=“私”这一道德的对立、矛盾,直接结合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其经济学上的分析是不够的基础之上,和由迄今为止所做的团结、统一战线的努力一转以宛如正统、正确=毛泽东批判异端、错误=赫鲁晓夫般的口气进行揭批,呼吁打倒赫鲁晓夫的基础之上,事实上体现了毛泽东将自己绝对化的想法。

1964 年 10 月 14 日,赫鲁晓夫被解除了党的第一书记和总理职务,16 日中国成功地进行了原子弹的爆炸实验。之后,中共中央派



周恩来率领的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举行两党会谈。然而，由于发生了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说：中国如果也让毛泽东下台的话，可以改善关系的醉酒“失言”事件，毛泽东断定苏联领导层推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赫鲁晓夫解职不但没有令中苏关系好转，反而进一步恶化。

1965年3月，苏共在莫斯科召集26个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但以中国为首的阿尔巴尼亚、越南、印度尼西亚、朝鲜、罗马尼亚、日本这7个国家的党没有参加，开成了19个国家的党的分裂会议。之后，中苏关系陷于“分而不裂”的状态。1966年1月，中共收到了苏联共产党第23次大会的邀请信，虽然1月彭真提出可以参加<sup>①</sup>，但3月在常委会上，毛泽东决定不参加，中共连贺电亦未发。

## 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3年5月，毛泽东将“生产的形势，一年比一年好。阶级斗争的形势是严重的，尖锐的”（《万岁》丁本，第440页）作为当前的矛盾。

生产的方面，周恩来领导调整国民经济，1962年大幅度调整退够，加大农业力度，削减重工业与基本建设，减少城市人口，经济脱离最低点，开始好转。1963年，农业与工业都增产，增加了商品供应量，基本建设也开始增加，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经济开始全面好转。根据毛泽东指示，9月党中央决定还要进行3年调整，延期开始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年至1970年）。这期间，导弹及核武器等国防尖端技术的开发取得了成果。

1964年12月21日、22日，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后述），1964年农业生产达到了1957年的水平，工业生产有

---

<sup>①</sup>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斯诺时说：刘少奇、彭真建议要派中共代表参加1966年3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这个建议被我们打掉了，“要搞修正主义就要跟苏联妥协”（《文革资料》中册，第500页）。在这里，毛表示非常强烈地警惕着是不是中国国内修正主义者内应苏联（在中国搞修正主义，不联合国际上的修正主义不行）。

了新的发展，国民经济成功地得以恢复。

阶级斗争的方面，从1963年至1965年的三年间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非常称赞大跃进中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的空前高涨为“共产主义精神”，正因为此，他将遭到挫折受了打击的原因归咎为农村基层干部和党员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及存在于背后的阶级敌人的策动，对反革命复辟抱有危机感。他由对人民的过度乐观一转而为对基层干部的强烈戒备，想通过让人民批评共产党员的官僚主义及不良行为来加以克服。早在1960年11月15日，毛泽东就发出了关于彻底纠正“五风”（本书，第244—246页）问题的指示，强调“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毛稿》第9册，第352页），想要将干部和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加以解决。而且，同一天，毛泽东还说了：“要讲（全国）三分之一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同上，第349页）。他指示：让干部“下放”，纠正坏人、坏事。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认为，在全国的县、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当中，一类（好的）占30%，二类（普通的）占50%，三类（坏的）占20%。他说：“三类县、社、队，有的领导权被地、富、反、坏分子篡夺了，实际上是打着共产党的招牌，干国民党、地主阶级的事，是国民党、地主阶级的复辟。”

1962年9月，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理论公式化之后，1963年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决定，推进清理农村账目、仓库、财物、工分的四清运动，和反对城市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分散主义、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5月，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委员及大区书记召开杭州会议，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前十条》）。

毛泽东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定位为“从党内至党外，从上至下，从干部至群众”，“土地改革以来最初的最大的”“阶级斗争”。他在《前十条》前文中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讲，人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获得认识，把认识放到实践中去检验，“由物质

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这样，他用其他的表现来教导《实践论》的纲要，要求干部学习这种认识论，进行调查研究，克服困难。毛泽东是想通过向革命的基点的回归，从社会底层的农村防止反革命复辟，重建社会主义。他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揭露了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企图复辟（地主，富农打击贫下中农，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进行恢复封建的宗族统治的活动，利用宗教和反动会道门欺骗群众，反动分子的破坏活动等）、旧资产阶级的策动（投机倒把、雇工剥削、高利贷、买卖土地）、新资产阶级的出现（投机与剥削，国家机关及集体经济中出现的腐败、变质的干部）。对此，他要求，依靠贫农下中农，让他们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协助、监督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的管理；让他们参加四清、批评干部；教育犯有缺点错误的干部，让他们虚心检讨，积极退赔，将干部与群众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予以解决，团结对敌，实行阶级斗争；让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改进工作方法。他说要放手发动群众，揭露坏人坏事，而且还说，严禁逼供信、打人和体罚，要求兼具大胆与细心。

为了克服大跃进与经济困难所带来的共产党的威信低下与社会秩序的动摇，毛泽东想要发动贫下中农的群众运动，让基层干部恢复群众路线，对地主、富农实行阶级斗争。这是革命的经验在建设中的应用。今天中共批评《前十条》过大地估计了形势，但当时似乎也有上边一制定阶级斗争的方针，下边必汇报加以迎合的夸张了的“实际情况”（上之所好，下必甚之）。

5月份的杭州会议之前，有人就汇报说各地试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火了。之后，在各地视察过的彭真向毛泽东建议：防止急躁与偏差，进行从宽处理。9月份的党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由邓小平、谭震林主持、田家英执笔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后十条》），经刘少奇修改、毛泽东批准后，11月交付中央局与各省委。

《后十条》的基本方针与《前十条》一致，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党的干部同群众打成一片，同时它也提出了一些具体政策，想要抑制阶级斗争过于扩大、保护集市贸易、肩挑运销以及贩运、家庭副业、自留地，注

意不要妨碍依靠发挥个人积极性来恢复经济。关于运动的方法，文件提醒要由上面派工作队，“访贫问苦，扎根串联”，除被坏干部把持着领导权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之外，“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

在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党中央对事态越来越重视。1964年春，刘少奇主张，要追犯错误的基层干部的“上面的根子”。8月，他向毛泽东建议，将省、地和县的工作队集中于地委，中央各机关的工作队也分到省、县，打对县逐一清理的“歼灭战”。毛泽东“完全赞成”后，推举刘少奇为五反与四清指挥部的统帅，邓小平、彭真为协助。9月，刘少奇根据“桃园经验”（后述），主持修改了《后十条》，将“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一条更改为：由整个运动工作队领导，工作队在扎根串联、调查研究以后，决定是否依靠基层组织与基层干部。其结果，对基层干部打击面过宽、过重，以致发生打人、捆人、自杀、逃跑等事件。

“桃园经验”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1963年11月至1964年4月在河北省抚宁县桃园生产大队蹲点调查的“经验总结”。毛泽东看了很欣赏，9月中央转发了这一文件。王光美等人先将基层干部排除在外，倾听了群众的意见，他们以群众的压力为背景教育干部，推动干部自我革命。群众揭露自称是贫农出身的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吴臣是小买卖出身，打过许多贫下中农，所以工作队撤了吴的职，推荐别的党员当书记。工作队将吴定为“钻进党内的坏分子”、“国民党分子”，公社党委批准把他清洗出党；工作队称桃园生产大队党支部为“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办的国民党的事情”的“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揭发了一直保护吴的区、县干部。在今天的中国，一般地认为，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与陈伯达的天津小站地区的夺权斗争的经验使社教运动更加激化（薄一波，第1123页）。

桃园的“经验总结”（节录，1964年7月4日。《集体化》下册）生动地描绘了农村的实际情况。在农民受大队干部的压制，怕报复，不敢将一肚子不满对工作队说时，工作队就断然致力于放手发动群众，大胆依靠贫下中农。在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以后，又有“过激情绪”之时，就要掌握运动的火候，强调“实事求是”，贯彻政策，注意不“出乱子”。我们可以感受到，王光美他们依靠党的领导来驾驭群众运动，井然有

序,防止出乱子的倾向很强。毛泽东曾说过:“基层干部不参加劳动,不就跟国民党保甲长(本书,第80页)一样了吗?”(《万岁》丁本,第445页)这里确实有农民对基层干部的专制主义统治所进行的无政府主义的反抗这种关系,似乎是重新形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描绘的农民反抗旧中国的土豪劣绅(“土皇帝”)统治的结构。

中共注意到了这种结构,着手改造,这是极为重要的。不过,因为中共确信通过革命已经彻底地改造中国社会,所以将基层干部的“土皇帝”化现象看做干部被地主、富农腐蚀及向新资产阶级分子蜕变的阶级问题,想要通过自上派遣工作队及自下依靠贫下中农这种土地改革时期的阶级斗争的方法来加以解决。1916年李大钊在《民彝与政治》中提出了改造旧社会的重要逻辑:抵抗企图继承东方式专制的上层建筑、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在东方式自由(脱离政治的、消极的自由)的基础上,建立近代的民权(参加政治的、积极的自由)。如果用此来加以比照,那么桃园的人民依靠自己的自然与自由来拒绝为政者的压迫的消极的自由(“常”)是强烈的,但人民自己造就判断是否的能力,通过讨论形成民意来将其实现政治的积极的自由(“法”)却是薄弱的,所以,他们无政府主义式地反抗,横冲直撞(近藤,第189-197页)。可以认为,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包含着这样一种逻辑:在树立人民的权力与所有制的公有化这一革命成果之上,人民发挥主观能动性,做了认识并改造社会与自然的真正的主人;然而,因为作为行政的担任者、生产手段的管理者的干部依靠手中掌握的生杀予夺的权力,做了人民的主人(“主人的主人”,萧延中,第191页),所以要把这种颠倒再颠倒过来。可是,由于中国目前必须依靠阶级斗争来防止蜕变为修正主义这一警惕心太强烈,所以比起长期地提高人民的能力和道德水平的“立”=建设的方面<sup>①</sup>,更偏倚于目前打倒干部的“蜕化变质分子”这一“破”=破坏的方面了。

---

①.“前十条”规定:“要充分发挥贫下中农组织对社、队管理委员会的协助和监督的作用。”更进一步思考,通过扩大人民做批评、参加的主体、民主(横的组织)方面,纠正偏于党的领导、集中(纵的组织)的方面的倾向,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民主化——毛没有这样做的可能性吗?

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全国工作会议。1月14日，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在此，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对立显露出来。

第一，关于主要矛盾，毛泽东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作为主要矛盾，把运动的重点规定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下简称为“走资派”），把四清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他主张，比起后台老板的地主、富农，更应以整顿台上的、当权的“四不清”（在四个领域当中蜕化变质的）干部=走资派为重心。与此相对，刘少奇主张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运动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还是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好。而且，他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不赞成“走资派”的概念，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称作为一个派，人数就太多了”（1964年12月20日，丛进，第603页）。刘少奇是想阻止阶级斗争的扩大化与激化。

第二，关于运动的方法，刘少奇提出工作队秘密“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实行大兵团作战，从一开始就不依靠基层干部。对此，毛泽东批评说：“一个28万人的县集中1.8万人，搞了两个月也没打开，学文件就学了40天。学习那么多天干什么？我看是烦琐哲学”（1965年1月3日，《万岁》丁本，第607页）。“要依靠群众，不能依靠工作队”（同上，第612页）。《二十三条》当中明确记载着：“在整个运动中，省、地、县级党委和工作队，必须逐步做到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包括放了包袱的干部），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的三结合。”“不要神秘化”，“不是靠人海战术”（《重要文献》，第20册，第23—24页），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

本来，毛泽东警惕基层干部脱离群众与实际，压制人民的主观能动性，将导致被打倒的剥削阶级复辟，弱化人民民主专政，同苏联一样，被“官僚主义者阶级”篡夺政权，党和国家全部蜕变为修正主义。因此，他让基层干部接受农民群众的批判，让他们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恢复群众路线，是想从下面整顿共产党。被毛泽东委任为运动统

帅的刘少奇则注重基层干部的官僚主义与贪污腐败，而对整个党和国家的变质注意不够，他将工作限定在依靠由 160 万国家干部组成的工作队进行的、自上开展的揭发贪污运动。刘少奇虽也动员农民群众参加运动，但担心群众过激，引起“乱子”，扩大对基层干部的打击，所以让工作队严格管理群众运动。

据说，刘少奇“对毛泽东是尊重和依赖的”，在重大的方针、政策上与毛泽东产生分歧时，“总是放弃自己的意见，转而支持毛泽东”（《刘传》，第 916 页）。1962 年他对毛的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理论产生忧虑，但却在附加不可以阶级斗争影响经济调整工作的条件下赞成了。然而，看来似乎是具有党组织第一的倾向的刘少奇，在具有人民第一的倾向的毛泽东强制推行阶级斗争时，担心“滥用组织手段，甚至党外斗争的手段来惩罚同志”（《修养》，《刘选》上卷，第 156 页），所以才开始反对毛泽东。毛泽东将大跃进中表现出的人民的“共产主义精神”，在经济上倒退到调整阶段，但是他打算将其在思想上、政治上坚持前进。因此，他与想将调整从经济上波及到政治与思想上的刘少奇之间的潜在的对立，就明显起来。《二十三条》规定，对干部中犯轻微“四不清”的，或者问题虽多但交代好的，要尽可能早一点解放出来；它又规定，对干部中问题不严重，检讨又较好，退赔可以减、缓、免。目前中共对于《二十三条》的这些规定，评价说：“这些规定部分纠正了 1964 年下半年在刘少奇主持四清工作影响下各地运动中产生的一些过左作法”（《七十年》，第 522 页）。但是，它却批评当时由毛泽东提出的“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这后来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口号）推进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发展到新的阶段。

毛泽东看到刘少奇依靠由国家干部组成的工作队，自上揭发基层干部的贪污，有时反对农民群众，就说：“这个搞法和我们过去搞法不一样”（《万岁》丁本，第 608—609 页）。在毛泽东看来，让贫下中农发起群众运动批评干部，让基层干部进行自我批评，恢复群众路线这一工作方法，以及构成其基础的人“改造自己，改造世界”的主观能动性被党和国家干部压制住了。据说毛泽东惊讶、痛恨刘少奇动员了 160 万国家干部的“能量之大”（高华[1998]，第 80 页）。可以认为，毛泽东通过

刘少奇公开反对自己的意见这件事,觉得自己被夺了权,被架空了,因此,决定将刘少奇排除在接班人之外,恢复革命的基点。由毛泽东提出指导思想,刘少奇据此主持具体工作,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的分工负责的作法由此受挫。毛泽东已不相信刘少奇。可是,他也不想委任其他的人来主持四清工作、依靠群众运动来克服基层干部的腐败,他认为,用四清运动与文化批判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于是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

另外,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1964年12月21日、22日)是毛泽东亲自提笔修改并获大会通过的<sup>①</sup>,是在毛泽东与刘少奇公开对立之时,中共中央的统一看法。在考察文化大革命时,此文件非常重要。该报告的基本方针(战略)遵奉毛泽东的思想,坚持原则性,在方针的执行方法(战术)上发挥了周恩来独特的灵活性。

周恩来总结了大跃进失败与调整成功的经验,以《论十大关系》中的矛盾的同一性“互相依存”(本书,第245页)的逻辑与自己的“综合平衡”论为理论基础,掌握经济建设的规律,关于发展今后国民经济的任务,提出了中期目标。

“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后来所说的“四个现代化”)。(为此,)从(1966年以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重要文献》第19册,第483页)。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周恩来主张,在社会主义国家对

---

<sup>①</sup> 《红旗》杂志在1965年第1期刊登了报告的概要。当时只有党内的县、团级以上干部学习报告等文。1998年《重要文献》第19册除第三部分外,公开了第一、第二部分全文。



于和平演变的危险估计不足是错识的,但不能说资本主义复辟就不可避免。他是想回避过多的危机感会使内部矛盾激化这一点。他强调,文化革命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花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最后完成,不能采取简单的急躁的办法,我们的方针仍然是“团结——批评——团结”。他想控制住对知识分子的打击。他主张,站在依靠阶级斗争=革命是促进生产发展的动力之一观点上,将中国社会的矛盾主要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加以解决。关于国际形势与中国的对外工作,周恩来提出了“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这样一个广阔的目标,采取灵活的态度:积极备战,追求和平,尽可能通过外交交涉来解决世界上的各种矛盾。在文革中,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挽救多次危机,在阻止人民共和国的崩溃,收拾“天下大乱”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基础有这种保持平衡的认识。

1965年6月18日,陈云给毛泽东送了一封作自我批评的信,其中说:他1962年估计恢复粮食生产要花8年时间,提出“用重新分田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恢复农业产量。这个意见是错误的”。“现在用加强集体经济的办法,3年就恢复了农业”(丛进,第580—581页)。看来,周恩来灵活地贯彻毛泽东的集体主义的基本方针,取得了调整的成功,在这一方向上,党中央的认识被统一了起来。

### 第三章 越南战争与文化大革命 (1966—1976)

研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很大的困难。

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从毛泽东时代的肯定论逆转为邓小平时代的否定论。毛泽东主导提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8日,以下简称《十六条》)。其中将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规定为“斗垮(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批”),改造教育、文艺,改造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改”),以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毛泽东将文化大革命自诩地称赞为“公开的、全面的自上而下的揭发我们的黑暗面”(1967年2月3日。《万岁》丁本,第664页)。

但邓小平主导下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以下简称为《历史决议》),如我在“前言”中叙述的对毛泽东基本上持肯定态度,但全面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这都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论,斗争的双方均以自我为绝对正确,对方为绝对错误,从正面对立。邓小平时代及以后公开出版的资料、研究成果,严格遵循了《历史决议》的框架,这就是应该将毛泽东错误的文革理论与正确的毛泽东思想相区分。

不过,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出现了有别于路线斗争学说的比较自由的研究。

前面叙述了20世纪80年代的李泽厚。90年代后半期以来,红卫

兵一代的自由主义派的徐友渔吸收了西方的文革研究,对全国 29 个一级行政区(省、直辖市、自治区,以下有时略称为“省级”)的事例进行调查,指出红卫兵运动中,除了存在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对立以外,在造反派内部还存在温和派和激进派的对立,而且主张红卫兵中产生的“独立思考”与文革后的民主运动具有连续性。除此之外,如“前言”的注解所记,也可以看到超越《历史决议》框子的文化大革命观。

我想正视毛泽东主张的理想主义动机和邓小平主张的惨淡结果,并以中国知识分子的体验和思考为基础,来把握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思想。本书依据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及以后出版的资料、研究成果,以解读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把握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到文化大革命其思想的一贯性与变化为重点。关于文革运动及由此导致重组的体制,因为有关资料研究还不够充分,本书仅抓住概况、考察问题的焦点。俟将来资料进一步公开,研究更为自由之时再行补足。

## 第一节 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

毛泽东在中苏论战中,将立足点置于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特别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反对“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苏联大国主义(国家之私),批判“修正主义”作为其根源的苏联共产党领导班子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化(党之私),他并认为中国共产党内部也出现了“官僚主义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想要把批判苏联的矛头指向中国,开展学习毛泽东思想运动,以防止中国向修正主义变质,准备抵抗美苏入侵的人民战争(“防修”)。这个运动即是文化大革命。中苏论战着眼于世界革命,文化大革命着眼于共产主义,二者是互为表里的关系。

防止修正主义、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将来逐步地过渡到共产主义,毛泽东 1962 年以来提出的这些问题(《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1966 年 8 月 12 日),文化大革命又原封不动地继承了下来。毛泽东本人讲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时说,“第一是为了‘反修防

修’，第二是为了战备”并指出“可能在1968年前后发生战争”，说“三线(内地西南和西北)不建起来，党也睡不着”，“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战备动员”，“打仗就得靠青年，把他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什么都不怕”(1966年10月4日对叶剑英的谈话，王年一，第101—102页)。他把文化大革命与对美、对苏的战备联系起来。

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为应付激化了的越南战争，加强支援活动，做本国的人民战争的准备，推进了三线建设。

日内瓦协定所规定的、1956年南北统一选举，未能实现。为了反抗美国遏制共产主义的世界战略支持下的吴庭艳政权，1960年12月南越共产主义者等反抗力量结成民族解放阵线，展开武装斗争，1962年美国设立驻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派遣特种部队进行“特种战争”(对付游击战争的战争)。中国支持解放阵线，1962年夏和北越估计了美军北进的可能性，进行了武器援助，1963年又讨论了共同作战的问题。8月29日毛泽东会见了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发表了“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侵略越南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并指出“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只有通过加强团结，坚持斗争，才能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取得胜利”(《毛稿》第10册，第353页)。可以认为，对中国而言，越南战争是对革命同志的支援，而且具有继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朝鲜战争之后第三次中美对抗的意义。

1964年5月至6月中央工作会议，把(一)大力发展农业，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二)加强国防建设；(三)加强基础工业这三个课题，作为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的基本任务。在6月6日的讲话中，毛泽东将其中的农业和国防工业比做拳头，把基础工业比做屁股，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吴晓林[2002]，第120页)。他还指出，“为了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要搞三线(“大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线(东北和沿海)、二线(中间)也要搞点军事工业(薄一波，1199—1200页)。8月他要求，各省都建设自己的“小三线”，制造常规武器，准备与敌展开持久战(郑谦，第317页)。美军以1964年8月2日的“北部湾事件”为借口，5日对北越进行轰炸，6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

人民决不会坐视不救。10日周恩来列席了全国2000万人举行的集会和游行示威，声援越南。8月17日和20日按照毛泽东的发言，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集中力量（人力、物力、财力）建设三线，把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发展农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转移到进行战争准备上。10月16日，中国首次核试验成功，中国政府声明，这“正是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要消灭核武器”，并提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问题。10月22日毛泽东指示“积极备战，立足于早打、大战、打原子战争”（《发展史》，第539页）。该年末北越正规军开始南下。

毛泽东在1965年1月9日会见埃德加·斯诺时指出，“哪里有压迫，不革命就不行”，“只有美国打进来，中国才打，……南越根本不需要我们去，他们自己可以对付”，“（中美关系改善）有希望，不过需要时间”（《外交》，第559页、557页、548页）。1月上旬成立了以石油工业部长余秋里为首的五人小组的计划委员会，由周恩来直接指挥，主要承担以备战为中心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制定，以及计划管理体制的改革。1月12日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2月7日美机对北越进行轰炸，3月8日美国向南越派遣地面部队，中国据此认为，美国欲继续把越南战争扩大到朝鲜战争的规模（美军该年末增加为18万人，1968年达到54万人，1969年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等多国部队达到7万人）。

2月8日至10日，毛泽东等最高领导人列席，全国各地进行了总计300万人的集会和游行示威，支持越南。4月2日周恩来对巴基斯坦总统说，“如果美国扩大战争，战争是会逐步扩大到中国的，对此我们已经有精神准备和物质上的准备”（《周外交》，第442页），并希望他将此转达给美国。4月中旬中国和北越在派遣支援部队的计划上达成一致。

4月28日毛泽东指示，不要学抗日战争时的蒋介石、苏德战争时的斯大林那样，让敌人“长驱直入”，要采取“诱敌深入”和防御战相结合的人民战争的新战略（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的人民战争、运动战），以防美苏等国军队对中国的进攻（《毛记事》，第938页，郑谦，第317—318

页)。关于援助越南的方法,5月总参谋长罗瑞卿的文章《纪念战胜德国法西斯,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进行到底》,预见美国把侵略南越的战争扩大到北越,再扩大到中国,认为这就是新的世界战争。它主张世界人民必须“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和苏联),应当……成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主力军的作用”。9月国防部长林彪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预见越南人民“用人民战争可以打败美帝国主义”,认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世界的农村”包围北美、西欧等“世界的城市”的形式,并主张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做斗争。两篇文章的构想有着根本的不同,但结果中国采用了林彪文章中的方针。<sup>①</sup>从1965年6月至1970年7月由高炮、工程、铁道、兵站等构成的“中国后勤部队”总计32万人,最多的年份达17万人秘密派往北越,担当国土防卫,进行后方支援,从1972年5月至1973年8月派出了海军,进行扫雷。总计,战伤4000多人,战死1000多人,援助了价值200亿美元的物资(邓礼峰,第330-353页)。

1965年原定于在阿尔及利亚召开的第二次亚非会议被取消,该年印度尼西亚发生了9·30事件后向反共反华政策转变,从该年末开始中国同古巴关系恶化,这些事件使得中国未能团结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来支援越南。

重视美苏和平共处而不对越南进行支援的赫鲁晓夫于1964年秋解职后,勃列日涅夫政权开始对越支援,并向中国谋求共同行动。可是中国担心苏联会把越南作为交易筹码同美国妥协,因而拒绝共同行动。一边继续对苏联的批判,一边将苏联、东欧援助的物资通过铁路运往越南。1966年苏联同蒙古订立新的互助条约,重新派苏军驻扎蒙古,在中苏边境和中蒙边境地区陈兵百万,对中国施加军事

---

<sup>①</sup> 朱建荣在《毛泽东与越南战争》一书中对林、罗两篇文章作了如下解释:“(1)两论文的发表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层大体一致、由罗署名文章代表的军事战略思想(A)向林署名文章所代表的新战略思想(B)主动地转变的过程的里程碑。(2)并没有由对立的(A)和(B)两集团同时进行的对立争论的现象,因此也就不存在(A)在争论中失败,(B)取得胜利的情况。(3)罗瑞卿的下台是因为其他理由”(第472-473页)。这作为对两文章的解释也许是准确的。但是我看不能认为斯诺所说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以是否在以牺牲中国独立为条件的苏联的帮助下,对抗美帝国主义威胁的问题为中心发动的吗”(斯诺[1968],第65页)。这种1968年4-6月的推测,因为朱的解释就完全被否定了。

压力。

朱建荣的《毛泽东与越南战争》对当时中国领导层的思想脉络做如下解读：

(一)1965年4月前半期“中方对中美战争的悬念达到了极点(第298页),我认为,当时中国军方制定了‘美军进犯中国大陆的计划’”。(二)“毛泽东认为……只有以全力援助越南,才是防止美军北进和中美冲突的最有效的手段”(第318页)。(三)中国通过派遣大规模的后勤部队来警告,美军地面部队对北越进行的攻击意味着“同中国进行战争”(第375页),成功地将美军的行动限定为“南打北炸”(在南越展开地面作战,对北越进行轰炸)。(四)基于此,毛泽东着手进行战略调整,加强同美国进行(早晚都要来的)“决战”的准备;揭露苏联“同帝国主义勾结的本质”,并应付其军事威胁;“扫清国内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第399页)。(五)“文化大革命……具有对全国人民进行抵抗来自四面八方的进攻的政治教育的一面”(第449页)。

可以认为这种理解大体是得当的。由此可以给人一种感觉,证明毛泽东的战争、外交指导能力并未衰退而是非常高明的,文化大革命具有为防御因越南战争扩大而引发的美苏对中国的进攻而做思想准备的一面。

在建设方面,毛泽东在1966年3月2日《关于农业机械致刘少奇的信》中说明了“为人民”的意义,就是把苏联农业政策的失败和中国过量收购粮食的错误作为教训,不使国家积累过大,要将粮食分散给全体人民进行储备,备战、备荒。让地方积累资金,以用于扩大再生产。要建立一种以各省、市、自治区自力更生为主,中央有所帮助的关系。“(农业机械)凡国家管理、地方制造、超出国家计划远甚者(例如超出一倍以上者),在超过额内,准予留下三成至五成,让地方购买使用。此制不立,地方的积极性是调动不起来的”。他主张把部分机械制造权分与地方(《毛稿》第12册,第20—21页)。将各省重组为人民战争根据地的战争观点,与“地方工业化”、“地方分权化”的政治经济观点是相辅相成的。

“1965年至70年代中期的(晚年毛泽东)经济发展战略<sup>①</sup>实质上是两条腿走路的工业化路线,它提倡中央主导的大三线建设和地方主导的小三线建设、五小工业(小型钢铁业、小化学肥料工业、小水泥工业、小煤矿、小发电站)”(吴晓林[1998],第71页)。可以认为,根据此方法,1980年建立了前述周恩来报告中所称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历史决议注释本》,第11页)。

60年代中期,经历了大跃进的挫折和中苏对立后的毛泽东,大概以为,只有依靠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来统一中国人民的思想,推进三线建设,进行人民战争,才能对付由越南战争扩大而数年后引发的美苏侵略战争。这和1957年的乐观想法,即争取15年的和平、社会主义阵营在生产力方面要赶超资本主义阵营、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的想法大相径庭。

关于哲学思想,毛泽东在中苏论战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加深了 in 实践和矛盾的两方面的思索。在实践方面,对农村干部特别是对县、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四级干部,要求他们参加生产劳动,通过实践成为既懂政治(红)又懂业务(专)的干部,而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要成为“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

---

<sup>①</sup> 吴晓林[2002]对由三线建设和地方工业化所构成的后期毛泽东经济发展战略,有如下看法:(1)三线建设是出于为了应对“遭受美苏超级大国强加大规模战争的”危险,“同时考虑强化安全保障和均衡全国工业配置”(第173—174页),是对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跃进、调整的“否定的摸索”(第139页)。(2)后期毛泽东的经济发展战略模式,是1959年喷油的大庆油田。1960年3月导入了毛泽东指示的“两参(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一改(改革企业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中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毛稿》第9册,第89页),这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具体运用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的“典范”,全面地体现了“多、快、好、省”这一总路线的要求(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1964年12月21日、22日。《重要文献》第19册,第469—470页)。(3)大庆的“大会战”方式是“动员全国的人、物、财”的“有组织的群众运动”、“具备技术基础的群众生产运动”(第266页),这被应用于以四川攀枝花钢铁基地、成(都)昆(明)线等铁路为首的三线建设。通过三线建设,三线地区的工业力量提高,离全国工业力量的差距缩小了。(4)“1965—1978年中国工业生产的增长是依靠增加投入劳动力和资本,不是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第297页),“三线建设的投资效率决不是所期望的那样”(第303页)。不过“也不能否定毛泽东时代强制推进的工业化,为邓小平时代中国的经济作出贡献(第304页)。如“五七指示”所述,开发大庆油田的思想和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原型,文革中是不是也有向全国普及大庆方式的的一面吗?文革的“抓革命”,对中断两年后于1969年再度开始的三线建设和地方工业化的“促生产”,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期待这一问题今后能得到更加具体的解释说明。



的真正好干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实践论》讲的作为认识的基本来源的社会实践），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并告诫说，如果不这样做，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干部将被敌人腐蚀侵袭，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几年、十几年或几十年内，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1963年5月9日，《毛稿》第10册，第292—295页）。他力图将主张人民战争方法的《实践论》应用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恢复干部和群众的平等关系。毛泽东还将《实践论》应用于文化革命，指出“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脱离实际谈认识论没有用）。学哲学的同志（大学生、教授）应当下乡去”（《万岁》丁本，第548页）。还要求改造大学教育，在参加实践活动过程中培养哲学家，要使用劳动人民的语言来写简单易懂的哲学文章。再者，毛泽东还自负地说“从实践到感性，再从感性到理性的飞跃的道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讲清楚。列宁也没有讲清楚”（同上，第562页）。中国的老子、庄子、墨子、张横渠、李卓吾、王船山、谭嗣同（毛泽东继承的“气学”的系谱）也都没有讲清楚（只有自己讲清楚了）。

在矛盾方面，毛泽东主张“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对立面的统一”，“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里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同上，第546页、548页）。直到1964年8月，读了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日本物理学志》1961年4月号。俄语译本的中文译本）后，赞同“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电子是可分的”的学说，说“宇宙从大的方面来看，是无限的。宇宙从小的方面来看，也是无限的。……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万岁》丁本，第561—562页）。他认为在宇宙的无限发展中，所有的个别的特殊的东西都将经历发生、发展、灭亡，人类、地球、马克思主义都将灭亡，将由更高级的东西来取代。他以宇宙的无限发展的思想为基础，解释人类的无限发展，主张“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不断地发展的历史”，“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

造、有所前进。静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毛对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修改的部分。《重要文献》第19册,第477页)。

基于这种发展的哲学,毛泽东一方面在科学实验和生产斗争方面,主张中国要采用世界上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实现大跃进,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赶超发达国家。另一方面,对于阶级斗争,要依据矛盾统一的法则,讲“一分为二”,主张事物可无限分割、斗争。他将“综合”规定为“吃掉敌人(国民党军)……一部分放走,大部分补充我军”(《万岁》丁本,第627-628页)。他把主张“合二为一”、矛盾双方和平共处综合论的哲学家杨献珍的学说,批判为“修正主义”、“阶级调和论”。毛泽东与《矛盾论》中的矛盾的同—性互相依赖相比,更偏向斗争性;与矛盾的非对抗性(人民内部矛盾)相比,更偏重对抗性(敌我矛盾)。

关于思想改造,毛泽东在1959年11月的杭州临时会议上,分发了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前一年和当年的三篇演说,并提醒大家注意其“和平演变”(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和平转化)的企图(薄一波,第1141-1144页)。1964年6月16日的党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指出,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1959年1月杜勒斯的发言),苏联在第三代出现了赫鲁晓夫。他同时还要求依靠搞马列主义、为人民服务、团结大多数人、有民主作风、自我批评这五项条件(后来成为“九评”的结论)来防止修正主义,培养革命的接班人(《万岁》丁本,第501-504页)。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年轻优秀的干部被提拔为县、地区、省的干部,大学毕业生被派遣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毛泽东在1963年提出号召,“向雷锋(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榜样、因事故而殉职的解放军战士)同志学习”,指示“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1964年在全国的工业交通部门设立政治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他还力图依靠人的政治觉悟的提高来发展生产力,开展“工业学大庆”(依照总路线和毛泽东思想开发油田)和“农业学大寨”(以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在山区建设高产量农田)运动。

工人、农民、士兵的学哲学运动从1958年就已开始(杨春贵,第

91—99页)。在人民解放军中,1959年由林彪提倡,第二年便开始了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毛泽东的语录刊载于《解放军报》上,并于1964—1965年编纂成《毛主席语录》,印刷量超过10亿册,成为文化大革命宝典的《毛主席语录》(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在增加了林彪的1966年12月16日的“再版前言”后公开发行。林彪事件以后,各地进行回收、处理。唐亚明)强调“备战”和“反修防修”。在收录的427条语录中,革命时期的有306条,其意图可以想见,是为让建设主体(党、军队、人民)的每一个人,都继承在革命战争中形成的“宇宙矛盾——人的实践”的哲学、“为人民服务”的道德、“群众路线”及“实事求是”的能力,并将其灵活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不过,在中国革命的“三个法宝”中,则过于强调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对于统一战线几乎未做说明。

收录的建设时期的121条语录,对世界战争做了两种设想: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打了仗再建设。它与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与中国的矛盾(武装斗争)、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矛盾(统一战线)、王明路线与毛泽东路线的矛盾(党的建设)这三对矛盾相对应,把美帝国主义与中国以及亚、非、拉之间的矛盾(反帝)、苏联修正主义与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矛盾(反修)、中国内部的修正主义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矛盾(防修)这三对矛盾,视作1965年中国的课题来看待。在经济建设上,语录提出了“从落后的农业国向先进的工业国转变”的目标,但对于其实现的方法,仅仅提出了“勤俭建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口号,并刊登一些称赞人民建设热情的言语。从1959年到1962年的四年间实为一空白,它没有收录毛泽东在大跃进和调整中探索经济建设的方法而苦战的文章。它只强调革命战争和反修正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很薄弱。

关于文化革命,毛泽东在1963年9月指出: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同时,在文学、艺术、戏剧、电影等意识形态方面必须进行反修正主义的斗争。同年12月严厉地批评文艺界“热心提倡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使文艺战线开始整风。1964年6月他又批评说:“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

的建设与革命”，“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并组成了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学术界亦如此，1964年7月，毛泽东的上述批评扩大到了对哲学界杨献珍的批判。甚至连经济学、历史学等领域也推行了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此外，毛泽东还批评学校教育游离于阶级斗争之外，并提出了改革的要求。

我认为，在党内矛盾方面，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与刘少奇产生了分歧，其结果是力图打破刘少奇的调和论和官僚主义，恢复自己的“宇宙矛盾——人的实践”的哲学。毛想要以我为中心，重建人民的群众运动与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毛—党—人民”的循环结构。

据说邓小平在1959年底察觉到了大跃进的灾害，尊重毛泽东的权威，“但不再把他当做毫无缺点的决策者来尊重了”（杨炳章，170页）。毛泽东认为，由于自己把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分为一线和二线，自己退居到了二线，因此“自己的大权落入了他人之手”，出现了“独立王国”，刘少奇、邓小平也不来找自己商量问题了。他愤怒道：“不要如丧考妣”（1966年10月24日，《万岁》丁本，第655页）。依他看，1962年以后，党中央的实权转到了刘少奇、邓小平之手，逐渐确立了他们之下的政党官僚体制，也就是推进了“政教分离”，毛与刘、邓产生了相当大的分歧。为此，毛意欲提高思想导师（教）的权威，夺回政治领袖（政）的权力，让林彪取代刘少奇做继承人，恢复“政教合一”。

如上所述，可见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包含着相互关联的三层斗争：（一）在思想和文化方面，由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而引发的反修正主义斗争；（二）在哲学、政治方面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党内斗争；（三）在哲学、政治方面，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中苏论战，和在军事、外交方面，对越南的抗美援朝战争的支援和为应付美苏的侵略战争而在本国进行的人民战争的准备。

关于文化大革命应该解决的问题，1966年6月28日，北京语言学院的七名团员学生向毛泽东递送了一封信，指出：我们的父母以前都是英勇斗争的革命干部、共产党员。现在他们当了“官”、成了“老

爷”，取得了政治上的地位和生活中的特殊待遇，革命性降低，正在变为“特殊阶层、修正主义者”，并提出了如下的改革方案：

降薪，取消各种特殊待遇；革命干部经常地参加劳动；凡是违反党纪、国法，做出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事，应一律予以制裁；尽快在全国普及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教育制度；在假期，青年学生经常组织起来，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或者到军队去当兵。

毛泽东在7月12日写了批语，“他们所谈问题，确是重要，应在运动中解决”，并发出通知“信已收到，看到，并注意了”（《毛稿》第12册，第77页），并吩咐把信和自己的批语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分发。毛泽东想通过文化大革命解决的问题，与这封信的提案有很多共同之处。

对通过文化大革命所应实现的新世界的轮廓，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五七指示”（1966年5月7日，《毛稿》第12册，第53—54页）中做了如下描述：

“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这样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跟各个抗日根据地一样。“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又能从事群众工作”（社教四清运动），“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人民公社的工业化），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这个指示，把毛泽东思想浓缩为建设万人兼学兼业兼进行文化革命的新世界，即是抗日根据地以及“工农商学兵”为一体的农村人民公社的实践，与基于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缩小三大差别的理论相结合，让人们去实践，以图再建、强化根据地式的公社（长期目标），由此准备应付第三次世界大战（短期目标）。其基本设想就是：以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为建设和战争的主力，让工业、城市、脑力劳动（特别是学生和党政干部）义务为农业、农村、体力劳动服务，借以缩小不平等。这是军事共产主义与“农业乌托邦”的结合。与1958年的人民公社的构想相比，全民皆兵的色彩更加浓厚，也不具体提“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经济增长，更加强调人民的思想改造（另一方面，也着眼于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大跃进）。

以“兵”为先导，“工”、“农”为主力，把“学”区分与“工”、“农”并列作为革命主体的部分，和作为革命对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部分，要求党政干部与“商”参加文化革命和体力劳动，这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构想。“五七指示”可以理解为，下令把农村人民公社扩大到全社会，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原为“中华人民公社”。<sup>①</sup>与试图把人民公社、“农业基础”与国家、“工业主导”相结合的以往的建设构想相比，没有详细说明国家与人民公社的关系，作为运动理论或制度理论，是不完整的。

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方法，毛泽东在“给江青（毛的夫人）的

---

<sup>①</sup> 最好把上海的“临时权力机构”还叫上海“革命委员会”，如果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的话，国号不改为“中华人民公社”就不妥了——毛泽东实际是在这种否定意义上采用了“中华人民公社”的概念。若改国号，国家主席改为主任还是社长呢？外国承认吗？如全部改为公社，党放在哪里？等等，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说：“我们是否还是稳当一点好，不要都改名字了”（1967年2月12日，《万岁》丁本，第670—671页）。然而，“五七指示”描绘的新世界，似乎是“中华人民公社”的名称最合适。后述的“省无联”的宣言认为，“毛主席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实际上已经把这种新的政治结构——‘中华人民公社’的内容勾画出来了”（《资料汇编》第6卷，第409页），主张立即实现它。

信”<sup>①</sup>(1966年7月8日。林彪事件以后1972年9月,作为党中央文件的附件在党内分发,同上,第71—75页)中有具体阐述:

### (一)形势与任务

反党分子=(党内)右派想打倒我们党和我本人,“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

### (二)方法

对于林彪在5月18日强调防止反革命政变和拥护最高领袖毛泽东的讲话,我“深感不安”,但还是准备同意把此讲话作为党中央文件来发下去。(党内)左派为打倒“鬼”(右派),欲借钟馗(毛)之力,高捧我,宣传《毛主席语录》,我不得不表示同意。“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中还是第一次”,捧得过高了,自己反而可能会跌得粉碎。在马克思、列宁也被世界上大多数共产党打得粉碎的今天,我粉身碎骨也没什么要紧。

### (三)展望

文化大革命是全国性大演习,就是以自己死后右派掌权的时候,左派(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的利益)打倒右派为目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这是记载隐藏在毛泽东心中的文化大革命构想的惟一文献。

对中国共产党内的严重意见对立,毛泽东没有依照列宁的“讨论自由、行动统一”(《全集》第10卷,第369页)的原则,即禁止派别活动,通过党内批评和意见斗争,实现意见和行动的统统一这一“铁的纪律”(斯大林《关于列宁主义的基础》)来解决。而是他超越禁止派别活动的界限,公开宣称“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毛稿》第12册,第101页),承认左派与右派存在。如果立足于把党内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的矛盾来解决,允许在此范围内的不同派别的政策论争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实现具有不同政策纲领的派别,按规则实行政策论争而决定党的意

---

<sup>①</sup> 毛泽东《给江青的信》在武汉给周恩来、王任重(湖北省第一书记)看过,没有给中央第一线的其他同志看过。周恩来经毛泽东同意,转告林彪,林彪深感不安而又有悔改的表示,毛泽东将原件销毁(王年一,第7页)。

志的“民主社会主义”(克拉希维里,第247-248页),然而他并没有这样做。结果根据1958年在汉口会议上谈到的,代表人民利益的左派,要团结中间派,孤立和打倒压制人民利益的右派的斗争方针,将林彪看做左派,周恩来看做中间派,刘少奇看做右派,欲把党内矛盾作为阶级矛盾来解决。为此,他向人民群众呼吁“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1966年8月10日,中共中央的群众接待站),不把左派对右派的派别斗争局限于党内,而是一举扩大到全国人民的规模,让党、政府、军队以及学生、工人、一部分农民之间进行“文斗”(思想斗争、示威运动)。人民大众被鼓动参加派别斗争中,产生了独立思考,但是突破了“用文斗不用武斗(暴力斗争)”的指示,文斗转变为武斗,天下大乱,也未能简单地达到天下大治。

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路线和缩小三大差别的问题,毛泽东在7月21日做了如下讲话:

“我们相信群众,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当群众的先生。现在这个文化大革命是个惊天动地的事情。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一关是最后消灭阶级,缩短三大差别”。(《对中央首长的讲话》,《万岁》丁本,第649页)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课题、主体和对象、目的,由毛泽东主持制定,在8月8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的“十六条”,明确了以下要旨:

#### 课题

已经被推翻的资产阶级“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迎头痛击这个挑战,“无产阶级用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 主体和对象

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即工农兵、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和其闯将即革命青少年。“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



## 目的

我们“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毛泽东、中共中央呼吁共产党员，要总动员“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人民大众，奋起向资产阶级发起总攻击，赢得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关于领导群众运动的方法，党指示各级党委要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采用“大辩论、大字报”（墙报）的形式，进行“大鸣、大放”（充分发表意见），“鼓励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时鼓励群众批评自己（党）在活动中的缺点、错误”，党要进行自我批评，也要接受群众的批评。对那些惧怕、压制群众运动、偏离正确方向的走资派，要撤换他们，“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在革命中要群众注意“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党不能代替群众包办革命。

这项方针是干部、知识分子通过生产劳动、阶级斗争的实践与人民群众融为一体，向群众学习再指导群众的毛泽东群众路线指示的再延续。将暴风骤雨般的人民群众运动置于首位，向革命的政党要求进行自我改造；要站在群众运动的前头领导群众。不要在后头批评他们，不要在对面对他们——这个《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来毛泽东的一贯的根本态度在此体现。

关于国际形势，8月12日通过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指出，“热烈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正义斗争”，“最强烈地谴责美帝国主义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罪行”，“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打到底，直到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最后胜利”，并宣誓以行动去进行支援。报告指责苏联在“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大国主义的政策下，对越南抗美战争采取了“假支持，真出卖”的两面政策，明确表示苏联已不包括在反美国国际统一战线之中，“要反对帝国主义，就必须反对现代修正主义”。

至此，上述三层斗争的相互关系已相当明确。看来似乎是，毛泽东以他自己青年时期参加过的、反封建主义文化革命（启蒙）和反帝

国主义民族革命(救亡)相结合的五四运动为蓝本构思出了文化大革命。我认为,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动机包含以下三层内容:

(一)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通过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进行思想改造(“思想革命化”,“世界观的改造”),提倡“大公无私”(为广大人民服务的、打破追求个人、小集团私利的集体主义)的道德,提高认识矛盾和在实践中解决矛盾的能力(主观能动性),人民发动群众运动,党恢复群众路线。党和人民“斗私批修”与自己的私欲作斗争,批判党中央出现的背离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否定大跃进,对苏妥协和官僚主义、资本主义),打破党员干部的特权阶层化,缩小三大差别,消除不平等、接近平等,向着“大同=共产主义”永远前进。

(二)以党、人民的“斗私、批修”为动力,克服由于大跃进失败而引起的毛自身威信的下落以及党内、人民内部的分化,提高导师的权威,恢复领袖的权力,打倒刘少奇修正主义的司令部,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重新改造中国共产党。

(三)对于苏共领导集团的党政官僚特权阶层的“私”,以及苏联国家的“私”为基础的修正主义、大国主义、苏美合作,继续加强批判,同时继续支持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促进本国的三线建设,将中国变为延安型的根据地,准备以人民战争来抗击美、苏的侵略战争。

我认为,毛泽东有抵御外来侵略,打破内部束缚、发挥人民的力量(“冲决网罗”),将国家独立和人民革命相结合的根本思想。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大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延续,其中对帝国主义的从外部的绝对批判,即“人民、矛盾、大同”的思想贯穿如一。

然而,推动文化大革命的方法却有自我破坏、自我毁灭的倾向。

第一,思想内容上,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对立规定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是极端的单纯化。实际上,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内部,或者说在毛泽东思想的内部,原来有坚持“人民、矛盾、大同(共产主义)”的绝对批判,并呈现猛进的毛的激进主义,同倾向于“党和国家、缓和矛盾、新民主主义”路线,并补充毛泽东思想的刘少奇的渐进主义之间的差异。这个差异转化成了对立(后述)。

第二，在处理对立的程序上，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没有将这种理论上、实践上都高度复杂的问题，提交给应有责任和有能力来很好解决的政治局常委会，进行彻底的讨论，而是简单地将其归结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的图式，直接将其诉诸于“上帝”=有最后决定权的人民群众，争取人民的支持来决定胜负，结果让人民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在党内、党与红卫兵及人民之间、红卫兵内部、人民内部进行了“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造成了许多人死亡，大量的人受到了迫害。知识分子坚信崇高的理想，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激烈地相互否定和自我否定，人性及人际关系被破坏，思想上留下了深重的伤痕。

第三，在处理刘少奇的问题上，毛泽东原来有在党接受人民的批评、进行自我批评，并整顿思想、作风、组织的开门整党中，将毛、刘的对立作为人民内部的矛盾来解决的初衷。然而毛没有坚持他的初衷，对刘进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尤其是将刘划入了敌我矛盾的范围，以“叛徒”之名开除其党籍，这同“简明党史教程”中斯大林的党内斗争逻辑极其相似。

警惕美苏夹击，打倒可能向苏联妥协、勾结的党内修正主义的文化大革命，与抗击日本侵略谋求民族团结，国共两党由敌对走向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逻辑不同，而是与惟恐德、日夹击而打算清除国内第五纵队的斯大林的大肃清逻辑很接近。

## 第二节 开门整党与红卫兵运动

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也认为它是开门整党运动，这意味着党要接受人民的批评，还要开展自我批评，整顿思想、作风和组织。他从上面支持教职员工和学生对学校党委和刘少奇、邓小平派遣的工作组进行造反，使红卫兵自下而上掀起了号称“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运动，并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下简称“走资派”）”，夺走资派的权。这两项运动是在毛泽东个人的绝对威信以及林彪指挥下的人

民解放军的强大支持下推进的。从1965年11月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到1968年12月红卫兵运动结束的这段时期,毛泽东思想的开展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关系,可以分以下三个阶段进行考察。

1. 从批判《海瑞罢官》到党中央工作会议前后(1965年11月—1966年12月)

在上年10月到本年1月,毛泽东对中国可能出现修正主义表露忧虑,在1965年10月10日他同大区第一书记的谈话中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你们就造反”,“要备战”(《编年史》,第246—247)。看来他认为可能发生武装斗争,试图尽可能通过“文斗”来打倒修正主义。

毛泽东率领陈伯达等左派理论家和林彪指挥下的人民解放军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首先在文化领域开火。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对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0年底完成,翌年上演)<sup>①</sup>进行了批判,认为它反映了大跃进以后出现的“单干风”和“翻案风”,并称之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株毒草”。12月毛泽东本人将“海瑞罢官”和“罢免彭德怀”联系起来,认为这是对大跃进和毛泽东本人的批判,并对此进行了反击,以此为突破口,把这场批判扩大到了政治领域。以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试图将这个问题控制在学术讨论的框架之内,拟订了《二月提纲》。3月末毛泽东批判彭真等为“包庇坏人(批判毛泽东的知识分子)”,并且对那些隐约含有批判毛本人的内容的吴晗、邓拓、廖沫沙合著的《三家村札记》(三人均为以彭真为第一书记的北京市委干部),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进行攻击,说它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5月16日,在刘少奇的主持下,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在毛泽东直接指导下完成的、以“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为主要内容的《五一六通知》。《通知》宣布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

<sup>①</sup> 赞扬明朝刚正不阿的地方官海瑞的戏剧。海瑞因处死强占民田、强抢民女的官僚地主的第三个儿子,命令缙绅退还民田而被罢官。

组，重新设立直属于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以下简称“中央文革”），呼吁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警告“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有人认为当时不是指刘少奇，而是指彭真。黄峥，第7页），他们现正睡在我们身旁”。24日，会议决定停止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候补书记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的职务，并对他们进行“专案（特别重大事件）审查”。另外，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的《纪要》，全面否定了建国以来对文艺界的党的领导，提出它是“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政，4月转发全党。

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7人张贴大字报，批判党委书记、校长陆平和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宋硕和彭佩云，攻击他们实行的是压制文化革命、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这张大字报通篇没有出现“公社”字眼，但毛泽东赞扬它是“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巴黎公社的宣言书”（《万岁》丁本，第648页），“北京人民公社宣言”（《编年史》，第270页）要求6月1日向全国播放。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全文，使全国学生对所属单位党委造反成为可能。在反对共产党修正主义路线的指导，并学习实践毛泽东思想的个人自主结合的意义，他使用了“公社”这个概念，试图把它作为新世界社会组织的萌芽。我认为，他将每个人背叛纵的秩序、获取自由、进行横向联合的、这种自己青年时期所体验到的“个性自由、共性互助”，“小组织、大联合”的五四新思想，和“五七指示”的根据地式公社结合起来，并和列宁的公社思想结合起来。列宁提倡过：把“压迫者的民主”，即“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的国家”，迅速地转化为“被压迫阶级的民主”，即“人民的大多数即工人、农民、用‘共同的力量’来镇压压迫者”的公社（《国家与革命》第三章 二，1918年。《列宁全集》，第25卷）。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是正确的，只是由于人们运用制度的方法（作风）产生错误，所以党应接受人民群众的批评，从而改正错误，使制度正确地起作用。在这种独自的运动论范围内，他说“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全部写入了宪法”（《万岁》丁本，第651页），

承认了学生信奉毛泽东思想并冲击学校党委和工作组的自由,让学生发挥潜力,使政治流动化。但是毛泽东所依据的《国家和革命》,主张粉碎资产阶级支配的官僚=军事国家机器、取消常备军和官吏制度,代之以人民武装、公务员选举制、解聘制和不超过工人工资的薪金、监督和管理的机能由全体人民顺序实行为内容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公社。而毛泽东根本无意要打碎现存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特别是其军队,而仅仅是整顿共产党,意图将被走资派夺取的部分领导权夺回到革命派手中而已。他没有从制度上对国家和公社的关系加以严密的思考。后来红卫兵与军队、政府发生冲突的原因之一也在于此。

6月初,刘少奇、邓小平向北京市的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将文化大革命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控制了造反学生。但是,根据回到北京的毛泽东的指示,7月下旬又撤销了工作组,学生脱离了共产党的管理,取得了自由,破坏了学校党支部保存的档案(进行人事管理的个人记录)。

5月29日,清华大学附中的中学生秘密组织了“红卫兵”组织,并在6月底7月初书写了以过去的毛泽东的讲话为自己信条的两份大字报,送给了毛泽东。这个讲话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岁生日大会上的讲话,1939年12月21日。《毛集》第7卷,第142页)。毛泽东于8月1日回信说:“对反动派(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及其走狗)造反有理”,<sup>①</sup>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期待着他们成为革命的接班人,并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毛稿》第12册,第87—88页)。

8月1日到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4日,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对刘少奇等派遣工作组的五十天提出严厉指责。他说,共产党和清朝、北洋军阀、国民党一样镇压了学生运动。毛泽东

---

<sup>①</sup> 讲话继续说,马克思主义把“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这几千年来的理论翻过来,并图继承古代以来反抗地主压迫、剥削的农民暴动的思想。

批判刘少奇“专政”，刘少奇则以“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进行反驳。毛泽东说“那为何害怕群众？”刘少奇说“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吗？无非是下台”。毛泽东说“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刘少奇说“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毛泽东曾说过的不害怕‘撤职、开除党籍、老婆离婚、坐牢、杀头’五条）”。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态度恶劣，顽固不化，这次会议不解决问题的话，就很危险。于是第二天就决心将刘少奇从接班人中驱除。（黄峥，第22—27页）毛泽东在5日写下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7日印发十一中全会，8月17日印发县、团党委）中，批评刘少奇等党中央领导班子派遣工作组，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并由此联想到过去刘少奇1962年的右倾（在七千人大会的发言中，过于强调“三面红旗”带来的困难，认为前途黯淡之类的话，以及他没有反驳“包产到户”的事）和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并对此进行了批判。他把批判大跃进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压制群众运动作为攻击的目标。8月通过的“十六条”（前述）在要求集中打击当权派，强调进行斗争的同时，也要求通过运动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95%以上的群众，要求“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它强调打倒少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与此同时，强调要“给出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力图通过人民的思想革命换来发展生产力。可以认为，这是把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理论从属于，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要不断地变革生产关系，变革上层建筑，发展生产力这种“人民内部矛盾论”。

关于公社，“十六条”说：学校和单位中“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是“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群众可以批评，改选和撤换那些组织的成员、代表”。

12日，中央全会选出了新的领导班子，林彪上升为第二位，成为事实上惟一的副主席，而刘少奇则降到了第八位。

毛泽东提倡公社和“造反有理”，指明了运动方向。从8月到11

月,他先后八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共计 1100 万红卫兵,并掀起了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联高潮。从 6 月初开始,北京市中学的一些自发组织起来的老红卫兵,对学校党委和工作组进行了造反,但是,大学里由党委组织的老红卫兵,却帮助工作组镇压造反学生。

他们由出身于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革命烈士),特别是党的高干子弟组成,以自己的血统为荣耀(血统论),<sup>①</sup>以黑五类为革命对象,对出身于黑五类的学生、教师或校长进行迫害。他们以破坏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破四旧)为名,殴打他人,破坏文物,闯入住宅,查抄别人财物,实行“红色恐怖”。10 月以后,党中央批判刘少奇、邓小平派遣工作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支持学生的造反。于是一些老红卫兵成为保护他们高干父母的保守派红卫兵。<sup>②</sup> 大学里的保守派红卫兵在 10 月末大部分已经消

---

① 也称“出身血统论”,即父母是革命的“红五类”,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女儿享受特别待遇,父母是“黑五类”的女儿则受歧视的思想、习惯和制度。1966 年 7 月 29 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的学生在校园里张贴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对联。北京的主要大学也张贴了这一对联,对联的内容在学生们中间引起争论。8 月 2 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召集了赞成派和反对派的代表,说这副对联并不全面,并提出了修正案,将对联改成“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严家其,第 106—107 页)。在全国红卫兵运动中,保守派坚持血统论,造反派反对血统论。10 月 16 日陈伯达为批判刘少奇、邓小平,说航空学院的对联是“反动的血统论”并加以批判,打击了保守派,助长了造反派的气焰。北京青年遇罗克(1942—1970 年)中学时成绩优秀,由于父母均为右派分子而遭批判,因为这个“出身”问题,他没能进入大学深造,而是一边当学徒工一边坚持自学。1966 年,他写了《出身论》(7 月初稿,9 月定稿,11 月修改。遇罗克,第 3—23 页)一文,对血统论进行了批判,认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老子的成份是儿子的出身”,与这个“出身”相比,重在本人的“表现”;唯出身论即血统论发展下去的话,就会形成新的“特权阶层”、“受歧视的阶层”,那将和印度的种姓制度无异;出身不好的青年也可以通过“主观能动性”和“思想改造”,成为革命的接班人。1967 年 1 月,《公安六条》禁止“黑五类”混入大串联和革命群众组织中,和《出身论》的主张相对立,4 月戚本禹认定《出身论》是“反动文章”,遇罗克于 1968 年 1 月被公安部逮捕,1970 年 3 月,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枪决。1979 年 11 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定遇罗克是冤假错案,为他平反昭雪。对于这个问题,加美光行有详细的研究([2001],第 47—168 页)。

② 根据徐友渔的研究,在全国 29 个一级行政区(省、直辖市、自治区)中,保守派红卫兵一直持续地存在于红卫兵运动的全过程,并占优势的“保守派——造反派”的斗争占据主导地位的区域只有内蒙古、江西、广东、广西、西藏和新疆等 6 个行政区。除江西外,其他 5 个行政区全部处于边防前沿、边境,其中,除广东以外的 4 个行政区均为民族自治区,因此,党中央为防御外敌、警惕民族矛盾,比起路线斗争来更重视稳定,所以并不能过于对当地的驻军施加压力,也不能压制那里的保守派。保守派得到驻军顽强支持得以存续。另外,在广东,虽然军区压制造反派,但因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是林彪的嫡系,所以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没有向黄施加压力(第 97—100 页,第 103—106 页,第 108—109 页)。



失。在中学，他们与造反派红卫兵进行斗争，12月成立“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对抗中央文革，并于第二年1月宣布“忠于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为此公安部认定他们是“反动组织”并逮捕了其成员。但由于毛泽东的命令而被释放。2月，保守派红卫兵支持军队对造反派的“二月镇反”（镇压反革命）而重新活跃起来。但是4月，由于毛泽东、中央文革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而以失败告终，至此以后，他们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失去了势力（徐友渔，第68—73页）。

在中央文革的鼓动下，1966年8月10日，大学和中学里结成的红卫兵造反派，出身于“中等阶级”者居多，他们攻击刘少奇、邓小平等党的高级干部和保守派红卫兵。

红卫兵造反的原因在于，文革以前党和国家灌输意识形态、文革中毛泽东的策略手段、社会矛盾（因家庭出身不同造成的、升学等前途机会的不平等，红五类与非红五类、黑五类的矛盾）与政治矛盾（政治运动造成的，干部和群众的矛盾）的爆发。另外，在经济、身份上，产业工人和临时工、合同工之间的矛盾，城市居民、“上山下乡”（城市的中学生毕业后到山区或农村去，从事农业、牧业活动）知识青年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在中国社会长期存在（同上，第16—21页）。刘少奇、当权派和保守派红卫兵，努力维持上层政治权力和下层社会阶层结构的现状，而毛泽东为了打破“大权旁落”的现状，发动了文革，不仅进行上层的权力斗争，还暗示要变革下层的社会阶层结构，获得了对现状不满的群众的支持（同上，第121页），比起刘少奇来，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存在的基本矛盾，对于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更敏感，有更深刻更清醒的认识”（同上，第161页）。可以认为，红卫兵本身就存在着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进行造反的动机。

10月，党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毛泽东的绝对威信和红卫兵运动的热潮，压倒了党的领导班，刘少奇、邓小平被迫作了自我批评。

陈伯达以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为基础，批判刘少奇、邓小平派出五十天工作组，是“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与毛泽东的“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

己”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违背。

刘少奇完全接受了“炮打司令部”的批判，承认6月1日以后的五十天里，派遣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并且对和他有联系的历史上的错误，作了自我检讨：①1946年2月，强调“和平民主的新阶段”；②同年初东北解放战争的指导方针的错误；③1947年夏土地改革中的“左”倾；④1949年春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右倾；⑤1951年7月批评山西省委的将互助组升格为合作社的提案；⑥1955年解散了农业合作社；⑦1962年的右倾；⑧1964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的原因，他认为没有采取群众路线、把群众运动的缺点误认为是反党、反无产阶级专政的逆流，没有改变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毛泽东思想学习不够（《文件汇编》，第381—386页）。

这里，关于派遣工作组，他首先优先考虑集中方面，承认了偏离了作为绝对理论的毛泽东思想，特别是群众路线，并发誓要重新回到这个路线上来，保持党的团结。他没有要求民主方面，即没有主张自己收拾大跃进失败的残局、并进行成功调整的政治指导的正确性，没有要求党中央在相对的政策层面上，彻底地进行讨论，以达到更高层次认识，制定新的理论、路线、政策。

毛泽东在刘少奇的自我检讨初稿中，写下了“基本上写得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的评语，予以承认（《毛稿》第12册，第134页）。然而，根据黄峥的观点，刘少奇对加给自己的批判采取了如下两种态度。

（一）对工作中“错误”的指责是违心接受的。直到1966年末，他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希望做一个犯了路线错误又能够改正过来的榜样），使自己转变到同毛泽东一致的立场上来。

（二）1967年4月以后，对自己政治历史和政治生命的诬陷，他竭尽全力据理驳斥（第100—103页）。

邓小平对五十天派遣工作组的错误，及作为其实质的群众路线、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错误，和思想的根源、作风的根源进行了自我检讨，但是对以前的自己的历史问题，则什么也没有说（《文件汇编》，393—397页）。毛泽东在邓小平的原稿上写下了“可以照此去

讲……，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的批示(上级对下级的指示)，予以承认(王年一，第107—108页)。

毛泽东在10月24日的讲话中说：“把(批判)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万岁》丁本，第654页)。在25日的讲话中又说：“我也有(将中央分为一线二线的)责任”(《毛稿》第12册，第143页)。“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同上，第148页)。他对中央和省级党的干部说：“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同上，147页)，并且说再有10个月就结束文化大革命。党要接受人民群众的批评，并进行自我批评，整顿思想、作风和组织，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把党内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恢复团结——毛泽东的这种开门整党的理论似乎顺利实行。我以为，这个时期是宣布胜利，平息事态，将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加以解决，是使人民的群众运动和党的群众路线结合的绝好机会。看来这是“毛—党—人民”循环结构力量的极限。

可是毛泽东具有与上述态度相矛盾的另一面，他在彻底变革现状愿望的驱使下，支持红卫兵攻击广大干部(王年一，第115页)。会后，刘邓的自我检讨没有附上毛泽东给予承认的批语，便印发到县、团级党委，“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会议精神扩大开来。人民群众为拥护毛泽东(绝对领袖)和毛泽东思想(绝对理论)，可以并且应该对违反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所属单位党委(绝对组织)和工作组造反——这种想法得到了公认。从12月开始，造反派红卫兵在游行中，喊出了“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并张贴大字报，召开批判大会。

在这期间，周恩来赞成文化大革命的“反修防修”的出发点，希望群众运动能够消除官僚主义等党和国家的黑暗面。他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力图将革命限定在思想文化领域，防止工业和农业的混乱，阻止国民经济的崩溃。他对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以前没有，并保留意见。他极力劝说红卫兵，说领导干部的路线错误不是反革命，要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周传·后》，陈扬勇)。

2. 从上海“一月风暴”到武汉事件、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事件（1967年1月—8月）。

1967年1月，在上海由中央文革成员张春桥支持的工人造反派“工总司”（领导人是王洪文），通过武斗打倒了由中共上海市委支持的工人保守派“赤卫队”，与学生红卫兵一起夺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权（“夺权”、“一月风暴”）。1月8日，毛泽东称赞说：“这是一个阶级（无产阶级）推翻了一个阶级（资产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万岁》丁本，第662页），让把造反派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向全国广播。这是由于毛泽东对学生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表示失望，而把希望寄托在工人的造反上造成的。这成为了扩及全国的“全面夺权”的号召。《红旗》第3期（2月3日出版）的社论，把夺权斗争的经验概括为五点，即夺权、大联合、重视革命干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2月5日，经毛泽东批准，“上海人民公社”（上海市临时政府机构。张春桥为主任，姚文元、王洪文等为副主任）成立。但是，在2月召开的政治局碰头会上，以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四元帅为首的老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做法向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了抗议（“二月逆流”），16日叶剑英反对不经政治局讨论、决定就改名政权组织的做法。为此，毛泽东便在24日将其改称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壬午一，第182页）。在此前后，各省都发生了对党委员会、人民委员会（政府）的夺权行动，成立了由革命干部、军队和革命群众代表组成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为了保障人民的“大民主”和维持秩序，必须对敌加强专政——在这一指导思想下，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了《公安六条》，宣布把攻击、污蔑毛泽东、林彪作为现行反革命行为惩办，严禁武斗，不允许“黑五类”混入大交流和群众组织。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又公布了“三支两军”（人民解放军支援左派、农业、工业，实行军事管制、军事训练）的决定。

毛泽东本不想打倒刘少奇，而是想像党的七大对王明的处置一样，在党的九大上把他选入中央委员，但导致毛泽东放弃初衷而决心打倒刘的原因之一，据说是为了克服“全面夺权”造成的困难，大概也是为了挫败支持刘的各省党委会吧。还有一个原因，据说是毛泽东相信了由北京红卫兵调查团在湖南等地收集的证明刘少奇过去被捕、叛变的材料，那“若干材料是毛泽东以前所不知晓的”（王年一，第222—223页）。部分政治局常委在毛泽东出席的情况下决定，把刘少奇的材料由“王光美专案小组”调查研究。在那之前的3月16日，党中央公布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自首、叛变的材料》，<sup>①</sup>全国掀起了“揪叛徒”的风潮，刘少奇派的多数党的干部被排除出政权。

3月末，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在《红旗》第五期上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不点名地批判刘少奇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它攻击党中央宣传部干部和其背后的最大当权派（刘少奇），背离毛泽东对卖国主义的批判，硬说电影《清宫秘史》（1948年）为爱国主义而不加批判——该影片是污蔑义和团革命群众运动、美化戊戌变法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宣传“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的。它并把这种对立定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斗争，把刘少奇定罪为紧紧抱住资产阶级世界观不放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对其活动经历提出了八大疑问。在刘少奇自我检讨中提到的五点的基础上，附加了在抗日战争前“自首变节”事件中的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宣传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为了反对毛泽东思想宣传资产阶级世界观1962年刊行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三点，以此把刘少奇当做“叛徒”来加以批判。

但是，在3月28日给毛的信中刘少奇说，没有说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影片（《刘谱》下卷，第654页）。

5月初，经常委会扩大会议讨论、认可和毛泽东的同意，由《红旗》、

---

<sup>①</sup> 薄一波等在“白区”（国民党或军阀统治的地区）工作的党干部，1936年4月经党的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决定和中央总书记张闻天的批准，在报纸上发表了《反共启事》，被国民政府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参加抗日运动的事件。

《人民日报》编辑部联合执笔所写的社论《〈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红旗》第六期),批评1962年8月修订的《修养》“于无产阶级专政一语不谈”(引用《“左派”幼稚病》的两处,删除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完全不讲毛泽东思想”，并攻击刘少奇像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布哈林以及赫鲁晓夫一样，企图复辟资本主义。

在毛泽东亲自修改的部分中，他批判《修养》作者刘少奇的共产主义观说：那是一种“共产主义社会里，一切都是美好的，一点黑暗都没有，一点矛盾也没有，一切都好了，没有对立物了”，质、量也永远没有变化、发展的形而上学的共产主义观。而且他说：这与“任何事物、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是由对立斗争，由矛盾而推动发展”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毛稿》第12册，第323—324页）是对立的。

在思想领域，《修养》采取的是先从理想出发，然后回到现实的理论结构。即：（一）共产党员要确立实现人类历史上最完善、最美好、最先进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世界观，并以此为基础修养自己的思想意识；（二）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须同强大的敌人即一切剥削者、压迫者进行长期的、艰苦的、曲折的阶级斗争。这同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是有明显的差异。毛泽东的哲学是从“宇宙矛盾——人的实践”出发来阐释人的不断进步的。他不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固定不变的，也不承认能达到没有矛盾的终极理想国，而认为最终是人类、地球与太阳的消失。这样，毛把这一理想国思想与思考方法的不同，以前看成互为补充的个性差异，在这儿看成了正统与异端的对立。

在经历方面，刘少奇在革命中，<sup>①</sup>以自己的苏联、城市、工人运动

---

<sup>①</sup> 刘少奇1899年出生在与毛泽东的故乡湖南省湘潭县接壤的宁乡县，在长沙学习并活动，其出发点处在毛的至近距离。刘有毛欠缺的经验，即留学苏联（1921—1922年在莫斯科进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当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国民革命时期领导大城市（广州、上海、武汉等）的工人运动及苏维埃革命时期领导“白区”地下工作等；而且和毛一样，领导武装斗争（瑞金苏维埃，长征，华北、华中的抗日根据地）、思想斗争（延安整风运动）以及土地改革。《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把刘少奇作为在苏维埃革命时期反对三次“左”倾路线，正确执行了进攻、防御的策略指导的模范，使“红区”（根据地）的毛泽东与“白区”的刘少奇并列；对于刘输送城市的力量使乡村的武装斗争力量发展，评价其为为了“以乡村工作为主，城市工作为辅”（《毛选》第3卷，第975页）的革命运动方针的形成做出了贡献。在党的七大会议上，刘少奇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的提议，得到了承认。

的经验,和接近于苏联马克思主义正统的思想,补充了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战略。建国以后,毛泽东力图开辟一条道路:在农民武装斗争根据地的基础上创立人民公社,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来建设社会主义,进行原始积累来实现工业化,向共产主义不断前进。对此,刘少奇原来的构想是:在和城市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先使新民主主义经济得到发展以实现工业化,使中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然后才向社会主义过渡。然而,毛重视人民、农村、阶级斗争,坚持以“战争——革命”为主轴奋勇前进。重视党、城市、生产力,以“和平——改良”为支柱的刘,则是想办法尽量适合毛的步调,支持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跃进。在党中央从大跃进转入调整时,刘一方面在七千人大会上批评大跃进,取代作自我批评退居二线的毛而成为一线负责人,且指导调整取得了成功。另一方面,他又想以支持和指导毛所提倡的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理论,及中苏论战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实践活动,来缓和不断激化的党内矛盾、党的干部与人民群众的矛盾、党与知识分子的矛盾、中苏矛盾等诸矛盾。他并努力想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或毛泽东思想中,用自己的渐进主义来弥补毛的急进主义,以制止冒进,避免悲惨局面的出现,但终于招致毛的激烈批判。可以认为,坚持“人民、矛盾、大同(共产主义)”绝对批判的毛,和倾向于“党、国家、缓和矛盾、新民主主义”的刘之间的差异,终于化为对立。

我认为,毛泽东应该站在以前合作关系的基础上,与刘少奇及七位政治局常委之间分析、讨论发生对立的客观原因(大跃进、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苏对立等)和主观原因(资本主义观等),认识对方的见解的现实根据,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使对立达到更加高度的统一。但事情并非如此。而且,毛泽东一旦承认刘少奇的对自己政策的自我检讨,但是,改变了态度,把毛、刘的对立当成无产阶级世界观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阶级斗争,甚至把它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划入敌我矛盾的范畴,并把刘定罪为“叛徒”。其结果使自己的思考余地和政策选择余地变得非常狭小,突出了武装斗争和根据地——人民公社,打击了统一战线、党的建设和国家,缩小了在党内

和人民内部的支持基础,使其只能用一个引擎孤独地硬性行事。

与毛、刘同为湖南省出身的老前辈,鼓吹排满革命的党外知识分子章士钊(近藤[1972],第31—38页),是毛的老师杨昌济的好友。他忧虑地表示:“毛刘分裂就会使国家分裂”,在3月6日左右给毛泽东的信中请求团结,并说:刘少奇,“可作检讨(检查自己的缺点与错误,查明其根源),但切不可打倒”。然而,毛泽东没有接受,而是让章阅读“专案组”整理的刘少奇过去的材料(黄峥,第145—149页)。

5月1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首先讲到由广大的知识分子、学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然后,由工人发起“一月风暴”夺权,完成革命。他认为,这是和由“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搞起来的五四运动,发展为以工、农、兵为主力军的北伐和长征这种亲身的革命经历相吻合的。他号召知识分子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并说,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的问题,挖掉修正主义根子的问题”,“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主要任务,绝不是目的”(《万岁》丁本,第676页)。

毛泽东批评走资派和老干部:他们虽然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并打土豪分田地给农民的民主主义革命,但对反对资产阶级,进行农业集体化的社会主义革命却不那么赞成,并说必须“在思想上进行彻底无产阶级革命化”,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要求他们不要因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而停止,不断地改造世界观,走向共产主义。他强调说,要保护95%以上的大多数干部,而只给予1%~2%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打击(但允许他们改正错误,进行革命),防止5%的群众中的坏人钻空子,要以“破私立公”和“必须经过斗争”为前提进行大联合。

革命的目的是自我思想改造(世界观的改造,思想的革命化),比打倒走资派这一当前的主要任务,更重视目的——这一观点应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思想的核心吧。但是,这个只强调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飞跃,而轻视其连续性的发言,是与毛泽东自己在七千人大会上很好的发言相矛盾的。在那里,他把通过实践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这个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方



法，应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这恐怕会压制老干部利用在革命中积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来纠正建设中的失误、扩大政策选择的可能性。

批判刘少奇开始以后，毛泽东“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的意图，没有轻易实现。正像他1970年12月18日对斯诺所说的那样“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文革资料》中册，第493页），这两个月的形势，混乱得连毛泽东自己也无法控制了。

在武汉，由武汉军区支持、组织的保守派工人组织“百万雄师”，通过大规模的武斗，压倒了由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工人组织“工人总部”。7月，毛泽东和周恩来介入。周认为武汉军区支持保守派镇压造反派的“支持左派”活动是错误的，指示要支持两派。但是，军队干部和保守派，对党中央代表谢富治和王力支持造反派、打击保守派的做法表示愤慨，并于7月20日绑架、批斗了王力（武汉事件）。党中央视此为叛逆，解除了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钟汉华的职务，把“百万雄师”打成反革命组织而遣散。中央文革成员关锋在《红旗》12期（8月1日）上发表社论，宣称要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是，红卫兵在各地冲击了军事机关。

毛泽东用“还我长城”（人民解放军）批评了关锋。而且对于因王力的煽动，红卫兵造反派夺了外交部的权，并在8月22日闯入英国驻华代办处纵火事件，批判王的讲话是“大毒草”。8月26日，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的报告，并指示周处理，对王力、关锋（以及翌年1月对戚本禹）进行“隔离审查”（共产党使党员干部脱离职务、对其进行拘留审查），抑制了中央文革和红卫兵造反派的极左倾向。在红卫兵运动和国家的国家机器军队以及外交部发生大规模冲突时，他不得不制止了“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公社运动。而在7、8月散发了“打倒周恩来”传单的五一六兵团，9月以后亦被当成反革命极左集团而遭揭发、逮捕。作为文化大革命理论指导的党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在1967年12月至翌年6月也被停刊。

### 3. 从大联合到红卫兵运动的终结(1967年9月—1968年7月)

1967年8月末至9月,毛泽东把运动的重点从“造反有理”、反右转移到“大联合”、反“左”上来。呼吁“拥军爱民”(人民拥护军队、军队爱护人民),下达了禁止红卫兵冲击部队、斗军队干部及抢夺武器,停止在各地的活动,回本地区、本单位革命的命令。毛泽东自7月中旬至9月中旬,视察了华北(河北)、中南(河南、湖北、湖南)、华东(江西、浙江、上海)地区发表了谈话,10月7日党中央以《重要指示》的形式做了传达。

谈话在整体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基础上,即“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重要标志就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又做出了修正一些具体缺点以实现“大联合”的指示。对人民群众,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具体指出,(工人)红卫兵与学生组织的两派,应尽量少地谈他人的缺点和错误,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实现大联合。就干部问题,要求群众一方面要打倒极少数的走资派,团结大多数干部,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采取“团结一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方式解决内部矛盾,要用文斗,不要用武斗。另一方面,又告诫干部,高级干部拿高工资脱离群众的不平等、不民主的问题,引发了群众的不满,应从中汲取教训,多深入基层与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具体设定的行动目标为“斗私、批修”、“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毛稿》第12册,第385—389页)。

我认为,《重要指示》把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人民内部矛盾上来,由“天下大乱”转变为“天下大治”,即力图收拾文化大革命。文革以后有人认为,它通过解放一批干部,抑制了局面的恶化(《编年史》,第307页)。

11月6日,由陈伯达、姚文元起草,经毛泽东认可的,《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将(继承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理论的)“无产阶级

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公式化。(一)必须用对立统一的矛盾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二)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三)阶级斗争就是政权问题，是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四)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主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民主与大联合)；(六)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文章将毛泽东的理论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置于第三个里程碑的位置。看来它指望，把文化大革命的实践纳入到继续革命这个更为普遍的理论中去，确立了其意义，以收拾运动阻止运动的倒退，给未来留下了有待解决的课题。

1967年7月“武汉事件”以后，代之以省级保守派与造反派的对立，造反派内部的“温和派”(要求变革上层=政治权力，后盾为周恩来)与“激进派”(要求变革上层=政治权力及下层=社会阶层结构，后盾为中央文革)的对立激化了。“温和派”中清华大学“四一四(1967年4月14日(井冈山四一四兵团)组成)东方红战斗团”的周泉纓，撰写了《四一四思潮一定胜利》(1967年8月9日)，主张因为自建国后至文革前的17年间，基本上是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经济，应该靠文化大革命进行局部性地改革国家政权(打走资派)，又因军队的革命路线占据主导地位，不应该冲击军队进行夺权。与此相对立的是“激进派”的“省无联”<sup>①</sup> (“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1967年10月11日发布成立宣言)中的杨曦光所写的宣言《中国向

---

<sup>①</sup> 1967年9月18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立。另一方面，温和派的“工联”与激进派的“湘江风雷”(总部)在实行造反派大联合，共同进入权力机构时，10月11日更为激进的“省无联”(包括“湘江风雷接管委员会”，据称有20多个组织30万人)组成后，对其发动了挑战(徐友渔，第94页。渡边一卫，第118页)。

何处去?》(1968年1月6日写完,1月12日公布),<sup>①</sup>宣言把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视为“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红色资本家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主张依靠文化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打碎旧的国家机构,实现社会革命及财产与权力的再分配,创立“中华人民公社”,力主通过在军队内进行文化大革命,依靠国内革命战争夺取政权(徐友渔,第110·112页)。

杨曦光在宣言中肯定地评价了1967年上海通过“一月风暴”实现“中华人民公社”(左),批判了毛泽东建立的革命委员会与周恩来等的“二月逆流”(右),肯定地评价了3月末中央文革的反击与“八月局部国内革命战争”(左),批判了“九月转折”中毛泽东通过与“官僚资产阶级”的妥协、退让以解除工人阶级武装(右)的做法。遵循这一历程,要求按毛泽东的建党原则建设“毛泽东主义党”,将“省无联”作为相当于俄国二月革命的“苏维埃”的“群众专政的权力机构”,呼吁靠暴力打倒相当于临时政府的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他声称江青去年11月12日的讲话与林彪今年10月24日的指示作为我们的总方针,发出了寻求中央文革与军队的支持的信号。(《资料汇编》第6卷,第408—430页)

他看到在毛泽东身上有这样的矛盾:既有利用造反派的破坏力、追求实现其人民公社理想的一面,又有依赖周恩来等党和政府官员进行建设的实际业务能力、向他们妥协退让的一面,由此力图使毛泽东由右向左转。

---

<sup>①</sup> 又名杨小凯。1950年生,笔名“一兵”。“省无联一中红造会钢319兵团‘夺军权’”的负责人。18岁时是长沙一中的中学生。父母是党的干部,但父亲因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问题”被降级,父母被卷入杨曦光问题而受到打击。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杨曦光作为“红五类”的一员被“四旧”,和“牛鬼蛇神”斗争,造反、参加大串联。1967年“一月风暴”后,参加造反派“湘江风雷”的夺权斗争。被“二月逆流”镇压后,他遭逮捕、殴打、监禁,但仍继续斗争。7月“湘江风雷”得到平反。在武汉事件发生以后的7月到9月“天下大乱”之际,杨参加抢枪,“湘江风雷”以武斗打散了保守派的“高司”。回城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成为“湘江风雷”的一个主力军,杨与他们交往甚密,并组织调查团到农村了解实际情况,“面向运动的暗面”试图优先解决这一问题。他还通过召开座谈会和串联会,让民众知道他们的惨况,以期得到同情与支持,另一方面研究中国的社会制度、政治经济及文化大革命种种问题,写了几本论文,主张“重新建党、建军,彻底改变制度”(李一哲,第153—154页;渡边一卫,第130—131页)。

温和派的红卫兵认为自己的家庭出身好,党员、团员干部居多,并以与军需工业等现代化大工业的工人组织合作为自豪。他们攻击激进派由混杂着“黑五类”的众多阶层组成,有在出身和经历上有问题的人、与“流氓”(恶棍、流浪者)无产阶级组成的工人组织进行合作等。对此,激进派则不问家庭出身与阶级划分,强调自身所受走资派的压迫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徐友渔,第115-116页)。

杨曦光将这样一些人视作文化大革命的动力:即在文革初期被当做造反主力的“先被文革派利用、最终又被镇压”(山本恒人[1985],第199页)的合同工、临时工,<sup>①</sup>被动员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的知识青年等,“承受了‘体制’的牺牲”的“城市下层”,保姆及其他地位低下的劳动者。杨期望进而发动农民运动,实现如“五七指示”所描绘的缩小三大差别的公社理想,使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

杨曦光把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作为源泉来认识中国社会,结合城市下层群众这一主体与“中华人民公社”的方法,把它作为自身的立足点,彻底地批判了中国的政治不平等与社会不平等,并将毛泽东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政策视作资产阶级篡夺权力,敢于同毛泽东唱反调。可以认为,杨将毛泽东思想穷究到底,又突破了它。这个“独立思考”<sup>②</sup>正是其宣言的意义之所在。

但是,毛泽东的整体战略并非全部打碎官僚的=军事的国家机器,而是把一部分单位的领导权从走资派手中夺回来,重新构建根据地式人民公社,做好抵抗美苏侵略的人民战争的精神准备,推进物质战备的三线建设。而杨曦光对此几乎没能理解。杨将共产党高级干

---

① 从1966年12月到1967年2月,对于合同工、临时工的全国性组织“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中国共产党及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有三次转变:1.“由中央文革小组全面支持与利用”;2.党中央对上海造反派的“反对经济主义的方针”表示赞成,周恩来对临时工制度的社会必要性进行解释等,态度“有所动摇”;3.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全面镇压”(此时“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全国性造反组织也被作为“非法组织”取缔)(山本恒人[1981],第20—30页)。在文化大革命中,为当局所警惕,不允许有全国性造反组织那种拥有强大的造反力量的城市底层群众,就蜂拥进入造反派的激进派“湘江风雷”和“省无联”中。

② 后述的“李一哲”中的一个人王希哲称:“杨曦光们的《中国向何处去》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我们的使命》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他称杨曦光们是中国‘思考的一代’的理论先驱,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但是他并不同意杨曦光“把周恩来视为保守派官僚的总代表,把毛泽东、林彪视为激进的革命者”的看法(王希哲,第47页)。

部的90%定为对人民群众进行统治、剥削、压迫并获得特权与高工资的“红色资本家阶级”，仅将行动目标集中在一点上，即打倒由党和军队干部主导的革命委员会（“小康”），实现“中华人民公社”（“大同”），而把国家在担当国防、外交、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予以完全舍弃。杨的理论尖锐地反映了在党的干部与人民群众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但没有对中国的基本矛盾进行全面的把握。因此，它不可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如果他实践这一理论的话，就只剩下永无休止的惨烈的武斗了。

但是，杨曦光信任毛泽东，并专心致志地实践毛泽东“造反有理”的思想，从社会的下层找出担当实现“中华人民公社”理想的主体。毛泽东作为思想家，对此应该予以正面接受，把在杨的目的即人民公社与共产主义中所表现的把不平等变为平等——这一城市下层的要求，进一步来说是农民的要求。毛应该指示用自己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目前用革命委员会的方法来实现杨的目的的路程。毛难道不应把这一道理向杨讲清楚，做说服教育吗？在后述的接见红卫兵领袖中，毛谈到周泉纓是理论家，应予释放，而对杨曦光仅称其为“‘省无联’式大杂烩”<sup>①</sup>予以舍弃，连姓名也未予提及（《万岁》丁本，第690—691页）。

1968年1月21日—24日在北京召开了湖南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等对“省无联”的批判会，由周恩来主持，康生批判了由杨曦光执笔的“省无联”纲领（1967年10月完成。《资料汇编》第6卷，第402—407页），并将其定罪为“反革命理论”。江青与姚文元对此赞同，叶群拒绝发言，谁也不支持“省无联”，也不为之辩护（同上，第43—54页）。1月26日在长沙召开批判大会，“省无联”不久被解散，杨曦光被捕判十年监禁。<sup>②</sup>

---

<sup>①</sup> 在1968年3月30日印发的《中央首长对审查湖南省革筹小组的报告的指示》中，江青发言称“‘省无联’是被少数反革命分子所操纵的‘大杂烩’，（他们）是无赖，少数顽固的反革命头头，是坏透了的”（《资料汇编》第6卷，第56页）。“大杂烩”恐怕就是中央文革对“省无联”的共识吧。

<sup>②</sup> 杨曦光出狱后，1983年留学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在澳大利亚的蒙纳石大学任教。偶尔向香港及中国大陆以外的杂志投稿论述文化大革命（杨曦光[1990]，第69页）。

右的派系对于“一月风暴”、反“二月逆流”、打倒老干部等进行了批评。对此，毛泽东让《人民日报》等自1968年3月以后予以反击，并于5月做出指示，要粉碎“右倾翻案风”。另一方面，把1967年夏以后以促成大联合为目的的群众组织中坏人(极左)的揭发，在1968年5月后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1968年4月末以后，在清华大学造反派红卫兵内部激进派“井冈山”与温和派“四一四”展开了对攻，发生了流血的“百日大武斗”。7月27日由8341部队(毛泽东警卫部队)与新华印刷厂工人组成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3万人，未带武器，仅挥舞着《毛主席语录》进驻清华大学，付出死五人伤数百人的代价，制止了武斗。28日黎明，毛泽东和林彪带领周恩来、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成员，接见了红卫兵“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在派别上，韩、聂、蒯属于“天派”即温和派，王、谭属于“地派”即激进派，但在思想上，聂和蒯都属于激进派。

毛泽东宣称我就是让“工人镇压”、“压迫红卫兵”的“黑手”。然后又批评了武斗，称“人民不高兴”，“你们脱离群众、脱离工、农、兵、大多数学生，脱离你们自己人”(《万岁》丁本，第712页)，并提出了解决大学武斗的四种方法(1. 军事管制；2. 一分为二，将两派分成两个大学或两个地方；3. 斗批走；4. 继续打下去，大打)，究竟采取哪种方法由你们去商量。毛给他们提出课题(林彪示意进行大联合)。而且，毛警告：继向广西、陕西后再向全国发出布告，凡是违反此规定，继续攻击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的，一律视为土匪与国民党，予以包围歼灭。

毛泽东在基本上肯定红卫兵运动的基础上说，“你们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同时也批评了他们虐待俘虏、强行逼供殴打，致死致伤的不文明行为。对于红卫兵向走资派采取的“喷气式”揪斗方式(把受批判人的两手反剪在后面，强迫其低下头)，视为在湖南农民运动中农民斗地主“戴高帽子游街”斗争方式的变形，同时称“我是罪魁祸首，难逃其罪”，亲自承担了责任。他说：在红卫兵中存在的无政府主义，是“过去说的奴隶主义，‘驯服工具’的(共产党员要做党的驯服工具。刘

少奇的意见)走向反面”、“对中央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把这一类责任推诿到刘、邓领导班子身上。

对韩爱晶的提问，即担心将来中国各派打着毛泽东思想旗号，出现割据、混战，毛答道：“出了也没啥大事嘛！”此前的中国不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内战与党内斗争了吗。毛一方面对继承文革寄予期望，“有了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有好”，另一方面又谈到“就是把我、林彪、在座的都消灭干净，中国人民灭不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同上，第714页）。他把这种应付否定文革事态的哲学，以遗言的形式留给了青年。

这次会见记录的要点以“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文革资料》中册，第153—154页）为题，在清华做了传达。在其中，“五大领袖”还宣誓签名，保证“我们决不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的最大关怀、鼓舞和期望”。

毛泽东批评了派工作组镇压群众运动的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鼓励红卫兵造党委会与工作组的反，自己解放自己，亲自促成大联合建立秩序，并提出了人民公社的目标。但是他借红卫兵的力量打倒了刘、邓，各省革命委员会一成立，他又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镇压了热衷于相互武斗、靠自己力量无法实现大联合的红卫兵运动。

“五大领袖”有的成为自己大学革委会的主任和副主任，有的被任命为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聂）和常务委员，但所有人员在1968年作为“极左分子”丧失了地位。聂元梓第二年在党的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但不久即被迫“下放”。据称在1971年接受了“隔离审查”（《大字报》，第27页）。他们从否定现状的造反即革命的主体出发，走出了向改良现状的国家的主体成长转化之路，但不久就被排斥、镇压。

毛泽东以通过让中国人民学习毛泽东思想而朝着共产主义前进为目的，以打倒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修正主义和准备抵抗美苏侵略的人民战争为目标，主张根据地公社式的平等和有造共产党组织的反的自由。由于在社会主义平等理想与现实的政治、社会不平等及被压制的矛盾之中苦苦挣扎的学生，与毛泽东的号召相共鸣、成为红卫



兵行动起来,所以毛泽东夺回了权力、建立了文革体制。红卫兵批判党的干部的特权阶层化,并将其中的一部分打倒,但看来他们并不以为能够实现自己的彻底的平等与自由的要求。

### 第三节 中美和解与文革体制的矛盾

毛泽东强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打倒了走资派,夺回了领袖的权力,将接班人由刘少奇替换为林彪。之后,欲将运动转化为成功的体制,利用党和国家的权力,使文化大革命落实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内。但是,面对国内国外所发生的一些预想之外的大的变动,又不得不努力去加以应付。我们可以将这一过程分为林彪事件发生之前与之后两部分。

#### 1. 从工人、解放军进驻大学到林彪事件(1968年7月—1971年9月)

1968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了让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全国各个学校的通知。毛泽东指示,实行工人和解放军与学校(学生、教员、工人)的积极分子之间的三结合,进行教育革命;在农村,由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并让姚文元将其宗旨以“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红旗》第二期)加以说明。在上海“一月风暴”发生二十个月后的1968年9月,西藏、新疆作为最后两个省级单位,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至此,由解放军主导的省级革命委员会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成立,秩序逐渐地得以恢复。

毛泽东根据其写于1967年10月27日,1968年1月1日公开发表的“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的“五十字建党大纲”,决定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准备在革命委员会的基础上重建共产党。作为大会的准备,10月13日—31日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为文化大革命辩护:称其“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

的,是非常及时的”,并得到了全会的赞同。

一方面,对刘少奇的思想,在全会召开期间发表的《红旗》第四期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号召批判对抗毛泽东党的建设路线的“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批判其“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党的建设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特别要以下述的(1)、(2)为中心,彻底批判黑六论,即(1)“阶级斗争熄灭论”;(2)“(共产党员成了共产党的)驯服工具论”;(3)“群众落后论”;(4)“入党做官论”;(5)“党内和平论”;(6)“公私溶化论(吃小亏占大便宜)”。这次批判是对刘少奇压制群众运动的批判的一个延续。与刘少奇的路线相反,毛泽东的党的建设路线是要求党员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群众当中,都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修正主义、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斗争(反对(1)、(5));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忠诚要优于对党组织的忠诚(反对(2));不图个人利益,为人民服务(反对(4)、(6));坚持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的观点,服务于群众,领导群众(反对(3))。这次批判,尽管不提毛、刘的共同点,只强调不同之处,不是全面的、不是内在的(不是抓住刘本人所固有的逻辑),但却清楚地表明了打破以确立党的官僚制为中心的刘少奇的路线,恢复以群众运动、群众路线为生命的毛泽东的路线这一意图。

另一方面,对刘少奇的行动,十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所做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审查报告》(10月18日,《文革资料》中册,第224—227页)将刘少奇的主要罪状解释为:(1)一九二五年在长沙;(2)一九二七年在武汉;(3)一九二九年在奉天(沈阳),曾三度被捕叛党。<sup>①</sup>不过,将“审查报告”及“罪证”报告(《刘问题》)与《关于恢复刘少奇同志名誉的决议》(1980年2月29日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进行比较阅读,就会感到对刘少奇如此定罪处理的证据是不充分的。我们

---

<sup>①</sup> “只要被敌人逮捕,不论是否变节,都说明此人就有疑点,需要进行严格的审查”。这据称是“共产党内一个不成文的看法”(高华,第495页)。这也许是延安整风“反内奸”斗争的最高领导人刘少奇自食其果。

难以理解毛泽东为何将刘少奇认定为叛徒。

关于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初衷是藉此进行开门整党，使共产党接受人民的批评、整顿思想、作风、组织，在这个过程当中，将毛、刘之间的对立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加以处理。但这一想法却没有得到贯彻。毛泽东推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将“高速度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党内斗争”的斯大林模式，以人民战争的方式加以运用的毛泽东模式绝对化，将刘少奇由大跃进（扩大农业集体化的规模与高速度工业化）失败而产生的对毛本人的政策的不同看法，定罪为针对正统思想的异端邪说，对领袖、导师的背教者，走的是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背道而驰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道路，是针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并加以批判，进而还将刘少奇的问题划归敌我矛盾的范围，将刘少奇定罪为“叛徒”并开除出党。在《党史简明教程》一书中，斯大林批判对农业集体化持不同意见的布哈林的看法是“阶级斗争消灭论”，将其作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开除出党（后来将其作为“人民公敌”加以逮捕，并提请诉讼，最后予以枪决）。斯大林主张和党内的“机会主义的党内俱乐部”进行斗争，并令其瓦解，清除了“工贼、叛徒”（第569—571页），为上述党内斗争辩护。毛泽东的做法，与斯大林的逻辑是非常接近的。

1969年10月，根据中央关于备战“疏散”的决定，重病中的刘少奇被从北京中南海空运到了开封，被“监护”在市革命委员会的楼中，未能得到充分的治疗，于11月12日病逝。毛泽东将邓小平与刘少奇区别对待说：（邓）在战争时期是打敌人的，历史上还未发现有什么问题，没将其开除出党（王年一，第311页）。

响应毛泽东的“造反有理”与公社的号召而出现的造反派红卫兵，对派遣工作组压制造反派的刘少奇、邓小平路线，及反对造反、保卫党的高级干部的“红五类”出身的保守派红卫兵，进行了激烈的攻击，并将其扩大为针对全国的省级党委会、政府的夺权斗争，与解放军和革命干部一起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通过这场运动，群众以从未有过的规模登上了政治舞台，使政治呈现出一种流动化，其结果动摇了国家社会主义体制。这样的现象是苏联未曾发生过的。引起红卫兵

造反的原因是，存在于党的干部中的特权阶级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政治矛盾、“红五类”与非“红五类”之间的社会矛盾、人民当中的经济、身份矛盾。这些矛盾远比毛泽东所感悟、推测的要复杂、深刻、巨大。

另一方面，在党内、党与红卫兵及人民之间、红卫兵内部、人民内部，由于实行“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出现了很多死者和数量庞大的受害者。红卫兵用湖南农民运动时农民与地主进行斗争的方法，对共产党的干部进行“残酷斗争”，红卫兵中的保守派和造反派，或造反派中的温和派与激进派，都坚信“我是毛泽东思想，他是修正主义”，进行残酷的武斗，并发展到了连点起这把火的毛泽东本人都无法控制的程度。

有人说，知识分子“为了‘革命’、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互相凶狠地、无情面地揭发、批判，虔诚地、忠实地、穷根穷底地交代、检讨……”“造成了多少的人格分裂、精神创伤和人间惨剧”（李泽厚，第198页）。人人都坚信崇高的理想，通过批判与自我批判进行激烈的相互否定与自我否定，破坏了人性与家庭、单位、地区、党和国家间的人际关系，留下了严重的伤痕。他们将阶级斗争这个打倒敌人的强有力的武器，指向自己与朋友，陷于无法遏制的自我破坏、自我毁灭。

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虽然作为批判、打倒既存的资本主义的理论是强有力的，但作为建设不存在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并不是那么具体的。毛泽东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绝对化；对于不同的看法，采取正统迫害异端的方式，强制推行进行阶级斗争的文化大革命，所以造成了悲惨的结局。

1969年4月，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林彪作政治报告，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主张为正当的。关于国际政治，林彪引用毛泽东所作的“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的论断，强调要抓住美帝国主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sup>①</sup>各国反动派与世界人

---

<sup>①</sup> 中国批评1968年以苏军为主力的华沙条约军侵入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其自由化，是口头上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实际上干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勾当，在这个意义上，称苏联为社会帝国主义。

民之间的矛盾这一国际形势，重视3月珍宝岛中苏武力冲突事件，准备对付包括核战争在内的来自美苏的大规模侵略战争。大会制定了新的党章，把从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制定的党章中删除的毛泽东思想，再次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相提并论，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基础”，将林彪作为毛泽东的继承人写进了党章。在选举产生的170名中央委员及109名候补中央委员当中，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被选上32%，只占九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19%，新增了大量军人和文革派理论家及群众组织代表。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林彪当选为副主席，陈伯达、周恩来、康生当选为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及政治局候补委员当中，新增了军人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减少了老干部。

毛泽东在大会的讲话中强调团结与胜利，在一中全会的讲话中主张继续进行“斗、批、改”的革命、做好进行战争的精神准备与物质准备。不过，从2月19日起，毛泽东已三次向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四位元帅提议进行国际问题研究，6月周恩来布置了工作。四位元帅于7月和9月提交了报告，指出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苏联有发动侵略中国战争的意图但有困难，有必要利用美苏间的矛盾，打开中美关系。这一报告奠定了战略大转移的基础。

为了报复3月发生的珍宝岛事件，8月13日，三百名苏军在直升飞机和装甲车辆的掩护下，埋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边境的苏方一侧，将30人的中国边防巡逻队全部消灭。18日，驻华盛顿的苏联领事馆代表向美国政府的有关人员探询：如果苏联打击中国的核设施的话，美国将会采取什么态度？其后，苏联通知其东欧的盟国：有可能打击中国的核设施，在《真理报》上暗示将对中国实施核打击。

毛泽东认为战争的危机迫在眉睫，在进行战争准备的同时，缓和了与7月后开始表示和中国接近的美国的关系，采取了牵制苏联、回避战争的战略转换（杨奎松[1999]十八章，熊向晖）。1970年1月，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沙重新恢复。

另一方面，中国继续进行抗美援朝，支持4月举行的印度支那三

国四方(柬埔寨、南越民族解放战线、老挝爱国战线、北越)会议。由于5月美军对柬埔寨发动了进攻,中国拒绝了中美大使级会谈。5月20日,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论断:“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毛稿》第十三册,第96—97页)。可以看出,毛泽东乐观地认为,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如果坚持“持久的人民战争”,就能够打败美国的侵略、阻止世界战争。

10月1日国庆节那天,毛泽东与斯诺并非站立于天安门上。他在12月18日会见斯诺时说,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我想与他进行会谈。1971年4月毛泽东亲自指示,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来中国,发出了建立中美关系的信号。7月9日至11日,美国总统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与周恩来进行了会谈,一致同意尼克松访华。周恩来于13日飞往越南,就会谈的内容向越南领导人做了说明;<sup>①</sup>15日又飞赴北朝鲜进行说明,16日中美两国同时发表了公报,宣布尼克松访华。

关于国内政治,毛泽东打算利用从走资派手中夺回的党和国家的权力,将文化大革命开展到工厂、学校等社会各个单位。他的目标是,通过实行其被林彪报告所引用的“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毛稿》第十二册,第531—532页)这一“斗、批、改”的过程,让干部参加集体劳动,恢复群众路线。他挑选北京针织总厂、新华印刷厂等六个工厂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作为试点,派遣8341部队及医生等身边人员去领导运动。毛泽东本想将其作为一种模式引向全国,但由于发生了林彪事件而中断了(郑谦,第477页)。关于共产党,毛泽东希望以“五十字建党大纲”为基准,进行开门整党,吸收造反派中的新党员,开除一部分老党员,使党与群众相结合和活化。到1971年8月,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会全部成立。

---

<sup>①</sup> 根据北越方面的资料,周恩来说:“对中国而言,首要的问题是美军从越南南部撤退,中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是第二位的”(越南《中国白皮书》,第69页)。

1968年12月，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毛稿》第十二册，第616页）。他大概是想将自己年轻时由参加城市的学生运动、民主运动、工人运动，到进入农村、致力于农民革命战争的体验再现到知识青年的身上。他到1976年之前，动员了1600万知识青年参加“上山下乡”运动，让其实践缩小<sup>①</sup>

---

① 1966年四川省成都一中高三学生、共青团员徐友渔回忆自己的经历，如下看待由红卫兵运动到“上山下乡”运动中知识青年的思想变化。

（1）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哀叹自己不幸未出生于革命时代的徐，满足于参加“挽救人类命运”的文化大革命“使命感与幸福感”（[1998]，第20—21页）。了解了陈伯达对血统论的批判后，他觉得头脑豁然开朗，被北京大学生的下述演说所打动：向以维护党的领导为名、指责群众为反革命、并进行压制的当权派造反，建设“人人平等，没有压迫的社会”即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坚信只有坚持“站在群众一边”，保卫并支持群众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人民才能真正地当家作主”，他于是投身于红卫兵运动。他以为通过这场运动可以解决下述矛盾：中国的政治制度是最美好的，党是绝对正确的这种教导，与不公正、不合理过多，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在玷污着党这一现实生活之间的矛盾（[1999]，第24—27页）。

（2）徐参加了造反派中的温和派，成了其中的“理论家”，与激进派展开了论战，但没参加武斗。可是，说：“我在‘文革’中干得越多，我发觉距离原先的理想越远”（同上，第70页）；我明白了“红卫兵中没有一派会有好下场，在‘中央文革’的政治棋盘上，我们全是过河卒子，是注定要牺牲的”（同上，第67页）。红卫兵被1968年进驻学校的军宣队和工宣队告诫说犯错误，被迫退出政治舞台，绝大部分红卫兵产生了上当受骗之感。

（3）为什么运动中的“革命先锋”需要“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对此，上级根本没有解释。在农村，干部一召开“忆苦会”（忆1949年以前的苦，思少人后的甜的会），农民就哭诉说60年代初大跃进中的公共食堂与饥饿和饿死的痛苦，多年受革命教育而形成的信念因此而崩溃了。通过1971年的林彪事件与在此事上不承认自己错误的毛泽东的态度，他完成了从运动中期开始的对“官方”的政治教义的疏离、怀疑与否定的过程。

徐友渔赞成作为文化大革命出发点的理想，但对运动的过程与结果却很失望，并认为文革以后留下了“一党专政制度”与“官僚特权”这些“未解决的社会矛盾”（徐友渔，第255—262页）。

而且，当时在安徽农村劳动了三年的知识分子曾对我这样说过：

当我们明白了贫下中农一门心思考虑的只是自己的吃饭问题，只知有一己，毛泽东的指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不现实的后，我们的幻想破灭了。我们想，改造农村只用铁锹等原始的农具没有办法，以为只能先实现城市工业化，制造先进的生产工具，然后把它带给农村。整个“上山下乡”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值得重视的是：当时的知青对农村改造还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1600万知青在农村得到了锻炼，深入地了解了国情，目前在各个领域当中处于重要的地位，成了改革工作的承担者（近藤[1997]，第14页）。

“上山下乡”的知青对此看法有同感的应不在少数吧。

三大差别。<sup>①</sup>他们虽从事农业及小工业等劳动，对农村、边境的建设做出了贡献，但由于体验了艰苦的生活，受到了农村的极度贫困与落后的冲击，开始重新观察整个中国社会。另外，同年10月，在全国成立了五七干校，将党和政府的干部及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令其从事体力劳动。这些都是对“五七指示”的实践。

在大学教育停止四年后，1970年6月，根据毛泽东“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在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决定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二年至三年制的“工农兵学员”进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学习。

国民经济在1966年得到了增长，虽然由于文化大革命混乱的影响，在1967年和1968年出现了下降，但由于实行了周恩来制定的“计划纲要”，1969年又开始好转。根据毛泽东“要准备打仗”的指示，1970年2月—3月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决定，加速三线建设、加速农业现代化、发展县级“五小工业”并成立农机修造厂、建设十个经济协作区（适应独立作战的工业体系）、下放企业。在1967年6月成立的、由林彪派系军人组成的军事委员会办事组的主导下，1970—1971年进行了“新跃进”。

在文化大革命从运动转化为体制、从党的重建发展为国家机构的重建的过程中，发生了林彪事件。1970年3月，虽然毛泽东提议不设国家主席，却遭到了林彪的反对。在8—9月间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上，又遭到了陈伯达等人的反对。毛泽东将这看做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责难说“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文革资料》中册，第555页），以此追逼林彪。党中央的通知说，林彪派谋杀毛泽东的阴谋失败，于9月13日乘飞机出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坠机死亡。毛泽东曾谈到，确立党的一元化领导、限制因文化大革命而过于扩大的军队势力这一问题，是导致林彪事

---

<sup>①</sup> 可以认为，毛泽东期待着“上山下乡”的1600万知青，在备战、地方工业化、农村工业化及农村改革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未见有这方面的资料。此乃今后的研究课题。



件发生的背景。看来似乎是，为了抗美援朝和为打倒刘少奇而被提拔的林彪，不能领导向联美反苏及向重建党和政府的政策转换，也不能适应它。

## 2. 从林彪事件之后到毛泽东逝世（1971年9月—1976年9月）

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靠近了老干部一侧，让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叶剑英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意图转换国际政治格局并重建国内政治。

关于国际政治，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代表权。1972年2月，毛泽东、周恩来与到访的尼克松、基辛格进行了会谈，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中美关系由敌对转向了和解。公报包括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不称霸、反对（苏联等）霸权；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等内容。公报表明了中国方面“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大国、强国不应欺负小国、弱国的价值观，与美国方面的“公正、稳定的和平”、“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的价值观不同之后，突出强调了双方同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政策的一致之处。9月，日本国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与毛泽东、周恩来进行了会谈。两国政府发表了联合声明，给日中战争（即抗日战争——译者注）划上了句号，实现了邦交正常化。美国对中国的包围圈打破了。可以认为，“救亡”的课题实质上一直留到这时才得以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23年后，终于得到了西方各国的承认，提高了防备北部和西部存在的来自苏联军事威胁的国家安全（能力），获得了从西方引进技术、发展经济的条件。中美和解与1975年越南战争的终结，结束了亚洲的世界战争时代。（不过，毛泽东固执地坚持“战争—革命”的框架。——后述）

毛泽东在会见尼克松时谈到，“现在不存在我们两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你们想（从越南）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外交》，第595页）。可以认为，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确信越南人民一定会赢得胜利，美军将撤兵，支援越南的抗美援朝，做

好了用人民战争去对抗将会发生的美苏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正因为此，毛泽东才能成就了依靠中美和解来回避中苏战争、打破对中国的包围、进入国际社会的绝技（作最坏的打算，求最好的结果）。可是，正处于抗美战争高潮的越南却猛烈地批评了中国。

关于国内政治，可以认为，毛泽东根据“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意图通过因文化大革命而高涨起来的人民大民主与平等主义、重建的党的领导来发展经济。一方面，他让江青等文革派控制宣传部门与教育部门，大造拥护文化大革命、反对右倾的舆论。另一方面，他让周恩来等老干部领导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同时又限制他们不要发展到否定文化大革命。他虽未总结自身进行三线建设、实行地方工业化的经验，提出如何将革命与生产相结合的方法，但却希望自己作为立于两个对立派之上的压物石，以保持平衡稳定，实现“安定、团结”。

1971年12月，毛泽东掀起了批判林彪的“批林整风”运动。

周恩来将一大批老干部从停职、监禁、迫害下解放出来，让他们担任领导职务。他指出，由于实行“新跃进”，工厂的工人总数、工资总额、粮食销售量及货币发行额超出了计划，国民经济失去了平衡。要在1972—1973年进行调整以使其达到好转<sup>①</sup>。1971年末，他指示在农村人民公社注意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照顾国家、集体、个人的三者利益，努力克服平均主义。1973年以后，从西方国家进口了化学肥料、化学纤维、石油化学等成套设备。他使教育领域及科技领域也走向正常化。周恩来提出以反“左”为工作重心，在批判林彪的同时，批判极左思潮与无政府主义，但江青、张春桥等文革派却高唱反对“右倾回潮”进行对抗。

毛泽东担心反“左”会否定文化大革命，1972年12月指出，林彪不是极左是极右。此后，除对外关系外，他不允许批判极左。1973

---

<sup>①</sup> 可是，1973年5月，党中央工作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因而用于备战的三线建设一直进行到1976年（《执政四十年》，第362页。吴晓林 [1998]，第77—78页）。

年他批评外交部的时候，<sup>①</sup> 批判林彪是“尊孔反法”。因为林彪尊敬孔子，其儿子林立果搞的暗杀毛泽东的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大骂毛泽东为“当代的秦始皇”，所以毛泽东将批判林彪与批判孔子联系到了一起，并驳斥说，秦始皇、法家的中央集权和“厚今薄古”是进步的，对此加以反对的儒家才是反动的。

1972年初以后，毛泽东采取措施，再度起用邓小平，<sup>②</sup> 1973年3月恢复了他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让其逐渐接替病重的周恩来。

在1973年8月召开的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做了政治报告，肯定了九大的路线，批判林彪派为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强调要将“批林整风”等活动在文化大革命的各个领域实现具体化。他认为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正在争夺霸权，指出，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失败了，现在又不得不从越南撤兵，正在走下坡路，事实上是将苏联看做更加危险的敌人。大会选出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副主席。被毛泽东当作接班人的王洪文、政治局常委张春桥及政治局委员江青、姚文元，在政治局内部形成了文革派四人帮。

1974年1月，毛泽东为了防止否定文革，同意掀起“批林批孔”运动。但当江青等人以周恩来为靶子，将思想批判引向群众运

---

①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认为：外交部对美苏签定防止核战争协定以后的世界形势所作的“大欺骗、大主宰”的评论，与自己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毛批评说：在思想方法是看表面，不看实质，“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周恩来承担主要责任，他审阅、修改外交部起草的自我批评的文章，使之符合毛的看法，得到了毛的承认（《毛稿》第十三册，第356—357页。《周谱·后》下卷，第603—605页）。同年11月—12月，毛泽东听说，周恩来和叶剑英在与基辛格的会谈中，周谈了错误的看法（台湾问题否？基辛格<sup>①</sup>，第514—515页）后，让江青等人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这次的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的“投降主义”，令周进行自我检查。毛泽东基本上肯定了这次会议，但指出不应该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等话，（周）总理不是“迫不及待”（地想要取代毛泽东）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毛以此压制江青等人的过火行为，将毛与周的矛盾限定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内，没有划到敌我矛盾当中（《周谱·后》下卷，第632—635页）。

② 邓小平在林彪事件发生后的1971年11月给毛泽东写了封信。当他听说在1972年初的陈毅追悼会上，毛泽东说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后，8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寄去了“自我检查”。毛泽东给邓信写了“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同刘少奇加以区别的”“批语”，列举了三点邓小平过去的功绩：在中央苏区作为毛派头子挨整，没有投降过敌人，有战功及在莫斯科没有屈服于苏修（《毛稿》第十三册，第308页）。

动之时，毛泽东不希望出现动乱，警告江青他们不要搞四人小宗派。

11月，原红卫兵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以“李一哲”的名字，张贴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的大字报，批判“林彪体系”是“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是从“人民公仆”转化为“人民的主人”、“特权阶级”、“新生资产阶级”。他们希望在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建立法制”、“限制特权”、“保证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权”；宣称一定要掀起粉碎“林彪体系”的群众运动，“必将重新恢复、发展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切精神。”（李一哲，第77—97页）他们是想让文化大革命发展为政治民主化。“李一哲”被广东省委批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他们三个人被逮捕关进了监狱。

10月，毛泽东抵制诽谤周恩来等人、想要自己“组阁”的四人帮，推荐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邓小平为副主席、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第一副总理、总参谋长。他任命张春桥为总政治部主任，以取得平衡。

为了适应中国在国际社会当中占有合法的地位、文革体制正在扎根的新情况，毛泽东着手研究理论问题。关于世界战争，他设想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关于共产主义，他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提出将美苏作为第一世界，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作为第二世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作为第三世界的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主张第三世界团结起来。2月25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时谈到，如果“（帝国主义的）社会制度不改变，战争不可避免”、“人民起来革命”，中国“准备打仗，准备他们（美苏）在世界上闹事”（《毛稿》第十三册，第379—380页）。可以认为，毛泽东打算在坚持他一贯主张的“战争——革命”的框架与反苏政策的同时，将各种世界新动向纳进其中。

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特别会议上，就三个世界的理论发表演说，强调“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掠夺和控制”，阐述政治独立应和经济独立相结合、自力更生应和经济技术交流相结合，在“战争——革命”的框架当中适当地加入“和平——改良”的成分。

在1975年1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宣读了邓小平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坚持三个世界的理论，认为，国际形势是“天下大乱”，“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总是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中国应团结第三世界、支持第二世界反对霸权的斗争、反对第一世界的霸权主义与世界战争。它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将曾在1964年12月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构想（四个现代化），<sup>①</sup>相隔十年再度提起。这次将时间明确为：“第一步，用十五年的时间，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第二步，在本世纪内”。这是打算将突破外面的包围圈与打破自我闭塞相联系，从资本主义各国引进技术。

之后，邓小平代替因患癌症于上年6月以后住院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与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他着手对以党为首的工、农、商、学、兵等各方面的工作进行全面整顿，批判派性与分散，强调党性与纪律，力图恢复秩序、发展经济。

1974年10月，毛泽东会见丹麦首相哈特林时谈到，中国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与资本主义无甚大差别，只是变更了所有制。10月26日，毛泽东将这次谈话告诉周恩来说，对商品制度和不平等的工资制度，“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1958年大跃进时，其所主张的内容具有两方面性质：虽然打破了干部与群众之间不平等等政治上的“资产阶级权利”，但却保存了按劳分配等经济上的权利，以克服“共产风”。此处只说打破、不言保存，其思考片面化、倒退了。而且，毛泽东依据列宁的小生产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一理论，警告说：“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毛稿》第十三册，第413—414页）。毛泽东是想限制社会主义社会所发生的人民之间的

---

<sup>①</sup> 1981年6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表明1980年的工业固定资产与产量比1952年增长几倍，确认实现了周恩来报告中的“第一步”设想。

经济上的不平等，防止共产党员变质为特权阶层，朝着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1975年2月，党中央将毛泽东讲话的要点作为“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加以传达，全国掀起了学习由张春桥与姚文元选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33条语录的运动。

1975年3月，暗中批判周恩来等老干部。姚文元主张“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毛泽东主张反对包含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在内的修正主义，以此来抵制“四人帮”。基于毛泽东“不要搞四人帮”的发言，邓小平于5月和6月在政治局批评了“四人帮”。因此，王洪文成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期望就完全消失了。

8月，毛泽东说，“《水浒》这本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同上，第457页），同意四人帮掀起批判运动。不过，在9月的“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江青讲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人要架空主席，以此暗示批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毛泽东得知后批示：“文不对题”，“讲话不要印”。

9月20日，周恩来因癌症进手术室时，在一份1972年6月23日在党中央所作的有关自己“脱党”谣言的录音记录稿上签名，并大声叫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周恩来年谱》下卷，第721页）。<sup>①</sup>周恩来夫人邓颖超要求汪东兴（八三四一部队司令员）将这一情况传达给毛泽东。

当时正病重，活动、说话都困难的毛泽东，从担任政治局联络员的侄子毛远新那儿听说，邓小平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虽然也说以毛泽东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为纲，但实际上

---

<sup>①</sup> 1967年5月19日，周恩来针对江青转送的南开大学造反派红卫兵送来的“伍豪（周恩来）等脱离共党启事”（刊登于1932年2月20日前后的上海的报纸）解释说，这“纯属敌人伪造”，“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周谱·后》下卷，第154页）。翌年1月16日，毛泽东作了“这件事已经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的批示（《毛稿》第十二卷，第463—464页）。1972年6月23日，周在党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就这件事作了详细说明，并宣布：根据中央决定，把报告录音与录音记录稿以及其他有关文献资料存入中央档案（《周谱·后》下卷，第531页）。看来似乎是这件事与1973年关于“投降主义”的自我检讨，使周在死前大发愤怒。

只搞了一项生产。毛泽东就认为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11月初让政治局就文革的评价进行讨论，并让批判邓小平。而且，毛泽东指出文革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错误是“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文革“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在这一思路下，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主持做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但却被邓小平委婉地拒绝了（《编年史》，第389—390页。王年一，第553页）。另一方面，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将一封批评书记迟群和副书记谢静宜（迟和谢参加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的信，通过邓小平转呈毛泽东。毛泽东将此看做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活动，11月发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被停止了大部分工作，只负责处理外交事务。

另外，这之前的同年9月—10月，为了促进全面整顿，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国务院有关部门起草了（1）“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工业二十条”）；（2）“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3）“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三个文件（《文革资料》下册）。文件强调按劳分配，反对平均主义（（1）），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目标，将毛泽东的三项指示定位为实现上述目标的工作大纲，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重点不在批判刘少奇，而在批判林彪，暗中将四人帮称作是“继承林彪的衣钵”、“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呼吁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3））。毛泽东本打算由自己坐镇，使“四人帮”和老干部并存于政权内部，让他们将革命与生产结合起来，但两派却是激烈对立的。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

2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既不是邓小平也不是张春桥，而是属于文革温和派的华国锋被选拔为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华国锋作为湖南省的地方干部，在农业集体化和大跃进中做出了成绩；文化大革命中，作为革命干部开始受人瞩目，当上了省革委会副主任、党委第一书记；后为中央起用，当上了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公安部长。可以认为，毛泽东期待着华国锋将革命与生产结合起来。华国锋同意发表毛泽东批评邓小平时说的

“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稿》第十三册，第486页），对邓进行点名批评。

1975年10月—1976年1月间的毛泽东的讲话，经毛远新整理后由毛本人亲自校阅，作为《毛主席重要指示》于1976年3月3日由党中央下发到县、团级干部。重要指示中说：“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发表于《红旗》第六期）。“（一百年后，一千年后）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毛稿》第十三册，第487—488页）。人民要反抗压迫，继续革命，继续前进，党必须要与人民相结合、领导人民。毛泽东这种关于人民革命的思想，一直贯彻到最后，未曾改变过。不过，他却并没有总结三线建设的经验，提出将革命与建设结合起来的具体方法。

自3月下旬至4月4日清明节，在南方各城市出现了悼念周恩来、批判文革派的活动。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摆放着许多花圈，还有歌颂周恩来、盼望实现四个现代化、批判四人帮、批评秦始皇=毛泽东的诗（“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始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严家其，第612页）和标语。群众对共产党的批评，是从刘少奇、邓小平进展到周恩来，再到林彪，最终指向毛泽东。4日夜，党中央决定将其作为反革命事件加以处理，得到了毛的同意，撤走了花圈和标语，并逮捕了一些人，5日动员民兵、公安、军人，镇压了抗议的群众。毛泽东未能实现其1957年所说的“（应当）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毛选》第五卷，第396页）这一金口玉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华国锋被任命为党的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被认为是事件幕后操纵者的邓小平被解除了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仅保留了党籍。之后，四人帮进一步强化了对邓小平的批判，暗中亦攻击华国锋及其他领导人。

6月15日，毛泽东将华国锋、王洪文等数人叫到病床前，讲了



如下的遗嘱。

在自己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中，对倒蒋、抗日持异议的人不多，但台湾还没有收回。对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也不少”。必须将两个未完成的事业作为遗产传给下一代，如果不能很好地传下去，就得“血雨腥风”。“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执政四十年》，第409页）。

对文化大革命是否会被继承下去，毛泽东是很感不安的。

7月6日，朱德逝世。28日，河北省唐山发生大地震，24万人死亡、16万人受重伤。

9月9日，毛泽东逝世。

10月6日夜，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为中心的政治局，认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图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逮捕他们，进行隔离审查。7日，华国锋在政治局会上当选为党的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接替了毛泽东的职位。

在1978年12月13日召开的党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叶剑英指出，自1966年至1969年，有40万人因文化大革命被杀害，受迫害、受牵连的人多达1亿人，占总人口的九分之一（王年一，第623页。《每日新闻》1979年2月5日报道）。

1981年6月27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批准了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决议”，同意被毛泽东指定为接班人的华国锋辞去党的主席、军委主席的请求，让他担任党的副主席。在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华国锋辞去副主席职务，保留了中央委员一职。

毛泽东将文化大革命总结为“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邓小平将其当做“错误”看待；当年的红卫兵会认为是“遭受挫折的革命、未完成的革命”吧。他们在造反运动中受到伤害而失望，后参加“上山下乡”运动，被剥夺了求学的机会。他们忍受了艰苦的生活，同时也为农村的生产和改革做出了贡献。他们明白了毛泽东思想脱离了极度贫困落后的农村的实际情况，幻想破灭了。似乎是，他们走向了自立，开始摸索其他的道路。

## 结论 毛泽东 实践和思想

本书研究毛泽东的实践与思想，把重点放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毛泽东在青年时期。我继承了竹内好及西顺藏所说的、在中国人格的独立支持民族的抵抗的观点，重视受杨昌济影响的城市知识分子毛泽东的个人独立和人民联合的思想。我以为，毛的早期思想在进入农村后，在农民的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运动中具体化，在此基础上，红军士兵获得了“精神解放”使自己形成为革命的主体。我探索毛的这一思想发展的逻辑。

（二）毛泽东在革命时期。我主要利用在日本编辑的资料《毛泽东集》及补卷，不受建国后毛泽东自己改订编辑的《毛泽东选集》中“反蒋抗美”、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统治思想的框子的束缚，努力掌握在复杂的情况下曲折地表现的、充满了丰富的创造性思考的、革命时期毛的“拥蒋抗日”的民族革命思想，思考毛的思想与从最近中国公开的资料及研究中了解到的毛的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

（三）毛泽东在建设时期。我吸收了和田春树的准备应付世界战争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概念，弄清毛泽东以中国的人民战争的方式运用苏联的模式，既有开拓超越苏联经验的新局面的地方，也有未能从以往的框子里摆脱出来的地方，从中考察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作用和缺陷。

在被拖入西方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并濒临灭亡危机的中国近代，毛泽东继承了“救亡—民主”这一中国近代思想的基轴，并与“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的列宁主义的框架相结合，参加、领

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他将革命的课题规定为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把革命的主体发展为“民众→国民→农民→民族→人民”，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方法，特别是用“农村包围城市”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领导苏维埃革命、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并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他由此基本上解决了中国近代的课题。

建国后，毛泽东对外与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及其后台美国相对峙，以通过世界人民革命阻止帝国主义发动世界大战为目标，继续保持了人民战争的态势。他首先向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派遣人民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将北上的美军、韩国军击退回三八线附近，挽救了北朝鲜的危机。以后他又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反帝国主义民族解放运动看做是阻止世界战争的主要力量予以支援，派遣后方支援部队援助越南的抗美战争。在此过程中，他注意到美国在越南陷入苦战，判断苏联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迫在眼前，在1972年实现了中美和解和日中邦交正常化，打破了对中国的包围圈，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获得了国际上的承认。加上1975年越南战争的胜利，在亚洲地区世界战争的时代结束了。美国试图通过“阻遏共产主义”政策来阻止共产主义者领导、以农民为主力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其对周边地区的波及，由此发生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持续三十年的战争时代结束了。

对内，毛泽东高兴共产主义的目标，在人民民主专政下，从新民主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力图提高每个人的自觉，高速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对抗帝国主义。为此，他引入了苏联国家社会主义的框架，即“准备应付世界战争的新总力战体制”；“共产党与国家粘合在一起，一元化地控制社会的、党、国家、社会团体打成一片的集权政治；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和计划经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教化”，以及《党史简明教程》所写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斯大林模式，即“推动高速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通过党内斗争处理左右不同意见”（“从上而下的革命”）。毛泽东将上述苏联的经验以中国的人民战争的方式加以运用，创造

出了从上而下的和从下而上的相结合的“两条腿走路”的毛泽东模式，基本上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毛泽东在建设上的功绩，可以与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建立起了物质基础、打败了德国和日本、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出了贡献的斯大林相媲美。其反面，他发动反右派斗争打击了广大知识分子，造成了共产党与知识分子之间严重的相互不信任；强行推进大跃进，造成了大量人饿死；发动文化大革命，大批人受迫害或致死。中国的大跃进（1958—1960年）相当于苏联高速工业化、农业集体化（1929—1934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1966—1969年）可与苏联的大肃清（1936—1938年）相对应。在评价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成果的同时，也应该正视其代价。

探寻其间毛泽东的思想形成的逻辑，可以看出，毛泽东无论在革命事业还是在建设事业上，抵抗外来侵略，冲破（“冲决”）内部束缚（“网罗”），发挥人民的力量，把国家独立和人民革命结合起来这一根本思想是一贯的。其核心是“人民”成为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断认识“矛盾”并通过实践加以解决，向消灭阶级、国家、政党的“大同”（共产主义）前进，即从外部对帝国主义的绝对批判的、“人民、矛盾、大同”。

如进一步区分时期来考察的话，毛泽东青年时代继承杨昌济以“吾”和“民”为基点、“改变旧中国变之自下的思想，形成了“精神之个人主义”（个人的独立自主和发展）和“民众的大联合”（人民联合）的思想。他在此基础上，接受了列宁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把以政治组织、国家、团体改造社会组织、地方、个人这一自上而下的道路，依据杨昌济的思想，重新组成为先从社会组织、地方、个人的建设着手的自下而上的道路。

在革命时期，毛泽东与俄国的“先占城市后取农村”的革命道路相反，建立以红军和农民为主体自立团结的、独立自主的农村根据地，创造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并依此为核心，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在建设时期，毛泽东立足于国家的独立自主和人民的主观能动

性,在接受苏联国家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斯大林模式的同时,批评了“从上而下”的“恩赐观点”(本书,第245页),批评苏联偏重工业、重工业、国家、中央等主要方面,是“一条腿走路”方针。他创造出了将苏联的模式用人民战争的方法加以运用的,即把“从下而上”的群众运动与“从上而下”的政府命令相结合的,发挥农业、轻工业、社会、地方等次要方面的积极性,两方面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 关于毛泽东的几个思想课题

毛泽东的思想是巨大和强烈的,它掌握中国人民群众,变成了推动历史发展的“物质力量”(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为了搞清毛泽东的思想的意义,本书对毛泽东的思想从四个方面的课题进行考察,即反西方化与西方化、革命与建设、面临的难题与其他的可选择的方法(alternative)、生前与身后。

第一,关于毛泽东反西方化与西方化之间关系的思想课题。

在“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世界史中,毛泽东反抗“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获得了中国的独立自主,开辟了东方、农村反抗西方、城市的统治的道路。在此意义上,他抵抗了西方化恢复了自我。

照应了早期马克思从内部对资本主义的绝对批判,即“无产阶级、自我异化、共产主义”,断然从外部进行了对帝国主义的绝对批判,即“人民、矛盾、大同”(第一部第四章第三节)。他在革命中,建立了我=人民的概念,即由于受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剥削,在贫困和失业中挣扎,不能“吃饭”,因此反抗敌人、进行革命、恢复自我的独立和生存的主体;他以大量的农民,特别是贫农、雇农看做人民的主力军。他将敌人侵略和我方抵抗的关系作为矛盾看待,认为“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残余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就是中国近代的主要矛盾,并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加以解决。他通过建立根据地,进行人民战争,坚持

“持久战”，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政权及美帝国主义。人民由此进一步向前，经过以斗争解决矛盾的实践、认识的无穷的过程，把反对改造的人加以强迫改造，以达到“大同”即“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与改造世界”的时代、“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毛泽东展望了美好的前途。

毛泽东在建设中也贯彻了这一绝对的批判。他把面对“一穷二白”的不利条件奋起抗争、改变现状的中国人民、特别是贫下中农看做建设的主体。他的目标在于：人民通过不断认识和实践，解决中国的基本矛盾“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达到共产主义。他在中苏论战中，作为阻止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力量，最为重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批判了苏联的“一条腿走路”的方法，创造了“两条腿走路”的方法。而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刘少奇倾向于共产党、城市、生产力和“和平——改良”基轴的路线，提倡缩小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三大差别。他的这样的言行里表现出了中国、农村对西方、城市的统治的反抗。

另外，“宇宙矛盾——人的实践”的革命哲学，以中国传统思想的“天人合一”的近代化表现形式“宇宙即我，我即宇宙”的思想为基础，对外抵抗侵略，对内突破束缚，表现出了中国文明对西方化的抵抗和自立的一面。

施拉姆认为，毛泽东的思想是“起源于西方的革命思想，是西方化的媒介物”（[1989]，第192页）。诚然，毛泽东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基本实现了国家的独立统一，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中国以平等的资格加入到国际社会，可以说他的这样的成就是西方化的。然而，毛泽东继承了有对西方的抵抗与学习两个方面的中国近代思想，他的思想里，主体和目的是抵抗西方、反西方化，这是根源的、主要的方面，至于在方法上学习西方和苏联化（西方化的一种变种），不过是他思想的次要方面。他保持矛盾中不断追求和实现这两个方面。因此，我认为这里有毛泽东的思想与行动的独特性最大的历史意义。

第二，关于毛泽东的思想中革命与建设之间关系的思想课题。

在他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与发动反右派斗争、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大量牺牲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呢？从革命到建设，毛泽东的思想出现了怎样的变化呢？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首先必须考虑的是：中国的建设是比革命更为复杂和规模巨大的事业，而毛泽东的领导战争的能力要高于领导生产的能力。

（一）在思想内容上，与以革命战争的丰富积累为基础形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相比，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尚未十分成熟。

毛泽东在经济建设上应用了人民战争的方式，采取了生产者（即人民）要认识到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通过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发展生产力的总体战略。而且他在领导生产活动时反复进行“感性的认识→理性的认识→革命的实践”的过程，想要形成具体的战术。但是，经过苦战和挫折，他自己也承认不懂经济建设的许多问题，生产力方面知识很少。其后他虽然也领导了三线建设、地方工业化，努力认识经济建设的规律，但并没有把他的实践总结为具体的战术。他仅仅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试图把个人思想的革命化与生产力的发展相结合，但没能最终实现。

（二）毛泽东思考方法的柔韧性，在建设时期比革命时期下降了。

毛泽东在革命时期提出“论持久战”，针对少数的日本统治阶级压迫、欺骗日本人民而发动的侵略，把无数的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必然进行抵抗而且终将夺取最后胜利的“人民”理想主义，与敢于正视敌强我弱的实力对比，利用建立根据地发动人民战争的“持久战”进行抵抗，通过逐步改变实力对比而取胜的“实际”现实主义结合了起来。他进入建设时期，也没有丢掉这个根本的态度，在军事、外交两方面上也实现了切实的结合。而在经济领域，虽然依靠人民群众空前高涨的劳动热情推行了“大跃进”，但由于没有正确认识到作为课题的经济建设上的巨大困难，以及作为主体的“毛一党

“人民”能力上的不足这二者之间的实力对比，制定出了过高的指标，使人民处于过度劳动的状态，造成了众多饿死者的出现。“人民”理想主义独行，“实际”现实主义却没有跟上，使得国民经济失去了平衡而且受到挫折。不过毛泽东面对困难逐渐恢复了“实际”现实主义，冷静地判断了实力对比并慎重处置，从困难中摆脱了出来。文化大革命虽然情况更加复杂，但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三）毛泽东处理不同意见的方法，与革命时期相比，在建设时期民主的方面有所缩小，而专政的方面则有所扩大，渐渐失去了灵活性。

毛泽东对于斯大林失误的认识有着独特的见解，既不同意苏联的是斯大林个人原因的说法，也不同意铁托和西方等主张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原因的说法，而认为是制度的运用方法以及思想方法上的原因。他虽然努力整风，但是自己没有研究和克服制度内部的缺陷。随着大跃进的实践失败，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威信下降而党内、党外的不同意见和批评扩大，毛泽东面对这样的情况并没有用宽容的态度去接受不同意见和重新探讨、重新构建自己的观点，而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及对制度的运用上把自己的解释绝对化，针对提出不同意见和批评的党外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强行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把他们定罪为背叛政治领袖和思想导师的异端，坚决强行“人民、矛盾、大同”的绝对批判。他虽然批判了斯大林过分强调敌我矛盾和把肃反扩大化，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民主集中制的方法加以解决，而在中国的实际中没有得到充分的贯彻，而是以专政的方法，当成敌我矛盾来处理，这与《党史简明教程》中斯大林的党内斗争的逻辑十分接近。

第三，关于毛泽东面对的思想上的难题是什么，有无解决它的可能性和其他的可选择的方法这个思想课题。

#### （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毛泽东认为“《共产党宣言》就怕小资产阶级，把小资产阶级的缺点、消极方面提得过多，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看你强调哪



一面……对流氓无产者更不客气，就强调消极面？他有积极的一面嘛！根据我们的经验，可以改造的”（1964年12月20日。《万岁》丁本，第595页），进而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说法进行了批评。而且毛还反对列宁“国家愈落后，它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就更困难”的论断，提出“愈容易”，“不是越困难”，“人越穷，越要革命”（1959年12月—1960年2月，《万岁》丁本，第333页）。他表现了要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超越马克思、恩格斯，超越列宁的气概。

而他以为对于缺乏作为社会主义前提的资本主义“大量的、大规模的生产力”的中国，要“首先造成舆论夺取政权，然后才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同上，第347页）。他想要以人民“一穷二白”、发奋努力改变现状的共产主义精神作为启动的动力，扩大生产力。

对于处于美国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下的中国，毛泽东的主张具有现实的根据和合理性，实际上也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成功。但是，他要提高启动的动力，使经济得到持续的发展，那么，就要进一步深究对资本主义从外部批评的自身和从内部批评的列宁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观的异同，内在地理解具有高度生产力的资本主义，在吸收它的先进技术的同时，也吸收和扬弃它的制度和思想。似乎是他有其他的可选择的方法。在革命时期，毛提出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及《新民主主义论》的观点，以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论为基调，也吸收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阶段论；而在建设时期，他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的矛盾论压制“由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然后再到社会主义”的阶段论，阻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使内部对立激化。

## （二）平等与自由的关系

毛泽东坚持以平等取代不平等的强烈的平等思想，而与此相比较，他对自由的探求则不够充分。他在青年时期强调“精神之个人主义”，革命时期强调主观能动性、“人民的个性解放与个性发展”，有人格独立的思想的萌芽。他在建设时期，将这些思想发展为“个人自由”原理，与“人民平等”及“共产党的领导”原理形成鼎立

之势，构筑新型的社会主义，这种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的。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到开门整风，虽然出现了这一趋势的胎动，但随着向反右派斗争逆转，偏于把“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矛盾（《毛选》第五卷，第475页）看做绝对的对立。虽然他也主张人民内部的“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同上，第368页），但实际上把党内党外对自己的不同意见作为“异端”加以镇压，在“毛——党——人民”的循环结构中只有合乎自己的要求的信息才能传到自己的耳朵里。个人自由的薄弱对毛泽东起反作用，导致他思路变得狭窄，判断错误。可以说，个人自由从属于阶级矛盾和敌我矛盾受到限制。

而且，毛泽东采取“放”的方针，采取民主的方法，使人人都能自由发言和自由行动时，不同意见喷出，达到不可收拾，在这样的情况下，他采用“收”的方针，不得不用集中和专政的方法加以抑制。这个循环在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多次出现。这就是李大钊曾经提到过的难题，即把人民抗拒为政者东方式专制而采取的东方式自由（消极的自由），如何提高到培养人民自身判断是非的能力，通过讨论形成民意，把民意实现在政治目标的近代的自由（积极的自由）。毛泽东也碰到这个难题，然而最终没有能解决它。

### （三）工农兵人民群众与知识分子的关系

在文化领域矛盾表现得最为尖锐的文学艺术上，毛泽东在革命时期的《文艺讲话》中，要求文艺工作者担当抗日战争时期“文化军队”的任务，为此必须深入工农兵群众进行自我改造，把自己的思想情绪同他们打成一片，从而诞生了“人民文学”。在建设时期，他也对“只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的文艺界党的领导人爆发过自己的愤怒。这种突出了文艺工作者与人民相结合，创造表现“人民创造历史”的文化，和使人民自身成为创造文化主体的“人民”理想主义。然而他没有承认文艺工作者表现自己内在要求的自由，也没能充分理解他们使创造文化的自由和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并存的巨大困难。事实上他过于急切地要求他们服从共产党和转变到无产阶级，使思想自由和表现自由的范围变得狭窄，抑压了他们创造文化的萌芽。

从根本上讲，注意地继承文学家自然地表现其内心（“不用之用”）这一鲁迅的文学观的基轴，并将其纳入到自己的哲学以及理论、路线，政策中；目前采取毛亲自修改并获得通过的、周恩来所作的1964年《政府工作报告》里讲的文化革命……“要准备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最后完成”这个持久战的态势，推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看来毛泽东有这样的可选择的方法。

而实际上，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强行“知识分子的工农化”，而原与其并行的“工农的知识化”（提高工人、农民的文化水平）则没有强调到同样的高度，事实上倒退以学生、知识分子文化水平的降低为代价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距的缩小。

第四，关于毛泽东的思想对毛泽东死后的中国具有何种意义这一思想课题。

晚年的毛泽东，一方面取得了对国家独立的国际上的承认，基本上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其死后中国从准备应付世界大战的人民战争态势（战争与革命）中转换到适应世界经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平与发展）上创造了客观条件；而另一方面，他发动文化大革命，让红卫兵和群众造反，从走资派手中夺权，给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社会主义体制造成沉重打击，同时也造成了众多牺牲者和受迫害者，使毛泽东（绝对领袖）和有国教性质的毛泽东思想（绝对理论）的威信大幅度下降，也就产生了人民接受阶级斗争向现代化建设大转变的主观条件。

毛泽东思想对其死后的中国具有的意义，有以下几个要点：

（一）毛泽东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

（二）建国后的所谓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其实也可以说是运用人民战争方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即根据地社会主义——公社社会主义（毛泽东）的路线，和倾向于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刘少奇）的路线之间的矛盾。看来毛泽东不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而是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这种矛盾，从而激化了内部矛盾，造成了莫大的牺牲。

（三）毛泽东之后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上不就是

新民主主义吗？由于有要在 21 世纪中叶进入“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目标，因此，研究毛泽东的思想以及重新估价毛、刘之间的对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共产党，对外反对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南（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加大（1984 年 5 月 29 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56 页），对内克服两极分化，使不平等变为平等，使“全国人民共同富裕”（同上，第 111 页）。既然有此目标，继承和发展毛泽东从上而下和从下而上的“两条腿走路”经济发展战略也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如果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甚至不承认响应毛泽东号召的红卫兵和民众反对共产党干部的特权阶层化与官僚主义、资本主义，人民公仆变质为人民主人的现象，把不平等变为平等的正当要求的话，共产党主动地接受群众的批评，克服自我腐败变质，改造党的作风和制度，也将会是不可能的。

参加红卫兵运动批判共产党干部，参加“上山下乡”运动和农民一起劳动，受到农村的极度贫穷和落后冲击，而开始重新估价中国社会的 1600 万知识青年，从绝对化的毛泽东和绝对化的毛泽东思想中解脱了出来。而他们怎样继承和重新组成作为个人的毛泽东的思想是值得关注的。毛泽东在个人独立和人民联合的基础上，重新组成和吸取了马列主义，建立和实践了以处于“一穷二白”下的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工人和贫下中农，以及占世界大多数的亚非拉人民为主体，通过不断改造世界和改造自己，向着“大同”前进这一思想。而红卫兵时代的知识青年怎样从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中去寻找改造中国和世界的珍贵启示呢？

## 主要文献目录\*

### I 毛泽东著作

#### 中文

1. 竹内实监修，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编辑《毛泽东集》第1—10卷，北望社1970年—1971年（简称《毛集》）
2. 同上，《毛泽东集补卷》第1—9卷，别卷1卷，苍苍社1984—1985年（《毛补》）
3. 《毛泽东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52—1960年，有日文版，外文出版社1972年版
4.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上下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
5. 《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4年
6. 《毛主席语录》新华书店1967年（《语录》），（有日文版，外文出版社1966年版）
7.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有日文版，外文出版社1977年版）
8.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毛选》）
9. 《毛泽东文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996年，1999年（《毛文》）
1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1998年（《毛稿》）
11.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选读》）

---

\* 文末尾括号内文字为本书引用时的简称。

12.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 1981 年 翻印本 苍苍社 1985 年
1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1—6 卷 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毛军》）
14.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年（《外交》）
15.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0 年（《文稿》）
16.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2 年（《农村》）
17.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批注集》）
18.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七大》）
19.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 1983 年
20. 《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
21. 《毛泽东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2 年第四版
22.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书信》）
23. 《毛泽东致韶山亲友书信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6 年
24.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25. 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26. 《毛主席文选》1967 年小苍编辑企划翻印 1974 年
27. 《毛泽东思想万岁》甲本、乙本 1967 年 4 月 小苍编辑企划翻印 1974 年
28. 《毛泽东思想万岁》丙本 1967 年 小苍编辑企划翻印 1974 年（《万岁》丙本）
29. 《毛泽东思想万岁》丁本 1969 年 现代评论社翻印 1974 年（《万岁》丁本）（此书有东京大学近代史研究会日译本 三一书房 1975 年版）
30. 《学习文选（1949—1957 年）》（《新发现的毛泽东文献 1》，参照《毛泽东的秘密讲话》）1967 年（《学习文选》1）

31. 《学习文选（1957—1958年）》（同上2）（《学习文选》2）
32. 《学习文选（1959—1963年）》（同上3）（《学习文选》3）
33. 《学习文选（1964—1967年）》（同上4）
34. 《毛泽东思想万岁》（1951—1967年）（同上7）1967年6月
35. 《学习资料》（1961—1967年）（同上12）
36. 《学习资料》续一（1949—1967年）（同上13）（《学习资料》续一）

### 日文

1. 武田泰淳、竹内实《毛泽东 其诗和人生》文艺春秋 1965年
2. 新岛淳良《毛泽东最高指示》三一书房 1970年
3. 山田庆儿 编《现代革命思想 3 中国革命》筑摩书房 1970年
4. 野村浩一 编《现代史实录 9 中国革命》平凡社 1974年
5. 矢吹晋 译《毛泽东论政治经济学》现代评论社 1974年
6. 竹内实 编译《毛泽东论文化大革命》现代评论社 1974年
7. 矢吹晋 编译《毛泽东论社会主义建设》现代评论社 1974年
8. 藤本幸三 编译《毛泽东论人的革命》现代评论社 1975年
9. 太田胜洪 编译《毛泽东论外交路线》现代评论社 1975年
10. 竹内实 编译《毛泽东论哲学问题》现代评论社 1975年
11. 西顺藏 编《由原文编制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第五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第六册《从国共分裂到解放战争》岩波书店 1976年
12. 小野川秀美 编《中公平装本 世界名著 78 孙文、毛泽东》中央公论社 1980年初版
13. 德田教之、小山三郎、镫屋一 译《毛泽东的秘密讲话》上下册岩波书店 1992年、1993（依据 Roderick MacFarquhar, Timothy Cheek, and Eugene Wu, eds., *The Secret Speeches of Chairman Mao—From the Hundred Flowers to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 1989.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蒂莫西·奇克、吴文津编《毛主席的秘密讲

话：从百花齐放到大跃进》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 1989 年版译出)

14. 竹内实 编译《毛泽东早期词文集 中国向何处去?》岩波现代文库 2000 年

## Ⅱ 毛泽东年谱、传记

### 中文

1. 《毛泽东年谱 1893—1949》上中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毛谱》）

2. 《毛泽东军事活动记事 1893—1976》解放军出版社 1994 年（《毛记事》）

3. 金冲及 主编《毛泽东传 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毛传》）（日文版由村田忠禧、黄辛监译，1999 年、2000 年由みすず书房出版）

4. 胡长水、李瑗《毛泽东之路① 横空出世 1935 年以前的毛泽东》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3 年

5. 张树军、雷国珍、高新民《毛泽东之路② 民族救星 1935—1949 年的毛泽东》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3 年

6. 庞松、林蕴晖《毛泽东之路③ 立国兴邦 1949—1956 年的毛泽东》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3 年（庞松）

7. 郑谦、韩钢《毛泽东之路④ 晚年岁月 1956 年以后的毛泽东》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3 年（郑谦）

8. 高菊村、陈峰、唐振南、田余粮《青年毛泽东》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 1990 年

9. 李湘文《毛泽东家世》香港南粤出版社 1990 年

10. 李湘文《毛泽东家世（增订本）》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 日文

1. 埃德加·斯诺著、宇佐美诚次郎译《中国的红星》筑摩书房 1952 年初版（系据英文 1937 年版 Snow, Edgar, *Red Star Over Chi-*



na, London, Victor Gollancz LTD, First published October 1937.  
之 1944 年新版译出) 松冈洋子译 (系据 1968 年作者增补版译出)  
《筑摩丛书》29 1975 年初版筑摩学艺文库 1995 年

2. 埃德加·斯诺著、松冈洋子译《北京 华盛顿 河内》朝日新闻社 1968 年 (斯诺 [1968])

3. 陈志让著、德田教之译《毛泽东 毛与中国革命 筑摩丛书 176》筑摩书房 1971 年 (原著 Ch'en, Jerome (陈志让). *Mao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由牛津大学出版社 1965 年出版)

#### 英文

施拉姆《毛泽东》(由石川忠雄、平松茂雄日译《毛泽东 20 世纪大政治家 6》纪伊国屋书店 1967 年)

Schram, Stuart. *Mao Tse-tung*, Penguin Books, 1966.

### Ⅲ 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

#### 中文

1.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8 册 (1921—1949 年)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1992 年版 (《中央文件》)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20 册 (1949—1965 年)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1998 年 (《重要文献》)

3.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 1—11 册 (1916—1951 年) 1979 年 (《党史参考》)

4.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文化大革命”时期》上中下册 (计划中 19—32 中的 25、26、27, 实际上只编到 27) 国防大学出版社 1988 年

5. 同上翻印《“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中下册 (《文革资料》)

6. 胡华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中国图书发行公司 1951 年

7. 《红色文献》解放社 1938 年
8. 《革命历史资料丛书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资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9.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下册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井冈山》）
10.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人民出版社 1942 年版，1961 年再版，1980 年公开发行
11.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下册 人民出版社 1941 年编印，1952 年再版，1981 年重印
12. 《整风文献（订正本）》解放社 1949 年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文献》香港文化资料供应社 1978 年重版
14. 《党的文献》编辑部编《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专题选集 1949—1952》、《同上 1953—1956》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共和国》）
15. 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1949—1957 年）、下册（1958—1981 年）（《集体化》）
16.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选本》人民出版社 1956 年
17. 《1957 年 11 月 14 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人民出版社 1958 年
18. 《列宁主义万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0 年
19.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人民出版社 1960 年
20. 《红旗》杂志编辑部《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的问题》人民出版社 1963 年（日文本见〈续中苏论战〉合同出版社 1963 年）
21.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63 年 3 月 30 日来信的复信》人民出版社 1963 年（《25 条》）（日文本由外文出版社 1963 年出版）
22.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一评一九评）人民出版社 1965 年（《总路线》）

2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人民出版社 1966 年（《16 条》）

24. 《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 11 次全体会议公报（1966 年 8 月 12 日通过）》人民出版社 1966 年

25.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注释本（修订）》人民出版社 1985 年（《历史决议注释本》）

26. 廖盖隆主编《新中国编年史（1949—1989）》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编年史》）

27.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28. 马齐彬、陈文斌等编写《中国共产党创业三十年（1919—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

29. 马齐彬、陈文斌等编写《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9 年（《执政四十年》）

30.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人民出版社 1951 年

31.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七十年》）

32. 《向导》、《人民日报》、《红旗》等

## 日文

1.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部会编《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第 1—12 卷（1918—1945 年），劲草书房 1970—1975 年

2. 同上《新中国资料集成》第 1—5 册（1945—1958 年），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 1963—1964 年、1969—1971 年

3. 同上《中国大跃进政策的展开 资料与解说》上下册（1958—1960 年）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 1973—1974 年

4. 《北京周报》1963 年 8 月—1976 年 9 月

5. 毛里和子、毛里兴三郎译《尼克松访华机密会谈录》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2001 年

#### IV 思想资料、历史资料

中文

1. 《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王稼祥）
2. 温济泽等著《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群众出版社 1993 年
3. 本庄比佐子编《王明选集》第 1—5 卷 汲古书院 1970—1971 年、1973—1975 年
4. 王力《现场历史 文化大革命纪事》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5. 艾思奇《研究提纲 第五部分 三、对立统一法则》《哲学选辑》辰光书店 1939 年
6. 徐晓、丁东、徐友渔主编《遇罗克 遗作与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9 年
7.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 1994 年（胡乔木）
8.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9. 《胡乔木文集》第 1—3 卷 人民出版社 1992—1994 年
10. 《胡适文存》（共三集）亚东图书馆 1921、1924、1930 年
11. 《胡风全集》第 1—10 卷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12. 吴晗《海瑞罢官》北京出版社 1961 年 采华书林影印 1967 年
13. 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断片》新华出版社 1995 年（吴冷西）
14. 吴冷西《十年论战 1956——1966 中苏关系回忆录》上下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 年（《论战》）
15. 康有为《大同书》古籍出版社 1956 年
16. 《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0 年（《蔡集》）
17. 《在历史巨人身边 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师哲）
18. 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李达、雷仲坚合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笔耕堂书店 1933 年再版（据广岛定吉、直井武夫 1932 年白杨社出版的日译本译出）（《西洛可夫本》）
19.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20. 《周恩来选集》上下册 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1984 年  
(《周选》)
21.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 1—4 卷 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周军》)
22.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23. 《周恩来 1946 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
24.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年 (《周外交》)
25. 《周恩来政论选》上下册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3 年
26. 《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27. 《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
28. 《周恩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4 年
29. 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编辑《周恩来专辑》上下册 香港自联出版社 1971 年
30. 《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
31. 《周恩来年谱 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周谱 前》)
32. 《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上中下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 (《周谱 后》)
33.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 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3 年
34.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 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  
献出版社 1989 年 (《周传 前》) (日文版由狭间直树监译 1992—  
1993 年阿吡社出版)
35.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 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 (《周传 后》) (日文版由刘俊南、谭佐强译 2002 年岩波书店  
出版)
36. 章炳麟《诂书 (大字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
37. 《蒋总统集》第一、二册 国防研究院 中华大典编印会 1986  
年 (《蒋集》)
38. 《孙中山全集》第 1—11 卷 中华书局 1981—1986 年

39. 蔡尚思、方行编《中国近代人物丛书 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 1981 年（日文版由西顺藏、坂元弘子译注《仁学》岩波文库 1989 年）
40. 《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5 年（《张治中》）
41. 《陈云文选（1926—1949 年）》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42. 《陈云文选（1949—1956 年）》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43. 《陈云文选（1956—1985 年）》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44.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中下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4 年
45. 《邓小平文选（1938—1965 年）》人民出版社 1989 年（日文版由外文出版社 1992 年出版）
46.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人民出版社 1983 年（《邓选》）（日文版由外文出版社和东方书店 1983 年出版）
47.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982—1992 年）》人民出版社 1993 年（《邓选》三卷）（日文版 1995 年出版）
48.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年（薄一波）
49. 泡尔生著、蔡元培译《伦理学原理》（商务印书馆 1909 年初版）、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 1984 年（日文版根据 Paulsen, Friedlich. *System der Ethik mit einem Umriss des Staats- und Gesellschaftslehre*, Berlin, 1989 原著之 Einleitung Zweites Buch Grundbegriffe und Prinzipienfragen 由蟹江义丸译，1899 年博文馆初版，收入 1904 年的《伦理学大系 第二编伦理学原理》由同社出版）（《原理》）
50.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 1981 年（《彭述》）
51. 米丁等著、沈志远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 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米丁本》）
52. 杨昌济《达化斋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53. 王兴国等编《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3 年（《杨集》）

54. 《雷锋日记（增订本）》香港朝阳出版社 1969 年
55. 李一哲著、漆豪校注《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香港东亚出版社 1976 年（李一哲）
56.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9 年（李锐 [1989]）
57. 李锐《李锐文集卷三 大跃进亲历记》上下 南方出版社 1999 年
58. 《李大钊文集（1—5）》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59. 《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60. 《刘少奇选集》上下卷 人民出版社 1981 年、1985 年（《刘选》）
61.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刘稿》）
62. 《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下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刘谱》）
63. 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上下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
64. 《刘少奇选集》东京（香港？）中华文化服务出版社 1967 年
65. 《刘少奇问题资料专辑》台北“中共研究”杂志社 1970 年（《刘问题》）
66. 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编辑《林彪专辑》香港自联出版社 1970 年
67. 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梁漱溟）
68. 《林彪事件原始文件汇编》台北中国大陆问题研究所 1973 年
69. 《鲁迅全集》第 1—20 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年
70. 《共和国风云四十年 1949—1989》（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89 年
71. 《文革大字报精选》香港明镜出版社 1996 年（《大字报》）
72.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6 卷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1998 年，同书第 7—12 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年
73.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38 年原著）人民出版社 1975 年

74. 《五四时期社团》(一)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9 年  
(《社团》)

75.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下册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5 年 (《国民党》)

76.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9 年  
(《合作》)

77. 《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上下卷 重庆出版社 1992 年

78. 《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 (《救国会》)

79. 《国民参政会纪实》上下卷 续编 重庆出版社 1985 年 1987 年  
(《参政会》)

80. 《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 1983 年

81. 《国共谈判文献资料选辑 1945 年 8 月—1947 年 3 月》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82. 《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下卷 重庆出版社 1989 年  
(《政协》)

83. 丁望《中共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 1—6 卷 1967—1972 年  
香港明报月刊社 (《资料汇编》)

84. 《中共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汇编》台北《中共研究》杂志社  
1973 年 (《文件汇编》)

85. 《新青年》、《长沙 大公报》、《新时代》、《中国农民》等

#### 日文

1. 黑格尔著 松村一人译《小逻辑学》上下卷 岩波文库 1952—  
1953 年第一版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18 卷 补卷 1—5 卷 大月书店  
1952—1955 年

3. 马克思著 真下信一译《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论》国民文库  
(大月书店) 1970 年

4. 马克思著 城塚登、田中吉六译《经济学哲学手稿》岩波书店  
1964 年



5. 《列宁全集（第四版）》第1—45卷 别卷 I、II 大月书店 1953—1969年第一版
6. 平泽三郎、松本滋译《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五月书房 1951年（把1950年解放社出版之中文版所载文章，由俄文直译）
7. 《斯大林全集》第1—13卷 大月书店 1952—1953年
8.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见《斯大林战后著作集》大月书店 1954年第一版（《诸问题》）
9. 斯大林《哲学论文集》真理社 1953年
10.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莫斯科外文图书出版社 1950年（《党史简明教程》）
11. 村田阳一编译《共产国际资料集》第1—6卷 别卷 大月书店 1978—1982年 1985年
12. 《苏共第二十次大会》第1分册 合同出版社 1956年
13. 山路正一编译《被隐瞒的列宁“遗嘱”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日月社 1956年
14. 《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 1963年7月14日》东京苏联大使馆 1963年
15. 邓拓（吴晗、廖沫沙）著 每日新闻社编译《燕山夜话 附三家村札记》每日新闻社 1966年
16. 林克、凌星光《毛泽东的为人》共同出版社 1993年
17. 吉田静致《西洋伦理学史讲义》富山房 1905年初版（吉田静致）（杨昌济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18—1919年）
18. 坂田昌一《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把新的空气吹进科学》新日本出版社 1966年
19. 山本市朗《北京三十五年—中国革命中的日本工程师》上下岩波新书 1980年（山本市朗）
20. 《美国国务院白皮书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朝日新闻社 1949年（原书由美国国务院公共事务处出版科 1949年出版）
-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 Division of Publi-

cations, Office of Public Affairs, 1949.

21. 基辛格著 读卖新闻调查研究总部译《基辛格动荡的年代①  
勃列日涅夫与毛泽东》小学馆 1982 年（基辛格①）

22.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编、日中出版编辑部译《中国白  
皮书——控告中国》日中出版 1979 年（越南《中国白皮书》）

## V 研究论著

### 中文

1. 王希哲《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载香港《七十年代》1981 年  
二月号（王希哲）

2. 湖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哲学研究室（王兴国等）《毛泽东早  
期哲学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3. 王兴国《杨昌济的生平及其思想》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4. 王年一《1949—1989 年的中国③ 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  
版社 1989 年（王年一）

5. 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 年  
第五期（由砂山幸雄日译 载《世界》1998 年 10—12 月号）

6. 汪澍白、张慎恒《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探原》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7. 龚育之《〈实践论〉三题》载《论毛泽东哲学思想》人民出  
版社 1983 年（龚育之 [1983]）

8. 龚育之《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新起点》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9. 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读书生活》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1986 年（逢先知）

10.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抗美援朝战争史》第 1—3  
卷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0 年（《战争史》）

11. 严家其、高皋《中国“文革”十年史》上下册 香港大公报  
1986 年（严家其）（日文版由辻康吾监译 岩波书店 1996 年出版 2002  
年收入岩波现代文库）

12. 高华《北京政争与地方——解读〈江渭清回忆录〉》载《二十一世纪》(香港)1998年4月号(高华[1998])

13. 高华《红太阳怎样升起的 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高华)

14. 黄峥《刘少奇冤案始末》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黄峥)

15. 徐焰《军事家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

16. 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 增订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徐焰)

17. 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派——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2年(徐友渔)

18. 徐友渔《再说文革中的造反派——与华林山商榷》《异端思潮和红卫兵的思想转向》《西方学者对中国文革的研究》，载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

19. 徐友渔《我在1968年》见《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徐友渔[1998])

20. 徐友渔《自由的言说》长春出版社1999年(徐友渔[1999])

21. 萧延中《巨人的诞生——“毛泽东现象”的意识起源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发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

22. 萧延中《划时代悲剧的剖析与理解——对毛泽东晚年政治哲学思考的若干思考》《毛泽东晚年政治伦理观述评》见《晚年毛泽东》春秋出版社1989年(萧延中)

23. 萧延中主编《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1—4卷 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

24. 石仲泉《〈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导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

25. 石仲泉《毛泽东研究评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

26. 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 新增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石仲泉)

27. 丛进《1949—1989年的中国② 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

出版社 1989 年（丛进）

28. 戴向青、罗惠兰《AB 团与富田事变始末》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戴向青）

29. 戴晴《梁漱溟 王实味 储安平》江苏文艺出版社 1989 年

30.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编《“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同社 1991 年

31. 陈扬勇《苦撑危局——周恩来在 1967》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 年（陈扬勇）

32. 《党的文献》编辑部《毛泽东重要著作和思想形成始末》人民出版社 1993 年（《始末》）

33. 邓礼峰《建国后军事行动全录》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2 年（邓礼峰）

34. 逢先知、李捷《毛泽东与抗美援朝》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年（逢先知、李捷）

35. 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1969 年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研究和建议的前前后后》载《中共党史资料（第 42 辑）》1992 年（熊向晖）

36. 姚旭《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三十周年》载《党史研究》1980 年第 5 期（姚旭）

37. 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38. 杨曦光《评〈中国“文革”十年史〉》载《争鸣》第 154 期 1990 年 8 月（杨曦光）

39. 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年（杨奎松）（近藤邦康书评载《国家学会杂志》107 卷 7、8 号 1994 年 8 月）

40. 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年（杨奎松“1992”）

41. 杨奎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42.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1995 年
43. 杨奎松《毛泽东为什么放弃新民主主义——关于俄国模式的影响问题》载《近代史研究》1997 年第 4 期（杨奎松“1997”）
44.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9 年（杨奎松“1999”）
45. 杨春贵主编“中国哲学四十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杨春贵）
46. 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7 年（李锐 [1957]）
47. 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 年（李锐“1992”）
48. 李锐《李锐文集卷二 毛泽东的晚年悲剧》南方出版社 1999 年
49. 李辉《历史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香港出版有限公司 1989 年（李辉）（由千野拓政、平井博日译《被囚的文学家们——毛泽东与胡风事件》岩波书店 1996 年出版）
50. 李君如《毛泽东与当代中国》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1 年（李君如）
51. 李君如《毛泽东与近代中国》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52.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 1987 年（李泽厚）（近藤邦康书评见《社会科学研究》第 40 卷第 3 号 1988 年）（近藤“1988”）（村田雄二郎译《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载《思想》1989 年 9—10 月号。坂元弘子、佐藤丰、砂山幸雄译《中国的文化心理结构》平凡社 1989 年）
53. 刘金田、吴晓梅《〈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前前后后》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 年（刘金田）
54. 廖盖隆《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55. 廖盖隆《毛泽东思想史》香港中华书局 1993 年
56. 廖国良、李士顺、徐焰《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解放军出版社 1991 年（《发展史》）

57. 林蕴晖、范守信、张弓《1949—1989年的中国① 凯歌行进的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年

#### 日文

1. 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岩波书店 2001年
2. 石岛纪之《中国抗日战争史》青木书店 1984年（石岛纪之）
3. 岩间一雄《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注绪论》《冈山大学法学会杂志》第49卷第1号 1999年
4. 岩间一雄《东西文明的“融合”与冲突——最后的变法派 杨昌济》同上第49卷第3、4号 2000年
5. 梅本克己《现代思想入门》三一新书 1963年
6. 绪形康《危机的呼号地中国革命 1926—1929》新评论 1995年
7. 加加美光行《作为反话（似是而非的话）的中国革命——反近代精神的败北》田畑书店 1986年
8. 加加美光行《历史上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岩波现代文库 2001年
9. 简野道明讲述《日汉名诗类选评译》明治书院 1924年初版（简野道明）
10. 木山英雄《〈沁园春·雪〉故事——诗的毛泽东现象》载《文学》2001年1、2月号
11. 鲍里斯·古拉希维里著，大江泰一郎、小森田秋夫、竹森正孝编译《徘徊歧路的改革》日本评论社 1990年（古拉希维里）
12. 吴晓林《对“三线建设”的经济政策的考察》载《现代中国》第71号 1997年
13. 吴晓林《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政策过程分析——以三线建设和地方工业化的关系为中心》载《现代中国》第72号 1998年（吴晓林 [1998]）
14. 吴晓林《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化战略 三线建设的政治经济学》御茶水书房 2002年（吴晓林“2002”）
15. 小岛朋之《中国政治和大众路线——群众运动和毛泽东、中央及地方的政治动态》庆应通信 1985年

16. 近藤邦康《关于中苏论战、中意论战》载《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会报》第32号1963年5月

17. 近藤邦康《书评——野村浩一的〈中国革命的思想〉》载《日本读卖新闻》1971年4月26日（近藤“1971”）

18. 近藤邦康《辛亥革命》纪伊国屋新书1972年（近藤“1972”）

19. 近藤邦康《毛泽东——“翻身”与“科学”》载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现代社会主义——它的多元的面貌》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

20. 近藤邦康《1930年代中国的抗日思想》载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法西斯时期的国家和社会8运动与抵抗下》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年

21. 近藤邦康《杨昌济和毛泽东——初期毛泽东的“土哲学”》载《社会科学研究》第33卷第4号1981年

22. 近藤邦康《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劲草书房1981年（近藤）

23. 汤志钧、近藤邦康《中国近代的思想家》岩波书店1985年

24. 近藤邦康《长沙时代的毛泽东——哲学、运动、主义》载《社会科学研究》第37卷第5号1985年

25. 近藤邦康《中国的乌托邦——〈大同书〉》载木村尚三郎编《东京大学修养讲座13理想与梦幻》东京大学出版会1985年（近藤“1985”）

26. 近藤邦康《杨昌济的“自下变法”的思想——“以吾为主”和“以民为主”》载《伊藤漱平教授卸职纪念中国学论集》汲古书院1986年

27. 近藤邦康《北京、上海的毛泽东研究和井冈山、瑞金之旅——日中学术交流的报告（二）》载《社会科学研究》第40卷第5号1989年

28. 西顺藏、近藤邦康编译《章炳麟集》岩波文库1990年

29. 近藤邦康《书评——野村浩一〈近代中国的思想世界〉》载《日本经济新闻》1991年1月13日（近藤“1991”）

30. 近藤邦康《中国 1990 年 3 月—7 月 1 日中学术交流报告(三)》载《社会科学研究》第 43 卷第 1 号 1991 年
31. 近藤邦康《中国社会主义的转换与困难——以“救亡与启蒙”为中心》载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现代日本社会》3 东京大学出版会 1992 年(近藤“1992”)
32. 近藤邦康、和田春树编著《苏联改革和中国改革开放——中苏比较论》东京大学出版会 1993 年
33. 近藤邦康《毛泽东的思想——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中心》载《中国研究月报》第 550 号 1993 年
34. 近藤邦康座谈会《中国近代思想史和我》载《社会科学研究》第 46 卷第 5 号 1995 年
35. 近藤邦康《西顺藏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人伦、人格、人民》载木山英雄编《西顺藏 人和学问》内山书店 1995 年
36. 近藤邦康《毛泽东的思想——人民和国家》载《现代中国》第 69 号 1995 年
37. 近藤邦康《围绕“毛泽东的思想”的日中学术交流——日中学术交流报告(四)》大东文化大学国际比较政治研究所新闻通讯第 6 号 1997 年(近藤“1997”)
38. 近藤邦康《毛泽东的思想与 1949 年的中国》载《大东法学》第 10 卷特号 2001 年
39. 近藤龙哉《胡风和“文艺讲话” 1945 年重庆——1948 年香港》载《日本中国学会会报》第 54 集 2002 年
40. 朱建荣《毛泽东与越南战争 中国外交大转换与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东京大学出版会 2001 年
41. 史景迁著、小泉朝子译《毛泽东》岩波书店 2002 年
42. 高桥满《第二章 经济改革(1)——制度、政策和成果 1 中国》前载近藤、和田编《苏联改革和中国改革开放 中苏比较论》东京大学出版会 1993 年(高桥满《中苏》)
43. 竹内实《毛泽东研究笔记》新泉社 1971 年
44. 竹内实《中国 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合同出版社 1967 年



45. 竹内好《毛泽东》载《竹内好全集》第5卷 筑摩书房 1980年
46. 竹内好《国民文学论的深化》载《国民文学论》东京大学出版会 1954年
47. 塚本元《中国国家建设的尝试——湖南 1919—1921年》东京大学出版会 1994年（塚本元）
48. 唐亚明《〈毛主席语录〉研究》（上、下）载《中国研究月报》1999年8月号、9月号（唐亚明）
49. 中岛岭雄《现代中国论》青木书店 1964年
50. 中岛岭雄《北京烈烈》上下 筑摩书房 1981年
51. 中前吾郎《初期毛泽东的思想——逃出“世界苦”的浪漫主义》近代文艺社 2000年
52. 中屋敷宏《初期毛泽东研究》苍苍社 1998年
53. 西晋一郎、小糸夏次郎《礼的意义和构造》宙傍书房 1941年（小糸夏次郎）
54. 西顺藏《关于中国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载《西顺藏著作集》第1—3卷 内山书店 1995—1996年
55. 野村浩一《中国革命的思想》岩波书店 1971年
56. 野村浩一《人类智慧遗产 76 毛泽东》讲谈社 1978年
57. 野村浩一《近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新青年〉的群像》岩波书店 1990年
58. 野村浩一《蒋介石和毛泽东——世界战争中的革命》岩波书店 1997年
59. 古岛和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研文出版 1982年（古岛和雄）
60. 丸山昇《走向文化大革命之路 思想政策和知识分子群像》岩波书店 2001年（丸山昇）
61. 丸山真男《在日本的民族主义》载《现代政治的思想和行动》载《丸山真男集》第5卷 岩波书店 1995年
62. 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东京大学出版会 1989年

63. 村田忠禧《井冈山时期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载《现代中国》第59号1985年

64. 村田忠禧《1929年的毛泽东——关于毛泽东离开与回到红四军的问题》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外国语科编《外国语科研究字报》第34卷第5号1987年

65. 村田雄二郎《中国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政治、亲统、道统》载《岩波讲座 现代思想 20世纪知识社会的构图》岩波书店1994年

66. 山本恒人《关于中国文革初期工人阶级底层——临时工、合同工的造反》载《亚洲经济》第22卷第2号1981年（山本恒人“1981”）

67. 山本恒人《第3章 1960年代劳动、教育、下放“三位一体”政策的展开及破产——以半工半读制度为视点》载加加美光行编《现代中国的挫折 反省文化大革命》亚洲经济研究所1985年（山本恒人“1985”）

68. 杨炳章著，加藤千洋、优子译《邓小平 政治传记》朝日新闻社1999年（杨炳章）

69. 罗钢、王培元著，近藤龙哉译《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历史考察》载《野草》第63号1999年2月

70. 罗钢、王培元著，近藤龙哉译《关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本的历史考察》上下，载《野草》第64号1999年8月第65号2000年2月

71. 罗钢、王培元著，近藤龙哉译《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历史背景的考察》上中下载《野草》第66号2000年8月第67号2001年2月第68号2001年8月

72. 和田春树《列宁的革命思想——围绕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载《历史学研究》288号1964年5月（和田春树“1964”）

73. 和田春树编《世界思想家 22 列宁》平凡社1977年（和田春树“1977”）

74. 和田春树《国家主义体制的阶段论》浮内谦、荒田洋编《斯

大林时代的国家和社会》木铎社 1984 年

75. 和田春树《作为历史的社会主义》岩波书店 1992 年（和田春树）

76. 和田春树、近藤邦康编《苏联改革和中国改革开放 中苏比较论》东京大学出版会 1993 年（和田春树《中苏》）

77. 和田春树《朝鲜战争》岩波书店 1995 年

78. 和田春树《朝鲜战争全史》岩波书店 2002 年（《全史》）

79. 渡边一卫《第 2 章 湖南文革和“省无联”》载加加美光行编《现代中国的挫折 反思文化大革命》亚洲经济研究所 1985 年（渡边一卫）

80. 渡边一卫《第 3 章 上海公社的希望和挫折》载加加美光行编《现代中国的去向 反思文化大革命Ⅱ》亚洲经济研究所 1993 年

#### 英文

1. 阿里夫·德里克《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由砂山幸雄日译《毛泽东思想的现代性和反现代性》，载《岩波讲座现代思想 14 近代/反近代》岩波书店 1994 年版）

Dirlik, Arif. *Modernism and Anti-modernism in Mao Zedong's Marxism.*

2. 约翰·哈格里夫《学术与帝国：1880—1970 年爱伯丁大学的海外联络 爱伯丁大学历史五百年的研究》爱伯丁大学出版社 1994 年

Hargreaves, John D. *Academe And Empire, Some Overseas Connections of Aberdeen University 1880—1970, Quincentennial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Aberdeen, Aberdeen University Press., 1994.*

3. 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1963 年

Schram, Stuart R.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 Frederick A. Proeger, 1963.*

4. 施拉姆《对佩弗·沃尔特在中国研究中的“革命”的一些看

法》《近代中国》1977年4月第3卷第2期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Pfeffer—Walder “Revolution” in China Studies, *Modern China*, Vol. 3 No. 2 (April 1977), pp. 169—183.

5. 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1989年(由北村稔日译 苍苍社1989年版)

——*The Thought of Mao Tse—tu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6. 施拉姆《毛泽东百年：一位统治者的遗产》《中国季刊》第137期1994年3月

——Mao Zedong a Hundred Years on: The Legacy of a Ruler.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7 (March 1994), pp. 125—143.

7. 史华兹《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哈佛大学出版社1951年(日文版由石川忠雄、小田英郎译《中国共产党史》庆应通信1964年)

Schwartz, Benjamin I.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8. 史华兹《毛主义的“传说”的传说》载《中国季刊》第2期1960年6月(史华兹《1960》)

——The Legend of the “Legend of ‘Maoism’”, *The China Quarterly*, No. 2 (June 1960), pp. 35—42.

9. 史华兹《共产主义和中国：变动中的意识形态》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68年(史华兹《1968A》)

——*Communism and China: Ideology in Flux*, HUP, 1968.

10. 史华兹《道德王国：对“文化大革命”中领袖和党的宏观透视》载《中国季刊》1968年7—9月第35期(史华兹《1968B》)

——The Reign of Virtue: Some Broad Perspective on Leader and Party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35 (September 1968), pp. 1—17.

11. 史华兹《再论马克思主义的精华——答复》《近代中国》1976

年第2卷第4期（史华兹《1976》）

——The Essence of Marxism Revisited: A Response, *Modern China*, Vol. 2 No. 4 (October 1976), pp. 461—472.

12. 史华兹《哲学家毛泽东》载威尔逊编《历史天平上的毛泽东》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1977年（史华兹《1977》）

——The Philosopher, Dirck Wilson (ed.) *Mao Tse-tung in Scale of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13. 史华兹《晚年毛泽东的思想：在救赎与沮丧之间》1989年（“1989”）见麦克法夸尔等编《毛泽东的秘密讲话——从百花齐放到大跃进》（德田教之等日译本下册，岩波书店1993年）

——Thought on the Late Mao: Between Total Redemption and Utter Frustration, in Roderick MacFarquhar, Timothy Cheek, and Eugene Wu, eds., *The Secret Speeches of Chairman Mao—From the Hundred Flowers to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 1989.

## 后 记

在中国革命胜利四年后的 1953 年，我进入大学开始学习汉语。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的 50 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前半段为从 1953 年到 1978 年的 25 年，那时日本与中国之间没有建交，我虽致力于日中学术交流，却一步都不曾踏上中国的大地；后半段为 1978 年至今的 25 年，这期间我共 12 次访问中国，混迹于中国人之间生活约达 740 天之久。我在这两个时期的主要研究课题也是不同的，前半段为《日本的侵略与中国的抵抗》，后半段则是《日本资本主义与中国共产主义》。前半段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谭嗣同、章炳麟、李大钊，后半段则是毛泽东。在前半段，我与毛泽东生活于同一时代，曾怀着喜忧参半的心情隔海关注毛泽东这一绝对重量级人物的言行，并惊异于自己有时会被他的言论鼓舞得精神抖擞。在后半段，我在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苏联解体等社会主义的剧变而震惊的同时，阅读了已故毛泽东的著作，来追寻他的足迹。对著作的部分内容怀有同感，对部分内容又心存疑问。

本书主要致力于通过研读毛泽东著作来把握他的思想。其中反映出的毛泽东的形象，是与中国已经公开的资料及通过中国人发表的研究而能大致了解到的当时的历史相对照的。他在革命时期的思想和历史能相对较好地吻合，对其相关联系也能大体理解，但在建设时期有些地方总也无法吻合，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困难。希望随着今后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和资料的进一步公开，我能够深化我的研究并进行补充修正。

毛泽东将宇宙与我一体化，树立了在最大限度地发展整体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发展个体，在身体向最高处发展的同时使精神也发展到最高处的哲学。他主张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我，也即“人民”，打倒敌人——压迫者和剥削者帝国主义，从而解决敌与我的“矛盾”，实现没有压迫和剥削的、全人类自觉地改变自己、改造世界的“大同”即共产主义，从外部对帝国主义进行了彻底的绝对批判。

我以毛泽东的这种一以贯之的特性为基础，致力于把握毛在革命和建设中的贡献、成果及挫折、损失这两个方面。毛泽东伟大而强烈的思想控制了中国的人民大众，并转化为“物质力量”，改造了一个时代的中国和世界，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当然也必须看到，他也给后人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和尚待解决的课题。

在这 25 年里，我曾向很多人谈及我的研究，并得到了重要的建议和批评。

日本方面，在此诚向在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会、日本现代中国学会、政治思想学会、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中苏比较研究会、比较政治研究会、全体研究研究会、月间研究会、东京大学法学部政治理论研究会、大东文化大学国际比较政治研究所研究会、大东文化大学东洋研究所现代中国班、北海道大学、信州大学等地倾听我的研究报告并做了发言的各位先生表示谢意。

中国方面，首先感谢几乎每次都做我“担保”的单位，使我有机会参加学术交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及其历任所长：已故的刘大年先生，王庆成先生、张海鹏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学研究所、哲学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湖南省社会科学院、辽宁省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辽宁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厦门大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单位，曾给予我发表研究成果的机会，并就课题进行了讨论，在此也表示感谢。

同时也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南京大学、国防大学、中共中央党校等单位的应邀与我进行个人面谈的学者们。

就个人而言，在日本，是我已故的老师西顺藏给予了我研究毛泽东的契机，本书写作过程中我经常与老师进行探讨。我原想如果老师能读到这本书的话，会对某些地方提出批判，对此我会一一反驳，以让他了解我的基本写作方向。既是先辈又是老师的古岛和雄先生曾就中国的农村革命和社会主义问题给予我很多指教。友人和田春树使我首次接触了“备战世界战争的国家社会主义”观点并深受影响。在此对三位先生深表谢意。

与我同辈的丁守和、李泽厚、金冲及等，以及下一辈的李君如、杨奎松、萧延中等曾与我进行过非常有益的交谈。中国共产党理论家、毛泽东问题研究家已故的廖盖隆，逢先知、龚育之、石仲泉等诸位曾与我交换过意见，使我从中吸收了很多东西。在丁守和先生的引荐下，我得以与萧克（上将）、师哲、李锐等毛泽东身边的、在中国革命中身经百战的老将们进行面谈，真的是非常难得。在此谨向上述的各位先生们表示深深的感谢。

在中国，多年来我追寻着毛泽东的足迹，走遍了韶山、长沙、板仓（杨昌济故居）、北京、上海、广州、武汉、井冈山、瑞金、大渡河、延安、重庆、西柏坡、香山、北京、庐山等地，亲身经历了毛泽东活动过的广阔天地，使我感慨颇深。岩波书店的马场公彦先生从计划制定之初开始，多年来一直耐心地激励我、指点我、支持我，在此顺致谢意。

近藤邦康

2003年6月25日



## 中译者后记

今年是毛泽东诞辰 110 周年。随着时光的流逝，毛泽东这个名字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已经是一个历史人物。参加本书翻译的研究生同学，大部分是毛泽东去世后出生的。通过本书的翻译，给大家一个重新学习、认识毛泽东的一个极好机会。毛泽东是一个改变了中国历史的杰出人物，了解了毛泽东，也就了解了中国的现代史。

本译著是集体劳动的结晶。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的研究生孙继强、万鲁健、周志国、石秀梅、张利军、田庆立、刘志强、曹修平、邵建彤同学参加了本书部分章节的翻译工作，还特请了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桑凤平副教授承担了部分章节的翻译，最后全书由宋志勇同志统稿。在翻译定稿过程中，作了个别删节。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得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潘平先生的大力帮助和指导，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另外，本书作者近藤邦康先生不远千里，特别从日本赶到天津，与翻译人员见面，当面指导翻译，并对译稿进行了认真的校审。对此，我们深表感谢。

由于译者能力有限，加之时间紧张，本书在翻译上难免存在不尽人意之处，望广大专家、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宋志勇 孙雪梅

2003 年 10 月 16 日

## 中译本著者后记

为了增进中国读者对本书的理解，我把自己写作本书的动机及立脚点和研究方法解释一下。

首先，关于我的动机及立脚点。

1945年日本战败、被美国军队占领的时候，我是小学5年级学生。进入初中和高中以后，我读了《论语》、《孟子》等，知道中国传统思想对于日本文化的基础确有很深的影响，很感兴趣，决心专门研究它。

1953年进入东京大学开始学习现代中文，当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不久，我看斯诺的《西行漫记》、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被日本的侵略、战败和中国的抵抗、革命这个当代的现实强烈地吸引，我感觉到我心里发生了对旧中国的兴趣和对新中国的关心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我想理解中国人抵抗外国侵略和国内专制、把旧中国改造为新中国的苦战恶斗的过程，因此开始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

战后日本知识分子有这样一种思想倾向：从日本战败和中国革命胜利这个历史事实出发，在文化上深刻地思考两国近代的思想意义，用“中国近代”这面镜子对照“日本近代”，来透视“日本近代”的消极的黑暗的一面，自己批评自己；并在政治上反对美国和日本政府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和对中国的包围圈，迫切要求日中邦交正常化。

竹内好是代表这个思想倾向的人物，认为“中国近代”是抵抗

“西方近代”的扩张、侵入的过程，毛泽东的思想的核心就是抵抗。西顺藏也是代表这种思想倾向的，认为在中国抵抗西方侵略的过程中，旧中国的总体的“人伦”原理和“行”的立场，抵抗西方近代的个人的“人格”原理和“知”的立场，并推翻自己的结构，产生了毛泽东哲学的总体的“人民”原理和个人的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实践”的立场。

我向这两位老师学习，继承了他们的思想倾向，把它作为自己的立脚点。

在1953—1978年的25年间，因为日本和中国之间没有邦交，我没有机会访问中国。那个时候，我以“日本的侵略和中国的抵抗”为主要课题，以先行于毛泽东的谭嗣同、章炳麟和李大钊等为主要对象，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

1972年9月日中两国政府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我非常高兴。1978年以后访问中国、进行学术交流的时候，我把过去通过文献研究形成的中国的形象和自己体验的中国的实际生活进行对照，我觉得对一百多年的中国近代的“革命的潜力”，过去认识基本上对的。但是我发现对现代的“社会主义的现实”，过去认识不够，认为它有维护国家独立和人民团结、建立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积极面，也有权过度集中在上面少数人，很难发挥下面多数人的主动性这种制度低效率和不合理等的消极面。我又感到压在现在的“历史的重担”，远远超出过去推测的范围。我比过去更加了解中国人急于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心情。

从1980年代到90年代，研究俄国、苏联历史的专家和田春树总结东欧剧变、苏联改革和解体、中国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的转折等世界历史的巨大的变动，提出“由应付世界战争时代的国家社会主义，到适应世界经济时代的民主社会主义”这一认识框架。我吸取这个框架，在“日本的侵略和中国的抵抗”的老课题上，附加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和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新课题，以毛泽东为主要对象，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

其次，关于研究方法。

对于把“毛泽东思想”看做“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种中国人的观点，我可以理解、尊重。但是，以一个日本人、一个知识分子的眼睛看，我首先被毛泽东个人吸引住，因此想抓住生活在一个时代的毛泽东个人的思想。我认为，毛泽东继承“救亡——民主”这一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框架，在这个基础上吸取“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一列宁主义的框架。我把毛的一生划分为青年时期、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研究各个时期的特点和其互相关系。

关于青年时期，我非常重视继承杨昌济的“以吾为主”、“以民为主”、“变之自下”的思想而形成的毛泽东的早期思想，即个人独立、人人联合的五四新思想。我以为李大钊、毛泽东等五四运动中城市知识分子的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思想，在湖南农民运动中进入了农村，在农民的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的运动中被具体化了，并形成了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基础。

关于革命时期，我最大地重视毛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思想，一方面尽力阐明他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人民战争等“武装斗争”思想和“宇宙矛盾——人的实践”的哲学等“党的建设”思想；另一方面特别注意他的“拥蒋抗日”的民族革命等“统一战线”思想。我以为毛泽东“以斗争求团结”，以共产党、红军、革命根据地的独立自主为中心支柱，拥护和促进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自主、联合，以自下而上的人民民主，一面迫使蒋介石实行抗日、民主，一面支撑蒋的自上而下的国家统一，把统一战线坚持下去，一直到抗战最后胜利。

《毛泽东选集》第1、2、3卷是根据毛泽东的1951年“反蒋抗美”的观点，将抗日战争时期的原文，加以大幅度地删改修订。因此，为了了解毛的抗日战争当时的思想，我主要地依靠日本人搜集当时公开发表的原文或接近原文的资料的《毛泽东集》及其补卷和邓小平时代出版的《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军事文集》等进行研究。

关于建设时期，我特别重视毛泽东立足于国家独立自主和人民的主观能动性，一面接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框架，一面批评它

的“从上而下”的“一条腿走路”的方法，并主张把苏联的框架用中国的人民战争的方法加以运用。这就是把“从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和“从上而下”的政府命令相结合的“两条腿走路”的方法。我看毛还没能把“从下”和“从上”很好地结合起来，但在他的摸索试验的成果和损失里，有重要的启示应该今后研究。

总之，我以为毛泽东“人民、矛盾、大同”这种从外部对帝国主义进行的“绝对批判”是一贯的；在革命时期，他把“人民”理想主义和“实际”现实主义坚韧地结合起来，在建设时期，他虽然努力结合这两个方面，但有时出现了背离，陷入了困境，倾注力量于再结合，这是变化的。

写完了本书以后，我感到我今后的研究还有（一）毛泽东和“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二）毛泽东和周恩来、（三）毛泽东和鲁迅、（四）毛泽东和蒋介石等等重要的问题遗留下来。

我尽力吸取中国人的先行研究和美国人等西方人的先行研究，然而归根结底力图发表“有日本特色的毛泽东研究”。我心里暗中希望本书有一些“旁观者清”之处。若能承蒙中国读者胸怀宽阔，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精神看本书，是幸甚之至。除了研究不够之外，我想误解执迷也定然不少。敬请读者不客气地批评与指教。

近藤邦康

2004年5月25日 日本东京